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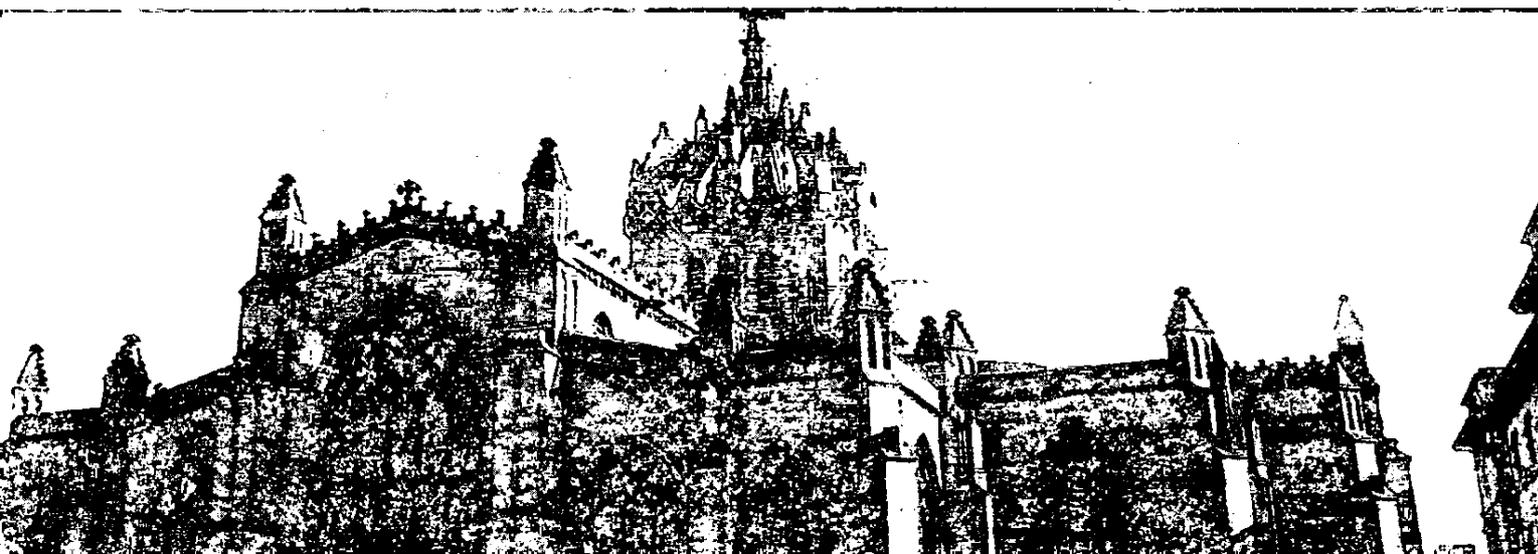
John Knox

新教著名人物传记译丛

诺克斯传

[英] 托马斯·麦克里◎著
Thomas M'Crie

华夏出版社



总序

何光沪

世界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发生在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同后来的“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一起导致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世界的现代化的确与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有密切联系，而比之早两百年的宗教改革运动则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一句话，不论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还是造成现代世界政治格局的英、法革命和美国革命，以及人类思想的现代发展，全都同四百年前那一场席卷欧洲各国的宗教改革及其后果密切相联。不了解那场改革及其后果，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现代世界及其种种问题。

那场改革的直接后果，就是基督新教及其各个派别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上述历史巨变的，正是那场改革中涌现的重要历史人物以及新教各派的创立者和中兴者们的思想与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不了解宗教改革的重要历史人物以及

新教各派中最重要的人物，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世界及其种种问题，包括其思想渊源及解决思路。

但是，在我国几十年来甚至近一个世纪以来出版的历史读物中，这方面的人物传记几乎是一个空白。这必然会对我国一般读者和历史学界的有关认识造成某种盲点，不利于我们认识历史、认识现实、认识世界，也不利于我国历史学术的全面发展。

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哲学界、文学艺术理论界以及宗教学界，已开始注意新教的历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但人物传记这一领域依然资料匮乏，这也许属于资料最为贫乏的领域。

有鉴于此，新教著名人物传记译丛的出版，实在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必将有助于填补空白，矫正盲点；有利于一般读者了解历史，了解世界；有利于我国有关学术界收集资料，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推动历史学和宗教学的发展，对我国人文学术研究作出贡献。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者说明

本书译自一部数百年前的英文著作，文法古老而晦涩难懂，这给翻译增加了很大的难度。译者宏恩先生在近十个月的翻译过程中付出了艰辛努力，突破种种困难，译出准确优雅的文字。另外，本书所有注释，除特别说明外，均由宏恩先生所加，这也耗费了他许多心血。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的审稿是由现在在美国深造的冀玉静编辑完成。她以前研究的方向是苏格兰历史，对诺克斯特别推崇，她一再推荐本书，认为本书英文虽难，却是有史以来最权威的诺克斯的传记。她的意见坚定了我们出版本书的信念，在此也对冀编辑表示感谢。现在回首本书翻译过程中的艰辛，还深深庆幸当初因为“无知者无畏”，敢于把这本书的翻译出版提上日程。

本丛书至今已出版了七本。有读者反馈，J. C. 莱尔的《英国复兴领袖传》因为换了封面，所以认不出是同一系列的书。我们在此特别解释一下，《英国复兴领袖传》和明年也许将出版的莱尔的另一名著《英国改教先贤传》，因为体例与单人传记略有不同，所以更改封面以示区分。将来的单人传记还会沿用以前的封面风格。

最后，特别就用纸问题向读者致歉。今年下半年以来，纸张供应极度紧张，只好降低用纸标准。我们经过多方努力，好不容易调到这批再生纸。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本书及一两本加印的传记，用

纸质量不如先前。在此特别恳请读者原谅。因为这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将来我们还会力争用较好质量的纸张。

阅读本书，改教家火热的激情扑面而来，惟愿当代的我们也能得到诺克斯一样的灵感，在此世代如明光照耀。

丛书策划人

代 序

约翰·诺克斯——清教主义的创始人

提起约翰·诺克斯，多数人只会联想起苏格兰，认为只有苏格兰人该怀念他，纪念他的著述。对于这样的说法，大可以作如下的回应：到过日内瓦，见过著名的为那些伟大的宗教革新者所立的纪念碑的人，一定会留意到约翰·诺克斯的名字也在其中。他的名字，与可敬的加尔文和法雷尔等同列。这就足以证明，约翰·诺克斯不单是在苏格兰干了一番不可思议的大事，他的影响是遍及全世界的。

现在要谈一谈诺克斯的为人。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备受诽谤的。不错，加尔文也遭受过不少诽谤，但约翰·诺克斯比他更甚，可能是因为他的性格使然，加之他受逼迫的原因与加尔文的情形有点不同。但这一切的诽谤，都是出于人的无知。罗马天主教的人士及其他种种主张大公教会的人，也给了他各样恶意的中伤。可是我并不是要为约翰·诺克斯辩护，他并不需要任何人为他辩护。

让我们先看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人。他个子矮小。这一点是不能忽略的！有人说，世上最伟大的事迹，都是矮个子和小国所作的！

他精力充沛。历世历代以来，神所使用的伟人，都有过人的精

* 本文节选自《清教徒的脚踪》中《约翰·诺克斯——清教派的创始人》一章。以琳出版社。钟马田著，梁素雅、王国显译。

力。约翰·诺克斯能成就那一切，当然可以说是出于神的恩典。但他本人特有的条件，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这种特有的条件，不但是伟大的政治家所具备的，也不仅是军事领袖所共有的，一般而言，也同样是伟大的传道人所表现的。

约翰·诺克斯还有一点特色，就是精明过人。他当时的处境，也叫他必须处事机灵。在当时而言，诺克斯只能与苏格兰的当权者合作，但他深知这些表里不一的政客们的嘴脸，洞悉他们的奸诈。好几次都因为他的机智和“完美无瑕的政治手腕”，宗教改革才幸免于祸。

然后我要提到他过人的智慧。不少人批评他满有偏见，为人执拗无情，非常自负，野心很大，而且不能容忍别人的异议。但当你读过有关他的客观的记叙，便不得不佩服他那非凡的智慧。他似乎总是晓得适可而止，永远不会做得过分。尽管有人怂恿他，又有人阻拦他，他都能巧妙地处理事情，做得合乎中道。比方他在伯威克的时候，他并不公开抨击当时官定通用的祈祷书，只是索性不采用它。从这件事上，你能看出怎样才是智者的作为。我强调这一点，因为我常常劝告年轻的弟兄们：行动胜于雄辩。只要有实际行动，无需事前大事宣传。

现在也要强调一下他的创新能力。有些人以为，约翰·诺克斯不过是加尔文的“传声筒”。这样的说法完全不符事实。别人可能会犯此毛病，但约翰·诺克斯绝对不会，他是能独立思考的人。他若从圣经里有所领会，就会毫不迟疑地提出来，就算是与别人的不同，他也不会缄默不言，就算是与丁道尔或加尔文的见解相违，他也不会退缩。他就曾经在信徒对他们的君侯及统治者应有的责任这个问题上，表示不同意加尔文和丁道尔的意见。他主张在某些环境下，可以与统治者对抗，甚至可以起来革命。这是他独有的眼光，他没有在这个问题上附从加尔文的意见；事实上，在其他事上，除非见解相同，否则他都不会盲从附和。他爱自己分析问题，找出答案。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能毫不加以思索，便全盘接受从书本

上得到的。就算是伟人所写的书，我们也不能这样囫囵吞枣，必须慎思明辨。

这就引出了他勇敢的特性。他死的时候，人称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这倒说得没错。我可以加上一句：他连女人也不怕。而他当时所要对付两个女人——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和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女王，她们的本事各有千秋，对约翰·诺克斯而言却毫无用武之地。他的无畏精神叫人难以相信。

至于作为一位传道人的表现，他又如何呢？他的讲道激烈有力。伟大的传道者，话语通常都铿锵有力。这并不是出于人的天性，而是出于所感受到的福音的能力。约翰·诺克斯是个充满能力的传道人。他的讲道曾深深影响到爱德华六世，还有许多人也深受他的影响。我们常爱提到，苏格兰玛丽女王如何感受到他话语的能力，往往因而流泪暗泣，不是因为她信服这些话，而是出于痛恨和愤怒；她对这个人充满了畏惧，惧怕他祷告和讲道所发出来的能力，甚于许多军团所带来的威胁。兰道夫（Randolph），一位英格兰大使，曾这样说过他对约翰·诺克斯的讲道的感受：“这个人的声音，在一个钟头内注入我们里面的活力胜于六百个号筒一齐向我们的耳朵吹响所带来的。”

现在来谈谈约翰·诺克斯是不是“清教主义的创始人”的问题。

我们根据哪些方面才能说约翰·诺克斯是“清教主义的创始人”呢？第一个答案，是根据他的独立创新的思想。顾名思义，清教徒都是有独立思想的，他永远不会是个“代表既成体制的人”；他不光在宗教信仰方面不是属于“国立教会”，就是在其他方面也是一样。这一点非常重要。有人生下来就是“代表既成体制的人”，不管在哪一方面，他们永远站在当权者那一边，永远属于一些固定了的团体。他们只致力于保存旧有的秩序。但清教徒基于他的本性与精神，永远不会是那个“代表既成体制的人”，这是由于他的独立性与创新精神，也因为他自己研读圣经，渴慕认识真

理，就不管别人怎样说。

第二点，约翰·诺克斯有资格称为“清教主义的创始人”，是因为他能把清教主义信仰的导向原则明确地实行出来。这些原则，首要的是以圣经——神的话，为最高的权威。这是诺克斯坚守的原则，如果没有圣经的根据，他就绝对不去做，也不准许弟兄们去做。第二个原则，是主张教会“改革要延伸到根部与枝条”，这话出自诺克斯之口。换句话说，清教徒并不以仅仅在教义上有改革而感到满足。（诺克斯和其他清教徒们，与英国的其他带领的人意见相左，也是出于这原因。）很多人都主张改革教义，都是加尔文派的。但差别之处，在于清教徒对改革的彻底要求，不仅要求改革教义，也要把改革贯彻到实践方面，包括对教会本质的整个看法。对清教徒来说，改革不仅是修改或一点改善，改革是教会的“全新的建造”——不仅是将已存在的修改一下，这个建造是根据新约的教导。

他要把教会恢复到新约圣经里的模式。基于此，他认为必须改革教会的仪式，就是教会崇拜的处理和所有圣礼的施行。他这样说：“向神的敬拜，尤其是圣礼的施行，必须以圣经所指明的为准，不得添加也不得减少。”又说：“教会没有权柄，可以自行发明一些宗教仪式，再自行加上重要的意味。”他因为说了这样的话而受到了指控。他分辩说：“人不可创立或发明一种讨神喜悦的宗教，他只能持守并遵行从神而来的信仰，不能加以删减或修改。”

他所高举的原则就是这样。但更重要的是，他把原则应用出来。没有所谓理论上或学术性的清教徒。不错，有人对清教派思想感兴趣，但是，除非他们能实行这些思想；否则就是清教主义的叛徒，因为真正清教徒的特色，就是实行。

还有一件事很重要。当时的习惯是在领受圣餐时下跪，这是安立甘派的做法。约翰·诺克斯是第一个教导信徒坐下来领受的。他不但这样教导，他自己也先实行出来；这是把清教主义精神应用出来的表现。

至于洗礼方面，他拒绝为已被逐出教会的人的儿童施洗，也反对平信徒可以私下给人施洗的传统，也拒绝在施洗时手画十架的表号。

有件事很值得留意。诺克斯曾被邀请前往法兰克福，担任逃亡到那里的英国信徒的教会的牧师。在那里，他和惠廷厄姆（William Whittingham），就是那部著名的日内瓦圣经的主要翻译者，一起草拟了一份教会崇拜的仪文，以代替他们所摒弃的公祷书，并公开说出他对公祷书的意见，结果被逐出。之后他前往日内瓦，该仪文成了日内瓦的教会所采用的教制，人称它为“日内瓦典籍”（Geneva Book），直到如今，苏格兰教会正式采用的，就是这本教会仪文的典籍。因此，在日内瓦的英国信徒的教会，可算是第一个真正清教徒信仰的教会。这一个事实，可以作为约翰·诺克斯是英国清教主义的创始人的最有力证据。

对英格兰清教徒的影响，在他去世后还一直持续下去。他在苏格兰所写的《教会改革的历史》（*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不在苏格兰印行，在1578年竟然由在英国的英格兰清教徒印行出版。不单如此，一位做带领的清教徒约翰·菲尔德（John Field），在印行约翰·诺克斯的一篇文章的时候，在序言中赞扬他是“神所用的尊贵可敬的器皿”，而且介绍该篇文章“印证他敬虔忠心的劳苦，表明他勇往直前的无畏精神”。

在接下来的世纪中，约翰·诺克斯的影响仍处处可见。弥尔顿在为处死查理一世辩护的文告中，就多次引用约翰·诺克斯的见解作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约翰·诺克斯有独特敏锐的眼光，对圣经也有独到的见解，尤其表现在必要时与掌权者对抗，甚至要把他置于死地的见解上。弥尔顿能领会到这一点，可见约翰·诺克斯实在堪称为清教主义的创始者。1683年，查理二世公开承认他信奉罗马天主教，下令在牛津当众将约翰·诺克斯所出版的著作全部付之一炬，并禁令人民读他的作品。那时是1683年，而约翰·诺克斯早已在1572年去世。他的影响至深至大，可见他实在

是英格兰同时也是苏格兰的清教主义的创始人。

移民美洲的早期清教徒对政府和掌权者的看法和约翰·诺克斯所见的完全一致，正如卡莱尔（Thomas Carlyle）所说的，他也同样可算是美国清教主义的创始者。我甚至认为，他的思想，可说是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成功的原动力；他是争取独立精神的开路先锋。

钟马田 博士 (Dr. David Martin Lloyd - Jone)

出版介绍

本书在初版面世几乎两百年之后再次付诸印刷，可能会使人感到奇怪。尽管在此期间也有其他不错的传记出现，如贾斯珀·里德利的《约翰·诺克斯生平》（*Jasper Ridley's Life of John Knox*，牛津，1968）以及伊丽莎白·惠特利的《诺克斯简传》（*Elizabeth Whitley's Plain Mr. Knox*，爱丁堡，1972年）第二版，但公平地讲，麦克里对这位杰出的苏格兰改教领袖的属灵理解，迄今尚无人能及。B. B. 沃菲尔德（B. B. Warfield）于1905年在查阅了一些有关诺克斯的传记后也评论道：“今天的传记作者对于诺克斯之教导的深层根基缺乏完全的认同，所以倾向于在写作中带有含沙射影的批评论调。”他继续说，“让我们深感痛心的是，在当今的苏格兰教会，随处可见许多远离最初纯正宗教体系的迹象；诺克斯当初正是凭借这一体系的力量，将苏格兰从罗马天主教统治的梦魇下解放出来。然而，今天人们视这一崇高教义为自己的重重枷锁；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将自己从这些枷锁中解放出来，而不是意志坚定地去宣告万军之耶和华的荣耀——这样的宣告正是诺克斯得力的源泉。我们的祷告和盼望是……我们应当重新正确审视诺克斯能力的源头，并且为自己，在此源头中寻找同样的能力，以此来摧毁那恶者的属灵堡垒。”

鉴于后来的历史学研究，麦克里的这本著作仅需要在很重要的一点上进行修正：直到20世纪初，大卫·弗莱明（David Hay

Flemming) 和其他历史学家才发现麦克里把诺克斯的生辰提前了九年。贾斯珀·里德利作为最近的一位传记作者,对史实评估进行了总结:“因此,现有最可靠的证据表明,诺克斯……生于1514年。”相应的结果是,诺克斯去世时的年龄也应当改为58岁。

本书不是麦克里原著《约翰·诺克斯生平》(*Life John Knox*)的最完整版本,但出版者认为,针对普通读者的需要,本书再合适不过。这也是诺克斯学会的意见,该学会在1905年为纪念诺克斯诞辰400周年(按照传统的生辰日期)而重新出版的诺克斯的传记就是本简化版。该书的最终版后被收录为《托马斯·麦克里著作集》(*The Works of Thomas M'crie*)的第一卷,内容要长一些,不过最明显的区别是在脚注——最终版提供了多达两百多页的注解,主要是为了满足有研究兴趣的读者的需要。

本书除了一例以外,其他所有的脚注均由现出版者提供。文中略去了几处无关紧要的拉丁文引文和一段苏格兰古诗。所有的文字均采用了现代拼写。

我们愿意向读者推荐两卷本的《约翰·诺克斯文选》(*Selected Writings of John Knox*),由美国的长老会传统出版社(Presbyterian Heitage Publications)出版。《诺克斯文集》(*Knox's Works*)的标准版共六卷,于1846至1864年间出版。诺克斯所著《苏格兰改教史》(*History of the Kéformation in Scotland*)经C. J. 格斯里在1898年编辑后,由真理旌旗基金会(Banner of Truth Trust)于1982年再版。

托马斯·麦克里(Thomas M'Crie, 1772 - 1835)是一位爱丁堡的牧师,在苏格兰长老会中享有盛名。在写完诺克斯的传记后,他的下一部重要著作是《安德鲁·梅尔维尔生平》(*The Life of Andrew Melville*),此人是诺克斯在苏格兰教会中的属灵继承人。麦克里还写过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改教历史以及其他神学主题。他的儿子也叫托马斯,同样是一位传记作家,曾著有《苏格兰教会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Scottish*),最近由自由长老会出版社再版。

在麦克里的《诺克斯传》终结版里面，有一篇爱丁堡大学苏格兰历史系的约翰·辛普森（John M. Simpson）执笔的序言，文中对于此书持久的适用性给予了以下评论：

如果一位历史学家的著作在初版一个半世纪后仍然值得研究，那么他会有好的口碑；如果他的著作经过这么长时间仍然值得再版，那么他必定是出类拔萃。托马斯·麦克里是苏格兰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在筛选原始记录和历史素材上所付出的劳苦令人叹服，要知道当时这种工作比现在要困难得多。他的文学恩赐可以将枯燥无味的材料变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最重要的是，在为苏格兰历史上的两位巨人诺克斯和梅尔维尔立传的过程中，他选择的主题使他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全心赞同和委身于这两位福音派基督徒所持守的信念。1843年成立的自由教会的奠基者们都读过麦克里的著作。他们知道，在既有法规的支持下，教会的宣告有很重的分量；但因着麦克里的影响，他们努力将福音的宣告放在第一位。他的著作今天依然发挥着同样的影响力。

上面提到的辛普森的分析在今天仍然真实。今天，无论在苏格兰还是在世界各地，我们比以往更迫切地需要圣灵大能的浇灌。所以，正如沃菲尔德祷告的那样，我们也盼望这本传记的重新出版会激发活泼有力的祷告，上达于天，祈求上帝赐下圣灵的浇灌。我们永远不应当忘记，横扫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归根结底是一个属灵的事件。

肯尼思·麦克劳德（Kenneth D. Macleod）

1991年7月

作者序

旨在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宗教改革是近代欧洲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新纪元。这场变革在宗教、礼仪、政治和文学上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日。毫无疑问，调查那段时期的历史以及那些成为上帝手中器皿的人物如何成就了这场造福人类的变革，成了我们最感兴趣的题目。

尽管许多有才华的作者曾经竭尽所能来探寻宗教改革的来龙去脉，并且苏格兰改教进程中的主要史实都已经被反复陈述，但我觉得这个主题还远未穷尽。当我出于个人兴趣，花了几年的工夫对本国的教会历史进行了更详细的考察之后，我的想法更加坚定。我欣喜地发现，描写苏格兰改教历史的材料是如此之多，然而却一直没有人着手去整理和介绍有关这一主题的信息；这些信息湮没在尘封的手稿和书籍之中，至今很少有人知晓和查阅。我对此感到十分遗憾。尽管我自己的才能和精力可能无法担此重任，但我仍想为我们国家的改教者草拟一份记录，尝试把他的个人经历和那场巨大变革的发展融为一体。因为在推进那场运动的过程中，他扮演了极其显著的角色。

这一类的作品似乎比较欠缺。实际上，诺克斯的名字经常出现于同时期的历史资料中；作为一位不容忽视的人物，不少历史学家以惯常的手笔对他的主要特点作了勾勒。但是，他们没有详述诺克斯生命中的许多事件，更谈不上用细致和严谨的态度去研究他个人

的历史，而这对于完整和准确地理解他的性格是必不可少的。有关诺克斯的生平传略往往作为出版其作品的前言，或者收录于名人列传和期刊出版物之中；可惜许多立传者手中缺乏正确的信息，其他人则由于写作范围的局限，内容毫无细节可言——我们知道细节非常有助于刻画人物个性，并且使传记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教育性。还有一些人对于这位改教者的评价大失公允。不管是出于偏见、无知还是疏忽，他们向人们展示的是一幅扭曲的漫画，而不是一幅真实的肖像。

我之所以敢作此尝试，乃是因为得到了一卷诺克斯的书信手稿。这卷手稿清楚地揭示了他的性格和生平。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这卷手稿使我受益多多。

我使用的其他主要文献包括：考尔德伍德（Calderwood）的巨著《苏格兰教会史》（*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Scotland*），罗（Row）的《教会史》（*History*）以及伍德罗（Wodrow）的《文集》（*Collections*）。考尔德伍德的《教会史》除了提供有关宗教改革早期的许多珍贵资料之外，还包含了诺克斯写于1559至1572年间的书信集。我手头上的这些材料涵盖了诺克斯生命中最活跃的20多年时光。对于和这段时期相关的所有历史资料我都进行了详细的查询。

罗在写作其《苏格兰教会史》（*History of the kirk*）前半部分的时候，得益于他的岳父大卫·弗格森（David Ferguson）所著的回忆录。弗格森是改教初期在邓弗姆林（Dunfermline）的一位牧师。在终稿之前，此书的副本可能就已经流传出去，所以某些版本中会有一些额外附加的内容。我偶尔会引用爱丁堡的神学图书馆所拥有的副本，但更多时候是参考一份1726年的副本，那是我见过的所有副本中最完整的一份。

以勤勉著称的伍德罗收集了大量与苏格兰教会史有关的珍贵手稿，其中大部分都被今天的公共图书馆收藏。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存有一些对开本，包括伍德罗所整理的文集，其中记录了16世纪苏格兰改教者和神学家的生平。这都给我提供了一些有趣的史料。

关于长老会的事务，我查阅了官方记录——通常称作《苏格兰大公教会书》(*Book of the Universal Kirk*)。在国内，这份手稿有好几个副本，本书中我所引用的是最老的副本，隶属于倡议者图书馆。

我一直努力查找改教时期出版的史记和书籍，通常里面会不经意地提到一些没有被历史学家记录的事实。倡议者图书馆所珍藏的有关苏格兰事件的资料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在那里我有幸查阅了诺克斯大部分著作的首版文献。在他的所有小册子中，最罕见的一本是他和克罗斯拉格修道院院长 (Abbot of Crossraguel) 辩论的故事。在诺克斯的时代之后几乎没有哪位立传者看过此书。当我试图一瞥这本令人好奇的小册子的期望全部落空之后，我偶然得知，奥欣莱克 (Boswell) 的绅士亚历山大·博斯韦尔 (Alexander) 的图书馆里有一个副本。对于我的借阅，博斯韦尔欣然同意。

以上罗列了我所参考的原始资料。请不要误解，我并不是向读者暗示这本书将提供大量他们从未知道的新信息。从事这类研究的人必须要明白：他们所发现的成果将被缩小到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而且应当预备好接受这样的事实：对于他们付出极大的甚至是不必要的艰辛所写出的作品，许多读者可能只是走马观花、一眼带过。有关改教运动和诺克斯的主要事迹已经人尽皆知。然而，我自认为拙作是从一个崭新的、更公正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事迹，并且由此带出其他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史实。

在本书叙述过程中所自然产生的一些公共问题上，我保留随意表达个人情感的自由，对此我相信没有任何辩护的必要。文中的某些看法可能和时下的流行观点不和，但这并不意味着后者是错误的，也并非要压制后者的意见。虽然我并没有对这位改教者一味地歌功颂德，但也不会因担心遭受这样的控告而有所顾虑。只要我认为诺克斯的行为无可非议，或者发现他受到恶意和夸大的指责，我都会为他提供支持和澄清。因为有来自多方的对诺克斯人格的攻击以及通过诋毁他来破坏改教进程的企图，使我不得不经常使用护教性的言辞来为他辩护。

目 录

CATALOGUE

代序 约翰·诺克斯——清教主义的创始人 ...	1
出版介绍	1
作者序	1

第一阶段

背景及早期生活 (1505 ~ 1542)

第1章 出生与求学	2
第2章 苏格兰腐朽的宗教制度	8
第3章 新教在苏格兰的传播	15

第二阶段

皈依新教信仰 (1542 ~ 1549)

第4章 归正	22
第5章 顺服呼召,领受牧职	26
第6章 辩论	31
第7章 被囚	35

第三阶段

英格兰改教 (1549 ~ 1554)

第8章 在伯威克	42
第9章 伦敦之行	49

目 录

CATALOGUE

第四阶段

流亡欧洲大陆 (1554 ~ 1557)

- | | | |
|--------|---------------|----|
| 第 10 章 | 片刻宁静 | 68 |
| 第 11 章 | 法兰克福的纷争 | 78 |
| 第 12 章 | 奔波的旅程 | 91 |

第五阶段

重返苏格兰 (1557 ~ 1560)

- | | | |
|--------|-------------|-----|
| 第 13 章 | 重返苏格兰 | 106 |
| 第 14 章 | 著述惹风波 | 116 |
| 第 15 章 | 忍辱负重 | 123 |
| 第 16 章 | 出兵 | 129 |
| 第 17 章 | 对抗 | 135 |
| 第 18 章 | 和解 | 148 |

第六阶段

爱丁堡牧师 (1560 ~ 1563)

- | | | |
|--------|----------------|-----|
| 第 19 章 | 《第一教规书》..... | 162 |
| 第 20 章 | 苏格兰的玛丽女王 | 169 |
| 第 21 章 | 第一、第二次会面 | 176 |

目 录

CATALOGUE

- 第 22 章 第三、第四次会面 186
第 23 章 再度论战 189
第 24 章 审 判 210

第七阶段

力挽狂澜 (1563 ~ 1570)

- 第 25 章 再度交锋 218
第 26 章 遭 逐 224
第 27 章 革 命 233
第 28 章 摄政王遇刺 239

第八阶段

最后的岁月 (1570 ~ 1572)

- 第 29 章 最后的坚守 248
第 30 章 离 世 263

结 语 275

第一阶段

背景及早期生活（1505 ~ 1542）

第 1 章

出生与求学

约翰·诺克斯生于 1505 年。对他的出生地人们一直有争议。最流行的观点是：他出生在东洛锡安（East lothian）郡的一个村庄吉福德（Gifford）。但是我国的传统说法认为他诞生在该郡的主要城镇哈丁顿（Haddington）。在该镇一处名为“吉福德门”（Gifford-gate）的郊区，当地居民迄今仍然在向人展示一幢据称是诺克斯诞生地的房子。他的家族一直拥有这幢房屋和毗邻的地产，直到大约 50 年前被威姆斯伯爵买下。

诺克斯的母亲名叫辛克莱（Sinclair）。他的父亲系年代久远的名门之后。先祖曾拥有伦弗鲁（Renfrew）郡境内的诺克（Knock）、兰福利（Ranferly）和克雷金斯（Craigends）的大片土地。这个家族曾出过一位拉福的主教，一位埃尔斯的主教，故后世子孙常以此为荣。至于什么时候他的祖辈离开那里迁居到洛锡安（Lothian）的，我还无法确定。

虽然诺克斯出身平常之家，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日后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卓越人士。但有些作者宣称诺克斯的父母贫困不堪，则有违事实。他们有能力供应儿子接受大学文科教育，在那个年代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少年时的诺克斯就被送到哈丁顿的文法学校学习，在那里掌握了拉丁文语法；之后约在 1524 年，又被父亲送到

当时苏格兰王国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圣安德鲁斯大学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深造。同一时期, 乔治·布坎南 (George Buchanan) 也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他们二人都就读于圣萨尔瓦多学院 (College of St. Salvador), 并在相同的老师手下受教。

当时苏格兰的学术状况及其在 16 世纪下半叶的发展, 远没有得到研究者应有的重视; 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同时代一些次要的课题上。毫无疑问, 16 世纪早期的苏格兰并不乏饱学之士, 但其成就主要归功于他们在外国所受的教育。文艺复兴给意大利和法国的学校所带来的革新, 花了很长时间才逐渐波及苏格兰的大学。虽然这些大学最初都是按照前者的模式建立的, 但对于新近来到的变革普遍持怀疑态度。当时苏格兰大学教育的内容主要由亚里士多德哲学、经院神学、教会法和民法构成。这些建立在王国重镇里的学校用拉丁语授课; 在某种程度上, 掌握这门语言对于神职人员主持宗教仪式是必须的。但希腊语在苏格兰几乎无人知晓, 尽管它在欧洲大陆早已被人热衷研修, 而且在邻近的英格兰也成了固定的教育科目。苏格兰人通常在国外学习这门语言。最早在国内教授这门语言的尝试是私人性质的, 而且其赞助人还有可能被扣上异端的帽子。据我所知, 蒙特罗斯 (Montrose) 镇是苏格兰最早教授这门优雅有益之语言的地方, 并因此闻名遐迩。唐县的约翰·厄斯金 (John Erskine of Dun) 被公认为是“苏格兰鼎力赞助希腊语学习的第一人”。早在 1534 年, 这位思想开明、热心公益的爵士就在归国的旅途中带回一名精通希腊语的法国人, 将其安置在蒙特罗斯任教; 当这位法国人离去后, 爵士又慷慨地鼓励其他法国学者来此继任。从这所私人神学院诞生了许多希腊语学者, 有关这门语言的知识也逐渐传播到王国各地。这里我补充一点, 此时苏格兰人对于东方语言仍然一无所知。直到改教运动发端之后, 才有人开始学习希伯来语。约翰·罗 (John Row) 是第一位教授该语言的人士。他于 1560 年赴珀斯 (Perth) 就任牧师之后, 马上开设了一个希伯来语学习班。从那时起, 苏格兰人对于希腊语和东方语言的了解有了长

足的进步。

诺克斯在中年以前就掌握了希腊语。但我们发现，他曾在1550年承认自己是希伯来语的门外汉。他对这一缺憾极为懊悔。不过后来他在流放欧洲大陆期间得到了补习的机会。

当诺克斯负笈圣安德鲁斯大学时，约翰·梅尔（John Mair）是该校的哲学和神学教授，一般人们更熟悉他的拉丁名字梅杰（Major）。通常年轻人的头脑和未来的思维体系会从他们最初受教的老师那里得到重要的指引，尤其是在这位老师享有很高声誉的情况下。梅杰在当时他所从教的领域被视为先知。鉴于他是诺克斯和知名学者布坎南（Buchanan）的导师，这里我们有必要留意一下他的思想。梅杰主要在法国接受教育，有一段时间他还担任过巴黎大学的教授。在那样的环境下，他对于某些学科的思维和表达方式，自然要比他的祖国和欧洲其他地区更为开明。在教会制度的问题上，他和约翰·格尔森（John Gerson）、彼得·戴里（Peter D'Ailly）等人一脉相承，表示捍卫康士坦会议的决定^①和高卢教会的自主权；反对不受制约的教宗主权。他教导说，大公会议的权柄高于教皇，并且可以裁判、指责、限制甚至罢黜后者。他否认教皇拥有至高无上的世俗地位和任意废立君王的权柄。教会惩戒和开除教籍的决定如果建立在错误和不相关的前提之上，那么这些决定都是无效的。他认为什一税只是人的规定，并非上帝授予的权利。他谴责罗马教廷和主教阶级的贪婪、野心和奢华虚浮。梅杰和一般圣品阶级的关系一般。此外，他还建议减少修道院和节日的数量。

他对于世俗政府的看法和他在教制上的立场相似。他教导说，

^① 14世纪晚期，欧洲出现三位教皇，局面混乱不堪，教会内部的改革迫在眉睫。为此，一些教会领袖连同一些大学学者，兴起了“会议运动”（Conciliar Movement），号召在教皇掌控的“拉特兰会议”（Council of Lateran）之外，另行召集大公会议，推动改革。因此，1414年召集的“康士坦会议”（Council of Constance）结束了分裂的状况，成功地解决了三位教皇并存的尴尬局面，并提出定期召开此类会议来制衡教皇的权柄，以期达到改革的愿望。只是当结束纷争的教皇站稳脚跟之后，就明令禁止“会议运动”。天主教内部改革的努力遂告失败。

君王和诸侯的权柄原本来自于民众，故不能凌驾于民众（作为整体而言）之上；如果统治者施行暴政，或者使用手中的权力来毁灭臣民，那么臣民就可以依法辖制他；如果他仍然拒不悔悟，无可救药，就可以被共同体废黜，剥夺其特权；对于暴君，可以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审判，甚至可以判处死刑。

无需赘言，以上梅杰的观点和日后诺克斯公开承认并被布坎南的经典著作所捍卫的政治原则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梅杰并不是第一位表达以上观点的苏格兰人，但很有可能的是，这位老师通过口头教导和文字作品，最先将这些原则传达给两位学生，然后这些原则在他们的阅读和反思中得到巩固，并由此发端，带出了以后的巨大变革。梅杰在教会论上的看法也对他们的思想轨迹有一定影响。

尽管梅杰的观点在这些方面比当时流行的论调要更为自由和理性，但我们必须承认，他的教导中能够被学生们借鉴和吸取的地方实在太少。如果我们把他的出版物作为其学术讲座的范本来检验的话，就会发现他讨论的许多问题都是毫无用处、微不足道的；其余的著作则拘泥于大量经院推理式的细枝末节，令人望而生厌。拜读梅杰作品的人如果能够从连篇累牍的废话里面找到一点真知灼见就很不错了。与其费尽工夫去发现这些所谓的天才创意和敏锐洞察，倒不如去参考阿奎那（Aquinas）和其他经院学者的经典著作。梅杰受到推崇，主要是由于他向国人揭露了当时一些显而易见的谬误和弊端。但是他的头脑充满了迷信思想，以至于为教皇制的某些最荒诞的教条去作辩护，其论调荒唐幼稚到了极点。他的才能并不出众；比如他对于古代作品的熟悉，完全是拜中世纪收集文献者的功劳。除了囿于某些公认的教会学者的成见，他从来没有提出过自己独创的见解和理论。此外，他的写作风格非常生硬和死板，“枯燥乏味、缺少修饰、含糊隐晦、迂腐之至。”

诺克斯和布坎南很快厌倦了这种学习，开始去寻求其他的领域，以满足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伴随着求知的过程，他们挣脱

了束缚，越过了界限，不再恪守那位缩手缩脚的老师制订的条条框框。按着各自的天赋和倾向，二人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布坎南涉猎广泛，遨游在浩瀚的文学天地，徜徉于绚丽的诗意空间；诺克斯则匆匆穿过世俗学问的林荫大道，全然委身于研读真道，尽心竭力于圣职事奉。然而，他们都盼望推进真正的宗教和自由，并为此倾注了同样的热情。他们忍受了漫长和痛苦的流放生涯，历经生命中许多的危险患难，皆因执著于这个共同的信念。所以，无论是在敌人罗列的大量毁谤中伤之间，还是同道之人衷心缅怀的回忆录里，他们二人的名字总是双双出现于人们的脑海之中。

但是，我们不要误以为诺克斯能够立即脱离他所受的教育和那个时代的偏见。尽管经院哲学对我们而言空洞无聊、令人反感，但在那个令人费解、微妙精细的诡辩术流行的年代，内中的某种魅力仍然能够让那些年轻气盛、天资聪颖的头脑着迷。你可以借此炫耀智慧；这种学问虽然不能给我们的理解力提供任何养分，但却可以使之得到锻炼；它甚至给想象力提供了发挥的空间，同时也让那些擅长此道的老手更加自鸣得意。对于一个置身其中深受熏陶的人而言，要想从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迷宫里突围脱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故此，诺克斯有一段时间继续钟情于此类学习，并颇为成功。当他拿到文科硕士文凭之后，在母校教授哲学课程（极可能是以助教或私人讲师的身份）。他的课堂很快声名鹊起，人们视他在雄辩艺术上的造诣丝毫不逊于他的老师——如果不是更出色的话。大概在同一时期，鉴于诺克斯优异的表现和老师们的推荐，他被破格升入圣品阶级，并被按立为神甫。由于那时他还没有达到教会法所规定的年龄（25岁），所以可以肯定地推断这事发生在1530年之前。

然而，不久以后，诺克斯的学业受到了新的指引，导致他的宗教情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并且对他未来的整个人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阅读中常常遇到经院神学家和圣典学者引用早期教父的作品，但他已经不满足于这些零散的摘要，决心要直接查阅原文著

作。在那些古代文献里他发现了一种察验和传递真理的方法，是他之前所完全陌生的。尽管他的头脑中有教育带来的偏见，以及在自己得意的学科里因成就非凡而滋生的骄傲，但这种简明的方法仍然对他的思想产生了触动。在基督教会的早期教父中，耶柔米（Jerome）和奥古斯丁（Augustine）引起了他的特别的注意。前者的著作使诺克斯认识到圣经是神圣真理唯一纯正的源头，并且教导他如何学习原文圣经。在后者的著作里，诺克斯发现其中的宗教情操和天主教会里教导的那一套完全格格不入。罗马教廷虽然仍将奥古斯丁尊为圣徒，但是视他的教导为异端，禁止在讲坛上传播。从那时起，诺克斯开始放弃对经院神学的研究。尽管还没有完全从迷信中解放出来，但他的思想已经蓄势待发，通过上帝早已预备的途径，准备去更全面和深入地了解福音派信仰体系。这种可喜的转变大约发生在1535年。但是，诺克斯直到1542年才公开承认自己是一名新教徒。^①

① 新教（Protestantism），也译为更正教、复原教、抗罗宗；中文习惯上称为耶稣教或基督教（相对于天主教和东正教而言的宗教派别）。从严格意义上讲，“Protestantism”一词指在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所有反对教皇制并脱离天主教体系的改教传统。为避免混淆，以下译文中将统一使用“新教”一词。

第2章

苏格兰腐朽的宗教制度

我们现在要进入诺克斯生命的下一个时期，他将与罗马天主教团体断绝关系，并着手开始改教。这里我最好先对同期苏格兰的教会光景和宗教状况作一个概述。没有足够的背景知识，就不可能对那场宗教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公正的评价，也不会理解为何诺克斯要尽心竭力地推进这场运动。当时为患教会的弊端和诟病范围之广，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新教徒之中却有很多人对此史实完全无知或仅仅略知皮毛——这一因素无疑造成了对诺克斯的性格和举动的偏见。在此我必须奋起辩护：诺克斯所行并非多此一举，改教运动也非矫枉过正。

宗教改革前夕，基督教普世性的腐败，在苏格兰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败坏程度超过了西方教会^①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国家。迷信和宗教欺诈以最露骨的方式流行于这个粗野无知的民族之中。通过这些途径，教士们聚敛了大量财富，攫取了显赫权力；随之而来的，是他们所属的修会乃至整个宗教制度的腐化堕落。

当时，整整一半的国家财富归属于神职人员，其中的大部分又被该群体中占支配地位的少数人占有。贪婪、野心和对世俗浮华的

^① 指罗马天主教会，“西方”是相对于以拜占庭帝国为中心的东方教会（亦称东正教）而言的。

热衷充斥于圣品阶级之中。主教和修士们生活之奢靡，绝不亚于第一流的贵族阶层。他们沽名钓誉、头衔等身，担任并长期独占诸如枢密院官员、民事法庭法官和议会成员等政府要职。一个空缺的主教或修道院院长职位通常招来强有力的竞争者；他们争夺这个位置就好像抢夺一块封邑或领地，所用的方式如出一辙，甚至经常靠武力解决问题。较低的圣职则拿去公开拍卖，或者赠给那些目不识丁、不学无术的阿谀之辈以及投机分子、云游诗人、主教的私生子等等。一人身兼几个圣职的现象极为普遍；虽然名义上这些空缺的职位有待他人来填补，但实际上兼职者通常终身（甚至几代）拥有这些职位，而且不用履行任何职责。这种制度带来的后果是：大量的教区废止了所有的宗教仪式。医治灵魂从此和日常生活不再有什么关联了。主教从不讲道。实际上，我考查了从苏格兰主教制度建立之日起直到改教时期的历史，几乎没有找到一例这样的记载。在所有的在俗教士中甚至废止了讲道的操练。讲道的责任完全落到了托钵修士的身上，在他们手中成为唯利是图的工具。

不被世俗法律约束，在荣华富贵和闲懒散漫中堕落的圣品阶级，其生活方式伤风败俗，成为宗教的耻辱。一方面他们宣告独身，禁止任何修会的神职人员缔结合法婚姻，违者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另一方面，主教大人们却以最荒淫放荡的生活为他们的晚辈树立了榜样：公然收纳娼妓，为自己的私生子提供圣职，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贵族豪绅的儿子，等等。由于垂涎那些私生女所带来的丰厚嫁妆，许多贵族卑劣到不惜玷污家族的血统来促成这种不道德的联姻。

由于王公贵族盲目轻率的奉献和捐款，修道院在全国大量滋生，并成为迷信和懒散的温床。虽然这些修道院在各地都已堕落不堪，成为臭名昭著、淫逸放荡的场所，但如果有人想减少它们的数量，削减它们的特权，转移它们的基金，则将被视为不虔不敬和亵渎上帝。王国上下到处是成群结队、无知懒散和奢华阔气的僧侣：白衣、黑衣和灰衣托钵修士，正规修士，来自圣安东尼派（St.

Anthony)、卡迈尔派 (Carmelites)、卡尔特派 (Carthusians)、科德力派 (Cprdeliers)、多明我会 (Dominicans)、圣方济各会 (Franciscan conventuals)、雅各派 (Jacobines)、普雷蒙特雷会 (Premonstratensians)、蒂龙派、十字军教团 (Hospitallers) 和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 (Holy Knights of St. John Jerusalem) 的修士, 来自圣奥斯汀会 (St. Austim)、圣克莱尔会 (St. Clare)、圣学士团 (St. Scholastica) 和圣凯瑟琳会 (St. Cathevine) 的修女, 还有其他不同派别的修女会。他们像蝗虫一样吞吃着地上的食物, 在空气中传播着瘟疫般的传染病。

圣品阶级在信仰上的无知就如他们道德上的淫乱一样露骨, 甚至主教们都恬不知耻地承认自己对于信仰的基本要义不甚了解; 除了弥撒书里面的一些经文以外, 他们从未读过任何一段圣经。在这样的牧者手下, 人民因无知而灭亡。那本能够使他们有得救的智慧、旨在让所有人——不拘是“希腊人、犹太人、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①——都能得到的圣书, 如今却被束之高阁; 若有人用本地的语言传讲圣经, 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宗教仪式从头到尾使用一种咕咕啾啾、不知所云的僵死语言; 许多神甫完全不懂这门语言, 有些人连朗读都有困难。即便是自己编写和批准的要理问答, 教士们也千方百计地阻止它们落到平信徒手中。

从本国的情形和地域来看, 苏格兰比那些与罗马毗邻的国家较少受到梵蒂冈教廷野心勃勃的渗透、不厌其烦的敲诈以及声色俱厉的诅咒之类的搅扰, 但这也使得苏格兰的教士们更容易维持罗马教皇在民众心目中极受尊崇的地位。而对于那些有机会从近处目睹教皇的种种恶行和世俗权术的人来说, 这种崇敬感早已荡然无存了。苏格兰对一个遥远的国外司法裁判机构的高度依赖, 使它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虽然教皇无权当面向苏格兰的高级教士们指手画脚, 但他并不需要一大堆的借口才能介入他们的内部事务。通常教会法庭

^① 语出《圣经·歌罗西书》3章11节。

会设法将民事诉讼揽到自己的管辖权内，继而把这些案件呈到罗马。每年王国都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去支付圣礼服、圣职确认状、诉讼审理费以及用于各种名目的教皇诏书、羊绒礼服、木头雕像、成堆的死人遗骨，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所谓的“珍贵、神圣”、实则荒诞无稽的宗教礼仪用品。

基督教的教义除了徒有其名之外，其内容已经丧失殆尽。人民没有被引导去敬拜那位独一无二的上帝，反而被教唆去向无数低等的事物顶礼膜拜。“上帝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已成为过去，如今是众多“中保”同享荣耀，让人相信通过他们也可以得到上天的恩惠。更多的恳求是呈给圣母玛丽亚和其他圣徒，而不是呈给“天父常常垂听的那一位”。弥撒中的献祭仪式据称可以为活人和死人取得赦罪之恩，完全抹杀了基督献上的赎罪祭之功效——他借此献祭成就了永远的救赎。人的良心不再信靠那位救主的功德，转而投向那些虚妄的依靠，如向神甫告解（忏悔）、教皇的赦罪令和自我惩罚。再无人指示大众：他们应当离弃罪恶来表明真诚的悔改和信心，也当遵守圣经规定的敬拜法则、实践各人的道德责任来证明他们对神对人的爱。取而代之的教导是：只要经常念叨“ave”和“credo”^①，向神甫告解，购买圣餐饼，去某些著名圣徒的祠堂朝拜，履行一些规定的肉体禁欲条例（比如每周五不可行房，按时缴纳什一税和其他教会费用等等），那么，他们的救恩就可以得到及时的、绝对可靠的保证。有一些非常富有和虔诚的人出资建了教堂或圣坛，将奉献用来供养神甫，或用于举行弥撒、葬礼和纪念亡魂的仪式；据说这些善行可以减轻自己和亲人在炼狱里的痛苦——减轻的程度取决于你有多么慷慨。我们很难想象教士们那些长篇大论的讲道是何等空洞、荒唐和卑劣。他们大谈某些宗教修会创始人的奇闻轶事、志怪传说，比如说此人的灵性如何高不可攀，行了多少神迹奇事，如何与鬼魔较量，还有怎样警醒、禁食和自我

^① Ave 指对圣母玛丽亚的称呼或祷告。Credo 指教会信经。

鞭挞；他们还吹嘘圣水、圣油、画十字和赶鬼驱魔的功效；炼狱是如何恐怖；某些圣徒的祷告是如何大有能力，可以把人从炼狱中解救出来；再加上低级庸俗的笑话、茶余饭后的谈资和市井街坊的飞短流长，这一切都成为传道者们最热衷的话题。人民无从听到纯正、可靠和崇高的圣经教导。

贪婪的教士们连垂死之人的床榻都不放过。他们想方设法，强逼临终者的家庭向自己或教会赠送财物。似乎向活人索取什一税还嫌不够，他们又向死人提出了要求。只要一个贫穷的农夫刚刚咽气，马上就会有神甫像抢夺猎物一样赶来把尸体运走。这一家死多少人，他就来多少次。如果有人不愿意交纳费用或者不服从神甫的安排，就会受到教会严厉的定罪。只要能够多榨取一分钱，教士们在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都会小题大做，随意处罚。神圣的礼拜被忽视，教堂被荒废或闲置；故除了少数节期之外，全国很多地方的礼拜堂只不过是罪犯的避难所、黑市交易的场地和消遣娱乐的去处。

为了维护这个腐败堕落、欺世盗名的宗教制度，既得利益者唯一能够使用的武器，就是逼迫和压制言论自由。对凡是真理有可能露面的地方都严加防范。知识被认为是异端之母。任何脱离罗马天主教的人士都会遭到诋毁，他们被丑化的肖像会展示在大庭广众面前，用来杀鸡儆猴。如果有人在茫茫黑暗中得到了一点启蒙的亮光，继而开始对圣品阶级的行为略有微词，并且提出纠正诟病的建议，他会立刻被扣上异端的帽子；如果他不赶紧逃命的话，接下来等候他的，不是地牢就是火刑柱。最终，当所有的防范措施都无法阻挡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的时候，教士们则准备采取最孤注一掷和血腥暴力的手段来予以镇压。

从以上关于本国宗教状况的不完全概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某些人强加给我们的历史诠释是何等错谬。他们似乎认为，天主教虽然是一个错误的制度，但纯粹只是思想层面的问题；虽然充满迷信，但只要它不是碰巧与不宽容和残酷无情为伍，就基本是无害的。事实恰恰相反。不过分地讲，这个宗教制度中的所有错误教义

和迷信活动，其最初目的和虚假包装无一不是为了助长和支持历来的陋习，提高圣品阶级的地位，确保他们不受民事法庭的制约，为他们染指世俗权力大开方便之门，使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侵犯人们的道德良知，鼓吹对于教会决议的绝对服从以及消灭所有自由言论和开明科学。

这个制度不仅极大地玷污了圣经所启示的信仰，而且与君主的合法权利、王国的独立、自由和繁荣格格不入；不仅摧残人的灵魂，而且践踏了健全的伦理原则，破坏了社会和家庭的幸福。从各个方面传来的意见汇集成强烈的呼声，一场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势在必行。不同阶层的人，包括贵族、爱国人士、诸侯和基督徒自身，都对宗教制度的积弊抱怨不已。当务之急，是需要所有人为了自身利益协调一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齐心协力发动一场全民参与的变革，方能根除毒瘤。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首先揭露那些高高在上的神学观念之错谬；正是这些观念使得迷信在人们的头脑中掌权，并且为天主教的教士们提供了靠山，使他们能够为那些巧取豪夺得来的特权和财富进行辩护。（如果有任何君主或立法机构试图剥夺他们的权力和财产，教士们就会利用大众的蒙昧无知，很快编出理由来拦阻这类尝试。）借助改教者们的讲道和著作，基督教起初的教义和实践得到复兴；通过激烈的论战，教皇派的错误被圣经所驳倒。今天我们能够脱离迷信、愚昧和专制的捆绑，并且享受政治和宗教上的祝福，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那场脱离教皇制的宗教改革。

我们实在要感谢上帝的旨意——为这场恰逢其时的革命，也为那些上帝用来兴起改教运动的器皿；他们对这场变革到来的时机深信不疑，并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看明当时风云变幻的时局中正酝酿着的横扫苏格兰和整个欧洲的改教洪流，以及至高者运筹帷幄的智慧之手所彰显的作为。我们从这些人那里承受了何等大的恩惠！他们不顾自己的性命安危，欣然致力于实现一个造福万代子孙的计划；他们无视大众轻率的盲从、传统和法律的袒护和严刑重典的威

· 慑，勇敢地抨击错漏百出、腐败透顶的宗教制度；他们攻破了迷信的堡垒，刺透了虚假的神龛，撕开了蒙蔽的面纱，揭露了世界崇拜已久的丑陋偶像，驱散了捆绑人心的魔咒并使它恢复自由。另有一些人安坐在仁人志士劳苦栽种、并用鲜血浇灌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却轻看珍贵的属天特权，不知道救赎的代价，肆意虐待那些真理的使者、曲解他们的行为、诽谤他们的动机、以种种恶行折磨和非难他们——这些人有祸了！

第3章

新教在苏格兰的传播

为了祖国的福祉，
爱国志士上下求索，舍生取义，
他们的丰功伟绩
千古流芳，万人景仰；
有一群人，本该配得更美的花环，
他们受命坚守真理的圣殿，
至死忠心，血洒祭坛，
成就了无比崇高的宣言——
“我们愿以永生之道为粮，
与上帝同行，进入神圣的自由，
展翅翱翔，心系天堂。”
然而，他们却罕为人知，被人遗忘！
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中，
找不到他们的名字；
洋洋洒洒的历史卷牍里，
寻不见他们的踪迹；
引火自焚的暴政固然被诅咒，

荣耀殉道的受难者却遭冷落。^①

在诺克斯的信仰转变之前，宗教改革的^②教义已经在苏格兰得到广泛的传播。一位名叫帕特里克·汉密尔顿（Patrick Hamilton）的贵族青年，从他的同辈人中脱颖而出，成为向苏格兰国民宣告这一好消息的第一人。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早在1526年，英王亨利八世还没有与罗马教皇决裂之前的那段黑暗时期，一束亮光就已经照进了这位年轻人的心里。他顺其引导，一直追寻到威登堡（Wittenberg）；在与德国改教者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面谈之后，转到马尔堡（Marburg）的新教大学研究圣经，师从阿维尼翁的弗朗西斯·兰伯特（Francis Lambert of Avignon）。在那段隐修的岁月，他被一种无法抗拒的强烈愿望所驱使，想把他所学到的知识传递给自己的同胞；他不顾朋友们的劝告，离开马尔堡回到了苏格兰。汉密尔顿对于腐败现象的直率揭露很快招来了教皇派的嫉恨；他被诱骗到圣安德鲁斯并遭拘禁。1528年2月的最后一天，他被大主教毕顿杀害，戴上了殉道者的冠冕。此事带来了报应：毕顿主教的侄子兼继任者随后也被杀。汉密尔顿所点燃的火焰“光照了整个苏格兰的一代人，并带着施行惩罚的震怒，烧灭了天主教的迷信、教皇派的权势和教士制度本身”。

作为一个身份高贵的人，汉密尔顿的惨死以及他承受苦难时所表现出来的最英勇无畏的坚韧和基督徒的忍耐，在圣安德鲁斯激起了轩然大波，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平民百姓，都开始质询他的主张。在副修道院长约翰·温兰（John Winram）的默许下，殉道者

① 摘自英国诗人威廉·柯珀的长诗《任务》，第五卷。

② 原文为“Reformed”，狭义上通常译为“改革宗”或“归正宗”。该词在本书中多次出现，但大部分场合下的使用并不是按其狭义理解，而是泛指当时欧陆主流的改教思潮、改教神学和改教运动。准确地讲，“Reformed”一词特指加尔文派传统（Calvinistic）与路德派（Lutheran，或称信义宗）及重洗派（Anabaptist）等传统有所区别。本书以1553年克兰麦大主教出版《四十二信条》为界，在此之前译为“新教”，之后译为“改革宗”。



的思想开始在修道院的见习修士中秘密流传。圣伦纳德学院院长加文·洛吉（Gawin Logie）向学生们的头脑灌输新思想的努力颇为成功，以至于流传着这样一条俗语：如果有人被怀疑是路德派的，那么“他肯定喝过圣伦纳德学院的井水”。对新观念的迅速蔓延感到恐慌的主教团体采取了最严厉的手段来铲除异己。所有的异端分子都面临严刑拷问，逼迫的火焰在全国各处点燃。从1530到1540年间，许多无辜的优秀人士遭到了最残忍的杀害。少数人通过忏悔得以活命。更多的人则逃往英格兰和欧洲大陆，其中包括以下学者：加文·洛吉、亚历山大·西顿（Alexander Setoun）、亚历山大·阿雷斯（Alexander Aless）、约翰·法伊夫（John M'bee）、约翰·麦克道尔（John Macdowal）、约翰·麦布雷（John Mackbray）、乔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詹姆斯·哈里森（James Harrison）和罗伯特·理查森（Robert Richardson）。

一连串的暴力镇压并不能阻挡真理的前进。来自邓迪（Dundee）、利斯（Leith）和蒙特罗斯（Montrose）的商人常常穿梭于英国和欧陆之间做生意，通过这些渠道，丁道尔（Tyndale）翻译的英文圣经和许多新教书籍被运进苏格兰并在全国广为流传。诗歌这种艺术形式成为反对无知迷信者手中的利器，为各国的改教运动推波助澜。大卫·林赛爵士（Sir David Lindsay）是詹姆斯五世的宠臣，作为一位优秀的诗人，他用最通俗和辛辣的笔调，鞭挞了圣品阶级的罪恶，讽刺了教皇制度的诸多荒唐、迷信。其作品宣称旨在纠正所有社会阶层的恶习，实则主要针对神职人员。他的讽刺剧在王室、宫廷和大型集会上反复上演，使圣品阶级颜面扫地、臭名远扬。这些讽刺文学甚至成为耕地的农夫、手工艺人和孩子们手上的读物。林赛的风格随后被其他一些诗人仿效，不同之处是后者更加公开地表明自己的新教信仰。翻译成苏格兰本国语言的使徒书信、道德教训和赞美诗歌仍然不胫而走，四处散播；人们如饥似渴地争相阅读，全然不顾严厉的禁令和被告发的危险。

到1540年，在皈依新教教义的信徒中，除了大量的普通民众

之外，我们可以列出许多声名显赫的人物，如格林凯恩的威廉伯爵、亚历山大·齐摩斯勋爵，埃勒尔的威廉伯爵、威廉·鲁斯文勋爵、他的女儿利利娅斯和女婿德拉蒙德领主约翰·史都华（梅斯文勋爵的儿子）、詹姆斯·桑迪兰兹爵士全家、大卫·林赛爵士、唐县的厄斯金、莱斯的迈尔维尔、哈尔山的巴雷夫（劳里斯顿的领主），还有威廉·约翰斯顿和罗伯特·亚历山大两位律师。作为早期欢迎新教信仰的人士，这些名字值得我们更多的思考。常常有人断言，苏格兰贵族之所以倒向改教，主要是因为他们想瓜分教会财产这块肥肉，以及英格兰王室从中作梗。如果我们谈论的是较晚的时期，这种说法确有道理；但对于我们现在讨论的时期则不太可信。首先，颠覆现有教会体制的前景还非常遥远和不确定，人们不可能仅仅出于贪婪而逾越雷池、将自己的身家性命置于最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下；其次，英格兰王室的影响力当时还没有渗透到苏格兰，那是后话。

从1540到1542年年底，皈依新教的人数急剧增长。主教团体曾两次试图将“异端分子”一次性斩草除根。他们向国王呈递了一份名单，内中指控好几百位拥有地产和财富的人士为异端。为了让国王批准对这些人的定罪，他们不惜向其献媚，承诺将来没收的巨额财富都归他所有。当主教们第一次提出这样的建议时，詹姆斯五世非常不快地拒绝了。但是，国王一直对苏格兰贵族怀有强烈的厌恶感，加上主教团体的灌输和影响，如果不是那场和英格兰之间的战争过早地结束了他郁郁寡欢的生命，在后来，他极有可能会屈服于他们的诱惑。

第二阶段

皈依新教信仰（1542 ~ 1549）

第4章 归正

当新教的思想在全国迅速蔓延时，这种思潮也影响了诺克斯。他的几位朋友都接受了宗教改革的教义，这些教义也是大学和文人圈子里常常谈论和争议的话题。在他执教的哲学课上，诺克斯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摒弃了经院哲学的路线，向他的学生推荐一种更加理性和有效的学习方法。这一改革激起了对诺克斯的强烈质疑；当他接下来抨击教会里盛行的腐败现象时，他被打成异端也就理所当然了。此后，他在圣安德鲁斯继续生活已无可能，因为这座城市完全是红衣主教毕顿的天下，此人是支持罗马天主教的死硬派，对于所有的改革充满敌意。诺克斯离开此地，来到南部。不久以后，他就在那里公开宣告自己彻底皈依了新教信仰。诺克斯的背叛激怒了主教团体。他们迫不及待地想除掉这个对手，唯恐他会吸引其他人步其后尘。根据贝扎（Theodore Beza）的记载，毕顿主教宣判诺克斯为异端，将他开除出圣职阶层，然后雇了杀手埋伏等候，欲加谋害，如果不是上帝的护理将诺克斯置于龙尼瑞领主的保护之下，恐怕诺克斯已是性命不保。

在帮助诺克斯更完全地认识真理上面，托马斯·纪尧姆 [Thomas Guillaume, 又名威廉姆斯 (williams)] 功不可没。他是一位杰出的修士，和约翰·拉夫 (John Rough) 一起担任阿伦伯爵 (Earl of Arran) 的私人牧师。伯爵摄政之初，对改教运动存有短暂

的好感，故在此期间，纪尧姆受命在王国各处讲道。然而，对诺克斯影响最大的人士，当推蒙斯的碧塔罗家族的一位绅士乔治·威沙特（George Wishart）。威沙特曾经因为在蒙特罗斯教导希腊文新约圣经而被毕顿主教驱逐出境，此后在剑桥大学度过了一段岁月。1544年，他加入一支受命与英王亨利八世签订条约的苏格兰使团返乡的行程，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在教会历史上，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人能够像乔治·威沙特这样和蔼可亲、满有魅力。他拥有远超过同时代人的学识、滔滔雄辩的口才、无可指摘的生活、优雅谦和的举止，他的生命中充满了热烈的虔诚、激情和坚持真理的勇气，又不失非同寻常的温柔、谦逊、忍耐、谨慎和仁慈。当他在苏格兰各地旅行布道的时候，常有一些名流显贵前呼后拥，人们成群结队慕名而来，对他的讲道心醉神迷。诺克斯对这位老师爱戴有加，并且从他的讲章和私人教导中受益匪浅。在威沙特最后一次拜访罗县的时候，诺克斯剑不离身，侍立在老师左右（自从上次在邓迪险些遭人暗算之后，诺克斯就开始佩剑了）。威沙特对于诺克斯的热诚和才干非常赏识，而且似乎已经预见到他将来必成大器。与此同时，威沙特也强烈地预感到自己不久将要殉道。当博斯韦尔（Bothwell）受毕顿主教唆使来逮捕威沙特的那天晚上，威沙特吩咐诺克斯放下刀剑，不要抵抗。当后者坚持要陪同他共赴俄密斯顿，威沙特回答说：“不，回到你的孩子们（指诺克斯的学生）那里去吧，愿上帝祝福你。一个人去做牺牲已经足够了。”然后打发诺克斯离开。

尽管教会授予了他圣职资格，诺克斯还是放弃了所有在教会任职的想法，转而到龙尼瑞的休·道格拉斯（Hugh Douglas of Longniddrie）家中担任家庭教师。道格拉斯是东罗县的一位绅士，此前接受了新教信仰。一位附近的绅士，来自于同一教派的俄密斯顿的约翰·格本（John Cockburn of Ormiston），也把他的儿子送来受教。诺克斯以宗教和高雅语言的原则来教导他们。他的宗教教育非常成功，以至于道格拉斯全家和左邻右舍都从中受益。他在龙尼瑞的一

所教堂里对他们进行公开的要理问答，同时也定期向他们宣读一章圣经，辅以解释。这些都保留在教会传统之中，那座教堂的遗址至今仍然清晰可见，被人们称作“诺克斯的教堂”。

毕顿主教设法说服了胆小懦弱、优柔寡断的摄政王，将政府权力完全握在了自己手中。在这样的形势下，诺克斯可能得作好长一段时间的家庭教师了。然而事情并非像预期的那样。当毕顿主教变本加厉，正在筹划孤注一掷的行动时，却不料自己反被人暗算，死于非命。一小撮强硬的反叛分子出于不同的动机（厌恶主教设立私刑、英国宫廷的操纵、报复主教的残暴行径、拯救国家脱离压迫，等等），策划了一起暗杀主教的阴谋。在1546年5月29日，他们突然袭击了主教居住的圣安德鲁斯城堡并成功得手。

然而，毕顿的死并没有将诺克斯从逼迫中解放出来。摄政王的兄弟约翰·汉密尔顿（John Hamilton）被提名继任主教职位，他对于寻索诺克斯性命的热心程度，绝不亚于他的前任。诺克斯为了安全起见，被迫隐姓埋名，东躲西藏。他对于这种流亡生活开始感到厌倦，并且感到自己迟早有一天会落到敌人的手上，因此决定离开苏格兰。他无意逃往英格兰，理由是，在那个王国，虽然“教皇之名辉煌不再”，但“他的法律和腐败仍然如日中天”。诺克斯决心拜访德国，并且去新教的大学深造，直到祖国的信仰气候有所改善。但龙尼瑞和俄密斯顿的领主们说什么也不肯和他们的老师分离，他们一再强求，终于劝服诺克斯和他们（以及他们的儿子们）一起逃到仍被反叛者所控制的圣安德鲁斯城堡避难。

在毕顿主教遇刺一事上，对诺克斯缺乏好感的作家曾试图抓住一些把柄来控告他。有人无知到竟然宣称诺克斯也是刺客之一。略有见识的则认为诺克斯既然在这帮反叛者之中寻求庇护，自然也就在他们的罪中有份。还有一些人的说法似乎更有道理，他们拿出诺克斯的著作作为证据，指出他在文中替反叛者辩护，说他们的刺杀行动值得称许，至少是无罪的。据我所知，某些诺克斯的辩护者否认了这一指控并宣称，诺克斯充其量不过说毕顿被刺是上帝的作为

和旨意，是上帝对于主教所犯下罪行的公义报应；对于那些充当器皿去惩罚毕顿的人，诺克斯并没有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表示赞同。我承认，诺克斯希望他的读者关注的首要之事，是天堂公义的审判。但在同时，我想任何一个仔细读过诺克斯相关著作的人，都会认为他在为那些反叛者的行为辩护。事实上，诺克斯的意见是，根据上帝的律法和社会公义的法律，某些人（比如臭名昭著的杀人犯和暴君）因着他们所犯下的丑恶可耻的罪行，已经丧失了他们的生命或生存权。如果有人私下将他们处决，这可以被算为正当；前提是，犯罪者篡夺了国家行政权力或者被专制的君主蓄意袒护起来，使得所有通过正常司法渠道操作的矫正措施都不可能实现。这种观点和许多古人提出的“诛弑暴君论”如出一辙。布坎南在他的对话集《有关苏格兰王国的法律》中对此观点进行了辩护。我必须承认，这种原则在应用时带有很大的危险性，极有可能被钩心斗角、狂热冲动和铤而走险的人所滥用，成为他们实施穷凶极恶之罪行的借口。然而，如果将上述现象与原则相混淆，则有失公允。该原则通过给予个人解决彼此争端的自由，使暗杀行为成为合法——要知道暗杀在当时那个年代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我再补充一句，曾有过这样的事例，有些人在没有得到政府授权的情况下，对残忍凶恶的罪犯执行了惩罚措施。所以，对于行刺毕顿主教的人，虽然我们并不赞同他们的行为，但也不能随便夸大其词，给他们定下谋杀的罪名。

第5章

顺服呼召，领受牧职

在1547年的复活节，诺克斯进驻圣安德鲁斯城堡，并开始以他惯有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教育。在城堡的教堂里，他举行有关查经的讲座，从《约翰福音》开始，仍然延续从前在龙尼瑞的脉络。他还在城市下属的教区教会对他们进行要理问答。有一些人两边的活动都参加。在城堡里避难的人（他们并没有参与刺杀主教的阴谋）包括蒙特的大卫·林赛爵士（Sir David Lindsay of the Mount）、哈尔山的亨利·巴雷夫（Henry Balnaves of Halhill）还有约翰·拉夫——他自从被摄政王解职后一直隐居在凯尔。这些人非常喜欢诺克斯的教义和教导方式，因此力劝他公开讲道，并希望他成为拉夫的同工。拉夫当时是驻防部队的随军牧师。但是，诺克斯拒绝了所有人的恳求，理由是他认为自己没有全职事奉的呼召，并且表示不会被他们的强求所动。然而这些人并没有罢休，经过和弟兄们的商量，他们做出了一个诺克斯毫不知情的决定，即以全体会众的名义，在公开场合呼召他承接牧师一职。

接下来，在定好的那天，拉夫在教会讲道，主题是有关教牧人员的选举。他宣布，无论会众人数多么少，如果发现他们中间有任何人具备恩赐，适合担任牧会的职分，那么会众就有权利推举此人；如果此人拒绝那些渴望得到教导的人们的呼求，那么他就有祸了。讲道结束时，拉夫转向诺克斯，对他说道：“弟兄，请不要觉

得被冒犯了，我代表所有在场的人向你宣布：奉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之名，以及所有借我的口呼召你的人之名，我指示你不要拒绝这份神圣的职位。在此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拓展基督的国度，为了建立弟兄，也为了安慰我——你非常清楚我已经不堪重负，请你担起这份圣职和讲道的责任。你当逃避上帝强烈的不满，并且渴望他赐给你丰富的恩典。”然后，拉夫转向会众说，“这难道不是你们给我的托付吗？你们是否同意这次任命？”所有人都回答说：“是的，我们同意。”面对这突如其来、神圣庄严的命令，诺克斯窘迫万分，不知所措，一句话也说不出，泪水夺眶而出。他退出聚会，把自己关在屋里。“从那一刻直到他被迫在公开场合首次讲道的那一天，诺克斯的表情和举止深深地表达出他内心的痛苦和忧伤；没有人看到他有丝毫喜乐的迹象，他甚至好多天不愿意和任何人待在一起。”

这一幕景象道出了履行教牧职责所要承受的重担，对于那些受托付去传福音的人，诺克斯的经历会唤起他们心中深切的同感。这也让人想起初代教会的日子，那时人们对于讲坛事奉慎之又慎，不会“为了混碗饭吃而去想办法谋求教会的职分”。当时敬虔和有才干的人对于教牧职位背后的巨大责任以及自身的不足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们对于承受圣职的任命勉为其难，尽管他们对此圣职仰慕已久，也为此尽心竭力预备自己。再看看当时充斥在天主教会牲口棚里的那些家畜之流的行为，这是何等强烈的对比！诺克斯的举止也责备了那些自我册封的传道人；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呼召，仅仅凭着行善的模糊愿望和一时热情，或者某种高估自身恩赐的愚蠢自欺，就胆敢践踏合宜的次序，强行跻身于神圣的教会事奉行列之中。

然而，我们不应当猜测，诺克斯在顺服他所领受的呼召时的痛苦和不情愿是因为他怀疑呼召的有效性；因为这个呼召缺乏当时在教会常见的某些外在程序，或者说，并不是按照教会给人按立圣职时通行的惯例进行的。这些程序和惯例，只要有圣经依据，并且有

助于保留体统和次序，诺克斯都不反对。他之所以尊重这些仪式，乃是缘自苏格兰新教教会的早期实践，他自己也在该教会形成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和所有改教先行者一样，诺克斯反对主教按立仪式的必要性，因为基督的律法从来没有授权如此行；他也不认为长老按手是保证圣职有效的必要仪式，或者是在教会各种场合下必须遵守的仪式。

实际上，教皇派在此问题上大做文章，认为诺克斯和其他新教牧师没有资格承担任何合法职分。同样，此后许多英国教会里看重等级次序的人也凭借他们极端的教义，毫不犹豫地撰文谈论说，主教按立圣职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主教的权柄是从使徒那里毫无中断地传递下来的。所以，除了他们自己的教会，所有新教教会的圣职次序都是无效的。这种教导在今天这个开明的时代又死灰复燃，有人恬不知耻地为之宣扬和辩护，其荒谬、狭隘和可憎的后果不言自明。诺克斯的敌人指证说，他对于自己早期在天主教中所受的按立不屑一顾；虽然我认为并非如此，但是，我完全确信，他视自己在圣安德鲁斯所受到的挑战是呼召他进入事奉的首要因素。

此时煎熬诺克斯心灵的并不是由于他的呼召缺乏某些外在的程序或仪式，而是有更崇高的原因。和从前在仪式上的受职不同，现在他对于教牧职分的重要性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因为有一天他必须向那位大牧者交账，所以诺克斯深知看顾不朽灵魂的工作是何等令人敬畏。他的使命是“毫不避讳地传讲神全备的旨意”^①，尽管这些信息并不讨听众的喜欢；他必须“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②；作为信奉新教教义的传道人，他未来的生活将面对逼迫、囚禁、流放甚至惨死；更危险的是，他可能会在这些艰难困苦的淫威下屈服，以至于“丢弃信心和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

① 语出《圣经·使徒行传》20章27节

② 语出《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2节

一般”^①。这些念头以及类似的顾虑充满了诺克斯的心，使他饱受折磨，痛苦不堪。最终，在确信是神呼召他进入事奉之后，他镇定下来，转向对神的倚靠，因为神曾应许说，“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②。正如使徒保罗一样，诺克斯立定心志，“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他的路程，成就他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③。在此后的岁月里，诺克斯经常动情地回想起人生当中这关键的一步。即使在身陷苦难、谷底的时候，他对自己当初经过深思熟虑后所作出的选择，也从来没有懊悔过。

当时发生的一件事进一步坚定了诺克斯的决心，使他顺服了会众的呼召。拉夫虽然有坚实的教义基础，但他的文化修养一般。大学和修道院中教皇派的支持者因此认为有可乘之机；其中一个叫迪安·约翰·阿南（Dean John Annan）的人，常常发言反对拉夫传讲的教义，用诡辩纠缠不休，或断章取义地引用早期教父的著作，使拉夫不胜其扰。诺克斯曾经撰文帮助拉夫；由于他逻辑能力出众，并且熟悉教父的作品，所以成功地驳斥了阿南的谬论，揭露了教皇派的错误。有一天，在一所教区教会举行的公开辩论中，阿南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批驳得一败涂地，于是他拿出最后一招杀手锏，宣称根据绝对无误的教会权柄，路德派的信条已经被打为异端，所以他断言，任何进一步的讨论已经没有必要。对此诺克斯的答复是：“在双方就论战内容达成这一总结性决定之前，首先有必要根据圣经所提供的标准确认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教会，以免他们盲目接受的这位属灵母亲是一个淫妇，而不是耶稣基督纯洁无瑕的新妇。”诺克斯继续说，“你满心寄予胜算的罗马天主教会，现在已经充满腐败；我确信它已经成为撒旦的会堂，它的元首教皇就是使

① 语出《圣经·提摩太前书》1章19节

② 语出《圣经·哥林多后书》12章9节

③ 语出《圣经·使徒行传》20章24节

徒所说的‘大罪人’^①，正如我确信耶稣基督被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团体逼迫一样。我已经用文字亲自证明，犹太教团体背离了摩西所赐的律法，所以他们一致同意杀害无辜的耶稣基督；同样，今天的天主教会也远离了使徒时代的纯洁，其堕落程度，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一个大胆的控诉。但人们都已预备好倾听证据。他们大声喊叫说，如果这一控诉是真实的，那么在过去他们一直受到了蒙骗。由于不是所有人都能阅读他的著作，大家坚持要求：既然诺克斯对于他的宣告如此确信，就应当走上讲坛，给大家一个机会来聆听他的理由。面对这一无法回避但合情合理的挑战，诺克斯答应在下一个主日证道。

^① 语出《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节

第6章 辩论

在指定的那天，诺克斯出现在教会的讲坛上。他讲道的经文是《但以理书》第7章24至25节。首先他解释了先知所见异象的含义，四活物所象征的四个帝国分别是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从罗马帝国中兴起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此处是诺克斯讲道的中心。他宣称经文里所说的“一王”指的正是堕落的罗马天主教会；在新约对应的章节里，也称作“大罪人”、“敌基督者”和“巴比伦大淫妇”。这些称呼并不是指任何一个单独的人，而是指一个组织或群体，受制于一个邪恶的元首，并且该元首的位置不断有人继任。为了强调“教皇势力就是敌基督者”这一主张，诺克斯从生活、教义和教规三个方面进行了考察。他描述了教会历史上历届教皇的生活；把他们不准吃肉、禁戒婚姻的教义和新约的教义进行比较（特别是有关称义的条款）；他们关于节日的教规等等和基督的律法有什么不同。诺克斯还列举了教规中许多赋予教皇的亵渎上帝的名号和特权，进一步证明教皇正是经文中描述的“敌基督”。最后，诺克斯表示，如果在场有人认为他的见证错误地引用或解释了经文、历史和教会学者的著作，可以当面交流，他愿意随时在公开场合给予他们满意的答复。当时出席者中包括诺克斯先前的导师梅杰、大学教授、修道院副院长以及众多来自不同修会的高级教士和修士。

这篇脍炙人口、后来使诺克斯声名大噪的讲道，引发了轩然大波，并且在所有社会阶层激起了严肃的思考。在此之前的新教传道人，包括威沙特，充其量只是对既有宗教体系中的某些较露骨的谬误进行批驳而已，但诺克斯的锋芒直指天主教的根基，大胆宣告教皇就是敌基督，而教皇制是一个错误的、违反圣经的体制。有关这篇讲道及其影响力的报告很快传到了圣安德鲁斯的地区主教那里，他大为震惊，马上写信给修道院副院长温兰（Winram），责备他居然能够让如此离经叛道和分裂教会的教导四处流传而不出言反击。温兰虽然骨子里对新教教义存有好感，但对于主教的警告也不敢怠慢，因此召集了本城最有学识的人在圣伦纳德学院聚集，同时召见拉夫和诺克斯赴会。二人的讲道中有九篇被选出来公之于众。温兰的措辞是，他愿意“倾听他们如何解释这些奇谈怪论”。

诺克斯到场后，首先表示很高兴能在这样一群尊贵、谦卑和严谨的听众前出席辩论。由于诺克斯很清楚温兰的微妙态度，加上他最厌恶虚伪和作假，故在开始答辩之前，他恳求温兰以诚实公正的方式来处理整个讨论过程：如果他提出的任何观点与圣经相冲突，他期望温兰发言反对，以免人们被蒙骗。但是，如果温兰确信诺克斯的教导是正确的，而且符合圣经，那么他就有责任用他的权柄为之正名。对此温兰很谨慎地回答，他并不是以法官的身份出席会场，所以既不会赞同也不会谴责任何意见；他希望这是一个自由的会议，而且，如果诺克斯不介意的话，他甚至也想参与一下辩论。接下来他陈述了一些反对意见，主要针对诺克斯的如下观点：“论到敬拜上帝的程序，尤其是对于圣礼的管理，当严谨遵守圣经所规定的原则，不应加添、不应删减。教会没有权力随意制订宗教礼制，并对这些礼制附加特别意义。”简短的辩论之后，温兰委托一位叫阿布克尔（Arbugkill）的灰衣教士继续发言。阿布克尔信心十足地发起挑战，但很快就羞愧地败下阵来。他一开始就急不可耐地证明教会拥有设立礼制的神圣权利；当诺克斯引用福音书、使徒行传和新约书信对他逐一进行质问后，他招架不住，情急之下大声宣

布：“使徒们写下这些书信的时候还没有领受圣灵，他们是后来才领受的圣灵并开始设立圣礼。”“神父！”温兰大声喊道，“您说什么？！我希望上帝禁止您再说这样的话。照你所言，我们信心的根基将归于无有。”窘迫不堪的教士试图弥补自己的失误，但徒劳无功。在其后的辩论中，诺克斯再也无法就讲道的内容和教士展开对话。阿布克尔死死抓住教会权柄这件唯一的法宝来应付所有的问题。诺克斯一再强调，圣经清楚命令要遵照神圣的律法来举行礼拜，教会没有权力违背如此明文的指示。“如果是这样的话，”阿布克尔说，“那我们就没有教会可言了。”“是的，”诺克斯以讽刺的口吻反驳说，“我在大卫的诗篇里读到他所写的邪恶之人的教会：‘我恨恶恶人的会’^①；今天的天主教会也是如此，你应当奋起与之抗争。如果你选择与它同流合污，我无法阻止你。但对我而言，我只能认同以耶稣基督为牧者、单单听他的声音、不会听陌生人声音的教会”。

获悉这次大会的详情之后，教皇派为长远考虑，开始避免在所有场合与改教者交锋，因为这样做只能对己方更加不利。假如圣安德鲁斯城堡在他们的掌控之下，他们肯定早就让这些制造麻烦的传道人闭嘴了。但事已至此，只能采取比较缓和、阴险诡诈的手段来应对。为了抵制诺克斯和拉夫深受欢迎的讲道，教皇派的策略可谓费尽心机：他们下令修道院和大学的所有学者于每个主日轮流到教区教会讲道。通过这种方法，新教传道人就失去了在主日布道的机会，而那一天的听众是最多的。教皇派也希望自己的教士们如此殷勤的工作能够重新赢得人们的好感。为了避免失言或者引发思考，教士们被叮嘱在讲道中不要触及任何有争议的话题。诺克斯轻易看穿了这套把戏，但他并没有为此愤愤不平，而是在周间的讲道里表达了祝愿，希望教士们在更多需要他们钻研的问题上也如此殷勤劳力。与此同时，诺克斯非常喜乐地看到，基督的名得到传扬，而且

^① “我恨恶恶人的会。”语出《圣经·诗篇》26章5节。

也无人在公开场合发表攻击真理的言论；如果有这一类的言论发生，诺克斯则请求公众在有机会听到他出面答复之前，暂时先不要下结论、作判断。

在圣安德鲁斯讲道的几个月期间，诺克斯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仅城堡里的众人，镇上的许多居民也都脱离了天主教，并公开表白了新教信仰，参与了诺克斯主持的圣餐礼——其模式成为后来苏格兰改革教会实践的样板。诺克斯对于事工所结出的第一批果子感到欣慰；然而令他不快的是，会众中有一些品行不端的案例发生，某些人犯有淫乱的罪行，尽管这在当时的军队中是极为平常的事。当诺克斯被选为他们的牧师那一刻起，他就公开地责备这些不法之事。当他看到自己的劝诫不能阻止犯事者时，对于他们所从事的军人职业他深表忧虑。

第7章

被囚

1547年6月底，一支装载庞大陆军的法国舰队，在利奥·斯特罗西（Leo Strozzi）的指挥下，出现在圣安德鲁斯的海面上，旨在协助总督镇压城堡叛乱。法军从海路和陆路将城堡合围。城堡守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在期待英格兰出兵援助的希望落空之后，最终不得不在七月的最后一天向法军统帅投降。法军对于投降者的待遇相当宽厚：城堡里的所有人都可以活命，并将被运到法国。如果他们不想选择服侍法国国王，那么他们将被移交给任何他们想去的国家——除了苏格兰以外。约翰·拉夫在城堡被围之前就已经离开并隐退到英格兰。尽管诺克斯预料到驻防部队可能守不住城堡，但是他无法说服自己放弃职责，所以决心要和弟兄们一同承担被围困的风险。故而，在城堡失陷后，他和其他人一同被押上了战舰。几天之后，舰队到达了法国费康（Fecamp），然后沿塞纳河逆流而上，最后停留在鲁昂（Rouen）。在教皇和苏格兰教士团的请求下，法国人违背了投降协议，所有被掳者作为战俘被扣押。为首的贵族们被分别监禁在鲁昂、瑟堡（Cherbourg）、布雷斯特（Brest）和蒙圣米歇尔（St. Michel）。诺克斯和其他人成为战舰上

的囚犯^①，锁链加身，除了饱受一般的牢狱之苦，还被当作异端分子，遭到百般羞辱。

战舰从鲁昂开到南特（Nantes），然后停靠在卢瓦河（Loire）边过冬。为了使囚犯们放弃他们的信仰并赞同天主教的敬拜方式，他们把引诱、威胁和暴力等等各种手段都用上了。但苏格兰战俘们对于天主教的偶像崇拜如此深恶痛绝，以至于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无论是关押在地上的还是船上的）在淫威下屈服，甚至连一丝象征性的让步也不肯。当战舰泊于卢瓦河上时，船上和岸边经常举行弥撒仪式，“Salve Regina”^②的颂歌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每当这个时候，囚犯们就被带出来，并受到威胁恐吓，说如果他们不想受皮肉之苦，就必须向圣母表示应有的敬意。但是，他们不但没有照办，反而在弥撒一开始就立刻蒙上了头。诺克斯后来曾说过一桩此间发生的趣事。虽然他没有提到故事里主人公的姓名，但极有可能就是他自己。某天，有人带了一幅精美的圣母画像上了船，并带到一个苏格兰囚犯面前让他亲吻。这名囚犯请持像者不要打搅他，因为他是不会去碰这类被诅咒的偶像的。船上的军官们见状不由分说，粗暴地将画像按到他的脸上，硬塞到他的手中。这名囚犯拿着画像，瞅准机会，把它猛地扔进河里，然后说：“现在让我们的圣母拯救自己吧，既然她身轻如燕，那么就让她学习游泳吧！”从此，再没有人用这种方式来搅扰他们了。

据记载，法国舰队于1548年夏天回到苏格兰，在东部海岸游弋了很长时间，为要监视英格兰舰船。底舱牢房的恶劣环境极大地损害了诺克斯的健康，他开始发高烧。船上所有人都对他的病情感到绝望，认为他必死无疑。但是，即便身处这样的光景，诺克斯内心的坚韧和勇气也没有衰退，他仍然以获释的希望安慰狱友们。当时的形势使人们变得非常焦虑和沮丧，他们不停地问诺克斯：“您

① 指成为在船上划桨的奴隶。

② 意为“万岁，女王”（指圣母玛丽亚），某些天主教圣歌以此句开始。

说我们还能重获自由吗？”他始终如一地回答说：“上帝为了他的荣耀，一定会拯救我们，甚至就在今生拯救。”当他们停泊在邓迪和圣安德鲁斯之间的海岸时，一同被囚的詹姆斯·鲍尔弗爵士 (James Balfour) 让诺克斯遥望陆地，问他是否能认出故土。虚弱不堪的诺克斯答道：“是的，我能认出来，因为我看到了教堂的尖塔，那里是我当年顺服上帝荣耀的呼召、第一次公开讲道的地方。无论我现在看上去多么虚弱，我完全确信，将来我会再次站在同样的地方见证他的圣名。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是不会死的。”这是一个惊人的答复。在诺克斯重返苏格兰的若干年前，詹姆斯爵士在许多见证人面前重复了这段话，而在当时，他的豪言能否兑现是极其渺茫的。

然而，我们不应当认为在整个被囚期间，诺克斯一直都持守着这样的高尚情操和平静心态。当被投进残酷的监狱，受到敌人的侮辱，而且没有任何获释的迹象时，诺克斯也被痛苦和绝望所环绕，正如以色列的王室诗人所描述的凄惨遭遇。他感受到内心的争战，那是所有义人都很熟悉的经历。当肉身的苦难一起袭来时，这种争战变得更加激烈。不过，当诺克斯求助于祷告——这是重压之下的受苦者永远有效的避难所，他就从恐惧中解放出来，安息在他所侍奉之上帝的应许和眷顾里面，充满了“信心和喜乐的盼望”。

当诺克斯病愈后，为了打发单调沉闷的监狱生活，他开始专心写作，整理自己的信仰告白，其中包括他在圣安德鲁斯教导的内容，特别是在圣伦纳德学院论战的记录。之后他设法将这部手稿辗转送到了苏格兰的挚友手中，随文附上了一篇恳切的劝勉，鼓励他们务要持守所承认的信仰，不管会为此遭遇什么样的逼迫。诺克斯后来在达勒姆 (Durham) 主教面前为其教义辩护时，曾经提到这篇信仰告白：“请不要以为，只因我现处英格兰境内，所以发言才敢如此大胆。不，上帝已经把我的疑虑除去。当我身处最痛苦的捆锁之中，在残酷的压迫者手下，上帝的仁慈和良善使我的手仍能够奋笔疾书，为心灵的宣告作见证。那些文字甚至比我的口舌所说的还要丰富。”

尽管身处严酷的监禁之中，这些分散到各地的囚犯仍然找到了

彼此之间偶尔联络的机会。哈尔山的亨利·巴雷夫（Henry Balnaves of Halhill）在狱中写成了一篇论文，题为《论称义：一个义人的著作和对话》（*Treatise on Justification and the Works and Conversation of a Justified Man*）。这篇文章在诺克斯第二次随战舰从苏格兰返回法国的时候传到他手中，诺克斯对该文极为欣赏；他将其分成章节，加上注释和内容摘要，然后在前面附上一篇推荐性的献辞，打算日后一旦有机会，就出版供苏格兰的基督徒弟兄们使用。我相信，今天的读者应该去感受一下那篇论文的风格——它给正在忍受逼迫的诺克斯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和活力，尽管当时“他的双脚被铁链牢牢拴住”（正如他自己在献辞中所说）。鉴于这本书如此珍贵，我愿意更多地引用诺克斯所写的献辞：

耶稣基督的奴仆约翰·诺克斯，在此写给圣安德鲁斯城堡教会最亲爱的弟兄们，以及所有宣称归信基督真正福音的人：愿天父上帝所赐的恩典、怜悯和平安，并圣灵永恒的安慰，都归于你们。

接下来他列举了一些圣徒的例子，正如约瑟、摩西、但以理和初代教会基督徒的故事一样，他们被赶出自己的祖国，流放异国他乡，但上帝之名却因此被尊大，福音信仰的恩泽也遍及四方。他继续说道：

本书正是这些事情的写照。撒旦逼迫我们的计谋，其目的首先是阻止基督福音的馨香气味吹到我们坐谈起居的地方；其次是通过肉体的患难和世上的灾祸来压制我们，使我们找不到可以敬虔灵修的地方。但是，因着我们父神莫大的恩慈和无限的良善，撒旦的这些计谋都徒劳无功；无论他和属下的所有邪恶势力怎样拦阻，这福音必要在苏格兰公开宣扬（哦，主啊！我敢如此说乃是因为信靠你神圣的应许）。在如今混乱动荡的时局中，我们仁慈的天父眷顾了所有人的期盼，为我们提供了安息之处：眼前的这部著作就是上帝恩惠的明证。当我被囚在

鲁昂的一艘名叫“圣母号”(Nostre Dame)的战舰上,躺卧在铁链之中,被虚弱和病痛折磨的时候,这部手稿送到了我的手中。作者是一位可敬的弟兄——哈尔山的亨利·巴雷夫阁下;他作为囚犯(这显然是不公正的)被关押在鲁昂的古老宫邸。在我拜读这部作品的时候,这位尊贵和忠诚的人士在文中所提出的观点和建议,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和安慰。为了更方便的阅读,我冒昧地自作主张,将其划分成章节;与其说是为了更好地阐明原著(其实作品本身已足够敬虔和完美),倒不如说是为了和作者一起,来公开宣告我对其中所包含的称义条款的认信。亲爱的弟兄们,我请求你们慎重地思考,我们现在有没有否认这些从前所承认的信条。今天我们不再有圣安德鲁斯城堡作保障,所以我们的敌人污蔑我们说,没有了这些城墙的保护,我们必定不敢再“口出狂言”。赞美主!他无限的仁慈和智慧使仇敌不再有诽谤我们的机会;主让我们看见,那条古蛇只有伤人脚跟的能力,或者说,他只有骚扰和折磨肉体的能力,但是却无法阻止灵魂时刻与基督耶稣紧密相连,也无法阻拦我们公开告白主的真道。哦,永在的父啊,愿你的名被尊崇!这一切完全出于你的怜悯:你保守我们直到今日,并且借此论著,让我们的信仰、宣言得以为人所共知。主啊,求你继续施恩,正如你现在赐给我们笔墨见证真理,愿我们很快也能用口舌在你的会众面前宣扬真道。愿主仁慈的眼目看顾你的百姓,不要让黑暗势力压制他们。这是我的祷告。亲爱的弟兄们,请原谅我偏离了话题,因为我心炽烈,我灵奋激(主知道我没有撒谎),不得不说。

蒙圣米歇尔的囚犯询问诺克斯,如果他们试图越狱逃走,这样做是否正当。因为他们中间有人反对这个提议,担心越狱者会使那些仍在坐监的弟兄面临更严酷的待遇。诺克斯的答复是:这些惧怕并不构成放弃越狱计划的充分理由;他们可以带着良心的平安越狱

逃脱，条件是从始至终“不可流任何人的血，如果获取自由要以流他人的血为代价，那么我永远不会赞成”。之后蒙圣米歇尔的囚犯实施了他们的计划，并成功越狱，“没有伤害任何人，也没有破坏任何属于国王、官长和所在地的财产”。

终于，经过19个月漫长和艰苦的监狱生活后，诺克斯于1549年2月获得了自由。至于他获释的原因，我不太确定。有一种说法是，囚禁诺克斯的那艘法国战舰在英吉利海峡被英格兰人俘获。另一种说法是，法国国王下令将他释放，因为调查显明，诺克斯和毕顿主教被杀一事没有牵连，而且也没有参与那些占领圣安德鲁斯城堡的叛乱者所犯下的其他罪行。还有人认为，他的朋友出于满心盼望诺克斯将来必成大业的动机，出重金将他赎买出来。此外，诺克斯获释也很有可能和外界的形势变化有关：当时法国宫廷在征得议会同意后，促成了太子和年幼的苏格兰女王的联姻^①，并获得了后者的财产；借此，他们在苏格兰的筹算已大功告成，故而对处理苏格兰教士们的争吵不再有很大的兴趣。

^① 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Mary I of Scotland，又称为 Mary Stuart、Mary Stewart 或 Mary Queen of Scots，生卒：1542年12月8日—1587年2月8日）是苏格兰的统治者（1542年12月14日—1567年7月14日）以及法国王后（1559年7月10日—1560年12月5日）。她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五世的独女，母亲是法国权臣吉斯公爵弗朗索瓦·德·洛林之妹玛丽·德·吉斯（Marie de Guise）。玛丽也许是苏格兰君主中最有名的一位，主要是由于她个人生活的诸多丑闻以及政治生涯的悲惨结局。她的父亲詹姆斯五世在 Solway Moss 战役中败于英格兰，忧闷过度，于1542年年底去世，因此出生仅六天的玛丽继位成为苏格兰女王。（从那时一直到1554年，苏格兰宫廷由亚兰伯爵詹姆士·汉密尔顿摄政；之后是女王的母亲玛丽·德·吉斯摄政，直到她于1560年去世。）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苏格兰和亨利八世统治下的英格兰关系紧张，冲突不断；苏格兰在两国交战中连连失利。当时的法国国王亨利二世打算通过苏格兰年幼的女王与自己的儿子弗朗索瓦的联姻来统一法国与苏格兰。这在玛丽·德·吉斯看来是解决危机的唯一明智的出路。1548年7月7日，玛丽与法国皇太子的婚约在距离汉廷顿不远的修道院内签署。8月，年仅五岁的玛丽女王被送到法国宫廷抚养，在那里度过了十年光阴。1558年4月24日，她在巴黎圣母院和法国皇太子弗朗索瓦举行了完婚典礼。次年亨利二世去世，皇太子继位，玛丽成为法国王后。1560年12月5日，登上王位仅一年多的弗朗索瓦二世去世。1561年8月19日，年轻守寡的玛丽回到了苏格兰，开始执政；女王的天主教信仰使她与国内新教势力的矛盾一触即发，这是后话。

第三阶段

英格兰改教（1549 ~ 1554）

第 8 章

在伯威克

重获自由之后，诺克斯即刻去了英格兰。从前使他拒绝在那个王国居住的不利因素，如今已不复存在了。亨利八世于 1547 年驾崩。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麦（Thomas Cranmer, 1489 - 1556）曾在这位骄横跋扈、变幻无常的君主手下饱受压制，现在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开始全力以赴推动宗教改革了。当时继位的爱德华六世（Edward VI）还未成年，摄政统治王国的实权人物对主教的举措给予了倾力支持。^①但在实施这一广泛和艰巨的计划时，克兰麦发现称职的副主教极为缺乏。大部分在任主教虽然表面上附和政府所提出的改革步骤，但实际上仍然依恋旧的宗教体系。他们不但不支持，反而暗中阻挠主教的改教措施。弥撒仪式充满了拙劣的无知，这种无知又使他们深陷入习以为常的迷信活动中。下层的神职人员通常既无能力也不情愿去履行所吩咐的指令。克兰麦征得摄政王同意，从德国邀请了一些新教学者来到英格兰；其中有几位大师如彼得·马特（Peter Martyr）、马丁·布瑟（Martin Bucer）、保罗·法

^① 爱德华六世登基时年仅 10 岁，故由他的舅父索美塞特公爵（Duke of Somerset）作摄政王辅助他。公爵是一位力主改革的人，因此掌权后便大事改教。如请求国会将亨利八世的法令《信仰六条》撤消，准许平信徒在领圣餐时持杯而饮，要求国会准许圣品人员结婚并制定新的崇拜仪式，要全国教会遵守。他还委派克兰麦编订《公祷书》，给所有教会使用。



幼年的爱德华六世

吉斯 (Paul Fagius) 和伊曼纽尔·崔米纽斯 (Emanuel Tremellius) 被安置在牛津和剑桥大学担任教授，专门训练讲道者，以备将来之需。但是，眼下对传道人的需求极为迫切，对此所采取的权宜之计是：不再将一些受欢迎的优秀传道人约束在固定的职位上，而是差派他们到王国各处去巡回布道。因为地方上的神职人员最蒙昧无知，对改革最叛逆不服，而且当地居民受迷信的捆绑也最为严重。

在这样的形势下，诺克斯的热心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在圣安德鲁斯讲道的名声早已传到了英格兰，饱受苦难的经历也为克兰麦和枢密院所知。他们一致觉得，将他送到北方边境去作传道人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所以在诺克斯到达英格兰之后，很快就被授权离开伦敦，派遣到伯威克 (Berwick) 去讲道。诺克斯欣然前往，因为伯威克给他提供了渴慕已久的机会，可以探知祖国的宗教状况，方便与朋友联络，并且向他们提供建议。诺克斯在被囚期间亲身感受到新教教义强有力的心灵支持，这一经历使他对之深深爱慕，也挑旺了他反对教皇制的热心。在伯威克，诺克斯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教导会众。他不遗余力地攻击天主教会，斥责其礼拜是公然的偶像崇拜，并且其教义可咒可诅。他努力说服听众摆脱天主教的禁锢，其心情之急切，好像从水深火热中救人性命一样。诺克斯在伯威克两年的劳苦工作没有白费：通过他的事奉，许多人脱离了无知和谬误，信仰得到归正；当地的驻防部队曾因惹是生非、淫乱放荡而臭名远扬，如今在士兵们中间，生活方式已焕然一新。

当地的教士们对于这位新教布道者的成功和声望自然恼怒不已，因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顽固透顶的教皇派，历来受到达勒姆 (Durham) 教区主教汤斯托 (Tonstal) 的荫庇。像他的朋友托马斯·莫尔爵士 (Sir Thomas More) 一样，汤斯托主教属于那种极难表达正确意见的人，他的性格中明显掺杂了某种坚持谬误的顽固不化。一方面他在高雅的学识上胜过同辈，另一方面却是偏见和迷信的庇护者。虽然他在私人生活中表现适度、举止温和，但他在任期内参与制定的公共法案却被令人震惊的粗俗鄙陋所玷污。起初他在

议会中坚决反对他所谴责的革新提议，但随即摇身一变，对颁布的改教法令悉数听命，百般迎合；正因如此，汤斯托才能在一系列动荡的宗教变革中连任三届教区主教而不倒。他对于和自己职业密切相关的学问几乎不感兴趣，对当时激烈的信仰论战也漠不关心。在一个人人都必须选择自己的信仰立场的年代，汤斯托固守着那些久已确立的传统观念，沉浸在圣品阶级的权势和荣华之中。鉴于自己曾参与促成改教法案（这些法案导致了英格兰和罗马教廷的决裂），汤斯托似乎急于弥补这一过失，故而在议会中反对任何进一步的变革。由此产生的冲突激起了他的热情，使他最终变成一个教皇派信条的积极拥护者。他还写了一本为“化质说”^①辩护的书；按照伯内特（Burnet）主教的评论，书中的“拉丁文较其神学更为出色”。^②

诺克斯在教区内的工作令汤斯托主教非常不快，因为他所致力于颠覆的一切，都是主教所倾心支持的。由于诺克斯持有摄政王和枢密院的授权，主教不敢公开禁止他的事工；但只要教士们针对诺克斯教导的教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主教都洗耳恭听、大加鼓励。1549到1550年间，虽然诺克斯主要驻扎在伯威克镇，但偶尔也被差派到附近乡村去讲道。他是否于1550年年初按巡回布道的路线到达过纽卡斯尔镇（Newcastle）并在那里讲道，还是由于在伯威克的讲道遭到非议、故被召到纽卡斯尔去讲道，我们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人因诺克斯教导说弥撒中的献祭是偶像崇拜而在主教面前控告他。因此诺克斯被要求在指定的日期公开陈述其理由。1550年4月4日，在纽卡斯尔召开了一场大型集会，与会者包括枢密院议员、达勒姆教区主教以及主教手下的饱学之士。诺克

① 化质说（Transubstantiation），又称圣餐变体论、变质说。罗马天主教认为，弥撒进行时，就有神迹发生，饼和酒会真实地变为基督的身体和血，尽管物品的感官特质——知觉、味道、气味——仍保持不变。天主教会是按字义解释《约翰福音》第6章32-58节的经文。

② 这是一句讽刺的话，意思是该书徒有华丽的辞藻，但其内容却让人不敢恭维。

斯在众人面前对遭到质疑的教义给予了充分的辩护。在绪论中，他向听众陈述了来此讲道的原委，并警告他们提防教育和习俗造成的强烈偏见；这些偏见助长了宗教信仰中的错误观念和实践。接着，他开始证实自己所教导的信条。诺克斯阐述主题的方式非常适宜听众接受，尽管他们的文化修养参差不齐，背景悬殊。按照当时学院的惯例，他以三段论式的演绎法提出论点，但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其举例说明，使台下文化程度最低的人也能明白。在简略提及弥撒中粗俗的内容和可耻的交易（这在当时极为普遍）之后，诺克斯话锋一转，开始力证弥撒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还其最真实的面目”，本身就是一个偶像，是迷信的头脑所炮制出来的产品。弥撒已经取代了真正的圣餐仪式，并且独占了不当得的荣耀，这荣耀本该归给耶稣基督和他的牺牲。诺克斯对于自己批判的标准所立下的格言是：“集中全部火力。”圣经的权威、有力的推理、严肃的谴责以及尖锐的讽刺，都被他用来进行轮番攻击。在辩护过程中，诺克斯也不失幽默，妙语连珠；这实在要感谢天主教的迷信和愚昧所提供的丰富素材。即便那些已经深刻意识到迷信仪式之危害的人，^① 也被他戏谑了一把。在总结陈词之前，诺克斯提及上一个主日的讲道中包含某些错误教义，他已准备对其进行展示说明。但他会首先将自己所作的讲道笔记送给那位传道人过目，并请后者作适当的修改，以此表明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歪曲他人的言论，也不是借此吹毛求疵、蓄意挑剔，而是为了捍卫真理，并且告诫他的听众谨防那些损害他们灵魂的谬误。

这次论战使主教和他博学的助手们彻底哑口无言，也让诺克斯的名声传遍了整个英格兰北部。诺克斯在伯威克的讲道一直持续到1550年年底；从1551年开始，他移居到纽卡斯尔，因为那里的事工更需要他。同年12月，枢密院为了表示对诺克斯的嘉许，委派

^① 当时有许多人士虽然意识到（甚至批评）天主教内部的腐败行为和错误教义，但并不反对教皇制度本身（或者说，他们仍然认同天主教会的合法性）。

他担任爱德华国王的常务私人牧师之一。在国王的一部重要的事务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按照任命，我应该有六位常务牧师，其中两位常在左右，四位外出布道。第一年安排两位在威尔士，两位在兰开夏郡（Lancashire）和德比（Derby）；第二年，两位在靠近苏格兰的边疆地区，两位在约克郡（Yorkshire）；第三年，两位在诺福克（Norfolk）和埃塞克斯（Essex），两位在肯特（Kent）和萨塞克斯（Sussex）。这六位牧师是比尔（Bill）、哈尔（Harle）、珀内（Perne）、格林德尔（Grindal）、布拉德福德（Bradford）和——。”第六个人的名字从日记里划掉了，但勤勉的斯特赖普查证此人就是诺克斯。伯内特主教说：“这些人是最热情洋溢和甘心乐意的讲道者，他们作为巡回布道者被差派到各地，去弥补大部分神职人员的缺陷和过失。”每位常任牧师的年薪是40英镑。

在这一年中，公祷书正在通过评审阶段，诺克斯被问及对其有何意见。他很可能因为此事而被短期召回伦敦。虽然主管教会事务的人士并不愿意发动一场诺克斯认为确有必要的彻底改革（也许他们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但为了将英格兰教会的礼拜制度简化到圣经上的模式，他们仍然采纳了诺克斯的某些意见。诺克斯成功地促成了圣餐仪式的一项重要改变，即完全排斥了基督的肉身圣餐里真实存在的观念，并告诫人们不要崇拜圣餐中的饼和葡萄酒——这是当时盛行的“跪领圣体”的惯例所衍生的观念。在《给英格兰真理教师的劝谏》（*Admonition to the professors of truth in English*）一文中，诺克斯对以上的修正极为满意：“靠着上帝赐下的勇气和知识，议会除去了教皇派奉若神明的小圆片^①，并下令在圣餐桌上使用普通的面包，此外还废除了大部分的迷信行为（除了在圣餐桌前下跪仍被保留），这些迷信行为在之前很长的时间里亵渎了真正的基督信仰。”一系列的圣制修改极大地冒犯了教皇派人士。玛丽女王在位期间，教皇派代言人韦斯顿博士（Dr. Weston）曾和拉

^① 指罗马天主教会在圣餐中使用的一种小圆饼。

蒂默（Latimer）有过一次辩论，他对当年诺克斯施加给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影响作了如下控诉：“一个苏格兰逃亡者竟然挪去了圣餐仪式中对基督的崇拜和敬奉；通过他的工作，这种异端思想居然被放进了我们的公祷书；可见此人的权威在当时占有压倒性的优势。”1552年，在宗教条款递交议会批准之前，诺克斯受命对其内容进行修订。

在伯威克居住期间，诺克斯认识了玛乔丽·鲍斯小姐（Miss Marjory Bowes），这位年轻的女士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她是尊贵的鲍斯家族的一员，曾经差一点和罗伯特·鲍斯爵士（Sir Robert Bowes）联姻；罗伯特·鲍斯爵士是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年间声名显赫的权臣。诺克斯离开伯威克之前曾登门向鲍斯小姐求婚，并受到友好的接待。鲍斯的母亲对这桩婚事比较满意，但由于某些原因——很可能是她父亲的原因，大家觉得把结婚的日子拖后比较明智。但既然作了正式的承诺，诺克斯觉得自己已经担负了神圣的义务；所以在写给鲍斯夫人的信里，诺克斯总是称她为“母亲”。

我无意对此期间受托在英格兰传播真理的仁人志士有任何贬抑之词，他们理应得到称赞；但我敢说，诺克斯在他的岗位上所付出的辛勤劳苦，以及一丝不苟的态度，绝不亚于他们中间的任何人。从早些时候，他的心中就预感到这段改教的黄金时期不会持续很久。因此，他时刻不忘“抢夺光阴”，在学习和教导上从不懈怠。除了主日礼拜的讲台事奉，期间他每天都要讲道。在规定的学习时间之外，他常常和许多就信仰问题来向他讨教的人谈话。枢密院对诺克斯事工的价值颇为赞赏，并几次给予高度评价。他们写信给诺克斯事奉所到之处的郡县长官和头面人物，请他们对他予以关照和保护。宫廷确保按时付他的薪水，直到最后向他提供正式的圣俸。出于对诺克斯的尊重，枢密院在1552年9月给他的兄弟威廉·诺克斯（William Knox）颁发了一份特许证，授权他在一段时期内可以在英格兰任何一个港口自由通商，货船载货量可到100吨。

第9章

伦敦之行

诺克斯的工作虽然得到枢密院的支持，但是却召来了北方地区天主教团体的憎恨，他们人多势众，并且对教皇制死心塌地。诺克斯勇敢攻击天主教会的迷信所取得的成功，极大地激怒了这些人；但他们审时度势，知道如果仅凭这些证据来控告他，不仅是白费工夫，而且十分危险；所以，他们一直暗中窥觑机会，希望在诺克斯的著作和行为中抓住一些把柄，以便借题发挥，进行反击。此外，他们对政府早已心怀不满，巴不得朝廷早日生变、颠覆新教势力；其欲望之迫切，表达之露骨，即便在靠近王国中心的地区也毫无收敛。诺克斯早就观察到这一切，并为此心急如焚。他看到教皇派在听闻摄政王倒台的消息后是怎样的欣喜若狂；他们还幸灾乐祸地传播国王即将驾崩的预言。在1552年圣诞节期间的一次讲道中，诺克斯表达了他对这类现象的义愤。在悲叹教皇派冥顽不化的同时，他宣称他们是福音在英格兰的敌人，是君主和英联邦的潜在背叛者，除了盼望国王早日别无所求；只要能重建他们的偶像崇拜，这些人根本不在乎谁来统治他们。诺克斯的敌人立刻抓住这篇讲道，经过一番添油加醋，将其递交给宫廷里暗中支持他们的重要人物；后者决定在枢密院面前指控诺克斯犯有重罪。

在教皇派采取行动的时候，他们兴奋地获悉诺森伯兰公爵（Duke of Northumberland）的态度与他们不谋而合。公爵最近刚刚

就任北部地区的行政总长。这位野心勃勃、毫无道德顾忌的贵族假装热心支持新教信仰，以此作为爬上王国最显赫官位的跳板。不久前摄政王索美塞特公爵（Duke of Somerset）的倒台终于使他如愿以偿。诺克斯曾在讲道时公开表示了对索美塞特下台的痛惜之情；无论索氏有何其他的过失，他一直是宗教改革的热心拥护者；他的失势给改教进程带来了很大威胁。诺克斯的这些言论显然得罪了诺森伯兰公爵。此外，他在讲坛上对大大小小罪恶的直率抨击，也让后者怒火中烧。所以，为了把诺克斯从这块地盘赶走，公爵在教皇派动手前就已向枢密院上书告状，借口是大批苏格兰人都来投奔诺克斯，恐要生乱——似乎只要和这个人搭上关系就是图谋不轨。事实上，诺克斯的忠诚品性满朝皆知，无人不晓；而且他始终都在尽其所能消除他的同胞对英格兰所怀的偏见。

当这些诉状呈给枢密院之后不久，诺克斯收到了一张传票，要他即刻赶赴伦敦，就其行为做出解释。以下的摘录选自诺克斯写给其妹的一封信，从中可以一窥他收到传票时的心态：

眼下形势紧迫，不容我向你细述内心的想法。威斯特摩兰的主教大人（Lord of Westmoreland）周三下午六点给我写信，要我从速赶往他那里答复；此行必多有凶险。我无法等到明天讲完道再动身了。赞美上帝！当我们软弱不足、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时常证实和确认他真理的话语。姊妹，你的仇敌正在工作，为要使你怀疑神的话。如果在从前的世代有过对于真理的见证，那么我们每天亲眼看见发生的事情岂不也证明真理是确定无疑的吗？历史岂不是证明！神的道必要传扬四方，但会遭到很多人的蔑视和轻看，真正认信的人将受到信奉异教的父母及他人的憎恶，最忠诚的信徒会遇到逼迫吗？难道这些事不也要临到我们身上吗？姊妹，你当欢喜快乐！那预先说我们遭患难原是命定的，也同样保证我们进入将来的荣耀。对我而言，尽管目前身陷困境，但上帝掌管这一切。唉！遗憾的是，我深

感自己的信心还未成熟，实在不配去为基督殉道；但不管怎样，现在所缺乏的，上帝在他所定的时间都要成全。请放心，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忘记你和你的陪伴。

诺克斯到达伦敦后，发现他的敌人一直在大肆传播极为虚假的诽谤信息，制造攻击他的不实之言。但枢密院在听取了诺克斯的辩护后，深信那些控诉都是出于恶意的蓄谋，故而体面地宣告他无罪。诺克斯受命在宫廷讲道，深得朝中众人尤其是国王的满意；国王对诺克斯一直格外青睐，非常希望能够在教会中提拔他。枢密院决定派诺克斯在 1553 年去伦敦和南部郡县讲道。他在赴任前获准短期返回纽卡斯尔，也许是为了处理余下事务，也许只是借此公开表明他的清白。他于 1553 年 3 月 23 日从纽卡斯尔寄给其妹的信中写道：

有关这件事的原委，你可参阅另一封信件。在写那封信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我再不会有动笔的机会了。我感觉迟早会落到他们手中，因为撒旦的众爪牙对我的狂怒有增无减。虽然我受到极为恶毒的指控，并被许多谎言诋毁中伤，但有一天上帝会毁灭所有说谎的舌头，并且拯救他的仆人脱离苦难。撒旦的攻击只会使自己遭毁灭，使上帝得荣耀。因此，我的妹妹，请不要停止赞美上帝，并且为我祈求安慰。虽然仇敌的军队不计其数，但主耶稣要一一挫败他们。我希望复活节之前一直待在纽卡斯尔。

在法国战舰上的囚禁生活以及在英格兰的辛苦工作极大地损害了诺克斯的健康，他患上了结石病。1553 年这一年中，他忍受了好几次疾病的剧烈发作，同时伴随有严重的头疼和腹痛。在以上所引的书信里，他说道：

我每天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请宽恕我的亏欠。我的旧病复发，疼痛难忍，故伏案写作对我的健康极为不利。我还不至于虚弱到不能去拜访你；但除非病痛停止，否则我什么事都做不了。哦，主啊！求你工作，按照你无限良善的旨意，和你自己所喜悦的方式，减轻这些病痛；愿你的荣耀彰显，阿们。

在另一封给妹妹的信里，他写道：

头痛和腹痛让我饱受煎熬，每天我的身体都在朽坏；但上帝的旨意不受拦阻。我受命在周日到威云顿（Widrington）讲道，可能会在那里多待一天。愿主耶稣的灵与你同在。请你们献上衷心的祷告，求良善的上帝按他自己的喜悦，减轻我身体和灵魂的痛苦，因我正在试炼之中。赞美我的神，我发现哪里宣告上帝的荣耀，哪里就会有圣灵充沛的彰显。因此我确信，有一些隐秘的事情是我们看不见的。

又一封信里，他说：

你的邮差来到时，我正躺在床上，被疾病折磨了一夜；所以有些感伤的倾诉。但无限良善的上帝从不轻视一个伤痛心灵的祈求，他定会按自己的良善和喜悦，结束我们现在所遭受的痛苦，并为我们戴上荣耀和不朽的冠冕，直到永远。然而，亲爱的妹妹，我有时会 and 信实的约伯——那位饱经大难的人——一样认为，我所受的痛苦在今生不会被挪去。也许和我心里所认为的不同，上帝可以用他的大能去逆转这些看似不可逆转的事情，正如他对约伯所作的一样。但剧烈的痛苦和深深的忧伤往往使人灰心绝望。因此，我比以往更清楚地告诉你，你有一个在苦难中的伙伴和同路人；所以，在基督里安息吧，因为蛇的头已经被打破，他现在能够做的，只是咬我们的脚后跟而已。

1553年4月初，诺克斯回到伦敦。2月时，克兰麦大主教受枢密院的委托，推荐诺克斯领取伦敦城内一份空闲的圣俸名额。这个提议是出于年轻的国王对诺克斯的个人钟爱；但这件事引起了诺森伯兰公爵的不快。公爵开始私下设法阻止诺克斯得到这份肥差。不过他的干涉其实毫无必要，因为诺克斯婉言谢绝了这份圣俸。当被问其原因，他欣然承认说，自己压根就没有想过要在眼下的英格兰教会里接受一份固定的圣职。诺克斯的答复被视为冒犯和不敬。4月14日，他被传唤到枢密院答辩。出席的人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伊利主教兼大法官古德里克（Goodrick）、贝德福德（Bedford）、诺桑普顿（Northampton）和施鲁斯伯里（Shrewsbury）的伯爵们、财政大臣和内务大臣以及他们的两位秘书。当被问及为什么拒绝向他提供的圣俸，诺克斯回答说，如果教会以别的方式来使用他，他会感到心满意足。他们质问他是否主张过以下观点，即根据现行宗教法律，无人能够合法地履行教会的圣职事奉。诺克斯坦率地答复说，有许多事情需要革新，否则教牧人员无法在上帝面前良心无愧地履行职分；比如，圣职的主要责任之一是阻止不够资格的人参与圣礼，但根据现行法律，教牧人员却没有权力这样做。他们又问诺克斯：在圣餐桌前下跪是否无关紧要？他答道：基督的举止是最完美的，但他在圣餐中却没有采用这种姿势，所以跟随他的榜样是最保险的作法。下跪是人的发明，是一种强迫性的行为。在这个问题上，诺克斯和某些枢密院大臣之间进行了一场机智的交锋。终于，漫长的辩论之后，诺克斯被告知，此番召其赴会并无任何恶意；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判断与公共次序相对立。诺克斯回答说，令他感到遗憾的是，公共次序与基督所设立的制度相对立。会议结束时，他们婉言劝告诺克斯尽量在既有教制的范围内进行沟通。

如果诺克斯屈服于名望和薪水的诱惑而放弃独立思维，他可能早就变成一个彻底的英格兰国教徒了。应爱德华六世的特别要求，

并经枢密院许可，诺克斯又被授予一份主教职位。但和上次放弃圣俸的理由一样，诺克斯再次拒绝了这份更加诱人的提议。^① 经贝扎的证实，诺克斯在回绝的同时还附上了对主教职位的批驳，认为这一职位本身并不具有神圣的权柄，在英格兰教会中的运作也和教会法规相矛盾。

这里我有必要特别说明一下诺克斯对于英国国教的态度。众所周知，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无论从礼拜还是教制上来说，都和其后发生在苏格兰的改教运动大相径庭。在英格兰，教皇至高无上的地位转移到君主身上；教士的等级统治仍然存在，但必须服从于世俗权力；天主教古老的礼拜程序在剔除了较粗俗的迷信行为后，其主要模式被保留下来。而在苏格兰，所有这一切都被废弃，理由是这些传统没有神圣权柄的根据，既毫无意义又繁琐累赘，或带有教皇制色彩；教会的制度和礼拜程序被缩减到圣经所定的简约纯朴的标准。诺克斯作为将这些教会模式引介到苏格兰的先驱，他的影响力举世公认。但有一种流行的意见是：鉴于诺克斯在英国国教里工作过相当长一段时期，可以猜想他对该体制应该是很满意的；他于爱德华六世驾崩后流亡欧陆，此间才开始对英国国教产生反感。当时，他深受加尔文思想的熏陶，故将后者的观念带回苏格兰，并按照日内瓦的模式组建了苏格兰教会。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在寄居欧陆期间，他对英国国教的礼拜仪式的反对态度与日俱增，愈加坚定；但在此之前他早有此意。在欧陆的岁月使他对教会治理和纪律的判断进一步成熟，但在他接触加尔文和其他外国改教者很久以前，这些激进的观念就已形成了。他在日内瓦所看到的教会，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和他所构思的“神圣授权的教会模式”（divinely authorized pattern）相得益彰；但无论对于日内瓦模式，还是对于任何既有的教会模式，他既没有不加分辨地一味肯定，也没有依样

^① 诺克斯在一篇论文里谈到过爱德华六世给他提供的几次晋升。在以后的某个时期，诺克斯曾清楚地声称他以前回绝过一份主教职位。

画葫芦全盘模仿。

早在 1547 年，当诺克斯在圣安德鲁斯开始讲道时，他就教导说，世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担任教会的元首；在信仰领域，人有责任以神圣的律法来管理自己；圣礼的主持必须完全遵照基督的实践和范例。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在该地的那场庄严论战中，诺克斯坚持宣称，教会没有权利以美化礼拜为借口，去发明各样礼仪并赋予特殊含义。他在 1550 年纽卡斯尔的论战中以及后来在伦敦枢密院的会议上，都捍卫了这一立场。无论从任何形式上讲，英格兰教会都不可能通过这些原则的检验。就如教会的无上权威、教士等级制的不同级别和隶属团体、洗礼时画十字、领圣餐时必须下跪等礼仪、矫揉造作的服装、生硬模仿的动作、宗教仪式中徒然无用的重复祷告——这一切都遭到诺克斯的批判和摒弃。他所持守的核心原则是：在基督的教会里，特别是在礼拜的行为中，一切的安排和样式，都当遵照神圣启示的智慧和权柄所指示的去行，而不应当按照人的喜好和指派。

诺克斯欣喜地看到：在英格兰全国上下，对上帝纯正话语的传讲可以畅行无阻，并得到鼓励和欢迎；偶像崇拜和粗俗迷信受到压制；统治者乐于支持宗教改革，甚至愿意迈出更大的步伐。考虑到大部分神职人员的特点、胜任的传道人极为缺乏的现状以及拦阻纯朴的教会次序和法规在各地推行的其他因素，诺克斯在枢密院的指示下，勉强默认了一部分主教所行使的权柄，并尽力帮助他们的工作；为了推进改教大计，他常常不辞劳苦到所被指派去的地方去讲道。但他从没有违背或掩盖自己明确的观点，并谨慎地避免受聘担任圣职——因为这样做无异于肯定了自己从前所认为有损于信仰的、不合法度的行为。

诺克斯恪守原则。在英格兰逗留期间，他对某些礼拜程序一直没有认同；他拒绝担任主教，并婉拒了一份固定的圣职。他觉察到一股教皇派的势力和当时见风使舵的政策阻碍了改教进程；从前所公认的陋习又开始死灰复燃，并得到强有力的维持；伊丽莎白女王



伊丽莎白女王

登基之后，改教运动出现倒退，礼仪之风卷土重来，其性质比之前虔诚的新教徒所抗议的那些繁文缛节更为严重，并在专制法规的保障下强制推行。身处这样的环境，诺克斯觉得有必要对这些现象进行更坚决的斥责。

诺克斯对英格兰教会体制中的诸多问题发表了严厉抨击。比如教会仍然继续使用大量愚昧无知和素质低下的神甫，这些人除了会主持弥撒和吟唱启应祷文之外一无是处；讲道的场合普遍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朗读布道文，喃喃自语做祷告，或者吟诵早祷和晚祷文；圣礼的主持徒有其表，会众听不到相关真理的教导；圣职兼任现象极为盛行，令人震惊；教会完全没有任何惩戒制度，等等。诺克斯认为：神职人员不应占据任何世俗官职，以免被世事缠累，分散精力，使其不能专心履行圣职的责任；主教们应该放弃他们世俗的头衔和尊位；主教职责应该被多人分担，这样在每一个城市或乡镇就可分派一位敬虔博学的人，在其他人的辅助下管理教会事务；在全国各地都应当建立教育青少年的学校。

在这些观点上，那些积极实行英格兰宗教改革的领袖人物与诺克斯所见略同，尽管他们对其重要性的肯定可能没有后者那么强烈，对如何实践这些原则的策略也有分歧。但是，如果我们以为他们的立场与性情和许多爬上高位的人一样，以为他们洋洋得意于将英格兰宗教改革仅仅带到今天的高度，并视其为其他教会的典范和完美模式，那么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对于被后世盲目推崇等级制度和礼拜仪式的人所采纳的那些奢侈和狭隘的观念，他们根本不感兴趣。如果有人正儿八经地宣称：教会礼仪是“圣洁之美”的必要组成部分，以及主教的按手仪式对于圣职按立的有效性是绝对必需的——那么他必会遭到改教者的嘲讽。如果此人继续含沙射影地暗示：缺少这些教会礼仪，就没有基督徒事工，没有合法的圣礼，没有真正的教会，甚至可能没有救恩，那么在改教者看来，他连一个新教徒都算不上。许多后人所赞许的，都是他们难以接受的。假如当时的形势容许他们引入被后人所贬斥的“清教徒的革新措施”，

他们肯定会欢欣鼓舞。我完全相信：倘若第一批英格兰的改教者被给予自主选择的权利，倘若不是被爱德华年间深受教皇制影响的圣品阶级拖了后腿，倘若没有受到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后最高世俗权柄的限制，他们肯定能够将英格兰教会的治理和敬拜模式过渡到其他新教教会的模式。

这些设想也是爱德华六世的恳切愿望。国王不仅具有杰出的品性，而且对上帝的圣道有一种真诚的敬畏；他情愿顺服上帝话语的指示，过于遵守传统习俗和既有惯例；他始终一贯地倾向于给勤勉尽责的国民减轻负担，而且一心谋求国内外所有新教信仰者的联合。所有这些美好的意向在历史文件中都有充分记载。如果不是因为过早辞世，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将成功地清除英国国教中的诸般邪恶现象（这些现象使最坚定和开明的新教徒深感痛心）。如果他的妹妹伊丽莎白能够和他同心合意并忠实贯彻他所留下的计划，她就能够将所有改教支持者联合起来，成为其政权的强大后盾，从而大大削弱天主教徒的势力。可惜她没有这样做。现实中，女王虽一再对天主教团体实行包容调和的政策，却始终无法得到他们的效忠，也未能阻止他们多次企图篡逆政变的密谋。另一方面，信奉新教的臣民之间则长期争执不断；这些分歧成了女王留给继任者的遗产；多年严厉的镇压使矛盾日趋尖锐，危机逐渐恶化，直到最后演变为一场革命，以至于暂时颠覆了等级制和君主制。如果那场建立在审慎和开明原则之上的改革起初没有遭到抵制，历史可能会是另一种结局。值得注意的是，早先留下的分歧虽然因着宗教宽容法令得到部分的缓解，但至今依然存在，并且将占这个国家很大比例的人口带离了教会的团契生活；如果不采取及时有效的补救措施，它们最终会破坏英格兰教会的根基。

诺克斯在伦敦期间有很多机会观察当时宫廷的形势。所看到的一切使他内心极其焦虑，充满了不祥之感。对于年轻国王的敬虔和真诚，诺克斯并没有丝毫怀疑。从前他从文字报告中获得的对于国王性情的印象，如今通过和陛下的交往都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凡是

认识国王的人都对其杰出的德行和天赋表示由衷的赞赏，诺克斯也不例外。但是，当时国王身边的权臣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许多的证据清楚表明，他们对于所有宗教问题毫不关心。如果改朝换代，有新的王命出台，他们随时随地准备倒行逆施，和教皇派同流合污，重新恢复古老的迷信崇拜。爱德华长期衰弱的身体每况愈下，已经没有任何康复的希望；而这些权臣一心只顾着扩张他们家族的势力，保护自己的地盘和财富。

国王的私人牧师们是一群非常与众不同的人。他们不是趋炎附势、逢迎巴结、油嘴滑舌的寄生虫。他们不怕失去自己的薪俸。面对那些皇亲国戚和贵族名流的听众，牧师们警告他们的良心，向他们说刺耳的话，抨击他们所犯的罪恶，指明将要临到他们的天国审判。备受尊敬的拉蒂默牧师以直率大胆著称，这从他留下的讲道手稿中可见一斑。文中质朴的诚实、不加修饰的简洁、原汁原味的幽默以及对当时风俗的真实描绘，至今仍值得我们一读。格林德尔、利弗 (Lever) 和布拉德福德不仅表现出同样的忠诚和勇气，而且在学识上要胜拉蒂默一筹。他们对当时充斥宫廷的野心、贪婪、奢华、压迫以及漠视宗教的现象进行了抨击。只要是国王亲自出席的讲道场合，牧师们还能得到表面上的礼待和尊重；一旦国王因为肺病发作不能露面，权臣们则通过最傲慢无礼的言行公开发泄他们的不满。那些熟悉诺克斯性格的人都可以推测到，他在宫廷中所发表的讲道，其犀利和坦率程度，绝不亚于以上这些同僚。这一点可以从他对自己在国王面前最后一次讲道的描述中看出来。他严厉地斥责了骄横跋扈的首相以及他的亲戚——财政大臣温彻斯特侯爵 (Marquis of Winchester) 大人；当时这二人都在听众席上。

1553年7月6日，爱德华六世驾崩。这一消息给所有热爱学识、美德和新教的人带来无以言喻的悲痛。英格兰被黑云笼罩；不久之后，一场可怕的飓风带着最具毁灭性的狂暴骤然降临，肆虐了五年之久。诺克斯当时正在伦敦。当得知国王陛下辞世的消息时，他表现出了坚韧的态度以及对于上帝最高旨意的顺服。其实他对此



休·拉蒂默牧师
1555年在牛津殉道

早有心理准备；很早他就预料到国王过世及可能引发的后果。对前景的展望使他痛彻心肺，泪流不止。无论是在公开讲道的时候，还是在和朋友的私下对话中，他都谈到了让他忧心如焚的时局。

在此后不久给鲍斯夫人的信中，诺克斯说道：

想想你我多少次谈到当前的形势，都不禁泪流满面！多少次我曾对你说过，我感到祸患随时都会降临，我多么希望它不要发生！我拒绝了陛下提供的那些晋升高位的机会（此举召来了所有人的不悦，甚至是那些最爱我的人），为什么？就是因为预料到这一即将来临的灾祸。因着我们的罪过，上帝收去了陛下的生命。多少次我曾告诉过你，英格兰给我面包的日子不会长久！请参阅我上一封写给您内兄的书信，想想我在里面所说的话。

他在伦敦一直待到7月19日玛丽女王（Queen Mary）登基的那一天。仅在九天之前，这座城市刚刚为那位温柔可亲却命运悲惨的简·格雷^①举行过同样的加冕仪式。诺克斯对伦敦市民毫无理智的欢呼雀跃深感不解，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玛丽的上台会给他

① 简·格雷（Lady Jane Grey, 1537 - 1554），即都铎王朝的 Queen Jane Grey。她只当了九天女王就遭罢黜并被投入监狱，故又称为“九日女王”。格雷的外祖母是英王亨利八世的妹妹；从理论上讲，她是爱德华六世之后的第四顺位继承人（第一合法继承人是玛丽·都铎，第二是伊丽莎白，第三是格雷的母亲弗朗西斯）。这个不幸的女孩自己并没有当女王的意愿，但身不由己，成为当时宫廷权力斗争的牺牲品。由于爱德华六世重病缠身，很可能死后无嗣，当时的权臣诺森伯兰公爵担心如果笃信天主教的玛丽继位，他可能会失去权力，甚至可能因为自己的新教信仰而性命难保。所以他企图建立一个新教徒政权并将其掌控，要达到此目的，最好的途径莫过于让自己的儿子和格雷联姻并扶持后者登上王位。1553年7月6日，爱德华驾崩，四天后（一说是国王驾崩当日），格雷被加冕为英国女王。而玛丽根据英王亨利八世的遗嘱享有第一合法继承权；她在萨福克召集她的支持者，于7月19日赶赴伦敦，监禁了格雷和她的支持者。玛丽成为继任的英国女王，即史上著名的“血腥玛丽”（Bloody Mary, 1553 - 1558年在位）。格雷和她的丈夫吉尔福德·达德利（Guilford Dudley）被囚禁在伦敦塔，直到1554年2月12日被处决，死时年仅16岁。

们所承认的宗教信仰带来严重的威胁。诺克斯公开表达了他的不满，并且在他的讲道中警告他们即将来临的灾难。考虑到新政府可能采取的逼迫政策，此后他离开伦敦，退到了北部。

为了诱使新教徒和平地归顺她的政府，玛丽采取了哄骗的手段，在即位后的一段时间内发布公告，承诺不会用暴力侵犯他们的信仰自由。虽然十分了解女王的顽固本性，以及她对天主教的执迷不悟，新教的传道人仍然觉得有必要利用这段暂时的缓和时期。八月，诺克斯回到南部并重新开始工作。可能就是在这段日子里，他写下了信仰宣言和祷告书，并在所服事的教会里广泛采用。在书中他点名为玛丽女王祷告。当他在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巡回布道时，吸引了大批听众，有慕名而来的，有被危机所迫的；在阿默舍姆（Amersham）的聚会人数尤其多，这个城镇之前因为广泛接纳英格兰改教先驱威克里夫（Wickliffe）的教义而闻名，并且威氏的跟随者所撒下的种子从未被彻底根除。诺克斯无论走到哪里，都恳切劝勉人们当因上帝的责备悔改，并要恒切持守从前所承认的信仰。在整个收获季节，他都在白金汉郡和肯特郡（Kent）讲道，尽管政府采取的手段随时会使他的安全失去保障。11月初，他回到伦敦，住在两位可敬的商人朋友洛克（Locke）和希克曼（Hickman）先生的家里。

新政府的措施给王国境内所有的新教徒都构成了威胁，诺克斯每天都做好了入狱的准备。这时他又在私人事务上遇到了一个严重的试炼。我先前提到他和鲍斯小姐的婚约。现在双方都认为举行正规的仪式、建立婚姻关系的时候到了。但遭到了鲍斯父亲的反对；当时的形势让诺克斯、鲍斯夫人和女儿都大伤脑筋。鲍斯先生的反对似乎是出于家族血统的骄傲。但我倾向于认为：他的决定也有宗教方面的考虑。从书信来往中的几处线索来看，鲍斯先生的态度即便不是完全偏向天主教，至少也对现时宫廷所采纳的宗教制度表示认同。诺克斯于1553年9月20日从伦敦写给鲍斯夫人的信中说：

请您为我每天极重的劳苦祷告。我感到力不从心，无暇顾及您的丈夫和您之间的所有商议，甚至无法抽身处理我和您女儿之间的事情。我为您的大胆无畏和忠实一贯由衷地赞美上帝。但我请求您，母亲，不要为此过于费心劳力……我已经写信给您的丈夫，我们的弟兄哈里（Harry）会将信中的内容告诉您和令爱。如果我能逃脱疾病和牢狱之灾，您很快就能见到我。

诺克斯的未婚妻和岳母急切地盼望他能够在伯威克或邻近地区安身，虽然不能像以前那样公开露面，但至少比较平安无事。但要在那里安顿下来需要一笔钱。自从玛丽女王登基后，政府就没有给诺克斯发放薪水了。实际上，在过去的12个月里他没有收到其中的任何一笔钱。他未婚妻的亲戚们完全有能力给他提供一笔足够的收入，但对这门亲事的不满情绪使他们不愿出手帮助。在岳母的一再强求下，诺克斯在伦敦拜见了罗伯特·鲍斯爵士（Sir Robert Bowesfus），向他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希望能够消除后者心中对自己的怨恨，以期对整件事情有一个和睦的了结。在后来写给鲍斯夫人的一封信里，诺克斯谈到了这次不愉快的会见，以下是一段摘录：

亲爱的母亲，我这样称呼您，不仅出于我在基督里向您所怀的温柔爱心，而且也是因着您和我第一次见面后，从始至终向我显出的慈母般的关爱。尽管我所期盼的这些事情——也是您和其他人长久期盼的事——似乎永远不可能实现；但请您放心，只要我还能顾念地上的任何人，我对您的爱和牵挂就绝不会减少。11月6日，我按照您的要求和罗伯特·鲍斯爵士见面，谈话的主题是您所知道的。爵士的言语充满了蔑视和恶意，极大地伤害了我的心，使我愁苦不堪。我外表不动声色，



玛丽女王

内心却极为忧伤。爵士本该对这些事慎思明辨，可是他却变成了一个轻慢和嘲讽上帝使者的人。愿上帝怜悯他。当我准备就整件事情阐述自己的意见时，他说了一句最令人吃惊的话：“少来你那一套花言巧语的理论，我不会被它们说服的。”上帝知道我从未使用花言巧语或混淆是非的言辞；我只用最简单的方式讲明真理。我并不是一个好的演说家。但是，如果他现在厌恶我所说的，那么将来有一天，他会在痛苦中听到上帝亲自向他宣布这些话。如果他不悔改，这一切必要应验。我祷告上帝让你的良心平静安稳。无论我这具朽坏不堪的躯壳在哪里入土，我都不以为意。如果人的忘恩负义会让我停止服侍基督的百姓，那么我就不配再领受英格兰这个国家对我的供养。我担心的是，当所有力所能及的事情都做了以后，我仍然会落到那样的结局里面；因我渴望某些人以仁慈待我，却遭到他们的轻蔑和仇恨，对此我难以容忍。然而，虽然他们不知感恩，上帝却对他们极其慷慨宽容。情感的好恶让我此刻深受困扰；但我毫不怀疑靠主可以得胜，他最终必要安慰他受苦的子民。愿主全能的圣灵与您同在。阿们。

他在年底所写的另一封信里也提到了这桩失败的会见。信中说，自己糟糕的健康状况因着内心的焦虑更加恶化：“我到伯威克的时间可能要推迟到12号以后，其实我几乎决定放弃此行。您知道是什么原因。无论某些人对我的判断是否公正，我只求上帝更加怜悯他们。我良心的见证宣告我在上帝面前是无辜的——他从来不看人的情面。”这些摘录向我们展示了作者的内心世界：气质敏锐、情感丰富、富有责任心，以及他在矛盾中的挣扎：一方面想维护灵魂的自尊和独立，另一方面又要顾及对亲属的爱心。

11月底12月初，诺克斯从南部回到了纽卡斯尔。当时议会已经废除了所有支持改教的法律，并恢复了罗马天主教制度。到12月20日的最后期限之前，新教徒有做礼拜的自由；那一天之后，

他们再这样做就不再受到法律的保护，而是作为异端分子受到严厉的惩罚。许多主教和牧师被投入监狱，其他人则逃亡欧陆。然而，诺克斯既不愿逃离英格兰，也不肯停止讲道。最后通牒过后的三天，他在一封书信里写道：“我现在无法抽空回答您的圣经问题，也无暇写《诗篇》第六篇的注释，因为只要我衰弱的身体还能坚持，我必须在这一周中的每天都讲道。”

诺克斯的敌人在前任政府时期对他的攻击都告失败，现在朝中的掌权者终于乐意倾听他们的控诉了，他们自然不会放过这难得的机会。1553年年底到1554年1月初，诺克斯的仆人在送信给鲍斯母女的途中被抓住。敌人希望从截获的书信里找到一些攻击他的把柄。但信中只是宗教方面的建议，以及恒心持守信仰的劝勉。诺克斯对此毫不惊慌，因为他早已做好了准备，在任何一个传唤他的法庭面前，他都可以坦然承认其中的内容。但是，考虑到这一事件的报告可能给伯威克的朋友带来不安，他决定立即启程去探访他们。尽管他打算秘密出行，但消息仍然很快传开了。鲍斯小姐的一些亲戚劝诺克斯，指出他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虽然诺克斯极不情愿，但仍然被说服放弃了拜访伯威克的念头，转而退到海边一处安全的地方；假如追捕他的行动仍在继续，那么他就可以渡海逃到欧陆去。在那里诺克斯给鲍斯母女写信，告知自己秘密逃亡的原因，以及近期内拜访她们的可能性极其渺茫。他说，虽然与自己的心意相违背，但弟兄们的“劝谏和眼泪终于迫使我不得不顺服”；其实他早已下定决心，既然上帝差派他作了真理的使者，那么作为真理的见证人，为真理论战而死，正是死得其所。尽管如此，诺克斯答应弟兄们，如果上帝预备了这条逃生之路，那么他愿意“听从弟兄们的声音，暂且容让撒旦兴风作浪、得势一时”。

形势日趋严峻，朋友们的预料得到了充分的证实；仇敌的追击使诺克斯无法在此地继续藏身。于是他乘船离开了英格兰，并在1554年1月28日安全抵达了法国诺曼底的一个港口迪耶普。

第四阶段

流亡欧洲大陆（1554 ~ 1557）

第 10 章

片刻宁静

朋友们对诺克斯的力劝和催促显然是上帝的安排，旨在救他脱离当时的险境，日后对他委以更大的重任；假如按他自己的意愿行事，依其刚烈无畏的性情，肯定会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当他一到达法国海岸，就开始后悔自己被迫作出的选择。当他想到那些曾与自己一同事奉的讲道者被投入地牢，那些不久前他所看顾的信徒如今四处流离，好像没有牧人的迷羊、饥饿狼群的猎物，他的心就感到难以名状的痛苦，并且产生了一股几乎无法抗拒的念头：马上回到英格兰，和肢体们一同出生入死，经历荣耀的试炼。尽管他的逃亡并非出于胆怯懦弱，不过是顺服了主的指示：“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① 并且他问心无愧，但是，他发觉自己的行为仍然会被人误解为贪生怕死；他担心这种误解会让留在英格兰的弟兄们灰心丧气，以至于诱使他们犯罪，为了保全性命而妥协屈服。

在从迪耶普写给鲍斯夫人的一封信中，诺克斯向她剖明心迹：

亲爱的母亲，无论是用言语还是文字，都无法表达我内心

^① 语出《圣经·马太福音》10章23节

的急切愿望，就是想在目前的大争战中（这场争战马上就会结束。主必要扰乱他骄傲的仇敌），听到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持守信仰的消息。可以肯定，正是这种愿望克服了所有的回想追忆和牵肠挂肚——这通常是肉体用来安慰和保护自己的方式。因为，不管在何地何方，上帝都会激励一些人，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来供应我们这愁苦人生所需的衣食住行；即或不然，他也会派乌鸦刁饼来喂养我们。所以，在每一处地方，也许都会有人供养我肉身的需要。唉！但我现在却不知何处可以找到上帝借生命之道重生的儿女。因此，在我的心中，那些勇敢认信基督之人的属灵生命，比这个世界所有的荣耀、财富和名誉都要宝贵；而当我每天听到有人回转退后、重新去敬拜偶像时，我的心就比上帝命定的随时临到的肉体死亡还要痛苦。有人会问我：那你为什么逃跑呢？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有一点我很确定，那就是对死亡的恐惧不是我逃亡的主要原因。我相信逃亡的原因之一是让我亲眼看到：在平安稳妥的日子里，并不是所有貌似真诚的人对基督耶稣都怀有一颗真诚之心。然而，我的逃亡算不得什么；在所有的冲突结束之前，上帝的恩典可以让我重返战斗。哦，主啊！不要让我苦苦等待！按照你所喜悦的旨意，让我的舌头在会众面前再一次称颂你的圣名，哪怕我已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无论这世上的暴君发明什么样的刑罚，我也绝不会向那个最令人憎恶的偶像卑躬屈膝——出于上帝的帮助和他圣灵的感动，我才能写出这些诚实无伪的话。虽然在这场战斗的开始，我表现得像一个胆小懦弱的战士（上帝知道其中原委），但我的祷告是：我将会再次回到战场。赞美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赐给我在窘迫中的安慰，但我盼望得到更大的恩典：如果死亡没有很快来到并了结我所有苦难的话（这样的安排对我更有好处），靠着那位从不藐视受苦哀恸之人的主，我必会大得激励，奋起而战；英格兰和苏格兰都将知道，为了宣告新教教义和属天的信仰，我已预备好去承受

比贫困和流放更严重的试炼。上帝出于他的怜悯和拣选，使我在人前为此信仰作了一名卑微的战士和见证人。因此，母亲，不要让恐惧进入你的心；不要误以为，我因着逃离这些狼群穷凶极恶的追击，就失去了从前对信仰所怀的热情。不是的，母亲；只要能够在英格兰境内讲道，此刻我情愿去经历一切患难，甚至过于肉体所能承受的。靠着那位最有能力、最有怜悯之上帝的恩典——唯有他通过基督耶稣赐下安慰和帮助，有一天这些事都要显明出来。

在这段隐退的岁月，诺克斯有充分的时间默想过去的七年里，神的旨意给自己的命运所带来的许多惊人转折：在圣安德鲁斯，他得到事奉的呼召并开始工作；接下来经历了监禁和获释；在英格兰找到用武之地，之后又遭排斥，被痛苦地剥夺了事奉的权利，成为一个东躲西藏的流亡者（之前他是作为囚犯被运到这个国家）。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事件引起了他的严肃的反思：身为一名“上帝奥秘之事的管家”，自己对于这一神圣的托付是否尽忠职守？这些思考清楚显明了他的性情；以下将他回顾的结果展示出来，对于那些同样在教会中担负重责大任的人，将不无裨益。

对于蒙召作神的仆人，诺克斯充满了感恩。他并不否认，自从来到英格兰之后，他的事奉素质得到很大的提高；无数听众和他自己的良心可作见证：他从未忽视所领受的恩赐，并不辞劳苦地忠心操练它们。同时，他在好些事上也找到了自责的理由。在一封书信里，他先提到基督对彼得反复的命令：“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羊”；然后大声叹道：“唉！能够遵守这条命令的牧师真是少之又少！但在这件事上，除了控告我自己之外，我不会责难他人；因为我承认，我没有尽心竭力去喂养基督的大小群羊。很多时候，我只付出很少的努力去满足很多人的需要，尽管我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我做了几份事情，但并没有完全尽责。”

在私人的责任上，诺克斯承认，因为顾及脸面以及害怕会招来

世人恶毒的诽谤，所以他不愿去探访那些蒙昧无知和愁苦不幸的人，并带去他们所渴望的教训和安慰。在公共服务方面，他缺少热忱、忠心、公正和勤奋。的确，他从不阿谀奉承，并且他“粗犷直白”的风格得罪过一些人；但是，他的良心现在控告他没有足够坦率地警戒罪人。他习惯于用某种表达方式来描述听众自觉有罪的恶行，可以使他们从中看到自己的本相；但因为“不愿触犯众怒”，他避免在讲道中进行具体的应用。尽管他的“眼目没有过多关注世上的提拔晋升”，但有时因着对朋友和熟人的感情，会受到微妙的诱惑，导致他在某些地方驻留太久，而忽视了其他人。那个时候他认为，只要不是无所事事，这样行并不是犯罪；可现在他相信，自己当时应当考虑到在一个地方待多久方为合适，以及还有多少饥饿的灵魂在别处嗷嗷待哺。有时在朋友们的请求下，他暂且偷懒，花时间料理世俗事务，或者去锻炼身体、娱乐身心，而当时他本该走马上任，去履行官方授予的职责。“除了这些以外，”他写道，“我还受到更明显的罪恶的攻击——确切地说，是污染。那就是：我邪恶的本性渴望得到人的恩宠、尊重和称赞。尽管有时上帝的灵感动我与这样的意念抗争，并且恳切地激励我（上帝知道我没有撒谎）为这些缺点哀痛哭泣，但只要一有机会，这些罪恶就会来烦扰我；它们是如此诡诈和隐秘地侵入了我的内心，以致我丝毫没有觉察到自己已经受伤，直到自负和虚荣几乎占据上风，把持我心。哦，主啊！求你怜悯我的重罪；请不要按我的罪孽所当得的报应待我，但求按您极丰富的恩慈待我。”

这就是诺克斯对自己的事奉行为所作的仔细省查。在许多人眼中，他所自责的那些过犯都是性质轻微、可以原谅的；还有人会认为那根本无可厚非。但是在患难之日的独自默想中，这些事情在他的头脑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在我们看来，他所付出了巨大的劳苦努力；如果这样一个人尚且有许多理由责备自己，那么在担任同样职分的传道者中间，能有资格说“我确实不记得自己今天有什么过错”的人，恐怕凤毛麟角。

然而，诺克斯并没有一味沉浸在忧郁的沉思和徒劳的哀怨中不能自拔。当他到达迪耶普之后首先想到的事情之一，就是给先前的会众写信，因为他再不能用讲道和面谈训诫他们了。他为此目的所写的两篇短文被传送到英格兰。其中一篇是《诗篇》第六篇的释经文；这是他在英格兰的时候，受鲍斯夫人的委托起草的作品，但那时一直没有时间完成。这篇实用的文章对经文有精彩的诠释；凡是在逆境和苦难的学校里受到信仰锤炼的人们，都会对其中的文字格外钟情。另一篇论文是一封长信，写给在伦敦和英格兰其他地方的会众，诺克斯曾受命向他们布道；文章大意是警告他们不可背弃先前所承认的真道，也不可赞同他们身边的偶像崇拜。结束语是一段极其感人和雄辩的劝诫。诺克斯谈到大家的良心、盼望、恐惧和情感，并以最神圣庄严的名义，诚挚地恳求他们：无论是作为普通人、父母，基督徒切不可退后离开他们美好的信仰；不要让自己和子孙后代陷入愚昧和偶像崇拜的深渊。凡读过这封信的人，无不被其中情真意切、慷慨激昂的语调所打动；更难得的是，诺克斯写信时正流放于异国他乡，孑然一身，举目无亲，不知道哪里可以安身，也不知道如何维持生计。

1554年2月的最后一天，他离开了迪耶普，就像古时希伯来先祖一样，“不知往哪里去”；他“将自己的路交托给上帝”，经由法国来到了瑞士。一些英格兰改教者之前和瑞士教会最负盛名的神学家有书信来往；故后者已经听说了英格兰的宗教改革遭到颠覆、拥护者流散四方的消息，并深表悲痛。因此，在诺克斯表明身份之后，马上受到了他们热诚的欢迎和最友好的款待。他在瑞士停留了一段时间，拜访个别的教会，并和学者交流。他一直在反复思索当前英格兰的事态危机中所浮现出来的某些难题，并向神学家们征求意见；后者的看法和他不谋而合，这使他更加确定自己作出的判断。

五月初他回到迪耶普，去收集有关英格兰的消息。逗留欧陆的期间他经常来这里。他在瑞士短暂寄居时得到的友好款待和令人愉

快的友谊，逐渐驱散了他刚到法国时的满腔愁绪，并且开阔了他的心胸，使他从目前神所允许的苦难境遇中展望乐观的前景。他在一封寄给“我受苦的弟兄们”的书信中谈到基督躺在坟墓里的时候，他的门徒绝望的光景；然而当主再次向门徒显现时，他们突然经历了从极度忧伤到欣喜若狂的转变。诺克斯继续说：

这些回忆给我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慰藉。我怀着一个美好的盼望，那就是总有一天，今日在英格兰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耶稣，会从死里复活，击败他的仇敌，并向他软弱无力、忧愁困惑的门徒显现（就是那个痛苦悲惨的王国里属他的人）；他会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是我，不要害怕。”

当诺克斯得知岳母仍然恒心持守新教信仰的消息时，他的精神也为之一振。鲍斯先生期望妻子和全家人都和自己的宗教立场一致。但鲍斯夫人以最坚决的态度表明，她宁可弃绝自己的朋友和祖国，也不愿牺牲她的信仰；所以鲍斯先生只得作罢，不再强求她顺服罗马天主教。在赴瑞士之前，诺克斯曾表示，如果他到时还活着，他想拜访伯威克的朋友们。当他从瑞士折返迪耶普，仍然怀有这样的想法。很可能朋友们的来信打消了他的念头；经过冷静的思索，考虑到此行不仅危及性命，而且没有任何益处，他决定推迟返英的计划。

因此，他再次从迪耶普启程前往日内瓦（Geneva）。通过这次造访，他和著名的加尔文（Calvin）首次见面，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段友情一直维持到后者于1564年去世为止。他们二人年龄相当，并且在气质和性格的显著特点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日内瓦改教者非常赞赏诺克斯的敬虔和才华，诺克斯对加尔文的敬重和顺服，也超过了对其他任何一位改教者的仰慕之情。鉴于日内瓦拥有适合学习的良好环境，而且其中实行的宗教仪式大都得到诺克斯的认可，所以他决定在以后的流放岁月中选择这个城市作为他的常驻地。



加尔文

但是，尽管个人安全不再受到威胁，生活环境也得到改善，诺克斯却从没有忘记尚在逼迫中的弟兄们。七月的时候他再次来到迪耶普，旨在确切地了解他们的景况，并且筹算能做些什么以表安慰。然而他听到的消息再次撕裂了心中还未愈合的伤口。教皇派对英格兰新教徒的镇压越来越严厉；而且，更让诺克斯心碎的是，从前许多因着他的事工皈依真理的人，现在却被引诱放弃了信仰，倒向了教皇制。在灵魂的极度痛苦中，他在信中向他们陈明，如此怯懦背道的行为将使他们不朽的灵魂面临毁灭的深渊，并恳切地呼召他们悔改。带着这样的伤痛之情，他在给岳母和未婚妻的信中重复了以前的警戒，因为他对她们是否能持守信仰感到忧心忡忡：

我们虽然身隔两地，但上帝会按自己所喜悦的旨意让我们重聚。如今我用笔所写的话，都是从前我亲口所讲，你们也亲耳听见的。如果有人或者天使一心要引诱你们偏离起初所承认的信仰，他就应当被诅咒。如果有任何人——不管是民事长官或世间的朋友——过分地搅扰你们，除非他速速悔改，否则将受到公正的定罪。但此刻，母亲，我正在信仰的道路上艰难跋涉、痛苦挣扎，求您安慰我的心（愿上帝成全这一愿望）；请您务要忠心到底，绝不可向那偶像下拜——这是让我能够忍受世上其他苦难的良药。我常常在沉思中安慰自己，并乐意认为：上帝不会让您落入那样的罪责之中。我相信，如果我和你们二人同在的话，你们肯定会害怕和耻于去行那可憎之事，尽管我不过和你们一样，是一个被罪和愁苦辖制、悲惨不幸的人。但是，哦，母亲！请您惧怕主的同在，不可得罪他；无所不在的主监察人的心肠肺腑；他对悖逆之人的义怒一旦发作（没有什么罪比拜偶像更能激起他的震怒），天上地下没有谁能够平息他的怒气。

诺克斯怀着同样的心态写下了《对英格兰的警戒》（*Admoni-*

tion to England), 并于当年年底出版。抨击诺克斯的人通常都是援引这本小册子作为根据, 控告他的态度过于激烈极端、用语充满敌意苦毒。的确, 诺克斯在文中用最愤怒的言辞刻画实行逼迫的教皇派, 将他们视为被人诅咒和被神报应的对象。这里我不想考究, 他在表达愤慨和热心的措辞上, 是否有越过信仰和福音所规定的合宜界限之嫌; 也不想调查, 如果按照这些非难和控告的标准来衡量圣经里提到的最公义的人物——甚至我们的救主自己, 他们的性情和言语是否也要遭到定罪。但我想质问的是, 诺克斯的态度如此严厉, 难道和他撰文所反对的那些人的品性毫无关系吗? 况且, 他情感上所受到的伤害并不是为自己的苦难悲哀, 而是出于对患难中的弟兄们的深切同情; 他们被残忍的同胞投入监狱, “就如羊被牵到宰杀之地”, 作为取悦罗马教摩洛神^①的祭物被野蛮地当众杀害。在爱德华统治时期, 某些人对新教信仰表示最热情的欢迎, 借此爬上高位, 享受富贵尊荣, 如今却鼓动对以前的手足弟兄和资助者大开杀戒; 谈到这些人的所作所为, 谁能遏制心中的义愤呢? 看看深藏不露、蓄意报复的加德纳 (Gardiner), 凶恶暴虐、血腥杀戮的邦纳 (Bonner), 还有那位冷酷无情、残忍无度的玛丽女王以及他们从容炮制的、可憎可咒的逼迫制度, 有什么谴责的言语会显得太过分呢? 泯灭人性的玛丽已完全丧失了作为女性本该具有的柔和; 她颁布命令大肆杀害自己的臣民, 甚至连她的丈夫 (尽管非常顽固麻木) 都对屠杀的惨状感到厌恶, 不忍卒看。然而她嗜血成癖仍不满足, 反而更加丧心病狂、变本加厉!

论到这一话题, 若我们还能平心静气, 就是不虔不义;
义愤填膺、灵性奋激, 方为合情合理。

^① 摩洛是旧约时代迦南地亚扪人的神。上帝明令以色列人不可敬拜迦南各族的偶像。参见《圣经·利未记》18章21节、《圣经·列王记上》11章7节。作者在这里是讽刺罗马天主教的偶像崇拜。

——扬 (Young)

“压迫使智者发狂”，但一位现代雄辩家的话更为合适，“智慧人大发脾气、举止疯狂强过愚昧人清醒冷静。他们的呼号是苦难中的虔诚迸发的心声；这声音并非升华为毫无节制的胡言乱语，而是一种充满预言和灵感的、分别为圣的癫狂。”

诺克斯回到日内瓦，并且以年轻人般的热情全心投入学习，尽管他已年近 50。可能正是在这段时期，他在希伯来语的知识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弥补了青年时期没有机会学习这门语言的缺憾。人们很自然地要问：他在流亡期间从哪里得到经费上的支持呢？尽管他的岳母非常希望供应他的生活所需，但她丈夫的反对态度使她完全无能为力。朋友们在他匆匆离开英格兰之前为他筹措的款项已经用光，此刻他因为缺钱而极为窘迫。由于不愿意麻烦陌生人，所以他向以前自己事奉过的群体寻求帮助，希望得到他们自愿的捐款。他在一封致鲍斯夫人的信中说：“我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景况如何，但上帝会引导困惑之人的脚步；他若坚决不向世界求助，那么上帝必要在患难中喂养他。如果在忠信的圣徒中间筹集了任何款项，我会问心无愧的接受，正如保罗在遭难之日也没有拒绝肢体的奉献一样。但我将一切交托给主的旨意——他从来都看顾属自己的人。”我从诺克斯的书信中发现，他在欧陆居住的年月中，从英格兰和苏格兰都有特别的朋友给他汇款。

在此期间，英格兰国内的逼迫愈演愈烈，大批新教徒逃到国外避难。据统计，到 1554 年年底，在欧陆寄居的英格兰学者不少于 800 人，这还不包括其他背景的人士。各国的改革宗教会对表现出的热情友善的反应证明了美好的信仰精神。从前许多外国人在爱德华治下的英格兰受到礼遇和款待，如今这些英格兰流亡者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各国的新教徒争相效仿，尽力接洽散居在他们中间的这些不幸的难民，并减轻他们的痛苦。流亡者安身的几个主要地方是：苏黎世、巴塞尔、日内瓦、阿劳、埃姆登、韦瑟尔、施特拉斯堡、杜伊斯堡和法兰克福。

第 11 章

法兰克福的纷争

法兰克福坐落于美茵河上，是德意志的一个富庶的帝国城市；早期接受了宗教改革的影响，并且对来自所有国家的新教难民都以礼相待，前提是这些交往不会导致和皇帝的公开决裂——后者一直以猜疑的眼光注视着该城的一举一动。当时在城中已经有一个法国新教徒的教会。1554年7月14日，法兰克福的行政长官允许来到此地的英格兰流亡者有权共用分派给法国教会的礼拜场地，并且可以自由地用自己的母语举行宗教仪式，条件是他們必须尽可能遵循法国教会的礼拜形式；这是考虑到当地政治环境的压力而作出的谨慎防范。英格兰人以感恩之心接受了这一提议，并一致同意，在使用英格兰礼拜程序的时候，略去启应祷文，出声回应，穿戴白色长袍，以及其他的一些礼仪。因为这些仪式“在其他的改革宗教会看来似乎比较怪异”或者显得“迷信和多此一举”。他们非常和谐地解决了这些细节问题，并临时选出了一位牧师和几位执事，商定了一些纪律条规，然后向散布在各地的弟兄们发出了一封通函，邀请他们到法兰克福和他们一起分享膳宿，并且为苦难中的英格兰教会献上同心合一的祷告。斯特拉斯堡的流亡者在回信中推荐了几位人选，认为他们最适合担任监督和牧师的职位。其实法兰克福的会众并没有要求这样的推荐，因为他们认为在目前的处境下并没有必要设立一位监督；但他们打算请两到三位牧师以同等的权柄来一起

管理教会。最后他们决定聘请三位牧师，其中之一就是诺克斯。他们给在日内瓦的诺克斯发函，邀请他来法兰克福牧会；以下就是邀请信的内容：

我们收到了斯特拉斯堡的弟兄们发来的信函，但我们并不认为其中的建议十分明智。随后我们奉圣灵的名聚会，大家一致决定，特别选择您成为我们会众的牧者之一；请您按照上帝给予的恩赐，向我们传讲上帝最活泼的圣言；靠着上帝的怜悯和仁慈，我们奉基督之名在这里聚集成一个教会，同为一个肢体，并且来自于同一个民族，同一个语言，同一个国家。目前，深感您的同在之必要，我们奉上帝的名，请您不要回绝我们，也不要拒绝我们的邀请。我们的愿望和要求是，在这样一个美善和敬虔的事业上，您会亲自来帮助、支援和扶持我们。我们现在所作的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和他会众的利益，也是为了分散各处的基督的困苦羊群。倘若有您和其他贤达的同在，他们将会来到这里，归于同一个羊圈。但眼下他们四处漂泊，如同没有任何向导的迷羊。我们毫不怀疑，您必会喜乐地接受这一呼召。祝顺利。

法兰克福的弟兄们敬上

9月24日

诺克斯很不情愿承担这个责任：一方面因为他渴望在日内瓦继续学习，另一方面他担心在法兰克福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经过加尔文的劝说，他终于顺服了呼召，并于11月赶赴法兰克福，在全体会众的一致同意和认可下，开始了他的事奉。但是，在他到达之前，人们起先原有的和谐已经遭到破坏。苏黎世（Zurich）的流亡者在回复通函时表示，法兰克福的教会应当在信仰上保持原有的礼拜仪式——即爱德华国王先前在英格兰宣布的仪式；除非在这一点上得到保证，否则他们不会去法兰克福。因为他们下定决心，

“不会承认和使用其他的礼拜仪式”。他们宣称，如果偏离原有的仪式，仇敌就会借此攻击他们的信仰欠缺不足和草率易变；这无疑是对留在英格兰境内的弟兄们的羞辱，因为他们正为此仪式而流血殉道。针对这些抗议，法兰克福的弟兄们回复说，他们之所以获准在这个场所自由敬拜，前提条件就是尽可能符合法国教会使用的礼拜形式。其次，英格兰公祷书上的某些内容会冒犯周围的新教徒；即便对于英格兰国内讲原则的人士，书中的某些部分也会引起他们的顾虑。现今所作的修改并没有对爱德华国王及其枢密院制定的圣礼仪式有任何质疑；其实国王和枢密院也改变了很多从前的制度，并且决心要做更大的改动，而他们认为那样做并不会给教皇派的敌人留下什么把柄。最后，法兰克福的弟兄们相信，这些修改更不会有损殉道者的名声，因为他们流血舍命所要证实的东西，远比人所指定的易变礼仪重要得多。这个答复并没有让苏黎世的学者感到满意，尽管使他们的语气略有缓和。他们觉得自己持守这样的观点还不够，于是又鼓动斯特拉斯堡的弟兄们提出同样的要求；频繁的书信往来和信使拜访使法兰克福的会众争执不休，产生了意见分歧。

当诺克斯到任时，他发现敌对的种子已经在他们中间萌芽。从他对英格兰公祷书的态度我们可以确知，那些急不可耐地希望恢复书中仪式的人肯定让他非常不悦。但是，他明智地意识到，这些弟兄们都是为了同一个信仰而遭到流放，如果在他们中间产生纷争，将会带来极大的羞辱和毁灭性的后果。所以他决定在两派之间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尽量缓解双方的矛盾，并避免分裂进一步扩大。所以，当会众同意遵循日内瓦教会的礼拜仪式，并请诺克斯按此仪式主领圣餐礼时（他个人当然赞同日内瓦的模式），他却表明，除非征求了各地方有学识的弟兄们的意见，否则他不会使用这种仪式。与此同时，他也表明自己不愿意按照英格兰的礼拜仪式主持圣礼。如果他没有权利按照更符合圣经的方式来主持礼拜，那么最好请别人来承担这一职责，他愿意只做讲道的工作；假如这两样工作都不被批准，他恳求弟兄们让他辞职离开。对最后这项请求，弟兄们当

然不会同意。

诺克斯担心，如果这些分歧得不到迅速的和解，人们会爆发更激烈的争端。因此，他和其他一些人合作，起草了一份英格兰公祷书的概要，并翻译成拉丁文，送交加尔文过目，请他提出意见。加尔文在1555年1月20日的回信中，对法兰克福教会当前不合时宜的纷争感到悲伤，并表示尽管他一向建议用温和适度的方式对待外在礼仪的问题，然而他必须抨击那些顽固不化、不愿意对传统惯例作任何改变的人。在英格兰的礼拜仪式中，他发现了许多“可以容忍的愚蠢内容”——他的意思是说，这些内容在改革初期可以容忍，但以后必须除去。他认为英格兰人目前的情况使他们有正当的理由作此尝试，并且应该制定统一的、能够更好地造就信徒的礼拜仪式。此外，从个人的角度，他无法理解那些如此痴迷教皇制糟粕的人到底用意何在。

这封信在会众面前被宣读，并起到了显著的效果，压制了那些急于推行英格兰礼仪之人的声音。一个委员会被任命草拟一份能够调和所有不同意见的礼拜模式。当委员会聚集商议的时候，诺克斯告诉他们，他确信若要达成和解，有一方必须作出让步；因此，他会宣布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案，然后他会将自己排除在外（即放弃自己的表决权），让他们在上帝和教会面前对此方案作出决定和取舍。按照这个提议，他们商定了一套敬拜仪式，其中某些部分取自英格兰的礼拜仪式，并附加了一些适应当时环境的程序。这套仪式的效力将维持到四月底；如果在此期间有任何争议发生，则应将问题提交五位最负盛名的外籍神学家定夺。全体会众都在这一协议上签字表示赞同，并为着恢复和谐举行了公开的感恩礼拜，之后举行了圣餐仪式，代表会众对彼此合一的承诺，以及对过去所有冒犯的埋葬。

但不幸的是，这个协议很快就遭到侵犯，会众之间的和平再次被破坏，其方式之蛮横放肆，令人震惊。3月13日，曾担任爱德华六世的私人教师的考克斯博士，携同行之人从英格兰来到了法兰

克福。他们到达后第一次参加公共敬拜就违反了既定的秩序。在神圣礼拜进行的过程中大声回应牧师的宣告。当一些长老出面警戒和制止他们的行为时，却遭到傲慢无礼的回答：“大家更喜欢以前在英格兰的规矩，也更情愿有英格兰教会的模样。”下一个主日，该团体中的一人强行闯入讲坛，在没有经过牧师和会众的同意下，念诵了启应祷文，考克斯及其同伴在台下附和回应。这一冒犯行为因着下列因素变得更为严重：他们中间有些人在离开英格兰之前顺从了教皇制，但至今还不能给弟兄们一个应有的交代。

目睹这种对全体会众的公开侮辱以及对所有合宜之礼和秩序的粗暴侵犯，诺克斯显然不能置之不理。那个主日的下午正好轮到诺克斯讲道。在讲解《创世记》的过程中，他提到挪亚在帐篷里赤身躺卧的时候，含对父亲所做的事；并由此推论：弟兄的软弱必须得到遮盖。然后他又说，对于那些可能公然羞辱上帝之名、给他的教会带来不安的事，则必须予以揭露和公开指责。随后他提醒听众不久前发生在他们中间的争论；经过漫长和艰苦的努力，这些争论如何通过庄严的协定，以皆大欢喜的方式得到了妥善解决；可是在那天，这一美好的协议却遭到了极其恶劣的践踏；其可耻行径是他们中间最骄傲的人也未曾做过的。所有缺乏神圣理由的事物都不应该强加给任何一个基督教会。他愿意公开证明：在那本某些人过分痴迷，引以为傲的公祷书里，有不完美、不纯净和带有迷信色彩的内容；如果有人着手用这些东西去劳累一群自由的会众，他将坚决反对他们的企图——只要他还能站在这个讲坛上，并且他讲道的经文正好有的放矢。关于这个无法回避的主题，他进一步谈到，英格兰人曾拥有大好时机，但他们在改教行动上却迟缓松懈，这是上帝对英格兰不悦的原因之一。他论及胡珀主教（Bishop Hooper）在拒绝某些礼仪时遇到的麻烦、教会惩戒制度的缺乏以及众所周知的圣职兼任制，即一人担任三四个甚至五个带俸圣职；他还指出基督的羊群被剥夺了他们必需的灵粮。

这一直率的训斥引起了被谴责者的极大怨恨，特别是那些在英

格兰身兼多份圣职的人；这些人抱怨讲道者毁谤他们本国的教会。鉴于对这篇讲道的控诉喧闹不断，教会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来讨论此事。在会上，控告者一开始不提控告之事，却坚持要求考克斯博士及其同僚应该被给予入席投票权。这一要求遭到多数人的抵制；因为他们还没有在教会纪律册上签名表示同意，而且对于最近制造混乱的举动以及之前在英格兰背道的罪行，都没有表示应有的歉意。诺克斯在会上的表现不仅精明慎重，而且温和得体、宽宏大度。他十分清楚这些人对他的敌意，知道他们争取入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人数上压倒自己；然而，由于他对自己公正的原则深信不疑，并且迫切地希望排除偏见，所以他恳求并劝服了与会者作出让步，允许考克斯派拥有投票权。但是，对方对此无私的举动却毫不领情；当他们一获得入席资格，并取得了多数票的发言权，考克斯马上免除了诺克斯的讲道职位，并且不允许他介入任何教会事务。

会众的大多数成员对这些作法感到愤慨。令人担心的是，他们很可能爆发一场不光彩的骚乱。法兰克福的行政官在得知有关事件的详情之后，劝告英格兰人通过私下协商解决争端，但没有奏效；于是他们颁布了一条法令：规定会众必须完全遵循法国教会使用的礼拜仪式，因为以往偏离该仪式只会产生一系列的混乱。如果会众不服从这一法令，官员们则威胁要关闭他们的礼拜场所。对此不容辩驳的命令，考克斯派表面上欣然服从，暗地里却想方设法，试图废掉这条法令，并重新把他们中意的礼拜仪式强加到弟兄们身上。

鉴于诺克斯在会众当中的影响力，考克斯派意识到，只要诺克斯身在其中，就别想指望实施他们的计划；所以决定首先除去这个眼中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采取了最低级卑鄙和违背基督教原则的手段。经过合计，他们派了两个人私下去见行政官，控告诺克斯犯有阴谋反对德皇、皇太子菲利普（Philip）和英格兰玛丽女王的叛国大罪，并递交了一本诺克斯最近出版的书，其中凡是受到指控的段落都作了标记。诺克斯在提及这一事件时说道：

哦，主上帝啊！打开他们的心，察看他们的恶行吧；求你按丰富的怜悯饶恕他们。哦，主啊，我也从心底最深处饶恕他们。但愿借我口传讲的主的信息不要受到诽谤。我被迫宣告我离开的原因，并公开他们的愚昧和其他人的例子；他们虽然同遭流放的命运，却以如此残忍之心逼迫自己的弟兄。

控告者交给行政官的书是诺克斯所写的《对英格兰的警戒》，其中有一段文字，被重点指证犯有反对皇帝的叛国罪名。那段话最初是诺克斯对白金汉郡阿默舍姆（Amersham）的居民所讲的；当时正风传玛丽女王会和查理五世的儿子兼继位者菲利普王子联姻；这桩婚姻甚至让许多英格兰天主教徒都感到惊恐不已。以下是该文的摘录：

哦，英格兰，英格兰，如果你顽固不化，执意返回埃及；如果你和这些维持和推进偶像崇拜的王子们缔结婚姻、联邦和同盟；如果你要和这样的皇帝修好：他和尼禄（Nero）皇帝一样是基督的仇敌；如果你为了讨这些君王的欢心，回头去行昔日教皇制下的腐朽可憎之事；那么毫无疑问，哦，英格兰，那些你所仰赖和投靠的人，必要给你带来灾祸，使你全然荒废。

书中其他的一些段落则提到英格兰玛丽女王的残酷行径。

官长们接到控诉之后，随即派人将英格兰会众里的一位有名望的人士惠廷厄姆（Whittingham）招来，向他询问诺克斯为人如何。惠廷厄姆回答说，诺克斯是一位“学识渊博、庄重沉稳、生活敬虔的人”。然而，官长们则强令他得像自己的一些同胞那样，对诺克斯提出严重的控诉；然后他被强令将那本小册子里面标记过的段落都翻译成拉丁文，如若不从，就会被扣上破坏和谐的罪名受到惩罚。这样做之后，他们命令诺克斯停止讲道，直到他们觉得时机合

适为止。诺克斯后来写道：“因为有人要向我倾诉，所以第二天我还是去了教会，并没有想到自己的露面会冒犯任何人。但是，当那些控告者一见到我，马上就起身离开了讲道现场；其他的同伙则强烈地抗议说，他们不能和我待在同一个地方。”官长们对如何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非常头痛：一方面，他们对控告诺克斯之人的恶意预谋早已心知肚明；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事情闹大之后，有关控诉的信息会传到奥格斯堡（Augsburg）的皇家枢密院（the Emperor's Council）那里，那样，他们就不得不把诺克斯交到后者手中，或者引渡给英格兰女王。左右为难之间，他们授意惠廷厄姆私下劝诺克斯主动退隐，离开法兰克福。与此同时，当那些控告者登门求问审议结果时，官长们无法掩饰对其不道德行为的嫌恶，非常不悦地打发他们退去。

3月25日晚上，诺克斯向大约50位来到他住处的会众成员传达了一篇充满安慰的讲道。第二天，诺克斯启程离开法兰克福；大家带着沉重的心情和许多的眼泪陪送了好几里路，把他交托给上帝，然后各自散去。

诺克斯刚刚离开，考克斯就和首席行政官的侄子革老伯格博士（Dr. Glauberg）私下谋划，通过弄虚作假的方式，谎称全体会众一致同意恢复旧制，从而设法让议会颁布新的法令，规定可以不受限制的使用英格兰的礼拜仪式。下一步是废除教会纪律，然后任命了一位主教（或称监督）来管理牧师。在完成了这些重要的“改良措施”之后，他们现在终于自诩有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英格兰教会”。不错！他们现在能够俯首傲视所有曾盛情款待自己的改革宗教会了，虽然那些教会拥有所有基督所设立的圣职人员和圣礼仪式，但是却没有主教、启应祷文和白色长袍！他们现在真可以跑到罗马教会面前兴高采烈地宣告如此如此……但是，我不应忘记，我笔下的对象当时是为了新教信仰而流亡异乡，而且对于教皇制系统深恶痛绝，可惜他们仍然对天主教的华丽服装、优雅举止和高雅语言怀有迷信和幼稚的依恋。



殉道史学家约翰·福克斯

如果要探究法兰克福英格兰教会的后续故事，显然超出了这本传记的范围。这里我只简单补充几句。在教会的和睦被破坏、牧师被诽谤中伤的情况下，几次弥补和修复的尝试均告无效；因此大量的信徒离开了这座城市。其中一些人，包括著名的殉道史学家福克斯（Foxye），转道去了巴塞尔（Basle）。更多的人去了日内瓦，并在那里获得了一个礼拜场所，在爱心和睦中安然居住，直到玛丽女王驾崩，英格兰的逼迫风暴终告止息。那些留在法兰克福的人，似乎在补偿对诺克斯所犯下的罪过，仍然在无休无止的争吵中不能自拔。考克斯和他的同党在达到目的后很快就撤下那些剩余的会众去化解他们挑起的分裂，并找到了一处费用更低的环境继续学习。

我尽可能准确地记录这些事实的细节，不仅因为本书的主题与此有关，而且因为这些事实清楚反映了遵从国教者（conformists）和不从国教者（nonconformists）之间的争论；这一争论贯穿了接下来很长一段时期的英格兰教会历史。“法兰克福的骚乱”展示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这是日后要在英格兰本土上演的那场更大规模论战的缩影。这一事件的结局预示着和平调解争议问题的前景极为黯淡。本来，出于对政府的尊重而规劝人们去顺服政府喜悦采用的宗教礼仪（尽管这些礼仪令人反感），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法兰克福事件中，并没有政府对他们发号施令；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如果这些英格兰人在一个法律和习俗与自己有冲突的地方尚且偏执狭隘，一味强求按己意而行，那么当他们回到有法律和习俗支持的英格兰时，会发生什么事呢？当伊丽莎白女王即位时，得到晋升的神职人员表示他们希望除去那些引起纷争的因素，但没有得到女王的许可。我相信其中许多人作此表白的诚意，但是，既然他们在事情的决定权完全在自己手中的时候，尚且那样死板固执；既然他们急不可耐地要给弟兄们的良心套上重轭，甚至催促极不情愿的法兰克福行政官批准他们的安排；那么，如今他们向统治者申请的缓和措施则表现得勉强、冷淡、毫无动力；这些统治者决意施加更重的轭，又用蝎子鞭惩罚当年他们曾用鞭子教训的百姓

——这一切又有什么奇怪呢？我重复一遍：当我思考法兰克福事件的影响，再看到随后每一次推进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尝试均告失败并且那些为异议者（因良心的缘故不愿顺服某些教会法规的人）争取宽容政策的努力也屡屡受挫，我就感到不足为怪了。我知道有人会辩解说：那些异议者所抱怨的事情都是无关紧要的、圣经里没有禁止的、并非涉及信仰根基的、更不是得救所必需的；对于见多识广的人，这些事也不会影响他们良心的平安；当政府颁布这类礼制的时候，那些拒绝顺从的人，主要是受到了不合理的顾虑、高傲自负、独断专行和固执己见等诸如此类因素的影响，等等。这是统治者一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少数方，侵犯后者信仰自由时常用的论调。但这种论调没有提到一种危险，即任何统治阶层，无论是世俗的还是教会的，都有权力在信仰领域强制执行可有可无的事情。一件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这种借口下，礼仪惯例的繁琐制度又被逐渐引入，当年正是这些制度使天主教会的信仰趋于腐败。此外，经过深入严肃的思考会发现，那些有争议的事情并不是真的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为了避免在这些话题上讨论太多，我只想对上述辩解作一个简单明确的答复：

对于心存顾虑的人，这些事情意义重大，关乎良心的平安；但你们却说无关紧要。倘若按你们的判断，这些事情真的是无关痛痒，纯属多余，并不值得成为争论的主题，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将其强加于人，以致破坏教会的神圣平安，造成持续的分裂呢？为什么要压制、剥夺、搅扰和迫害敬虔博学的人士，并把一群庄重虔诚的人赶出教会或团契呢？为什么要折磨他们的良知，危害他们灵魂的福祉呢？

离开法兰克福之后，诺克斯直接去了日内瓦。加尔文热情地欢迎他的归来。鉴于当初自己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诺克斯的决定，使后者接受了法兰克福的邀请，所以加尔文对诺克斯的遭遇及

被迫离任感到非常难过。在答复考克斯博士发来的一封护教性的书信时，尽管加尔文谨慎回避任何可能重挑争端和火上浇油的言辞，但仍然忍不住表示，诺克斯受到了毫无爱心和粗野无礼的利用；那些控告者与其跑到国外、闯进一个和睦平静的团体去煽风点火，倒不如待在老家更好一些。

从整桩事件里可以看出，是上帝的护理将诺克斯从法兰克福的工作中释放出来，为要让他承担更重要的事奉。从他作为囚犯被运到法国的时候起，就从来没有忘记苏格兰，也没有放弃重返祖国再次布道的希望。在英格兰的五年时间里，持续不停的事工占据了他的身心，使他不再经常因为实现伟大夙愿的日子变得遥遥无期而抱憾不已。离开英格兰之后，他的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自己的祖国。从法兰克福离任回到日内瓦不久，他就得知，经过这些年的黑暗时期，国内的形势开始出现乐观的迹象。当圣安德鲁斯城堡失陷，在其中避难的新教徒被驱逐流放之后，苏格兰的改教事业似乎遭到致命打击。教士们欢庆胜利，为扼杀了反对的声音而洋洋得意。王国境内仍然有许多新教徒，但他们只是秘密地保留自己的观点，并不愿公开承认，以免招来杀身之祸；也不敢私下聚会，恐怕激起仇敌的怀疑。当时发生的一起事件本来会彻底断送不列颠的宗教改革，不料却成为在苏格兰复兴改教的工具。在受玛丽女王逼迫而被赶出英格兰的新教徒中有一些人来到苏格兰避难。这个国家的教士们被先前镇压新教的成功所蒙蔽，满心认为安全无虞，所以明显忽略了这帮来自邻国的难民。他们四处旅行，教导了很多人，也激起了那些以前接受过真理知识的人潜在的热情。

这批人里面，威廉·哈洛 (William Harlow) 是来到苏格兰的第一位讲道者；对于福音教义的热忱和知识弥补了他所受教育的不足。紧随其后到达的是约翰·威洛克 (John Willock)。1555年夏天，威洛克受埃姆登 (Emden) 公爵夫人的委托来拜见摄政女王。他后来成为诺克斯的主要助手，并对后者极为尊敬和爱戴。他们二人在才干和特质上的珠联璧合对改教运动利莫大焉。威洛克在学识

上并不逊于诺克斯；尽管他不如后者勇敢无畏、滔滔雄辩，但他更为殷勤和蔼、审慎明智、说话得体；这些品质使他能够久居其位并完成使命，特别是当他的同伴处境不妙或行动受挫的时候。他是艾尔郡（Ayrshire）本地人，有作修士的背景；但很早就皈依了新教信仰，并逃到英格兰。在《信仰六条》^①的严厉逼迫时期；他曾于1541年被投入舰队上的牢房。之后他作过简·格雷（Jane Grey）的父亲萨福克公爵（Duke of suffolk）的私人牧师；在玛丽女王登基后，他退隐到东弗里斯兰（East Friesland）。

^① 英王亨利八世在位时，于1539年颁布了《信仰六条法令》（*Six Articles Act*）。国王虽然实行宗教改革，与罗马教皇决裂，但主要是出于婚姻和政治原因，故改革极不彻底，保留了大量天主教圣礼制度。所以《信仰六条》中仍然规定必须遵守圣餐变体的教义，不准平信徒在守圣餐时自己执杯，圣品人员要严守独身、不得反悔修道的誓约、肯定告解的重要性等等；违者将受到严厉惩罚。

第 12 章

奔波的旅程

在诺克斯的生命中，只要有服侍主的机会，他从来都不惧危险，也很少顾及自己的个人安危；但他并没有鲁莽行事。在所有的计划中，他对带领自己进入任何事工的呼召都作过深思熟虑。眼下他虽然得知一些从苏格兰传来的振奋人心的消息，但一开始仍然很不情愿返回苏格兰。深夜，他辗转反侧，心中思量；他十分享受目前的研修时光，渴望能够继续学习下去。但是，希望与妻子重逢的焦急心情以及岳母一再要求他来访的信件，终于使他下定决心踏上返乡之路。1555 年 8 月，诺克斯从日内瓦出发来到迪耶普港口，然后从那里坐船越过海峡，在不列颠岛东岸，靠近苏格兰和英格兰交界处的地方登陆；那时已是秋末。他马上赶往伯威克并非常欣慰地发现，他的妻子和岳母一切安好，并且和该城其他几位人士有美好的信仰团契。他们都没有向官方设立的偶像制度“屈膝下跪”，也没有向敌基督者屈服，“接受他的印记”。

和她们呆了一些天之后，诺克斯秘密启程去探访爱丁堡的新教徒，原打算短暂停留之后再返回伯威克。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他发现那里的工作使他无法脱身。在爱丁堡，他寄宿在詹姆斯·赛姆（James Syme）家里，此人是一位受人尊敬、信仰虔诚的市议员。当接纳改革宗教义的人们一听说诺克斯来到此地，便纷纷来到他的住处听他教导。这些人当中，有唐县的约翰·厄斯金（John Er-

skine) 和莱星顿的小威廉·梅特兰 (William Maitland, younger of Lethington) (日后他成为苏格兰玛丽女王的大臣)。约翰·威洛克当时也在爱丁堡。听过诺克斯讲道的人对他的教义非常满意, 回头又带来了更多的朋友和熟人, 于是听众的人数与日俱增。由于被限制在私人房屋里, 所以诺克斯被迫对一拨又一拨的会众连续讲道; 并且无论白天黑夜, 几乎没有间断地教导那些特别渴慕得到训海的人。在以下这封写给鲍斯夫人的信里, 诺克斯解释了自己拖延时日、无法按期返回的原因; 这段文字是他当时的工作和心情的最好写照:

人的道路由不得自己决定。亲爱的母亲, 虽然我返回苏格兰的行程完全和我自己的判断不合, 但是今天, 我要为那些导致我来到此地的人们赞美上帝。首先我为您感谢上帝, 因为您是他所使用的器皿, 为要吸引我离开舒适的小窝 (确实是您使我离开了平静安宁的学习环境), 来专心察看和了解弟兄们的热切渴慕——他们日夜流泪叹息, 为要寻找生命的粮。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国家亲眼目睹此情此景, 我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赞美上帝, 当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看到上帝在所多玛城中不是只有一个罗得, 也不是只有两个忠心的女儿。爱丁堡的弟兄们所发的热心, 远超过我之前见过的其他人。我会在这里多待一些天, 所以请您耐心等待。直到上帝稍微满足他们饥渴的时刻来到, 我才能离开此地。真的, 母亲, 他们的热忱使我深受感染, 让我禁不住控告自己的懒惰, 责备自己的冷淡。愿上帝成就他们心中的愿望。请告知我您的近况, 以及自上封书信以来发生的事情。愿您在上帝的应许中得到安慰, 并且确信上帝会兴起更多的朋友, 远超过我们所认识的。向所有您身边的人致以问候。我将您交托给那位全能者的保护之中。仓促草书。

您的儿子, 约翰·诺克斯

1555年11月4日于苏格兰

当诺克斯到达苏格兰时，发现接纳改革宗教义的人通常会继续参加天主教的礼拜甚至弥撒，主要是为了避免招来恶意的诽谤。这使他非常不悦；他在讲道和谈话中揭露了天主教礼拜的不敬虔，以及与之同流合污的危险。为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弟兄们召集了一次会议，会上梅特兰以其杰出的学识和真诚的态度为以上行为作出辩护；但诺克斯对其观点的答复无懈可击，所以梅特兰最终让步，承认自己的观点站不住脚，并和其他的弟兄一致同意以后禁绝这种妥协行为。从此他们从苏格兰的天主教会正式分离出来。这次事件被公认为改教运动的重要一步。

厄斯金先生说服了诺克斯和自己一同回到安古斯 (Angus) 地区唐县的家族别墅住了一个月，其间诺克斯每天讲道，听众都是当地的头面人物。当他回到南部以后，大部分时间住在詹姆斯·桑迪兰兹爵士 (Sir James Sandiland) 在卡德豪斯 (Calderhouse) 的家里；在此聚会的人包括罗恩阁下 [Lord Lorn, 后来的阿盖尔伯爵 (Earl of Argyll)]、马尔伯爵 (Master of Mar) 以及詹姆斯·斯图亚特 [James Stewart, 詹姆斯五世的私生子，圣安德鲁斯的行政官，后来的莫里伯爵 (Earl of Moray)]。诺克斯在世时见到后两人成为苏格兰的摄政王。这些贵族非常喜爱他所传讲的教义。1556 年年年初，在巴尔的洛克哈特 (Lockhart of Bar) 和凯林克鲁的坎贝尔 (Campbell of Kineanleugh) 的安排下，诺克斯来到了苏格兰罗拉德教派^①的古老据点凯尔 (Kyle)，那里有不少改革宗教义的拥护者。除了在该地区的许多人家中讲道以外，他还去了艾尔镇 (Ayr) 布道，并在那里的几处地方主持了圣餐仪式。复活节前夕，格伦凯恩伯爵 (Earl of Glencaim) 派人请他到自己的芬雷斯顿 (Finlayston) 庄园讲道；他在讲完道之后也主持了圣餐，伯爵、伯

^① 罗拉德教派 (Lollards) 是英格兰改教先驱约翰·威克里夫 (John Wycliffe) 的追随者组成的团体。这里指苏格兰境内热衷威克里夫思想的人。

爵夫人、他们的两个儿子以及其他一些聚会的朋友都参与了神圣的筵席。他从芬雷斯顿回到了卡德豪斯，稍作停留之后再次访问唐县，进行比以往更加公开的布道。蒙斯地区的大部分贵族当时都改用坐姿领受圣餐，以此公开承认改革宗信仰；他们彼此庄严地结盟，拒绝参与天主教的任何圣礼，愿按上帝的旨意坚持传讲真实纯正的福音。这个结盟开启一系列信仰协定或盟约之先河，通过这种方式，苏格兰新教徒的联合不断得到认可。

充满危险患难的岁月使诺克斯和他的朋友们学会了行动隐秘、做事低调。直到诺克斯在不同地方讲道好长时间之后，教士们才得知他在王国境内。但是，听众越来越多，继续隐藏身份变得不切实际。他在艾尔镇的讲道被举报到朝廷，成为摄政王后^①面前讨论的话题。有人声称讲道者是一名英国人；一位高级教士（可能是格拉斯哥大主教毕顿）说道：“不，不是英国人，是诺克斯那个无赖。”诺克斯后来说道：“我的主很乐意给一个穷苦的人施洗。如果有人究其原因，他的白衣和冠冕可以代表他行事的权柄。至于他如何随自己的意思规定那些不太确定的事情——比如我的学识和教义，在此我忽略不谈。自从上帝按自己的美意呼召我离开天主教的泥坑以来，我的生活言行如何，可以让我的敌人来评说；我的学识如何，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来证实一下。”主教们开始起意要抓捕诺克斯，但是摄政王后阻止了他们的请求。

在诺克斯最后一次访问北部之后，各地的天主教修士都涌到主教们那里，鼓动他们采取迅速和果断的措施，制止诺克斯的讲道所带来的令人恐慌的影响。诺克斯因此收到了传唤，要他于5月15日赶到爱丁堡的黑衣修士的教会，在教士会议上露面发言。诺克斯决意赴会，并于指定日期之前到达了爱丁堡，随行的人有约翰·厄斯金和其他几位绅士。教士们万万没有想到诺克斯真的来赴这场“鸿门宴”；当得知后者的意图后，他们害怕将事态引入极端，加

^① 指玛丽女王的母亲玛丽·德·吉斯（Marie de Guise, 1554 - 1560年摄政）。

上对摄政王后是否明确支持没有把握，所以提前聚集商议，编造借口，谎称发出的赴会邀请都是非正式的传唤，从而放弃了约定的会议。在那一天，本该作为被告人出席的诺克斯，受邀在邓凯尔德主教（Bishop of Dunkeld）宽敞的住所里讲道，听众的人数远远超过以往他在爱丁堡的任何一次聚会。在接下来的10天里，每天的上午和下午，他在同一处地方连续讲道。教会中无人敢对他有丝毫的骚扰。在忙碌工作的间隙，他给鲍斯夫人匆忙写信：

亲爱的母亲，容我在主耶稣里向您致以最衷心的问候。虽然我此前已打算要拜访您，但是上帝的拦阻使我无法成行。我毫不怀疑上帝现在所作的是为了荣耀他自己，也是为了安慰这里的许多人。在过去的三天里，古老的号角再次吹响，直到这所宽敞的私宅再也容不下它的声音。为了他的儿子基督的缘故，上帝让我知道，在天上的君王面前，我心灵的哭泣并非徒然，我的眼泪也未被忽视。哦！如果我在爱丁堡的40天都像过去的三天这样，就是死我也甘心乐意。喜乐吧，母亲，我们得救的时刻近了。撒旦如何猖狂，圣灵的恩典也如何丰盛，并且日日更新，见证我们满有慈悲的天父永远长存的大爱。此刻我无暇再写更多。愿主耶稣的恩典与你同在。

您的儿子约翰·诺克斯

仓促草书于星期一

那时，受格林凯恩伯爵（Earl of Marishal）的邀请，马歇尔伯爵赶来参加了一次由诺克斯主讲的夜晚聚会。听后大为欣喜，遂和格林凯恩一道劝说诺克斯给摄政王后写一封信。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使王后倾向于保护改革宗传道人，甚至可以让她对改革宗教义产生好感。诺克斯同意了这一要求。为了表现原信的写作风格，以下我引用了原文：

王后陛下，我毫不怀疑近来有许多关于我的谣言传到您的耳中，按照其中的指控（如果所有的报告都属实的话），我的性命实在不配再存活下去。如果陛下的心被许多人的声音所激动，相信我就是控告中所说的十恶不赦之人，从而对我充满憎恶，那么我早就该闭口不言，更不用说向您乞求同情了。然而陛下没有勃然大怒，这真是一个奇迹。我被诽谤为异端分子，被指控为假教师和蛊惑民众的人，还遭到许多其他的辱骂；若非清白无辜，所有这些罪名（这都是那些在世上有尊贵名望的人所声称的）无疑会挑起地方官府大人的震怒。然而，赞美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赐下属天恩典的甘露，熄灭了陛下心中不悦的怒火，并且挫败了撒旦的工作和谋算（最近我开始明白）。有一件事会给我的心带来莫大的安慰，（上帝可以作证）是我在愁苦人生里所能拥有的任何福利和保障都不能带来的；（我理当去喝的杯是上帝的智慧所命定的，他的计划永不会改变）我相信王后陛下会予以恩准。正如您以宽容之心待我和我不惜代价投身的事业一样，请您一如既往，也以同样的温和与仁慈对待其他那些可能受到不公正指控的人士。

诺克斯继续写道，如果一位雄辩家要求王后陛下以慈母般的怜恤对待臣民，以公义审判杀人者和逼迫者，心中不怀贪婪和偏见，头脑中常以公众的福祉为念，以及具备其他的美德，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无论是异教徒，还是富有灵感的作者，都会对执政掌权者提出如此要求。但是，依他之见，当宗教信仰如此腐败堕落的时候，任何革新世风民俗的愿望都是徒劳的。他在这封信里不会公开揭露教会中蔓延泛滥的那些错误和腐败现象之源头、发展和范围；但是，如果王后陛下愿意给他机会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他随时准备就此作出阐述。与此同时，他呼吁王后关注这一重要的问题，并指出一些流行偏见的错谬之处，以及她可能被欺骗的危险；这些谬论包括：对宗教信仰的关怀不属于地方行政官，而应完全移交给神职人

员；宗教信仰普世性的堕落是夸大其词，很难令人相信；判断真实信仰的根据是多数派的意见、传统惯例、人的法律和决定或任何其他东西，唯独不是神默示的圣经上无误的指令，等等。王后必须谨防受到这些思想的误导。诺克斯知道，信仰上的革新会被视为一种冒险；但在目前的景况下，改革之迫切需要和重大意义必然要压过对于风险的惧怕。他也知道，实行一场公共变革可能会超出了王后摄政的权柄，但他提醒王后切不可维护偶像崇拜和弊端陋习，也不可容忍教士们的暴行——他们大肆杀害无辜的人，仅仅因为后者按照圣经的话敬拜上帝。

虽然诺克斯的文风并不是非常流畅优美，而且他直白严厉的语言常常激怒别人，但这封致摄政王后的信却不失庄重典雅。显然作者在写信时小心翼翼；就语言风格而言，该文表达简洁，颇具说服力，可以和同时代的任何作品媲美。书信的笔调经过仔细斟酌，旨在激发读者的询问和证实作者的决心——他确信邪恶已经在教会中得势。但诺克斯对信仰争议的主题并没有急于判断是非，而是定意在论战双方之间保持适中的态度。尽管摄政王后的礼节风度令人印象深刻，但她却不是信中所描述的人物。当格林凯恩伯爵将这封信递交给她的时候，王后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就转交给格拉斯哥大主教（Archbishop of Glasgow），并说道：“主教大人，请您读读这篇讽刺文。”这件事促使诺克斯在离开苏格兰之后将该信公开出版，并附加了一些内容，所使用的风格更为尖锐和严厉。

当诺克斯在苏格兰忙碌的时候，他收到了日内瓦的英格兰会众发来的信，说他已被选定为他们的牧师之一，催促他回来视察。诺克斯觉得有责任答应这一邀请，于是马上开始准备行程。他的妻子和岳母此时已经来爱丁堡和他会合；鲍斯夫人不久前丧夫成为寡妇，现在决意要和女儿女婿共赴日内瓦。诺克斯先把她们送上去迪耶普的船，自己则再次拜访昔日讲道的地方，向弟兄们告别。凯林克鲁的坎贝尔领他去见阿盖尔伯爵，之后他有几天的时间在坎贝尔城堡讲道。阿盖尔（Argyle）和格莱诺基（Glenorchy）的领主们力

劝他留在苏格兰，但他拒绝了所有人的迫切请求。他后来写道：“如果上帝大大祝福他们微小的开端，使他们能够持守敬虔的生活，那么，无论何时他们想命令我回来，我都会悉听尊命。”1556年7月，他离开了苏格兰，到达迪耶普之后，和家人一道赶赴日内瓦。

当教士们意识到诺克斯离开王国之后，马上以卑鄙的方式重新传唤他（先前诺克斯在场时他们表示放弃）；由于他显然不能出席，所以他们通过审判，宣布他的肉体应受火刑，他的灵魂应受咒诅。鉴于不可能抓获诺克斯其人，所以他们在爱丁堡的十字架上焚烧他的画像以示羞辱。针对这一审判，诺克斯起草了一篇《呼吁书》（*Appellation*）；后来他将其出版，并附上一份恳求和劝谏，这份《呼吁书》是写给苏格兰的贵族阶层和平民大众的。文中他对自己近来访问苏格兰期间所教导的教义作了一个总结。教士们对该教义大加贬斥，恨之入骨。以下是总结的内容简介：

诺克斯教导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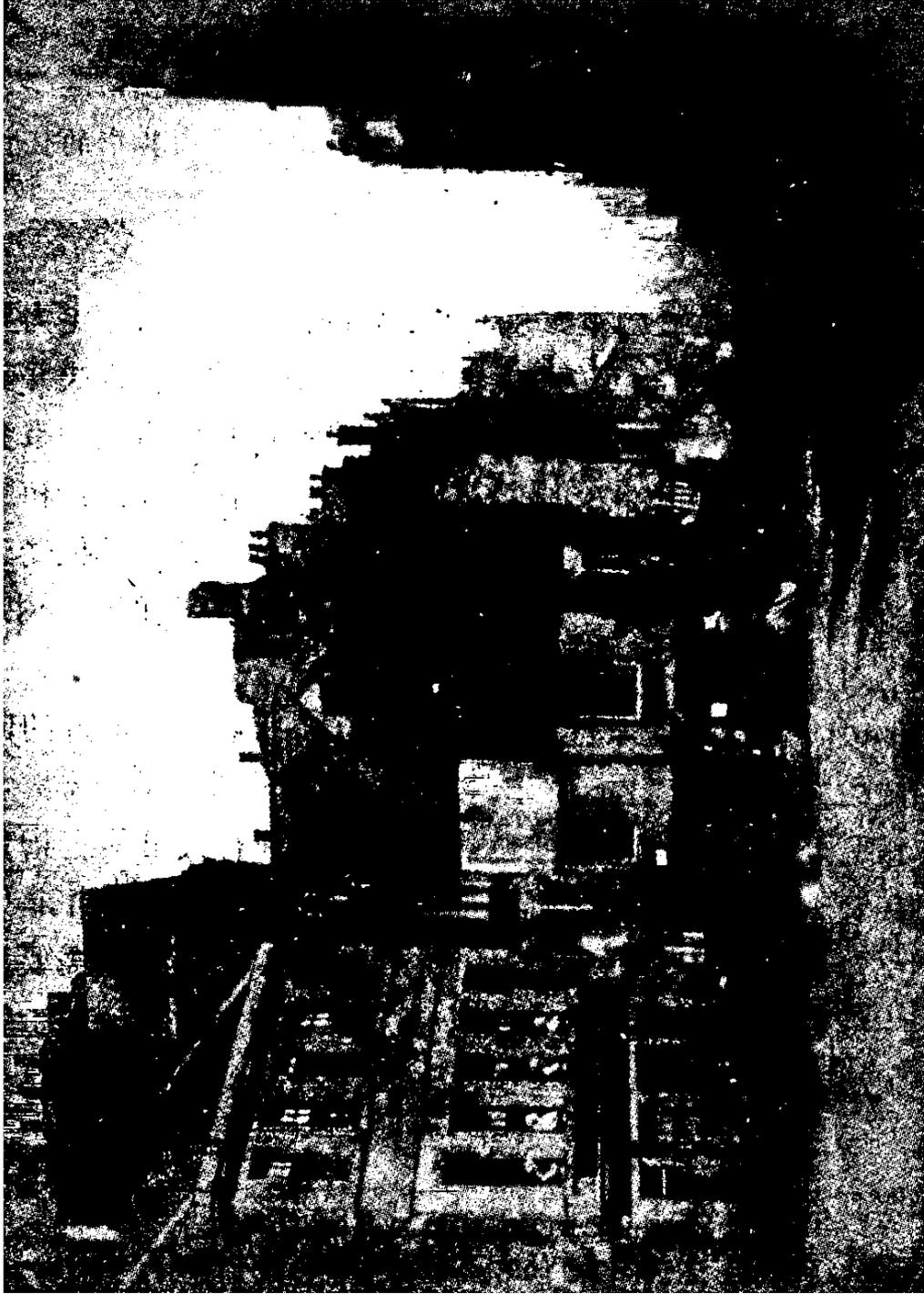
除了耶稣的名之外，再没有别的名，人可以靠着得救；所有对于他人功德的倚靠都是徒劳和虚妄的。耶稣通过自己一次献祭，将那些继承所应许之国度的人分别为圣，并与上帝和好；人自称为了赎罪而献上的所有其他祭物都是亵渎神；所有人应当恨恶罪，因为罪在上帝面前极为可憎，除了他儿子的死之外，没有什么祭物能够补偿罪的代价；人应当颂赞他们的天父，因为天父没有保留基督的肉身却将他舍弃于十字架上，为我们忍受了羞辱和残酷的死亡；那些从他们先前的罪中被洗净的人，一定要过一个新的生活，与肉体的情欲争战，并当努力以善行来荣耀上帝。对于那些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面前否认基督，并且以他和他的话语为耻的人，基督在父面前也要否认他们，并且以他们为耻。

他进一步教导说：

对永生怀有盼望的人，其义不容辞的责任是避免偶像崇拜、迷信和所有虚妄的宗教；换句话说，任何一种敬拜方式，若没有从上帝之道而来的权柄，就应当被抵制。他相信这一教义完全符合上帝的圣经，没有人会厚颜无耻地否认其中的任何一点。

然而，那些毫无信义的主教和不虔不敬的修士们却将他定为异端分子，把他的教义定为异端学说，继而宣布对他的死刑判决并焚烧他的画像予以证实。针对这一判决，诺克斯呼吁按照古老的教会法制举行一次合法的大议会；同时谦卑地请求苏格兰的贵族和平民，在这些信仰争端得到最终解决之前，为他本人，还有其他受到控告和逼迫的人士提供保护；并把这篇文章看作他清楚的呼吁书，其作用和通过庄重的仪式递交的请愿并无二致。

我们的改教者（这是诺克斯现在要去承担的角色）最近的回国之旅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这一事件奠定了日后改教运动恢宏大业的根基，诺克斯是那场运动神使用的主要器皿。有人可能会指责说，他过于轻率地放弃了自己所开创的良好局面。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姑且不去揣度诺克斯当时头脑中的思路和想法，只需要从他的决定中就可以理出头绪，看出神如何以他智慧的安排来看护处在襁褓期的改教运动以及如何指引改教者的脚踪。正如他亲自到场、不辞劳苦地推进改革一样，他的缺席对于保存这场运动也大有助益。当时在苏格兰进行全面改教的时机尚未成熟，而且修士们绝不会容忍一个满带能力、热心传播“新潮教义”的斗士在这个国家存活。通过及时的撤退，诺克斯不仅保存了自己的性命，留待将来有更好的机会再投入事奉，而且避免了逼迫的风暴临到弟兄们的头上：由于他们的老师不在国内，仇敌对他们的猜疑就少了许多；与此同时，弟兄们在私下的聚会里继续在先前领受的教义上彼此坚



诺克斯在爱丁堡的住处

固，从而使所撒下的真理的种子有足够的时间生根和扩散。

在离开苏格兰之前，鉴于缺乏牧师的帮助，诺克斯谨慎地留给弟兄们一些在他看来必不可少的指导，旨在促进彼此间的造就。他显然不满足于仅仅在口头上传达这些信息，于是将它们付诸书信——这封信要么是他离开前留下的，要么是从迪耶普寄出的——并送到各处他曾讲过道的地方，由弟兄们传阅。在信中，他热情地鼓励在每个家庭里过敬拜生活，进行信仰教导。他建议说，那些属于不同家庭的信徒应该每周聚会一次（如果可能的话）。在聚会中，他们应当以认罪开始，并献上祈求神圣祝福的祷告。在读完一段圣经之后，如果哪位弟兄对此有任何劝诫、解释和疑问，就可以发言；但发言者的态度必须谦逊质朴，目的是为了彼此造就；应小心避免“冗长繁琐的言辞、令人费解的诠释以及逞强好胜的推理”。如果在诵读经文和聚会的过程中碰到无法解决的难题，可以在散会前记录下来，然后递交给有学问的人评断。诺克斯表示，若有需要，他随时愿意告诉他们自己的建议和观点。最后，应该以祷告结束聚会，正如开始的时候一样。事后证明，以上的指示均得到了正确的遵行。因此这封信被视为改教运动正式确立之前，有关苏格兰新教教会之情形的重要文献。

在他的信件中，有几封是对苏格兰弟兄们所提交问题的答复。提问者通常是对信仰很严肃的人士，他们对圣经有一定了解之后，开始对某些表达感到困惑和无所适从，不知道怎样才能将其中的某些指示应用到自己的处境中。这些问题显示了提问者刨根问底和忠于良心的态度，但同时也表明了普通基督徒在没有教师帮助下举步维艰的不利情况。我们的改教者所作的答复显示了对圣经非同一般的熟悉，在经文解释上的灵活运用以及在良心问题上给予建议时的审慎态度；一方面制止了疏忽大意的危险倾向，另一方面也避免了不必要的顾虑和过度的僵化刻板。

诺克斯在收获季节秋末到达了日内瓦，并接受了当地英格兰会众的任命，服事他们有两年的时间。这段短暂的日子是他生命中最

恬静的时光。家庭的温暖和关怀使他经历到从未有过的慰藉和医治，这也是他常年病痛的身体所特别需要的。在日内瓦期间，家中添了两个儿子。他所牧养的教会人数不多，但却充满了诚挚友善的气氛，信徒对他爱戴有加。诺克斯和他的同工克里斯托弗·古德曼(Christopher Goodman)住在一起，二人情同手足。与加尔文以及其他日内瓦牧师的友谊也让诺克斯欢乐无比。他对于这座城市所建立的纯正宗教十分满意，因此向英格兰国内的信仰同道极力推荐，劝他们逃往日内瓦这座最好的基督徒避难所。在给友人洛克(Locke)先生的信中，诺克斯写道：“我曾经希望，现在仍然希望上帝会喜悦我介绍你来到此地；我可以放胆无愧地说，这座城市是自使徒时代以来地上有过的最完美的基督学校。我承认基督在别处也得到了传扬；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地方像日内瓦这样，在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上有如此真实的改变。”

然而，个人膳宿的享受、思想交流的愉悦、家庭幸福的温馨，这一切都不能减弱我们的改教者心中的激情，也无法干扰他的决心：一旦有机会在本国的同胞中推行宗教改革，他将重返苏格兰。在一封写给爱丁堡的朋友们、所署日期为1557年3月16日的信中，诺克斯表白说：

我自己的意向和每天的祷告是，我不仅要拜访你们，而且盼望在你们中间喜乐地结束这场争战。我向你们保证，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你们当中有一群人召唤我回国事奉，其数量超过我现有的会众，那么靠着上帝的恩典，没有什么事情——包括对刑罚和死亡的恐惧——能够拦阻我回到你们那里去。

那些被上帝的旨意兴起，为要在世上成就伟大革命的人，常常会表现出某种英勇无畏的信心以及对最终胜利的成竹在胸。凭借这种确信，他们能够经历常人无法承受的挫折而不气馁，直面让他人胆战心寒的危险而不畏惧。伟大的德国改教者路德身上常常散发出

这种热情的英雄气概（我用这个词并非贬义）。诺克斯拥有毫不逊色的类似品质。在和上封信日期相近的另一封信函中，他说道：

我承认撒旦正兴风作浪，但大能的上帝应许说，在我们遵照他的诫命所做的所有事工上，他必与我们同在；他这样行是为了自己圣名的荣耀，也是为了保守真实信仰。因此，我们不再惧怕那些敌对的势力；实际上，靠着上帝所赐的勇气，我们有审判所有敌人的权柄，无论他们是诸侯、帝王、血气之人、天使还是魔鬼。因为他们永远不能胜过我们所公开宣扬的、上帝简单明确的真理。在上帝的许可下，他们表面上可以用逼迫肉体的方式来胜过我们；但是，即或撒旦有万般伎俩，我们的信仰终必得胜。

这封信寄出后不到一个月，诺克斯在爱丁堡的房东詹姆斯·赛姆（James Syme）和另一名该市的议员詹姆斯·巴伦（James Barron）就来到了日内瓦，带来了一封由格林凯恩伯爵、罗恩阁下、厄斯金和詹姆斯·斯图亚特联名签署的信件，报告说：那些承认改革宗教义的信徒依然信心坚固。新教的敌人在国内的声誉每况愈下。拥有最高权力的执政者虽然并没有对新教徒表示好感，但也无意逼迫信徒。在这样的局势下，贵族们以自身和众弟兄的名义，邀请诺克斯重返苏格兰，并表示他们已经预备好迎接他的到来，并将付出全部的精力和财力来推进改教事业。

第五阶段

重返苏格兰（1557 ~ 1560）

第13章

重返苏格兰

诺克斯在会众面前宣读了来自苏格兰的邀请信，并呈交给加尔文和他的同工过目。同工们的意见是：“除非他存心悖逆上帝，而且对自己的国家毫无怜悯，否则他无法拒绝这一呼召。”会众一致同意，为了教会更大的益处，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个别利益。诺克斯的家人也表示默许。因此，诺克斯写信回复贵族友人，表明他将长途跋涉去探访他们。随后，会众邀请了另一位牧师代替了他的职位，并妥善安置了他的其他事务。在十月初，诺克斯和日内瓦的朋友们依依惜别，奔赴迪耶普。但当他在那里等船的时候，却收到了几封和上封书信语调完全不同的信函；信中说，经过新一轮的商议，有些人开始后悔当初邀请他重返苏格兰的决定，而大多数人则似乎犹豫不决、胆怯畏缩。

这一信息使诺克斯陷入了极为窘迫尴尬的境地。他立即给先前邀请自己的贵族回复了一封急件，严厉地责备他们的胆小怯懦和反复无常。信中写道，他刚刚在迪耶普收到的消息使他非常困惑，伤心不已。对于这次的计划，他采纳了欧洲最博学最敬虔人士的建议，既无愧于自己的良心，也满足了贵族们的心意。如果半途而废，将会给双方都带来耻辱：人们会认为，要么是诺克斯极端鲁莽自负，要么是贵族们的邀请行动过于轻率，缺乏判断力。因着自己的离开，他的家庭失去了一家之长，而且他不得不将自己的羊群委

托他人牧养（他们虽然人数不多，却是他挚爱的弟兄）。有人可能觉得这不过是小事一桩，但对诺克斯而言，若再次经历刚刚过去的离别的一幕，目睹许多弟兄姐妹的挥泪相送，实在让他难以承受。现今他打道回府，人们会问他为什么没有继续他的旅程，他该如何答复？上帝可以作证，他个人遭受的诸多不便以及在失望之余萌生的羞辱，都不是他感到悲痛的主要原因。他所担忧的是，倘若苏格兰贵族忽略了眼下将福音引进自己祖国的机会，后果将极其可怕；他们会把属灵并属世的束缚和苦难，加在他们自己、儿女、臣民和子孙后代身上。从良心的角度出发，他认为所有背负苏格兰贵族头衔的人在这件事情上都难逃其咎。诺克斯的言辞也许比较尖锐和不够慎重，但爱心是这一切的最好解释。智慧人会思量，知道一个真正的朋友不会对自己阿谀奉承，尤其在这样重大的场合——须知这不是几个人得救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民身体和灵魂的救恩。

我所有的哀恸哭泣，并心中所受的痛苦煎熬，上帝终有一天会公开证明。先前我的话又沉重又严厉，如今我还要加上几句：如果有人出于对将来危险的惧怕，试图说服你们放弃对原定目标^①的决心，那么，无论他多么富有智慧、与人为善，你们当判定他为愚人和仇敌……我知道令人忧惧的烦扰会因你们的改教计划接踵而至，正如我从前在书信里向你们说明的。但是，哦！如果人经历这一切难处是为了成就上帝借他的道所启示的旨意，那么这些逆境和患难是多么令人喜乐和欣慰呢！虽然逆境和患难在人眼中甚为可怕，但它们绝不可能完全吞灭受苦之人；因为凡是以单纯之心顺服上帝的人，上帝必会按照他的应许，以眼不能见、不可战胜的能力来支持和保守他们……你们到如今所开创的改教大业，绝不亚于摩西进到法老面前所作的壮举；因为你们的臣民——实际上是你们的弟兄——正在

① 指宗教改革的计划。

受到压迫，他们的身体和灵魂被置于奴役和捆绑之下；而且上帝已经指示你们的良心（除非你的灵性死亡，正如这个盲目的世界一样）：纵使要付出与君主和帝王对抗的代价，也当奋不顾身，对他们施行拯救。因为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你们才被称作百姓的贵胄；并且，你们得到上帝命定的尊荣、称赞和尊敬，不是因着你们的出身和血统（大多数人如此错误地认为），而是因着你们的职分和责任——就是最大限度地使用你们的权力，为你们的臣民和弟兄伸张正义，拯救他们脱离所有的暴行和压迫。

在向唐县的厄斯金、碧塔罗的威沙特和其他几位绅士发出了和上文语调类似的信件之后，诺克斯决定在法国内地逗留一段时间，希望能够收到从苏格兰传来的较为乐观的消息。改革宗教义很早就传入了法兰西王国，并且被许多殉道者的鲜血所浇灌。所有野蛮残暴的镇压并不能根除信仰的种子，也无法阻止它在所有阶层的传播。当时巴黎的新教徒正在一场屠杀的余波中饱受折磨；在内战开始前后，这些杀戮使罗马天主教在这个国家的声望大跌。新教徒在私人家庭中聚集礼拜的时候，往往会受到仇敌的袭击，并被施以极其残忍的暴行。逼迫者还不解恨，又效法自己异教徒的祖先，炮制穷凶极恶的诽谤来中伤新教徒，四处散布谣言，污蔑他们在聚会中犯下了最邪恶无耻的罪行。针对这些恶毒的控告，无辜的受难者为自己起草了一份申辩书。这份材料也传到了诺克斯手中，被他翻译成英语，并加上了序言和附录，旨在出版后可以供他的同胞使用。

掌握法语之后，诺克斯结交了不少法国新教徒，并在穿越该国的旅途中偶尔向他们讲道。他在罗谢尔市（Rochelle）讲道时先介绍了自己祖国的情况，之后告诉听众，他希望在几年之内重返爱丁堡的圣贾尔斯教堂（church of St. Giles）讲道。他在流放生涯中多次拜访迪耶普，但是否在那里找到任何新教徒则不得而知，至少我从他的信件里没有获得任何线索。也许他找到了，因为在17世纪

早期新教徒在该地已拥有了一间人数众多的教会。

鉴于一直没有收到任何鼓舞人心的消息，诺克斯决定暂时放弃返回苏格兰的计划。这一决定不太符合他惯常的坚毅作风，历史书一般对此也没有说明原因。其实，新教贵族并没有撤回他们的邀请；诺克斯收到的那些消极书信都是出于个人之手，并没有经过他们的任何授权；而且，假若他们的热心和勇气开始减弱，那么诺克斯就更有必要亲自到场给他们打气。根据他写给老友私人信件，我们能够更全面地明白他撤退的动机。诺克斯深知，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斗争和冲突将不可避免；他在苏格兰的露面必然激起教士团体的狂怒，后者将会倾尽全力摧毁他们的对手，为要保住有利可图的腐败体制；可以预见，随之而来的将是国内的不和、混乱和流血。这些灾难的前景在他的脑海中涌现，使他实施回国计划的决心动摇——尽管他先前判定这一计划合理合法、值得赞许、大有必要。他写道：

当我听说麻烦在那个王国出现时，我开始和自己争论：“在一个宣布彼此开战，骚动有增无减，即将天下大乱的地方，可以传讲那位平安、和谐、宁静的创造者——基督的美名吗？难道人们不会将所有接踵而至的灾难都归咎于他的福音吗？当看到一半的国民起来与另一半争战，彼此戕害的时候，你能得到什么安慰呢？然而，首要的问题是，假若自己的祖国落入外敌之手，陷入所有人认为不可避免的厄运中，因为那些应该捍卫她的尊严和自由的人是如此盲目、愚钝和顽固，以至于看不到临到自身的毁灭——当你亲眼看到这一切，你的心还能有任何喜乐吗？”

“诸如此类的想法和更明智的深思熟虑”（这些念头在他回到日内瓦后继续困扰他数月之久），是诺克斯放弃苏格兰之行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他确信以上理由并不足以为自己中止计划的行动辩护，因为这一计划有许多强有力意见的支持。“但是，唉！对于



爱丁堡的圣贾尔斯教堂

一个受伤的人而言，即便他再精通医学或手术，也无法立刻减轻自己的疼痛和悲哀。同样，我也无法减轻心中的惧怕和忧伤，尽管我很清楚必须要做的事情。某些弟兄的疑惑和冷淡的文字确实增加了我的苦楚，并在某种程度上让软弱的我更加气馁，但主要罪责仍须由我自己承担。”至于诺克斯放弃此行的次要原因，我不得不再次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到上帝智慧的护理：上帝在他的道路上放置了障碍，使他返回苏格兰的计划被迫耽延了一段时期；如果他提前回国，将可能产生有害的后果；但若在上帝安排的时刻回国，那么将对心中所怀的伟大事业有最大的助益。

在离开迪耶普之前，他给苏格兰发了两封长信。第一封签署的日期是1557年12月1日，发给全体新教徒；另一封的日期是12月17日，发给贵族阶层。如果要评估诺克斯在推进改教运动一事上的影响力，我们不仅要看到他的个人劳苦，还要察看他和本国同胞之间长期的书信往来。通过这些联络，他可以在自己不在时教导他们；当出现难题时，可以向他们传达自己的建议，以及周围博学之士的意见；同时也激励他们持守信仰、恒久忍耐。在这些方面，以上的信件颇具代表性，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在两封信里他都谨慎地避免提到近期令自己大失所望的事件。

在第一封信里，诺克斯谆谆教导信徒的道德生活应纯洁，并且警告所有认信改革宗的人们远离毫无约束的生活。有两类人借此问题大做文章，毁谤新教的声誉。一类人是教皇派，他们指责道德生活的败坏是新教教义在本土所结的果实，尽管同样的罪恶现象在他们中间早已登峰造极。另一类人来自一个新的教派，他们反对迷信，也曾归属新教阵营，但后来却离弃该阵营，其敌视改革宗团体的程度不亚于教皇派。诺克斯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就是告诫新教徒警惕后一类人的伎俩，并揭露他们的主要错误。

诺克斯提到的后一类人一般被称为重洗派（Anabaptists）。马丁·路德在德国发动宗教改革后不久，该教派开始兴起，并迅速爆发为极端激进的群众运动，在各地制造暴力和混乱。重洗派在德国

被镇压后，扩散到其他国家，通过标榜严肃认真和简化信仰来秘密发展信徒。在昙花一现的强劲势头过后，此教派起初特有的骚动和宗教狂热情绪开始逐渐平息下来。伟大的革命往往伴随着这种过度迸发的泡沫现象：当人的心思在突如其来的强光照耀下目眩神迷，并且从世俗和教会之专制暴政的重重羁绊下得到释放的时候，常常会倒向另一个极端，落入无政府主义和过度放纵的误区。没有什么比这些事更让改教者感到忧心烦恼了。旧体制^①的辩护者以此为把柄，用来反对任何突变；许多原本对改革抱有好感的人士，也因为这个可怕幽灵的出现而惊恐不安，急忙打退堂鼓，重新缩回到天主教会的神圣栅栏之内寻求庇护。

我在著述本书的时候，通过考察这个激进教派发展到今天的模式，总结出其谬误在于将属于基督徒和基督教会的某种完美主义和灵修神学变成了愚蠢自负的幻想。他们从本质上偏离了原初的理念。同时，他们又和犹太教会^②划清界限，认为后者不过是今生世俗的团体。因此，他们很自然地倾向于删减那些界定信仰和生活方式的规条，将自己几乎完全局限于新约范围之内。并且在婴儿受洗的非法性、民事行政管辖权、国家教会、发誓以及防御性战争等诸多问题上，都采纳他们自己的主张。但是，除了这些观念以外，重洗派在当时主要受到亚流主义和伯拉纠主义（the Arian and Pelagian heresies）^③这两种古老异端的影响。重洗派和教皇派臭味相投，

① 指罗马天主教制度。

② 原文是“Jewish Church”，此处指信奉旧约传统的犹太教团体，而非指使徒行传中的以犹太人为主的早期新约基督教会。作者在这里用“Church”一词是根据其自身的神学立场；按照改革宗的“圣约神学（Covenantal Theology）”传统，上帝在旧约时代的“教会”就是指犹太民族。

③ 亚流主义（Arianism）：代表人物亚流（Arius of Alexandria, 256 - 336）曾是北非亚历山大教会的长老。该派主张耶稣在万古以前（不是永恒里）被神所生；和神相比，耶稣有不存在的时候，在神性方面像神，但比神低一等。耶稣也不是人，地位远远在人之上，比亚当还早。这种理论的目的本是为了维护独一神论，却把耶稣讲成既不是人也不是神，而是介乎神人之间的某种半神（Demigod）；因此，耶稣并没有绝对的神性，而仅为一个最高级的受造物。这明显不合圣经启示。亚流主义的思想曾（转下页）

对于改教者宣称的预定和恩典 (predestination and grace) 的教义极为反感，并大肆攻击。

诺克斯在英格兰和欧陆的时候曾和这些重洗派信徒打过交道，了解他们放纵和危险的信仰原则。得知后者正在潜入苏格兰，诺克斯担心他们会用诡诈的手段去毒害弟兄们的思想。他驳斥了重洗派在教会团契上的观点，指明他们所要求的纯洁程度在教会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无论是在圣经正典形成之前还是之后。针对他们所持的伯拉纠派观点，诺克斯作出了以下阐述：

如果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上帝没有预定和安排的，那么他的智慧和统管就有欠缺；如果在天上或地上曾经发生、或以后应该发生的某些事情，是他不可以阻止的（如果这是他向来所喜悦的），那么他就不是全能的。如果否认上帝具备以上三种属性，即智慧、自由统管和全能，请问他的神性还剩下什么？我们所承认的是：上帝拥有至高的智慧，甚至可以迫使撒旦的恶意和在罪中沉浮之人的可怕恶行，来为他的荣耀和他的选民的益处效力。我们相信并且告白，上帝拥有无限的能力，天上地下任何受造之物都无法与他的能力抗衡。我们也承认，上帝

(接上页) 蒙骗过许多信徒，并使东方教会陷入剧烈的纷争之中。公元 325 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 (Council of Nicaea) 将亚流主义定为异端，并产生著名的尼西亚信经 (Nicene Creed)，保护了正统教义。该派对现代西方的影响主要是耶和華见证人会 (Jehovah's Witness)，他们篡改圣经，贬低耶稣的神性，否认耶稣的人性，只承认耶和華是至高神，具有唯一位格，是完全错误的教义。伯拉纠主义 (Pelagianism)：伯拉纠 (Pelagius) 是罗马帝国时期不列颠的一位修道士，具有无可指摘的品格，性情温和。他于公元五世纪初崭露头角，提出有关人和救恩的教义，并一度在罗马贵族圈成为极受古尊重的基督教教师与顾问。他倡导严厉的道德苦修主义 (受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影响)，不容许以人性软弱作为借口。他认为神既要求人圣洁与完全，人就必定行得出来，因为神的创造已经赋予人完成任务的本性。他注重人的道德责任，主张人对自己的救赎有主动权。伯拉纠起初在罗马推行他的见解；他的门生色勒斯丢 (Caelestius) 将此思想介绍到北非的教会中，由此引起了希坡主教奥古斯丁 (Augustine, Bishop of Hippo, 354 - 430) 的反对和驳斥。奥古斯丁有关恩典、预定以及完全堕落的思想与伯拉纠主义产生了尖锐分歧。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原罪和自由意志。

随己意行万事，统管万有；当审判之日，没有什么受造之物胆敢在他面前辩论，或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他们可憎谬误的根源在于，除了他们愚昧的头脑所能理解的事情之外，他们概不承认上帝公义的属性 and 作为。神若许可，我们当为他们乞求更多悔悟的机会。

诺克斯警告弟兄们要特别防范这些假教师的诱惑。他们打着敬虔生活的幌子，在禁欲苦修的掩盖之下，“将基督尊贵的地位取而代之”，并且“对信靠基督之血白白称义的真理极为敌视”。教皇派的恶毒用心已昭然若揭、举世皆知；那些唯利是图的教师和不虔不敬的学者的假冒伪善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真实的宗教一旦被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真诚信奉，公然的暴政就不可能将其镇压和取缔。“但骗人和错误的教义是致命的毒物，一旦蛊惑人心并被接受，日后很难清除干净”。故而，诺克斯恳求弟兄们要“试验临到他们的诸灵”，并禁止任何人未经考验毛遂自荐就担任讲道者的职位、私下聚众领会；唯恐撒旦乘机将他的使者混入他们中间，为要“毁坏我们天父上帝耕种的田地”。诺克斯的警戒收到了果效，苏格兰的新教徒没有受到重洗派论调的迷惑，他们在教义、敬拜和纪律上保持合一，观点一致。

他写给新教贵族的那封书信洋溢着热烈和高贵的敬虔气息。他竭力净化他们的心思不受自私和属世原则的浸染；他向他们介绍教会历史（而非世俗历史）上著名的君主和英雄们的崇高事迹，来唤起和洁净他们的动机与基督徒的身份相符。他们应当全心关注、持定不变的目标是上帝的荣耀、耶稣基督国度的扩张、他们自身和弟兄们的得救以及将他们的国家从属世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荣耀和尊大，或为了微不足道的私人恩怨而争斗不休。

在那封信里，他对于是否抵制最高执政者的微妙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苏格兰贵族曾向诺克斯咨询此事，他将其提交给欧陆最杰出的学者，求问他们的意见。在年幼的苏格兰女王和法国皇太

子联姻后不久，苏格兰人开始对法国宫廷窥觊本国的自由和独立的企图感到忧心忡忡。特别是当摄政大权移交给太后以来，他们的猜疑之心与日俱增；因为太后全心热衷于迎合法国的利益，并且以各种借口让一支法国军队驻扎在王国之内。要激起苏格兰贵族们的反抗之心并不是一件难事；这些贵族独立自主，生性傲慢，即便对于本土血统的君王，他们的顺服通常也是极其有限和不稳定的。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就是明证：在和英格兰的战争中，贵族们拒绝配合，因为他们视这场战争只不过服务于法国的利益。我们的改教者对此如何应对呢？他是否抓住这次机会，去煽动贵族们暴躁易怒的性情呢？他是否说服他们去加入对政府法令心怀不满的阿伦伯爵等人的阵营，用后者的方式来推进他们的改教事业呢？不，恰恰相反，诺克斯写道，谣言正在欧陆传播，说苏格兰将要发生一场叛乱。他严肃地告诫所有皈依新教信仰的人不可加入其中；并要他们谨慎，不可支持那些为了属世的晋升和其他私人目的而试图扰乱政府的人。贵族阶层是国民自由权利的护卫者；作为臣民，对执政掌权者的顺服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他们可以不必顺服；但不应该用对抗来解决问题，除非局势在专制暴政的压力下走向极端。他们应当对自己的一举一动审慎小心、考虑周全，这是他们不容推卸的责任，免得敌人伺机指控说，他们打着宗教信仰的幌子煽动叛乱，图谋造反。故此，诺克斯的建议是，他们应当恭敬本分、甘心乐意地顺服所有合法的命令，同时通过谦卑和反复的请求，努力博得最高当局的接纳和重视，并设法促使执政者愿意采纳——至少不要逼迫——他们所发起的改教事业。倘若所有这些尝试都告失败，摄政太后拒绝实施公共改革，那么他们应当做好准备，坚持传讲福音，并继续在弟兄们中间主持圣礼。倘若政府企图使用专制和暴力手段来镇压弟兄们，那么身居高位的贵族们不仅有合法的权利，而且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挺身而出，去保卫他们的弟兄。“遵守法纪的顺服和出于恐惧心理对君王的奉承，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如果君王所要求和图谋之事旨在毁灭全体国民的公共利益，那么去成全他们的欲望是极不公正的行为。”

第 14 章

著述惹风波

诺克斯于 1557 年年底返回了日内瓦。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和教会里其他几位学者一起致力于出台一部新的英文译本的圣经。鉴于它在这座城市诞生和首次印刷，所以该版本被命名为《日内瓦圣经》（*Geneva Bible*）。也是在这段时期，诺克斯出版了《致摄政太后的信》（*Letter to the Queen Regent*）与《呼吁和警戒》（*Appellation and Exhortation*）；这两本著作都被传到苏格兰，为改革宗思想的广泛传播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我已经对第一本小册子作过介绍，该书的主要意图在于消除天主教徒的偏见。第二本小册子的主旨在于教导和鼓励那些对改革宗信仰抱有好感的人士，特别是写给贵族及社会主流阶层。诺克斯在文中指出，关怀和改革宗教信仰属于民事行政官的工作，是他们的首要职责之一。这既是自然的原则，也是启示的原则；他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免得让人觉得他似乎在暗示说，苏格兰的达官显贵“对于上帝的宗教之关心程度，甚至还不及异教徒对于偶像崇拜的态度”。下级的地方行政官（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王国的贵族和主流阶层以及君王和诸侯，都必须担负这份重责大任。诺克斯然后又转向苏格兰的平民大众，结合当时引起骚动的重要争议，指出他们的责任和利益所在。他们是有理性的受造物，按照上帝的形象构成；他们的灵魂须要拯救；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他们必须对信仰的真理作出

判断，并公开承认——这也是君王、贵族和主教所当行的。如果偶像崇拜照旧盛行，如果福音信息受到压制，如果无辜之人被杀流血，而他们对此依然保持缄默、没有竭尽全力去制止这些邪恶，他们怎能为自己开脱罪责呢？

然而，诺克斯在这一年出版的最非同寻常、引起强烈反响的著作，是一篇题为《吹响反对女性丑恶统治的第一声号角》(*The First Blast of the Trumpet Against the Monstrous Regiment of Women*，以下简称《号角》)的专论。文中他对准许女性治国掌权的惯例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早在玛丽上台成为英格兰女王时，他对这种不合适的惯例就有了看法。这可能是他在1554年和瑞士神学家商讨的问题之一。从他1556年写的一封信里，可以确知在当时他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然而，考虑到其他人的意见，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将其公之于众。但是，“血腥玛丽”的暴政最终激怒了他，他再也无法忍受女王有增无减的残酷行径，于是将号角举到嘴边，吹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提升一位女性来统治、凌驾、管辖和治理任何一个王国、政府或城市，这是与自然本性相冲突的事情，是对上帝的傲慢无礼，并且完全背离了他所启示的旨意和公认的训诫；最后，这是对所有公平和正义的颠覆。”这段引言就是该作的篇首语和主题。诺克斯为了证实此观点而举出了如下论据：正如女性肉体 and 心智上的弱点所表明的，造物主的本意是要女性隶属于男性，而不是凌驾于男性之上；当第一对男女受造之时，上帝所宣布的法则很清楚地赐给男人管辖女人的权利，并且命令女人服从男人；犹太人中间不允许女性掌管政权，如此有违使徒的教训；如此会导致政府的堕落，以及许多邪恶有害的后果，等等。

有关这一主题，诺克斯所说的远远不是什么新颖的见解。古时自由国家的宪法，以及这些国家的立法者和哲学家的权威，都为他的观点提供了支持。在法兰西王国，法律明文规定女性被排除在王位继承的人选之外。爱德华六世在去世前不久，曾向枢密院提议采纳相同的法律；但由于这一提议不符合诺森伯兰公爵满怀野心的盘

算，所以遭到否决。尽管诺克斯的观点有很高权威的认可，但他对于自己的举动能否得到接纳丝毫不抱有乐观的期望。在前言中他告诉我们：面对本篇檄文，那些热心支持该受谴责之惯例（指赞同女性执政）的人们肯定会愤愤不平；文中大胆的攻击也会让学者圈子里出身高贵、温文尔雅的人士感到惊恐不安，并招来他们的指责。诺克斯毫不怀疑自己被称作一个“专好问难，恶意捣乱，传播煽动性的言论，迟早哪天要叛逆谋反的人”。但是，为了宣讲自己深信不疑的真理，他决心“蒙上眼睛，捂上耳朵”，不理睬这些威胁和诽谤。不出诺克斯所料，这篇专论使他遭到两位女王的怨恨；而他将会在她们的执政期内度过自己的余生；其中一位是他本国的女王玛丽，另一位是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后者对苏格兰的影响力不亚于任何前任君主。流放者当中有些人对诺克斯的看法表示赞同；当《号角》出版时，极少有人觉得文中的观点会令他们感到不快。但是，由于这篇著作刚一露面，“血腥玛丽”就去世了，他的妹妹伊丽莎白继承了王位，所以，诺克斯的观点开始遭到众人强烈的反对。

约翰·福克斯（John Foxe）给诺克斯写了一封信，以非常友好的口气向他提出忠告，指出这篇著作的出版不合时宜，而且言辞太过严厉。诺克斯在回复中承认自己“用语激烈粗犷，某些判断缺乏深思熟虑；这些问题更像是出于愤怒的情绪，而不是出于热心和理性。”但他同时表明对自己主张的要点仍然确信无疑。

诺克斯最初的意图是想三次吹响他的“号角”，继而在最后一次声讨的时候署上自己的名字，以免非难落到别人身上。但是，当他发觉这篇檄文得罪了很多弟兄，而且自己的本意是要巩固伊丽莎白的政权，而不是使她失势，所以他放弃了实施计划的念头。他一直到最后都保留自己的看法，尽管他仍然被对手的谴责和胜利所激怒，并且有时在私人信件中暗示说，如果他们再不收敛的话，自己将打破沉默，但他始终克制自己没有作进一步的公开宣告，也不再答复他的对手。

在1559年期间，出现了一篇针对《号角》的回复文章，标题是《忠信臣民的避难所》(*An Harbor for Faithful Subjects*，以下简称《避难所》)。虽然是匿名作品，但正如《号角》的作者不难被人查明一样，很快人们就知道这是出于约翰·艾尔默(John Aylmer)之手。此人是寄居欧陆的英格兰流亡者之一，曾担任过斯托(Stowe)的执事长，以及简·格雷女士的私人教师。这篇文章是在伊丽莎白登基之后才开始起草，并且(按照艾尔默的传记作者的说法)“经过了流亡团体的商议，旨在获取新任女王的好感，除去女王对他们及其新教信仰的猜忌”。这一因素和其他的一些事件引起了诺克斯的怀疑；他认为艾尔默将教义和时势调和，并且通过迎合新任女王的虚荣心和对权力的喜好，来博取她的欢心。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诺克斯因其直言不讳和公正不阿受到称赞，那么艾尔默则在谨慎明智上胜人一筹；后者由此得到了伦敦教区主教的职位，而前者若想获得再次踏上英格兰国土的许可，也要大费周折。如果不是因为“血腥玛丽”的暴政，诺克斯的《号角》也许永远不会吹响警报。同样，如果不是伊丽莎白继位带来的吉兆，艾尔默的《避难所》可能永远不会对“忠信的臣民”开放。

然而，这一切并不会影响到问题本身的价值。这里我不想对此题目作详细的考察。近代对于治理政府的模式的变化，使该问题的实际意义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要。在诺克斯所处的年代，政府的成败与在位君王的个人才干和所作所为休戚相关。另外，在不列颠的立宪政体下，女性统治附带产生的邪恶，较之一个纯粹和极权的君主政体衍生的邪恶要少得多。这一点正是艾尔默所力推的主张；他对此所作的辩论非常具有说服力。《号角》的内容组织显得仓促草率，相比之下，《避难所》则经过精心构思而成，其中收集了不少和问题相关的历史事实。尽管这部作品夸张的修辞手法较其准确的逻辑表达更为出色，但全文论证可谓天衣无缝，偶然穿插的幽默更是点睛之笔。从总体上讲，这是一部细致严谨、不可多得的佳作。

毕竟，当命题是作为治理政府的一般原则而立论时，为维持既有惯例的方便权宜辩护（这些惯例历来受到法律和习俗的认可），要比支持该命题的观点容易得多。公平地讲，艾尔默是否驳倒了对手的主要论点尚未可知。假如诺克斯有意参与答辩，他也许会指出艾尔默论据中的几处错误。在针对使徒书信某处观点（《圣经·提摩太前书》2章11-14节）的答复中，这位执事长显得极为困惑。他对于“教会职责”（ecclesiastical function）的较大职分和“外部策略”（external policy）的较小职分之间的区别表示怀疑，并认为使徒的禁令是暂时的，而且只适用于处于使徒时代的妇女。他坚信女性群体不应该被完全排除在教会的教导和管理事务之外，在政府中也同此理。他非常严肃地说道：“据我看来，在禁止她们（指女性）服侍基督的事上，我们必须适度而行，不可趋向极端。请思考一下，在英格兰境内，难道就没有女性能够像当地最优秀的某位爵士一样，以智慧和学识向自己的家人和邻舍讲故事吗？”那位富有学识的伊丽莎白既然能够指教自己礼拜堂的主教大人“讲道不要跑题”，那么有谁会怀疑她能够和身边的教士们一样，写出优秀的讲章呢？当她为自己写了一本祷告书，而教士们却不得不用为他们定做的公祷书，请问有谁会质疑女王在其他的责任上比他们更加称职呢？实际上，艾尔默就那段经文发表的观点对于维护女王的权柄是非常必要的；女王是教会的元首，也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按照法律，她对境内所有的大主教和主教等神职人员拥有至高的权柄，在所有的教会职责上有权对他们进行监督、停职和控制。她可以颁布命令，指示首席主教何时讲道以及如何讲道。她能够随心所欲地批准和停止牧师事奉的资格。和男性一样，女王当然有同样的权利去承担和履行这一职分，倘若她选择这样做的话；但她确实又必须受到使徒禁令的适度约束：“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①

^① 语出《圣经·提摩太前书》2章12节。

《避难所》中有一些内容本来可能会引起女王的不快，幸好作者在下结论之前刻意用足够多的笔墨向女王恭维奉承，这些话对伊丽莎白及同等地位的女性都十分受用，从而缓解了那些敏感的内容。考虑到这位好心的执事长慷慨陈词，竭力为女性执政的权利辩护，女士们肯定会乐意原谅他一点小小的笔误；然而，她们很难相信，以下对女性的描述居然也是出于艾尔默之手。他说他用的词是“有一些女人比许多男人要更加睿智、博学、贤明和坚定”，但是其他的（艾尔默的传记作者说他用的词是“绝大多数”）女流之辈在他的笔下被描写为“盲信、愚蠢、任性、放荡、碎嘴饶舌、懒散轻佻、摇摆不定、轻率无知、缺乏审慎、意志薄弱、鲁莽粗心、骄傲、挑剔、扭捏作态、搬弄是非、打探隐私、制造谣言、恶言恶语、糊涂不堪，总之，她里里外外塞满了魔鬼污秽之物的渣滓！”《号角》作者的直率已经够让人吃惊了，但其对女性所用言辞的不敬程度，还远远不到以上引文的一半。人们会认为，艾尔默可能已经否认了为性别平等充当倡导者的角色，并且放弃了在此问题上所持的原则；正如他在主教的头衔和收入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态度一样。在从流放地回到英格兰之前，他曾猛烈地抨击和痛骂主教制；但回国之后，他却毫不犹豫、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主教职位。当被问到如何解释以前发表的激烈言辞时，他为自己辩护说：“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① 这些都是题外话，以下让我们言归正传。

诺克斯写给苏格兰境内新教贵族的书信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再一次鼓舞了他们消沉的士气。他们于1557年12月在爱丁堡举行了一次协商会议，一致决心要彼此扶持，尽心竭力推进宗教改革。在共同签署了一份庄严的誓约之后，他们再次向诺克斯发出了邀请。由于担心诺克斯可能会因为上次贵族们的优柔寡断而犹豫不决，他

^① 语出《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11节。

们又给加尔文去信，希望借他的影响力促使诺克斯同意。他们的信直到 1558 年 11 月才到达日内瓦。一些后期所写的信件也随之一同寄达诺克斯的手中。这些信函传递了同一个的消息，都论到改教事业的进展和持续兴旺的势头。

第 15 章

忍辱负重

借助我们的改教者于 1556 年年初在苏格兰停留期间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对其留下之教训的贯彻，新教徒们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在全国各地自发形成了很多聚会团体，有的较为隐秘，有的则较为公开。由于在坚决退出天主教礼拜一事上达成共识，他们努力尝试在环境允许下，为大家提供最好的信仰教导和相互造就的条件。鉴于没有牧师，有一段时期他们无法施行圣礼，但有一些智慧和敬虔的人被挑选出来，在聚会中为大家诵读圣经、发言劝勉并献上祷告。弟兄们深信有必要在团体中建立次序和纪律，并希望尽可能遵照基督设立的制度将会众组织起来。所以下一步他们开始选举长老来察验会众的信仰生活；会众也作出了服从长老的承诺。然后又选出了执事，负责收集救济款项并向穷人发放。爱丁堡是首先建立聚会次序的地方，而在邓迪镇，第一间改革宗教会被完全组织起来，其中有一位常任牧师，并且能够施行圣礼。

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自 1556 年秋天爆发的战争一直延续到第二年。在此期间，新教徒享受到很大程度的信仰自由；再加上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们的人数迅速增长。威廉·哈洛（William Harlow）、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保罗·梅斯文（Paul Methven）以及再次从埃姆登（Emden）归来的约翰·威洛克，都开始以更加公开的方式在王国各处讲道。教皇派的教士们对这些举

动自然不会等闲视之，他们满心希望采取封杀行动，并说服了摄政太后下令召见新教传道人。但西部地区贵族的干涉迫使太后放弃了针对他们的计划。最后，教士们决定重新启用自1550年以来就废止的那些残酷法令（那些法令之所以被废止，是因为王国的政治环境使然，并不是因为教士们的仁慈宽大和适可而止）。1558年4月28日，圣安德鲁斯大主教将一位年迈的神甫沃尔特·米尔恩（Walter Milne）烧死在火刑柱上，而后的行为实在无关宏旨。主教又以异端的罪名，传唤一些人来出席在爱丁堡召开的教士大会。

这一残暴和非法的处决行动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它标志这个国家的恐怖行径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可以确信的是，摄政太后在当时并没有参与策划这起事件，所以民众的愤怒情绪完全指向了教士团体。从前人们因为尊重既有秩序而谨慎低调，心怀顾忌；如今他们抛开了所有的惧怕和约束，公开聚集参加改革宗的礼拜，并甘愿冒任何风险，大胆承认持守新教信仰的决心。新教领袖们通过正规和恭敬的方式向摄政太后呈递了抱怨信，一再恳求她运用手中的权力，并协同议会的力量，制止教士们的野蛮举措，矫正教会中公然盛行的种种令人难以容忍的丑恶弊端，以及准许新教徒团体拥有信仰教导和敬拜的自由——至少可以从某种暂受限制的自由开始。他们向太后递交了一份限制性的方案，并表示愿意服从这一方案，直到他们的冤情得到慎重的调查和补偿的那一天。摄政太后答复说，她对于他们的提议抱有好感，并承诺一旦能够全权处理，就会采取合法措施将这些提议付诸实际；而且，在此过渡期间，他们可以寻求她的庇护。

面对这份从国内发来的充满善意的邀请，实在不需要耗费太多的口舌去说服诺克斯作出同意的决定。他立即开始为赶赴苏格兰的旅行做准备，并花了一些时间去妥善安置自己在当地所负责的会众。当英格兰女王玛丽的死讯以及伊丽莎白继位的消息传来，新教流亡者匆忙动身回归故土。日内瓦的会众聚集在一起，为上帝的解救献上感恩；大家都同意差派一位使者带信给欧陆各处的弟兄们

——尤其是法兰克福的肢体，就最近令人兴奋的转机向他们表示祝贺，同时请求他们确认之前已经发起的相互和解行动，埋葬所有过去的冒犯；以兄弟般的彼此合作，共同致力于解决英格兰的宗教问题——这也是所有对宗教改革抱有真诚和良好祝愿的人所一致盼望的。当日内瓦的弟兄们收到了对方赞成的回信后，他们辞别了这座热情好客的城市，启程前往他们的祖国。诺克斯托他们给自己以前的朋友捎信（这些朋友如今在伊丽莎白的宫廷里任职），请求批准他在返回苏格兰的途中可以借道经过英格兰。

1559年1月，我们的改教者最后一次告别日内瓦。临行前，为了表达对他一贯的尊敬，日内瓦政府特别授予他市民权。他把妻子和家人留下，直到确认苏格兰的环境足够安全的时候才将他们接走。三月中旬，他到达了迪耶普，得到消息说英格兰政府拒绝给予他穿越国境的许可。考虑到自己从前在那个国家的身份以及此番旅行的目的，诺克斯以为这一请求再合理不过了；他甚至想不等正式的批准下达，就直接动身到伦敦去。然而事实上，那些帮他呈递过境申请的人好不容易才逃过了被捕入狱的命运。

这一不太明智的严厉举措起因于某些流亡者提供的信息。这些人对于法兰克福的宿怨仍然耿耿于怀，所以将矛头指向诺克斯，以及所有在日内瓦由他牧养的信徒，控告他们对女王怀有不忠之心和不满情绪，并且都是诺克斯发表的反女权主义观点的信奉者。倘若说诺克斯出版这本易招非难的书，是因为他老早就预见到伊丽莎白会上台并以她为攻击对象，这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只要有正常判断力的人都不会像煞有介事地认为诺克斯和他的追随者会对女王的政府产生任何威胁；因为他们和其余的弟兄们一样，对女王的登基感到由衷的喜乐。如果说他在那部作品中出言不慎，“以偏概全”，那么他的失误（用该书回应者的话讲）“并不是出于恶意，乃是出于热心；其撰文的动机是因为过分注目于当前的残暴行径，而忽略了以后由此衍生的麻烦”；执政者应当以慷慨睿智的态度宽容这样的过失。然而，伊丽莎白和她的顾问却认为控告者所列的罪状非常

严重，从而采取了严厉和蔑视的手段对待被指控的人士，以至于让他们后悔当初不该为了回到故土而离开了国外的庇护所。政府的这一无理行为因着以下的事件显得更加不可原谅：当时许多在“血腥玛丽”执政期间助纣为虐的人居然都重新得宠，没有受到任何冲击；甚至连臭名昭著的邦纳（Bonner）也受到朝廷召见，而且体面的卸职回家。

得知过境请求遭到拒绝，而且他的羊群^①受到苛刻的待遇，性格急躁敏感的诺克斯有些按捺不住了，心中油然而生一股念头，想重新拾起以前决意放弃的那场论战，将其进行到底。他勉强克制自己，才压下了这一时的冲动。然而，一些更崇高的计划占据了他的心思。其实，诺克斯希望穿越英格兰，既不是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也不是出于在宫廷抛头露面的虚荣心，而是出于拜访当地老朋友的正常想法。他迫切地希望有机会寻见昔日曾听过自己讲道的会友——尤其是纽卡斯尔和伯威克的弟兄姊妹，并再次和他们交谈。但是，他的心中还牵挂着一个目标，事关英格兰和苏格兰双方的利益。

尽管诺克斯从苏格兰同胞那里听到的都是对摄政太后的溢美之词，认为她倾向于赞同改革，而且诺克斯也回信指示他们继续争取太后的支持，但他心中一直对太后的宣告是否真诚感到怀疑。当他离开日内瓦之后，这些怀疑得到了证实。他在途经法国时获取的消息，和他后来从苏格兰收到的情报不谋而合；这一切使他相信，苏格兰国内对改教运动的镇压已迫在眉睫，而且镇压的风暴会殃及邻国英格兰。这场由苏格兰摄政太后的兄弟们、法国洛林（Lorraine）的王公贵族野心勃勃炮制出来的计划正在逐步展开；当代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有非常详尽和出色的描述。简而言之，当时的法国宫廷在洛林贵族的影响下，决定扶持苏格兰的年轻女王玛丽，宣布她有权登上英格兰的王位；因此必须借私生女和异

^① 此处指那些已经回到英格兰的、之前诺克斯在日内瓦牧会时的会友。

端的罪名对伊丽莎白发动攻击，从她手中夺取王权；^① 鉴于苏格兰是能够成功发动这场袭击的唯一途径，所以首先须要镇压此处的宗教改革，在这个国家建立他们的权势。诺克斯在穿越法国的旅途中，结识了一些宫廷里的人士，从他们那里获悉了这一计划的某些内容。他确信苏格兰的改教团体肯定无法和即将兵临城下的法国大军相抗衡；故而，无论是出于切身利益的考虑，还是出于义不容辞的责任，英格兰宫廷都应该全力向苏格兰新教徒提供有效的支援。然而，诺克斯担心英格兰人可能会因明哲保身和目光短浅的政策错过援助的时机，直到大势已去，则悔之晚矣。因此，他焦急地呼吁英格兰政府尽早关注此事，并且将自己所了解的实情悉数告知对方。从1559到1560年期间，伊丽莎白颁布了最坚决彻底的政策，命令向苏格兰的新教徒提供援助。这些援助从一开始就挫败了她的敌人的计划，一举奠定了女王在苏格兰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她之前所有的英格兰君主用武力恐吓和金钱利诱都无法换来的；通过扩张和巩固新教徒的利益，确保了女王江山社稷的稳定，因为新教团体是其政权的主要支持者。这一切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们改教者的明智判断和远见卓识；是他在阴谋初露端倪的时候就已经胸怀对策，他也是提出该计划的第一人，并且坚持不懈地力劝英格兰当局采纳他的计划（正如我们下面要看到的），直到大功告成。

虽然诺克斯已经两次遭到严厉拒绝，但因受到上述考虑的强烈驱使，他忍辱负重，再次试图约见英格兰政府的某位秘密联络人。他于4月10日写信给国务大臣塞西尔（Secretary Cecil，诺克斯当年在伦敦居住时结交的友人）。信中提到日内瓦的流亡者在英格兰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并为他们申辩，指出他们和自己出版的那本

^① 玛丽的祖母（即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的妻子）是英王亨利七世的女儿玛格丽特·都铎，所以她理论上拥有英格兰王位的合法继承权。由于伊丽莎白是亨利八世和安妮·博林之女，而这段婚姻不被罗马教廷承认，所以天主教徒均认为伊丽莎白是私生女，无权继承英格兰王位。

得罪多人的著作并无关系，不应当为此承担责任；他向塞西尔保证，在那本书出版之前，他没有和其中任何人商量。就个人而言，他从来就无意否认自己是该书作者，也从未准备收回其中包含的主要观点。但是，他对伊丽莎白其人和她的政府并没有恶意，对于她的即位同样感到欢欣鼓舞；尽管他对于女王权柄之合法性的辩护与一般立场不同。诺克斯表明，这是他第三次恳求得到从英格兰过境的许可。他并不想去拜访宫廷，也无意在这个国家久留，但是他迫切地想要和塞西尔或其他值得信赖的人士当面沟通，向他们传达重要事宜；这些事情不便在信中讲述，也不适合委托给普通的信使。如果他的请求遭到拒绝，那么事后将证明对英格兰不利。

当时诺克斯得罪英格兰宫廷的事尽人皆知，所以他费了好大周折才找到一个为他送信的使者。也许是对自己的过境申请能否奏效不再抱任何希望，也许是被苏格兰传来的消息所催促，总之，诺克斯于4月22日坐船离开了迪耶普，并于五月初平安抵达利斯^①。

① 苏格兰爱丁堡附近的一个海港，位于福思湾（Firth of Forth）的南岸。

第 16 章

出兵

诺克斯一上岸，就发现苏格兰国内的局势极其严峻。摄政太后撕下了长久以来伪装的面具，公开宣布了要镇压宗教改革的强硬态度。之前因为太后需要新教徒支持她的政权以便和汉密尔顿派对抗，同时想让她的女婿法国皇太子通过联姻取得苏格兰的王位，所以她总是博取新教团体的友谊，聆听他们的改革计划，抱怨圣品阶级的腐败和暴虐，并表示只要一有恰当时机，她愿意着手纠正这些现象。她还用许多好话取悦新教徒，虽然没有明说要加入他们的阵营，但至少保证说她会保护他们免受教士们的狂暴攻击。新教徒完全被太后圆滑老练的谈吐和八面玲珑的掩饰所欺骗；他们服从了太后的全部要求，限制了某些传道人在公共场合的教导工作，并且打消了向议会呈递早已备好的请愿书的念头。甚至当太后的多处行为露出马脚，足够引起强烈质疑时，他们仍然不肯相信她在弄虚作假。然而，在实现了预期的主要目的之后，太后遵照法国宫廷的指示以及与教士团体的秘密约定，最终采取了强硬手段，彻底打破了新教徒的幻想。当太后传唤所有新教传道人的时候，某些新教领袖去拜见她，想为这些人说情。她直言不讳地回答：“无论如何，这些人都应当被赶出苏格兰，哪怕他们的讲道和圣保罗不相上下。”当新教领袖提醒她曾经多次立下的保护传道人的承诺时，她居然恬不知耻地答道：“不管君主是否愿意遵守诺言，臣民都不应该将这

样的义务强加给君主。”新教领袖告诉太后，如果她违反和自己的臣民所立下的约定，他们将不再对她效忠，并警告她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见此架势，太后的口气缓和下来，答应设法阻止对传道人的审判。但没过多久，当她听说改革宗信仰已经传入珀斯镇的时候，她故伎重演，传唤所有传道人于5月10日到斯特灵（Stirling）报到，出席审判。

我们的改教者在得知这一消息时的心情，从以下这封书信里可见一斑；这封信是他在苏格兰登陆后的第二天匆匆写下的：

亲爱的姊妹，愿圣灵永恒不绝的安慰归给你。仅此寥寥数语，向你告知，因着上帝满有怜悯的旨意和安排，我于5月2日到达了爱丁堡。我不清楚上帝在这个国家下一步的作为，但我知道会有一场空前的争战。撒旦已猖狂到穷凶极恶的地步，但赞美我的上帝，他让我来到了决战的前沿。因为我的传道同仁接到指令，要在5月10日那一天在摄政太后面前答辩；我也打算出席那场审判（如果上帝没有拦阻的话），无论生死，总要荣耀上帝的尊名——他曾以恩慈垂听我漫长的呼求。姊妹，请你为我代祷，使我在战斗临近时不至于退缩。我本想和你分享其他的事情，但因忙于四处奔走旅行，所以抽不出时间写信。请参阅我从迪耶普给你发的信，并将我的近况转告给我的弟兄古德曼先生。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你同在。

5月3日，草书于爱丁堡

尽管诺克斯自己的官司先前已被审断，并且当局已经宣布了对他不利的判决，但他毫不迟疑，决意要出席在斯特灵的公审大会，为弟兄助一臂之力，分担他们面临的危险。在爱丁堡仅仅休息了一天之后，他赶到了邓迪，发现安古斯（Angus）和蒙斯（Mearns）地区的新教领袖已经聚集在那里；这些人决心与他们的牧师同赴公审会场，公开宣布对于那些遭到指控的教义的坚信。作为一位新教

信仰的大能斗士，诺克斯在这场危机中的到达实在出于上帝的安排，给全体集会者带来不小的鼓励。诺克斯请求和大家一同前往，众人欣然应允。

虽然集会者没有携带武器，但考虑到如此声势浩大的队伍不期而至，可能会让摄政太后感到惊恐和不快，所以“会众派”（Congregation，从这时起，苏格兰新教徒开始被人如此称呼）一致同意在珀斯止步，然后差遣唐县的厄斯金先赶到斯特灵觐见太后，告知此次众人的来访是本着和平的目的和方式，并无任何恶意。但太后担心他们的到场会扰乱她的安排，于是再次伪装自己，巧言令色地说服厄斯金给弟兄们写信，让他们放弃前来斯特灵的行程，并授权厄斯金以她的名义承诺说，她会中止这次审判。会众兴高采烈地顺服了太后的请求，以此证明他们和平的意图；大部分人因为信任王室的承诺而折返家乡。但是，当原定的审判日临到时，太后仍然向传道人下达了召集令。所有受指控者因未能出席而被视为非法，并且政府严禁任何人窝藏或协助他们，违者将以谋反罪论处。

厄斯金从斯特灵逃到珀斯，并公布了太后的可耻行径，这一报道无疑激怒了新教团体。紧接着发生了一件事。在消息传来的那天，诺克斯正好停留在珀斯。他作了一场讲道，其中揭露了弥撒和图像敬奉（image worship）中的偶像崇拜。讲道结束后，听众安静地散去，只剩下少数无所事事的人在教堂中徘徊。这时出现了一名神甫，他很不明智地揭开了一座华丽的、装饰有画像的圣坛雕塑（altar - piece），准备举行弥撒仪式；他这样做的目的，或许是想以此试探人们的态度到底倾向哪一方，或许是为了对刚才讲道中的教义表示蔑视。有一个男孩出言指责了几句，遭到神甫的殴打，于是他朝神甫扔出一块石头作为回击，石头砸到了圣坛雕塑，打碎了上面的一幅画像。这一突发事故好像是发给在场人们的一个信号，他们和男孩一起动手，在短短几分钟之内，拆毁了教堂里的圣坛、图像和所有的装饰物，并且用脚踏踏得粉碎。喧闹声很快召来了一



转信新教的人们正在砸碎教堂里的偶像和祭坛

群乌合之众，这些人在教堂里没有找到可作发泄的东西，于是在一股突然爆发和不可抗拒的冲动下，大肆袭击了附近的修道院。他们将灰衣修士和黑衣修士的房屋，以及卡尔特会僧侣（Carthusian monks）的珍贵建筑全部夷为平地。地方行政官和传道人闻讯后马上聚集赶到现场，可无论是前者的权威，还是后者的劝说，都无法阻止他们的过激行为。所有的绅士以及会众当中头脑冷静的人们都没有卷入这场毫无预谋的骚乱。参与者完全是社会底层的当地居民——用诺克斯的话讲，他们是“草根大众”。

对修道院的毁坏曾被误认为是诺克斯的工作在当时的成果。所以本文有必要对这桩事件的起因给出详细的描述。无论他对偶像崇拜的器皿和纪念物被毁坏抱有什么看法，他都希望以正规有序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他清楚地意识到，在目前的形势下，如此混乱无序的举动只会给改教事业带来损害；所以，他不但没有煽风点火，反而竭力制止暴民的破坏行为。如果我们一定要找出这一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那么只能归咎于太后的反复无常和背信弃义。

实际上，没有什么比这次暴乱正中摄政太后的下怀了。由于最近不光彩的言行，她不仅丧失了新教徒对她的信任，而且在己方阵营的那些审慎温和的人士眼里也颜面扫地。这一次的珀斯事件正好给她提供了机会，使她能够将公众针对自己的愤怒情绪，转移到会众派身上。凭借其惯用的伎俩，她马上抓住此事大做文章。首先她召集贵族谈话，将这场偶发的骚乱夸大为一次危险和蓄意的谋反。对天主教徒，她则历数那些遭到摧毁的古老庄严的建筑物（这些珍贵遗产都是他们的祖先奉献出来、作事奉上帝之用的）；并谴责这种暴行是何等亵渎上帝、大逆不道。对那些没有加入珀斯闹事民众的新教徒，她抱怨说，卡尔特修道院（the charter-house）的王室根基遭到何等的破坏，并申明自己并无意使用暴力手段去伤害他们的良心；最后向他们承诺，如果他们帮助她去惩罚那些违反公共秩序的

人，她就会对他们提供保护。当太后激起了所有人对于会众派的反对情绪后，随即亲自带领一支军队向珀斯进发，威胁说要用火与剑将这座城镇变为废墟，并且要对所有参与制造暴乱的人进行严厉的报复，以儆效尤。

第 17 章

对 抗

北部地区的新教徒马上觉察到迫近的危险，并尽了最大努力去平息太后的震怒；除了给她写信，他们还给法国军队的司令官、教皇派贵族以及自己所属教派的会友去函；信中他们郑重地否认有任何谋反的企图，宣称随时愿意对政府履行所有应尽的顺服义务；恳求和劝告所有人避免向爱好和平的臣民使用武力——他们只不过想获得信仰自由的权利。然而，当他们发现所有的努力毫无效果时，决定不能让自己和弟兄们引颈受戮，随即着手进行守城的准备，以对抗这场非法无理、来势汹汹的袭击。他们的行动非常迅速有力，以至于当太后兵临城下的时候，觉得对他们发动攻击并非明智之举，于是提出和解的建议。对此新教徒们欣然同意。

当两军在珀斯前面对阵谈判的时候，我们的改教者得到了一次和圣安德鲁斯行政官以及年轻的阿盖尔伯爵（Earl of Argyle）会面的机会。此二人当时站在拥护摄政太后的立场。诺克斯提醒他们当初所缔结的庄严盟约，同时指责他们破坏了约定，反而去支持对新教徒不利的法令——那些法令旨在镇压改革宗信仰，并且将他们的祖国陷入奴役。两位贵族向他断然保证说，盟约在他们心中的神圣地位不可动摇。摄政太后曾要求他们尽最大努力和平解决眼下的争端，但是，如果太后确实违反了目前的协议，他们许诺将不再对她效忠，并且会公开加入其余的会众派团体。没过多久，太后就拱手

送上了机会，使他们二人得以兑现了诺言。

无数的证据使会众派的贵族们确信，摄政太后为了镇压宗教改革构想了一个全面周密的计划。作为应对，贵族们重申了彼此结盟的誓约，并且一起协商，制定了与太后的计划相抗衡的措施。在接下来发生的扣人心弦的较量中，太后屡次花言巧语提出议和，然后又背信弃义地撕毁协议，直到双方最终爆发了一场公开的（尽管不太血腥）内战。有关这一冲突的详尽说明，我必须参考那段时期的通史记载。限于本书的目的，我不会过多地涉及细节，除非事件本身和我们的改教者有直接的关系，或者那是描述他的言行不可或缺的材料。

新教领袖曾多次恳请摄政太后使用手中的权柄和影响力，除去宗教领域的腐败现象，这些现象早已无法再瞒天过海、障人耳目。他们也向教士团体呈递了同样的请求，但无功而返。“在某些场合下，放弃非法篡夺的权力、否认有利可图的谬误，本应是正直有德之人为真理付出的牺牲。但是，在所有的人类团体中，不要指望能看到这样的事情出现。因为一个团体的腐败，通常受到共同利益的驱使，经过普遍实行而成为正当，所以其成员等闲视之，丝毫不感到羞耻和痛恨。故此，改革绝不可能从团体成员内部产生，而总是通过外来力量强加给他们。”圣品阶级的生活充满丑闻，对于人民的信仰教导毫不重视，基督教的敬拜被粗俗的偶像崇拜所亵渎——这是当时最突出的积弊；举国上下强烈要求对此予以纠正。假如政府没有采取针对这些问题的合宜措施，大众的愤怒情绪必定会一发不可收拾。当下，会众派里的贵族领主决心在自己的权力或影响力能够波及的地区引进改革；这些地区的大部分居民都对改教持欢迎态度，他们正在废除天主教的迷信传统，以新教的敬拜方式取而代之。在当时的苏格兰盛行一种封邑观念，即非常尊重贵族对领地的管辖权；这种观念某种程度上为贵族的行动提供了正当的理由，而迫在眉睫、势在必行的改革则为之提供了最好的辩护。

圣安德鲁斯被定为发起这次改教行动的滩头阵地。时任该城修

道院院长的詹姆斯·斯图亚特勋爵 (Lord James Stewart)，连同阿盖尔伯爵，和诺克斯约定了在这座城市会面的日期。在途经法夫^① (Fife) 东岸时，诺克斯沿途在安斯特拉瑟 (Anstruther) 和克雷尔 (Crail) 讲道，并于6月9日到达圣安德鲁斯。大主教得知诺克斯打算在他的教堂讲道，马上组织了一支武装力量，并向后者传话说，如果诺克斯胆敢走上讲坛，他就会命令士兵向他开火。贵族们聚集在一起商议如何应对，觉得诺克斯应该放弃这次讲道，理由是：他们的随行侍从人数稀少，力量单薄，并且大家对于该城的民心倒向哪一方还不确定；此外，太后在附近驻扎了一支军队，随时准备为主教提供支援；最后，诺克斯在讲坛露面不仅可能牺牲自己的性命，而且会让那些决意保护他不受暴力攻击的人一同遇害。

有些时候，不按谨慎小心的常理行事，往往事后证明是上帝所赐的智慧。在某些情况下，直面危险反而平安无事，逃离危险反而惹祸上身。假如改教者在宣布他们的意图之后，又被大主教虚张声势的态度和威胁所吓倒，那么他们的计划一开始就会遭到沉重打击，再想恢复元气恐非易事。诺克斯以坚定无畏的态度制止了贵族们的想法。当年在那间教会的讲坛上证道的回忆使他激动不已，并且实现心中埋藏多年之夙愿的那一刻指日可待，诺克斯怎可放弃眼下的机会！面对弟兄们的恳求，他答复说：上帝可以为他作证，他讲道从来不是为了鄙视任何人，也从未怀有伤害任何人的意图；但是，若要他推迟第二天的讲道（除非他被强行拦阻），他的良心无法苟同。正是在那座城市、在那间教会，上帝扶持他成为一名高贵的讲道者；也正是在那里，由于苏格兰主教们的调唆，他被暴虐的法国军队掳去。此后漫长的牢狱生涯以及所忍受的诸般刑罚，他不会在这里一一历数；但有一件事他不能隐瞒，那就是，他曾经当着许多至今仍然健在的人面前，充满信心地表达了重返圣安德鲁斯讲道的盼望。因此，现在当上帝的旨意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将他带回

① 苏格兰东部一地区，位于福斯湾 (the Firths of Forth) 和泰湾 (Tay) 之间。

到此地的时候，他恳请大家不要拦阻他。他继续说：“对于可能临到我的危险和惊吓，请不要为我担心。因为我的生命在上帝的护理之下；我只寻求他的荣耀。我不希望任何人拔刀相助，为我提供保护。我只渴望有人听道。如果我的心愿在此时此地被拒绝，我必会到别处寻找实现它的机会。”

诺克斯坚定勇敢的回答平息了所有的反对意见。第二天，诺克斯出现在讲坛上，面对庞大的会众进行讲道，其间没有遭到任何抵触或被打断。他证道的内容是“我们的救主从耶路撒冷圣殿中赶出那些玷污圣所的商人”。借此主题，他揭露了在教皇制度下，无数被引入教会的腐败现象；并指出基督徒应当在各自的领域清除腐败，这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在同一处地方连续讲道三天。其传讲的教义影响力非常大，以至于教士长、市政官和当地居民一致赞同在该城建立改革宗的敬拜形式；教会中所有的偶像和图画被拆除，修道院也被拆毁。这一天是1559年的6月14日。

圣安德鲁斯的榜样很快被王国其他地区效仿。短短几周之内，在克雷尔、库珀（Cupar）、林多尔斯（Lindores）、斯特灵、林立斯戈（Linlithgow）和爱丁堡等处，僧侣们的房屋被倾覆，凡是用来促进偶像崇拜和图像敬奉的物品全部被摧毁。

在苏格兰宗教改革的进程中，没有什么比毁坏那些古老建筑更容易招来强烈的谴责；迷信传统在这些建筑里堆砌了无数用凿斧和画笔炮制的装饰品^①。罗马天主教徒视所有参与破坏行动的人犯下了不可抵赎的亵渎圣物的罪行，这些罪行推翻了所有宗教信仰的根基，应当受到咒诅。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撰文抨击的作家；这些人虽然大体上没有自诩虔诚，但在借鉴前辈的语言上却毫不迟疑。他们对如此多的珍贵纪念物的毁灭悲叹不已，其痛心疾首的语调，丝毫不亚于拜偶像者丢失自己所供奉的假神时的心情。他们强烈爱慕哥特式建筑和其他古典艺术的残骸；从所用的语言可以看出，如果

^① 指名目繁多的宗教雕塑和画像。

能恢复他们顶礼膜拜的物品，那么无论迷信传统多么无知和偏执，他们中间也有人愿意让它重新掌权。彻底毁灭圣物的事件标志着改教运动的进展，然而这些事件在此类作家的笔下却被描绘成最黑暗的一幕，就如历史学家在描述古老文明如何被野蛮的匈奴人和汪达尔人^① (Huns and Vandals) 的入侵所颠覆时所用的笔墨一样。他们在提到我们的改教者的时候，无不表现出恐惧和震惊，并用极其憎恨的言辞，称他是一个尚未开化的野蛮人、一个领导暴民的罪魁祸首——他打破了一切值得敬仰的古老遗物，颠覆了一切神圣庄严的信仰传统。

如果要提醒这些人，上帝曾命令毁灭迦南地上所有的偶像纪念物，那么会让他们无法忍受，甚至可能会激起某些人亵渎攻击这一神圣命令背后的权威。如果援引早期基督徒铲除那些献给外邦多神教 (pagan polytheism) 的庙宇和塑像的例子，那么只会唤起他们对这些无法挽回的损失的痛惜之情。如果提及启示录中的预言，则会令他们更加反感。某些狂热人士甚至认为其中的预言已经在这座“大城”的悲惨洗劫中应验了。经历了所有的革命，这座城市出色地证明自己是文化艺术的发祥地，是产生画家、制像家和雕塑家以及“竖琴师、音乐家、吹笛者、吹号手和各行手艺人”^② 的温床。直到今天，这些人还没有忘记向她所尽的责任，也没有停止为她的毁灭举哀哭泣。在我为诺克斯所作的所有辩护中，我宁愿减轻、而不是加重那种因古老纪念物被毁而产生的悲痛情绪。据权威人士的观察，某些物品的主要价值源于它们的稀有罕见（所谓“物以稀

① 匈奴人 (Huns)：于公元 4 - 5 世纪入侵欧洲的一个东方游牧部落，455 年被击败。

汪达尔人 (Vandals)：日耳曼人的一支，于公元 4 世纪和 5 世纪侵入高卢、西班牙和北非，并于 455 年占领罗马。

② 参见《圣经·启示录》18 章 21 - 22 节：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到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地被扔下去，决不能再见了！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决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决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决不能再听见。”

为贵”);如果能够找到大批数量的此类物品,那么它将不再被人追捧和珍视。论到那些宝贵的石头和金属制品,有一位文采出众的贵族居然质疑以上观察的正确性。但依我之见,无论那些尊贵的作者和博学的批评家在公共财富的观点上如何与众不同,他们肯定会同意上面的观察是完全有根有据的。这一观察适用于所有被古董专家视为财富的商品。在古董专家看来,稀有和罕见是判定这些东西值钱与否的基本必要条件。正如著名的《西彼拉占语集》^① (*Sibylline books*) 的拥有者一样,他的财产不会因其数量的减少而贬值;当这类物品中的大部分被毁灭后,他的收藏品反而会变得更加珍贵。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古董专家实在没有理由抱怨改教者们的毁坏行动,因为后者给他留下了如此价值连城的断壁残垣;通过把这些建筑物变成一片废墟,改教者们将古董专家升华到一种非凡的境界,在他的头脑中唤起了最崇高和美妙的热烈情感。^②

然而,严肃地讲,请不要以为我敌视所有的高尚艺术,对那些古老或现代的艺术品被毁幸灾乐祸,或者为那些出于无知、狂热和愤怒去煽动暴民施行毁灭的人作辩护。但在同时,我必须谴责某种冥顽不化的态度,这种态度驱使人们夸大破坏规矩的行为,并且使他们沉浸在对于损失的哀恸中不能自拔;实际上,在一个具有启蒙和开明思想的人看来,这场摧枯拉朽的革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价值;那些损失与之相比,实在微不足道。为了赢得胜利,成千上万的同胞献出了生命,难道我们要对此大张旗鼓地庆祝吗?面对那些残缺的雕塑、撕碎的画像、毁坏的塔楼,难道庄严的弥撒、悲哀的挽歌以及与之伴随的不祥咒诅仍然要永远吟唱下去吗?我宁愿

① 也译为《西卜林书》,古罗马时代的一本神谕集,据说书中有众多的先知代替上帝、神明在传达信息,并预言许多世纪的灾难、战争、祸患等等,后来被集结成册,再后来则不明原因地失传了。通常用来比喻那些起初不想买后来反愿出高价收买的东西。

② 作者在这里用的是讽刺手法,旨在驳斥天主教徒对所谓的“圣物”视若神明、顶礼膜拜的荒谬观念。

说，我将这些纪念物的毁灭视为一个杰作；这一行为从物质上促成了罗马天主教在苏格兰的覆灭，并阻止了它的复辟。当时的罗马天主教会正是凭借其富丽堂皇的教堂建筑和壮观豪华的礼拜仪式，迷惑了大众的感觉和想象力，因此，若要成功破除人们心目中的幻觉，最好的方法就是将这一切尽行毁灭。许多人没有察觉到，在诺克斯经常提到的一条谚语里面，包含着意味深长的智慧：“如果不想让乌鸦回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拆毁它们的巢穴。”对于那些历来承载和维持古老的迷信传统的建筑，改教者们将其彻底摧毁，或者使它们不再适合人居住（除了留下那些新教徒敬拜必需的场所以外），这种做法仅仅是按照智慧的原则行事而已。他们将无法长期占据的城堡和要塞夷为平地，以免日后落入敌手，被用来攻击自己。假如这些建筑被保留下来的话，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必定会旧梦重燃、执迷不悟，并费尽气力去恢复一切昔日的荣华；他们将利用一切机会搅乱小信者的心思，煽动迷信者的意念；到那时，改教者们恐怕要对自己当初考虑不周的克制行为后悔不迭。

诺克斯于六月底离开圣安德鲁斯，来到爱丁堡。之前摄政太后和她的军队已经撤出了该地。城中的新教徒都将目光聚集在诺克斯身上，立刻推选他担任他们的牧师。诺克斯随即承担了这份职责。但会众派的贵族们很快就与太后缔结了和约，同意将爱丁堡退还给太后。考虑到教皇派分子对诺克斯怒火中烧，无比仇视，大家认为诺克斯留在那里太不安全，所以决定让教皇派不太反感的威洛克代替他的职位。诺克斯随后启程在王国各处巡回布道。这次旅程极大地扩展了改革宗教义的影响范围。广阔的禾场、有利的形势、重重的危险以及活泼的盼望——这一切都使诺克斯热情愈发高涨，激励他在事工上付出了超乎寻常的心力和体力。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他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苏格兰。在拜访了凯尔索（Kelso）、杰德堡（Jedburgh）、邓弗里斯（Dumfries）、艾尔（Ayr）、斯特灵、珀斯、布里金（Brechin）、蒙特罗斯和邓迪之后，他回到了圣安德鲁斯。整个国家被唤醒了，民众的眼睛被打开了，看清了长期蒙蔽

自己的谬误；他们渴望领受生命之道。以下摘录的书信内容最恰当不过地描述了诺克斯完成使命后的心情；这些书信都是他在马不停蹄的忙碌事奉中，抽出宝贵的间隙写下的。

在一封6月23日发自圣安德鲁斯的信里，他写道：

直到如今，上帝仍然在我们中间发扬他爱子的荣光。对于我的上帝无与伦比的恩惠，我实在感激不尽。我的心长久以来饱受磨难，饥渴莫名，现在得到了丰富的满足，远远超出了我的期望。因为在过去的40多天里，上帝使用我的口舌在我的祖国传讲真道，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今后，无论何事临到我的血肉之躯，我都不以为意，只愿他的圣名得着称赞。此地无论是穷苦民众，还是贵族阶级，都对真道表现出如饥似渴的态度；这使我大得安慰，深信基督耶稣在北方地区，直到地的尽头，必要凯旋得胜。

在所署日期为9月2日的一封信里，他写道：

时间对我至为宝贵。在八天当中我好不容易才抽出一个钟头的空闲稍作休憩，和朋友们倾心吐意。自从接受任命的那一天起，我一直不停地四处旅行。虽然屡次受到热病的折磨，但我仍然走遍了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所到之处，不分贫富贵贱、三六九等，无数男女信奉了福音真理。愿所有的颂赞归于至尊的上帝！因着最近来到的法国人（教皇派对他们寄予厚望），我们的仇敌人数众多。当我们无力抵抗时，只需环绕耶利哥城行走，按着上帝所赐的力量大声吹角，心怀盼望，单单依靠他的大能得胜。

诺克斯一到达苏格兰，就给日内瓦的家人写信，要他们随后回国。6月13日，诺克斯夫人和岳母来到巴黎，向英国大使尼古拉

斯·斯罗克莫顿爵士 (Sir Nicolas Throckmorton) 申请, 希望从英格兰安全过境。斯罗克莫顿此时已经洞悉法国宫廷的计划, 所以不仅批准了她们的请求, 而且给伊丽莎白女王写了一封信, 劝她以大度之心宽容诺克斯因出版《号角》而造成的冒犯, 并善待他的妻子, 以此和他达成和解。爵士有此魄力为诺克斯夫妇说情, 主要是因为他深得会众派贵族的信任, 是促成苏格兰近期格局变化的关键人物, 并且是女王御前能力出众、身担要职的重臣。于是, 诺克斯夫人得以顺利进入英格兰, 依照宫廷的指示被护送到边境, 在9月20日与丈夫平安团聚。她的母亲在家乡短暂停留之后, 也跟随她进入了苏格兰, 并定居在那里, 直到去世。

与家人的团聚使诺克斯满心欢喜。让他更高兴的是, 一同来到的还有克里斯托弗·古德曼。诺克斯曾经急切地催促这位日内瓦的同工来苏格兰帮助他, 并对他的姗姗来迟表示了极大的不安。古德曼马上成为圣安德鲁斯的牧师。新教神职人员在苏格兰各地定居的时期, 比一般的历史书记载得要早。在1559年9月之前, 已经有八个城镇安置了牧师; 但由于讲道者严重短缺, 其他地区仍然无人牧养。

与此同时, 形势一天天表明, 如果会众派贵族仍然得不到国外援助的话, 他们所卷入的这场斗争将难以为继。假如这仅仅是介于他们和太后的国内势力之间的一场较量, 那么他们早已稳操胜券、大功告成了。但前来协助太后的法国军队能征善战, 经验老到, 会众派抵挡不住, 况且法国还在准备增派大量的援军。早在六月中旬, 诺克斯就重新开始努力, 希望获得英格兰方面的援助。他说服了格兰奇的威廉·科卡迪 (William Kircaldy of Grange) 先写信联络、后亲自拜访亨利·珀西爵士 (Sir Henry Percy, 当时在英苏边境担任一份公职), 以转达他的意见。珀西立刻将诺克斯的陈述递交到伦敦, 并且得到了国务大臣塞西尔鼓励并保持联络的乐观答复。

诺克斯自己也给塞西尔发函, 请求得到访问英格兰的许可, 并

且附上了一封致伊丽莎白女王的信，内中他对先前鲁莽攻击女性政府的言论表示歉意——没有什么比这种道歉更加令人尴尬了。信里还表达了对女王政府的坚决拥护，但其措辞和语气实在欠妥；实际上，假如此信真的被清高孤傲的女王过目，恐怕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使双方的关系更加恶化。但我相信精明的塞西尔把这封信压了下来。他本人一直倾向于支持苏格兰会众派，并运用了所有的影响力说服女王和她的议会同意自己的观点。他随后给诺克斯捎信，约他于8月2日在阿尼克（Alnwick）和亨利·珀西爵士会面，商讨非常紧急和机密的事务。然后塞西尔又亲自下到斯坦福（Stamford）面见诺克斯。

摄政太后的军队推进到爱丁堡，由此产生的混乱阻碍了诺克斯的行程。但形势一有好转，他马上就从皮滕威姆（Pittenweem）坐船来到了圣岛（Holy Island）。但此时珀西已经从边境被召回，于是他向伯威克总督詹姆斯·克罗夫特爵士（Sir James Croft）求助。克罗夫特已经获悉了诺克斯此行的计划，所以劝他不要进入英格兰境内；同时自己将他的信息送到伦敦，并努力尽快返回。当诺克斯在伯威克等候时，惠特罗（Whitlaw）带来了英国宫廷对先前书信的答复；诺克斯立刻折返斯特灵，将英国人的回信呈交给新教贵族会议。伊丽莎白内阁摇摆不定和小心谨慎的态度使回信的内容流于笼统，与会者对此大失所望，心生不快。在诺克斯的坚持下，他们才勉强同意以他的个人名义再次给伦敦发函。诺克斯在信中力陈形势已迫在眉睫、不容继续犹豫和耽延。这封书信得到了迅速回复：英国宫廷要求苏格兰人差派一位秘密使者到伯威克领取一笔款项，用来帮助他们维持战争。同时，拉尔夫·萨德勒爵士（Sir Ralph Sadder）被派遣到伯威克，担任政府授权的秘密代表。从此，萨德勒和詹姆斯·克罗夫特爵士开始负责伦敦宫廷和会众派贵族之间的通信联络，直到英格兰援军进入苏格兰。

如果我们反思本国的宗教信仰、公民的自由权和新教徒所从事的斗争之间的关联并诺克斯在这场事业中的热忱，我们会毫不惊奇

地发现，他在这段时期扮演了一位政治家的角色。超乎寻常的时势显然不能用寻常的规则来衡量。当一个民族所有宝贵的权利和福祉危在旦夕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使用上帝赐予他的才干为公共利益服务。在当时，贵族当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寥寥无几；尽管在新教领袖中不乏能力出众者，但他们中间极少有人善于处理公共事务。因此，有一段时期，和英格兰书信往来的工作主要落在了巴雷夫和诺克斯身上。然而，诺克斯接手这份工作仅仅是出于义务感和对共同事业的重视；尤其当小梅特兰加入会众派之后，他对于自己即将卸下这份差事感到如释重负、满心欢喜。

诺克斯渴望从这份工作中解脱出来是有原因的。他感到，正如自己早年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受经院哲学所困，陷于诡辩术的复杂迷宫里难以脱身一样，今天要想在钩心斗角、花言巧语的政治阴谋中持守基督徒的正直和纯朴，同样困难重重。由于所从事的任务与自己的性格和气质相去甚远，诺克斯遇到了许多烦恼和几次令人不快的摩擦。这些经历部分是因为他冲动急躁的性格，部分是因为英格兰宫廷和他的个人恩怨，但主要是因为英格兰宫廷制定的政策路线。他们很清楚，假如坐视苏格兰新教徒遭到镇压而不顾，将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危险；但他们希望对苏格兰的支持仅限于向后者秘密提供金钱上的援助，并认为通过这些援助，会众派贵族就能把法国人赶出去，并成功地结束战争；同时英格兰还可以避免和法国公开决裂。这一策略主要出于伊丽莎白女王的个人想法——因为她很不情愿卷入苏格兰战争，而不是出于她最明智的谋士的意见。但现实中，该计划使战争拖延日久，并且让英格兰政府的代表和会众派代表之间产生了几次争执。一方面，英格兰代表不停地催促联盟的苏格兰贵族赶在摄政太后从法国获得增援之前发动进攻，并责备他们动作迟缓，通信联络不够保密；甚至暗示说，资助的金钱本该用于共同事业，但其中一部分却被用于私人目的。会众派代表对这些指责非常不满，并强烈要求英格兰除了金钱资助以外，还应当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

在写给詹姆斯·克罗夫特爵士的一封信里，诺克斯陈述了当前的严峻形势，强调会众派必须立刻得到英军的增援，否则他们对利斯的进攻将面临失败的危险。他说，既然英格兰宫廷确知法国对其怀有敌意，那么就应当毫不犹豫地和法国翻脸。但是，“倘若你们想要手腕骗过法国人，给我们送1,000多名士兵并不会打破你们和法国签署的任何盟约或和平协议：因为在战争期间，你们的臣民可以随意效力于任何君主或国家，并得到相应的报酬；^①如果你们担心这样的理由不太奏效的话，可以宣布这些人是国内的叛乱分子——当然你们很清楚他们在我们的阵营里。”毫无疑问，此类做法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当时的宫廷也都知道这种“政治诡辩术”[按基思（Keith）的说法]。然而必须承认，诺克斯推荐的方法过于明目张胆。克罗夫特制止了诺克斯的急躁之举，他在回信中写道，他不明白诺克斯作为“一个明智的人”，怎么会要求英格兰宫廷提供这种方式的援助，因为这样做的后果只会导致“破坏和约、有损声誉”；况且，天下人也不会轻率盲目到无法识破他的策略的地步。诺克斯在答复中为自己“不太理智的请求”道歉，但同时也提醒克罗夫特关于朝廷在处理类似事件时的通常做法，以及法国宫廷在最近一桩事情上针对他们的行为。诺克斯十分了解，如果英格兰公开宣布支持苏格兰新教徒，将会产生外交麻烦；但他担心的是，倘若任由时间白白流逝而不采取关键行动，等到局面变得更难收拾的时候，英格兰人恐怕就要为自己错失良机而追悔莫及了。

这是我发现的唯一一处记载诺克斯建议故意装糊涂的地方；这实在有违他坦率的本性。他一切的行动向来以直截了当、诚实坦率著称，从不拐弯抹角。他一贯的立场是：英格兰人与其到最后才发现自己不得和法国人撕破脸皮，倒不如从一开始就出手相助、公开宣布对会众派的坚决支持。基思赞赏克罗夫特“公正地斥责了诺克斯先生两面派的建议”；塞西尔则认为，诺克斯的“大胆无畏

^① 指以自由民身份组成的雇佣军。

在此锋芒尽失”。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当以为他们的评论是出于任何良心和正直原则的考虑。因为克罗夫特在答复诺克斯的当天也给塞西尔写信说，他认为女王必须公开站到会众派一边。而且，在塞西尔谈论诺克斯“胆识不再”的那封信里，他建议克罗夫特在实际操作上仍然采纳诺克斯的策略，只不过要伪装得更巧妙一些。他授意后者，可以先给会众派送去五六名军官，假称他们是因为“对待遇不满，从驻地偷偷溜出去的”。在其后的一封信中，他命令再送三四名适合作指挥官的人过去，并让这些军人放话说，他们离开伯威克是因为“渴望到战争中练练身手，而不愿呆在镇上无所事事”。

由于我们的改教者对女性权力的“放肆”攻击，英格兰宫廷对他存有偏见；尽管如此，他们深知诺克斯的诚实人品和影响力，所以自然不会拒绝他的多方效劳。比如，塞西尔一直和他保持着书信联系；此外，从伦敦下达的金钱援助的指示中，特别注明要将诺克斯列为委员会成员之一，特为监督财政收支状况，以保证所有的援助款项都被用于共同行动，而非用于私人目的。

与此同时，诺克斯在会众派事业中的热心和举动，挑起了摄政太后和教皇派对他的极端憎恨。他们公开宣布，只要有人能够捉拿或干掉他，就可以得到一笔悬赏金；不少人出于仇恨和贪财的动机，伺机抓捕他。但诺克斯并没有被这些危险所吓倒，反而仍旧在公开场合露面，照常履行自己的职责，四处奔走于全国各地。在这段时期，他的努力和勤勉令人叹服。白天他忙于讲道，晚上则为公共事务书写信函。他是会众派的灵魂，并总是坚守在危险的岗位上。通过他的亲临现场、公开演说和私下建议，整个会众派团体得到了莫大的鼓舞，并击破了敌人试图破坏和分裂他们的阴谋。

第18章

和解

我们的改教者现在受召参与制定一项非常微妙和重要的策略。当会众派贵族最初迫于无奈、使用武力进行自卫时，他们并不想对政府做任何变动，也没有想过要改朝换代、夺取最高权力。甚至当他们针对太后的镇压行动进行了更具规模、更为持久的抵抗之后，他们仍然承认太后的身份和地位，继续向她呈递请愿书，并恭敬地聆听她的提议，希望能够解决彼此分歧的症结。然而，贵族们终于发觉，太后一心只想实施其颠覆民族自由的计划，并且她的头衔对她实行计划极为有利；此刻他们才开始商讨是否有必要采纳一条不同的应对之道。当时，女王和她的夫君^①都还未成年，又身在异国他乡，被法国宫廷操纵——主要是法国人制造了眼下让贵族们怨声载道的所有麻烦。太后凭借议会的授权把持着摄政王的位置；议会是否也可以罢免她的王位？在国家的当前状态下，想召集一个独立和规范的议会是不可能的。但是大部分倾向正义的国民已经宣布对太后的政府表示不满；他们是否有资格奋起捍卫即将受到威胁的公共安全？这些疑问成为当时人们常常谈起的话题。

经过大量商议之后，大批的贵族、男爵和自治城镇的代表们于

^① 指苏格兰女王玛丽和她的丈夫法国皇储弗朗索瓦。

10月21日在爱丁堡聚集开会，进行了严肃的讨论。诺克斯和威洛克也应邀出席；大会向他们陈述了议案，要求他们就罢免太后摄政权一事的合法性发表意见。时任爱丁堡牧师的威洛克以理性和圣经为根据宣布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执政者的权力是有限度的；如果证据确凿，理由充分，则可以剥夺他们的权力。摄政太后在利斯修建堡垒、将外国军队带入苏格兰的行为，表明了她执意要压迫和奴役国民的态度；而且她多次拒绝了作为王国顾问的贵族们向她提出的请愿和抗议；有鉴于此，剥夺她的权柄是完全合理的。诺克斯对弟兄的意见表示赞同，并补充说，与会者可以本着无愧的良心，按此原则行动，但必须注意以下三件事情：第一，民众不可因着摄政太后的胡作非为，而疏远了对他们的君主——弗朗索瓦和玛丽夫妇应尽的忠诚之心；第二，他们的行为要掌握分寸，其动机不应当出于对太后的私怨和仇恨，而是出于对全体国民安危的考虑；第三，他们此时宣布的任何判决都不应当排除以下可能性，即：倘若太后日后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并且愿意听从王国顾问们的建议，那么就on应该重新恢复她的地位。接下来，全体与会者在各自表态之后，一致签署了庄严的协议，决定暂时剥夺太后作为国家摄政王的权柄，直到下次独立议会召开之前；在此期间，他们将选出一个委员会负责管理公共事务。

后人曾指责两位传道人做了有违他们身份的事情，认为他们没有资格出谋划策插手此事；这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必要的臭名。但问题是，面对那些在自己牧养下的人们提出的要求，他们很难找借口拒绝表态，况且所求问的是一项涉及良心、法律和政治原则的议案。实际上，他们提出的建议（现实中都得到了执行）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远超过事件本身的范围。由于建议所本的原则完全不同于那些宣扬对抗君王、通过封建领主政体来限制君主权力的原则，而且我们的改教者因被视为后一种原则的教导者而备受批评，所以请读者原谅我再次岔开话题，对此事件作一澄清。

在中世纪，影响欧洲社会和政府的因素很多，其中特别值得注

意的是宗教的影响力。由于深受无知和迷信的束缚，人们的头脑已经习惯于默认政府的要求而不对其作任何考察，并且对所有加在身上的重轭都逆来顺受。教皇制度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深谙奴役之道。罗马教廷的直接目标是建立一个由圣品阶级掌控的属灵专制系统，同时也竭力将政治奴役的枷锁强加在人民身上。作为对世俗君主屈服于教廷傲慢要求的回报，教廷授予他们凌驾于全体臣民之上的绝对权力。借着君王加冕典礼上奉教皇之名所施行的膏抹仪式，某种神圣的性情被传递到君王身上，并将他们提升到比王国内的贵族更优越的地位，而这种地位是他们以前没有的；从此他们的人身变得不可侵犯，他们的王位变得超凡神圣——这就是所谓的“君权神授论”。尽管至高无上的教皇在某些场合曾经宣布和执行废黜君王的决定，并免除了臣民对这些君王效忠的义务，但是，如果黎民百姓自己胆敢作此尝试，则将被扣上大逆不道的罪名，在今世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在来世受到永远的咒诅。因此，君王拥有随意统治人民的神圣权力，人民对他的意志应当一味顺从、从不抵抗。在教廷的支持下，君主们有恃无恐，将臣民的生命和福祉玩弄于股掌之间，毫无节制地大行专制和残酷的暴政，而不用害怕臣民造反，更无须对其行为作任何解释。在某些国家（比如英格兰），人民可以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利，这些权利要么来自年代久远的传统，要么就是在一些有利情况下从君主手中费力夺来的；即便如此，上述原则在那里仍然普遍盛行。一位野心勃勃、势力强大的君王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这些原则，去粗暴地侵犯人民的权利而不受任何惩罚；就算政体的形式有利于保护民众的自由权，他也可以在其上强行建立一个彻底专制和独裁的政府。

有关教皇权威和大公会议权柄之间的争论，贯穿了整个15世纪。从这些论战里迸发出的一些激进的有关自由权利的原则后来被应用到政府管理中。知识的复兴^①揭示了古代希腊、罗马共和时期

① 指文艺复兴运动。

的立法原则和政府模式，逐渐带来了更为开明的观念。然而这些讨论仅限于少数人中间，对社会的总体形态并没有什么影响。被哲学理论和文学情调充斥的头脑软弱不堪，根本无力发起一场铲除积弊陋习的激进改革。当时有学问教养的人士，仅仅满足于自己得到的阳春白雪式的启蒙知识，沉迷于自由思考的权利和空间；他们对社会现实或者漠不关心、或者胆小怕事，不愿努力去改善芸芸众生的处境。理性自由权之真实原则的传播，以及随之带来的政府体制改良，主要归功于16世纪兴起的宗教精神，这一精神席卷了整个欧洲并扩散到所有的社会阶层。

世俗暴政和教会专制彼此勾结，狼狈为奸，以至于人们若不摆脱前者就不可能从后者中解放出来。因此，首先为人民的宗教信仰权利据理力争，然后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过渡到对人民应享有的公民权利进行探讨研究——这几乎是顺理成章、不可避免的过程。在某些王国，由于统治者摆脱了天主教的束缚，凭借自己的权柄自上而下引进宗教改革，故而民权理论的影响力非常微小、进展缓慢；其中一些国家（正如英格兰的例子）会发生以下情形，即从圣品阶级那里剥夺的权力被转移到君主手中，事后证明有损于民众的自由权。相比之下，在宗教改革得到全体国民的接纳、但遭到当权者一再反对的国家，民权理论的果效可谓立竿见影。由于统治者出于私心，仍然顽固地支持错谬百出的旧体制和教会专权，并且残酷地逼迫所有拥护新观点的人士，他们的臣民不得不寻求权威和顺服之间的公正界限。一旦他们的头脑明白了赋予自己的权利，一旦他们的良心得到了平安、知道为了获取这些权利可以采取什么手段，那么当前最紧迫的行动目标、从宗教奴役中得到解放以及自身和子孙后代的救恩在他们眼中将会变得无比重要，并会激励他们以满腔的热情和百折不挠的心志为此努力。仅仅对公民自由权的热爱是不可能激发这样的热情和心志的。

值得纪念的改教运动波及许多欧洲国家，并以有利于宗教和政治自由的局面告终。在这场革命中，向公众传讲新教教义的教师们

发挥了最重要的影响力。通过教导和劝诫，他们唤醒了民众去思考自己拥有的权利并运用自身的力量；他们激励了提心吊胆、谨小慎微的政客；他们也鼓舞和振奋了王侯、贵族、联邦盟国及其军队的士气，使他们在泰山压顶的艰苦环境下，仍然能够和强大可畏的敌对势力分庭抗礼，直到取得辉煌胜利。具有哲学头脑的作家们如今也承认了这些事实，并且在真理的力量面前，最终不得不将荣誉归给了新教改革的属灵领袖们——尽管长久以来他们被污蔑为一群愚昧无知的狂热分子。

我们的改教者对于倡导公民自由权所怀的热忱由来已久。我们已经提到过，早年大学教育期间的环境使他的注意力转向了某些民权原则。通过接下来的研究，他熟悉了古代独立国家的政府原理和模式。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和瑞士以及日内瓦的共和国之间的交流也对他的政治信条产生了一定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他形成了自己的观点，脱离了时代的偏见——这些偏见产生于既定的法律、古老的习俗和被普遍接受的信念。诺克斯的热忱和无畏驱使他公开承认和传播有关民权的理论。这种乐观和果敢精神正是他人所缺乏的；不少人因为感到惧怕不安，或者觉得毫无成功的把握，所以噤若寒蝉，裹足不前。广泛的观察使诺克斯深信，在大多数的欧洲王国中，政府的倒行逆施已经到了非常露骨的地步。但依据个人的政治原则，他期望对这些国家进行改革，而不是颠覆。虽然他极为赞赏古代和现代共和政体的治国方针，但并没有到头脑发热、不分青红皂白的地步。他知道共和政体既包含正义和自由的基本原则，也包含与君主政体互不相容的原则，二者必须分开。他十分清楚，若要在人类中间维持公正和秩序，规范政府管理是必不可少的；他也意识到，如果将人们从政府有益的约束中释放出来，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他始终如一地教导人们要诚实尽责地顺服统治者合法的命令，并且尊重他们的人格和权柄；即或在他们受到各种管理不善的指控时，也当如此；除非他们突破了所有法律和正义的界限，不再履行自己的基本职责。

然而，他宣称所有的统治者，无论是最高领袖还是下级官员，被赋予权力的目的是为了公众福祉的缘故。如果其统治下发生任何与上帝的律法相冲突的事情，臣民可以不必顺服他们。在每一个独立的、体制健全的政府，属地法（the law of the land）的权威高于君主的意志；下级地方官和臣民有权阻止最高长官实施个别的非法行为，同时仍然维持对领袖的忠诚，也不用担心犯下谋反的罪名。任何阶层的人都没有资格宣称，他们拥有某种起初固有的、与生俱来的、不能废弃的权利，即可以随心所欲地统治一方人民而无须征求后者的意愿和赞同。全体国民有权提出依法治国的规定和要求；所制订的法律应该符合上帝的律例，并以促进民众的福利为宗旨。统治者和臣民之间至少应当保持某种心照不宣、彼此默契的协议——如果没有白纸黑字正式立约的话。倘若统治者明目张胆地破坏这一协议，使用手中的权力去毁灭一个公民社会（他们受托付原本是要对此公民社会负责，并维护和促进它的福祉），倘若他们已变成彻头彻尾的暴君和臭名昭著的压迫者，那么人民就可以解除对其效忠的义务，有权对他们进行抵抗，正式废黜他们的王位，并且选举其他人代替他们执政。

实际上，苏格兰君主的权力范围一直以来都受到限制；如果考察宗教改革之前的本国历史，可以找到很多反抗君主权威的例子。虽然有人用这些先例作借口来为当前的场合辩护，但必须承认的是，我们不能将这些事件的出发点归结到真实民权的原则。这些事件的起因，要么是出于民众对某些公然的暴政行为迸发的不满情绪，要么是出于某些势力强大的地方领主的野心，要么是出于封建贵族为了捍卫本阶层的特权而过分提防猜忌的态度。遵照首领的理念标准行事的普通百姓其实对那些政治斗争毫无兴趣；就算君主的权力受到限制，他们从中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但是，在眼下的局势中，整个国家都被一种更公正和开明的精神倾向所熏陶，人们开始接受有关公民社会的概念，这个社会不仅包括特权阶层，也包括人民大众。我们的改教者并没有高举国王和贵族的世袭权利，而是致

力于约束贵族们的傲慢态度和压迫行为。他提醒后者，所有人生而平等；某些人被给予更高的地位，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他教导人们不仅要捍卫自己的权利，也当履行自己的义务。以上就是诺克斯基本的政治观念。在女性执政的问题上，他从未在同胞中引发任何争论，也没有试图拉拢人附和他的意见。但他一直竭力向人们灌输以上的民权原则，并且一生中不止一次在苏格兰付诸实践。当时，不少人认为这些原则是大逆不道的言论，是对专制君主及其臣仆的背叛；一些有识之士也投来怀疑的目光，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普遍的偏见。在一个政治自由的原则刚刚开始启蒙的年代，所有这一切反应都不足为奇。可是，在今天这个开明的时代，在不列颠的自由阳光下（如果我们的日头不会很快下山的话），居然还有人大大书特书，表示对上述民权原则深恶痛绝，对其倡议者口吐恶毒谩骂之言，给他们扣上“不择手段的反君权主义分子”（Anti-monarcho-machi）的帽子，并鼓吹对在上者无条件的顺服——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和愤慨。从根本上讲，这些民权原则是不列颠的自由政体赖以存在的基础；甚至其中最令人反感的部分也在令人缅怀的革命时期被付诸实践；如果当时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话，那么在暂时剥夺苏格兰太后的摄政权以及随后她的女儿玛丽女王退位的事情上，应用这些原则的必要性则更加迫切和不容置疑。

以上是我所作的澄清。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诺克斯在这个主题上提出的每一项主张都滴水不漏、无懈可击；也不是说，因为诺克斯为武力抵抗统治者的行动进行过辩护，所以这些事件都是理由充分、确有必要的，并且可以成为现代人援引和效法的先例。当时人们所持的政治信条明显刻有时代精神的痕迹，尤其很适合一个尚未开化的社会环境和动荡不定的政府。从那时以来，各种预防和牵制措施被引入宪法，通过自由的新闻媒体机构表达的大众舆论也开始对统治者的行为产生影响；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因素足以遏制君主危险的越界行为，并提供以和平方式纠正他们的途径，从而恰如其分地取代了暴力手段，使那些孤注一掷、大刀阔斧的补救方法

(那正是饱受压迫、义愤填膺的人民先前所采用的) 不再成为必要。但是, 假如有一天, 这些原则统统遭到否认和弃绝, 那么不列颠引以为豪的自由将很快灭绝净尽。

那些根据胜算把握来判断一项策略是否妥当的人, 一般会倾向于强烈反对罢免太后摄政权的决议。形势的发展似乎也验证了他们的感觉。当决议作出后不久, 会众派的情况开始急转直下、令人泄气。当时他们差派到伯威克去领取英格兰宫廷援助款项的信使, 在返回途中遭遇打劫, 所携钱财被抢掠一空; 会众派的士兵因为拿不到军饷而纷纷哗变; 他们对利斯的城堡发动的一次草率进攻被击退, 又在接下来和法国军队的一次战斗中落败; 太后派来的密使在他们中间的破坏工作屡屡得手; 他们的人数每天在减少; 剩余的人们纷争不和, 士气低落; 终于, 他们作出决定, 在11月5日晚间放弃了爱丁堡, 并带着仓皇和耻辱的心情撤退到斯特灵。

虽然这些灾难引发的沮丧情绪在大部分人中间弥漫, 诺克斯却心意坚定, 不为所动。到达斯特灵之后的第二天, 他走上讲坛证道他传讲的信息产生了奇妙的果效, 重新点燃了会众派的热情和勇气。他说, 他们的脸上充满困惑, 他们的敌人连连得胜, 他们的心因为恐惧而战兢, 他们整个人被羞耻和悲哀所笼罩。上帝让他们落到如此灰心气馁的地步, 究竟是为了什么? 眼下非常不利的处境, 需要直截了当的解释, 而他会直言相告。当前众人苦恼的心态会使他们陷入某种危险, 即过度关注自己遭遇灾祸的错误原因, 或者猜测自己当初是否不该奋起自卫、以致铸成大错; 就如以色列众支派因着上帝的带领, 向自己的弟兄便雅悯支派兴师讨伐, 却在战争中两次被击败, 其心情可堪对照。^① 诺克斯将会众派分为两类人: 一开始就投身这场事业的人和不久前才加入的人。继而根据自己的判断, 指出双方各自行为上的过失。接下来他劝勉所有人在生活、祷告和善行上立志更新; 最后, 他以一段鼓舞人心的演讲作为结束

^① 语出《圣经·士师记》20章。

语。他说上帝常常容许恶人暂时占据上风，同时让他的选民忍受嘲讽，身陷险境，甚至遭遇灭顶之灾；其目的在于降卑他们，使他们仰望上帝，从他那里寻求拯救和胜利。在《圣经·士师记》中，以色列人经历了两战皆败的耻辱之后，终于战胜了便雅悯人，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同样，如果他们诚心实意地转向上帝，那么他们现在的忧愁必将化为喜乐，成功也会随之而来。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他们所从事的改教大业必将在苏格兰彻底实现。他们所持守的，是永恒上帝的永恒真理；这一真理也许暂时会被压制，但至终必会大获全胜。

这群进入教堂时还情绪低落、沮丧不堪的人，离开时却焕然一新、勇气倍增。委员会在下午召开会议，请诺克斯祷告之后，大家一致同意差遣梅特兰去伦敦，向伊丽莎白女王请求更多有效的援助。与此同时，鉴于会众派已经无法守住阵地，他们决定将人马分成两队，一队停留在格拉斯哥，另一队在圣安德鲁斯。诺克斯被指派陪同第二队。法军在1560年年初已经突破到法夫一带。在诺克斯的鼓励下，由阿伦伯爵和圣安德鲁斯执政官指挥的这一小股部队奋勇抵抗，直到英格兰舰队赶来，迫使法军不得不仓促撤退。

先前新教军队因为各种不利因素撤离爱丁堡，不料事后却因祸得福。形势的发展迫使英格兰宫廷放弃了一直以来执行的谨慎保守路线。1560年2月，他们和会众派的贵族领主们签订了正式条约；4月初，英格兰军队进入了苏格兰境内。法军退缩到里斯的城堡内防守，并遭到海陆两面的夹击。在围攻期间，摄政太后在爱丁堡的城堡中去世。法国大使被迫同意讲和；和约规定：法国军队必须撤出苏格兰；对所有最近参与反抗太后政策的人颁布大赦令；赔偿抵抗者的主要损失；并召集一个独立的议会来商讨和解决王国的其他事宜。

在内战进行期间，当新教传道者在王国各地勤勉地传播真理知识的时候，教皇派教士们并没有采取任何抵制行动。他们腐败透顶，根本无望革新自己的生活方式；愚昧无知，毫无能力维护他们

的谬误。因此，他们唯一能指望的就是法国军队的获胜，并期待着战争的结果——那将决定他们的宗教的重建或毁灭。实际上，为了恢复自己失去的声誉，并支撑日渐衰亡的传统，他们曾经故伎重演，试图在圣徒的祠堂里伪造一些所谓的神迹。可惜他们的欺骗行为被揭穿，反而成为公众的笑柄。

尽管结束了敌对状态的和约并没有解决宗教信仰方面的分歧，但这一结果却对苏格兰的教皇派造成了致命的打击；权力从此落到了新教徒手中。除了先前被太后和她的外国援军占领的地区以外，全国各地几乎都废弃了罗马天主教的礼拜仪式，也没有人出资去重建他们的场地。天主教昔日对人民的观念和情感的牢固束缚，如今都土崩瓦解了。在苏格兰存在了许多世纪、一直以来纯粹靠强制措施维系的天主教制度，在法国军队离岸启航的那一刻轰然倒塌。那些衰弱无力、沮丧惊慌的神甫们纷纷自愿离职，不再主持各种仪式。只要能够找到牧师的地方，改革宗的礼拜仪式都被和平地建立起来。召开议会的时候，对于宗教方面的事务，除了批准国民之前采取的各项改革行动之外，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做了。

这就是改革宗信仰在苏格兰如何始于卑微，经历重重险阻，直到最后以合法建立的发展过程。上帝隐秘的祝福伴随着传道者的劳苦和坚守信仰者的忠贞。一系列的事件促成了改革宗信仰的发源、保存和兴旺——这些事件成为严肃认真、刨根问底的读者研究的对象，他们希望从中追寻至高者的护理之手（the hand of Providence）。尽管历史的舞台上充斥着王公贵族和内阁成员的反复无常、贪婪野心，但他们中间许多人愿意支持改教事业，并充当了推进这场运动的器皿。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一重大事件的脉络。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和罗马教廷的决裂，唤起了不列颠岛北部的居民^①对这场争论的注意。然而英王其后的作为却让他们大失所望。不少苏格兰人有

① 指苏格兰人。



安妮·博林，亨利八世为了与她结婚，断绝了与罗马天主教会的关系

意发动一场比亨利八世提供的模式更有效的宗教改革。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五世的过早驾崩使这些想法成为可能。在阿伦伯爵摄政之初的短暂时期，政府对改教者的提议表示支持，改革宗教义的种子由此得到了广泛的播撒，并深深地扎根于人民之中。当放弃新教立场的摄政王开始采取激烈手段铲除新教势力时，后者已经打下牢固的根基，能经受住这些严峻的考验。由于逼迫，许多人被赶出了祖国，并在爱德华六世治下的、坚决拥护新教的英格兰政府中找到了避难所。在爱德华六世去世后，英格兰和西班牙联盟，苏格兰和法兰西联盟；而西法两国是欧陆上两大敌对强国。这一形势阻止了英苏两国宫廷之间达成任何的一致，并很可能对新教信仰在不列颠的前途造成致命打击。英格兰女王“血腥玛丽”的残暴行径迫使传道者们逃到了苏格兰；而苏格兰摄政太后表面上对新教徒给予关照，并且默许和纵容他们的布道行为。在太后实现了自己的如意算盘、正准备一举粉碎改教运动的关键时刻，伊丽莎白女王在英格兰登基。出于政治和宗教上的双重考虑，女王采取了支持苏格兰改教团体的措施。海峡对岸，洛林的王侯们借弗朗索瓦二世的上台，完全控制了法国宫廷的权力。他们信誓旦旦，决心要镇压苏格兰的新教徒。在和西班牙缔结和约之后，他们似乎要集中整个王国的力量来摧毁苏格兰的改教运动。然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一系列旷日持久的内部冲突在法国爆发，使这个国家饱受蹂躏。法国宫廷被迫签订了和约；从此，法兰西在苏格兰的影响宣告结束，罗马天主教在那片土地上的统治也寿终正寝。

第六阶段

爱丁堡牧师（1560 ~ 1563）

第 19 章

《第一教规书》

宣告和平的欢呼声刚刚告一段落，新教徒的注意力就开始集中到向王国各处分派教牧人员的方案上。从前拟定的安排大体上被重新确认；因此诺克斯恢复了担任爱丁堡牧师的职务。整个八月份期间，他受命撰写《新教信仰宣言》(*the Protestant Confession of Faith*)，将其呈交给议会，并得到批准。议会同时还废除了教皇派的管辖权和礼拜仪式。

改革宗教会的组织形式还没有最后完成。当时主要将日内瓦的英格兰教会制定的《公共次序书》(*Book of Common Order*) 作为敬拜和管理的指南。但是这本书当初只是为一群个别的会众编写的，而且起草者大部分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所以，对于一个由不同的会众联合组成的范围广大的教会，这本书就不太适用了。我们的改教者在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教会体制 (*ecclesiastical polity*) 对于维持次序、保持教义和道德的纯洁以及促进信仰在王国的普遍兴盛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呼吁新教徒予以关注。作为这些努力的成果，枢密院的议员们任命诺克斯和其他五位牧师共同起草一份计划，以他们认为最符合圣经、最有益于推进信仰的方式确定教制方案。在耗费了大量心血共同商议之后，牧师们达成了一致意见，

制定了《第一教规书》^① (*First Book of Discipline*)。

鉴于我们的改教者在这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而且该书主题引人关注，这里我会多花一些笔墨来概括一下宗教改革建立之初，苏格兰教会的形式和秩序。

教会常务性和永久性的圣事人员 (office - bearers) 有四种：

1. 主仆 (minister) 或牧师 (pastor):^② 负责传讲福音和主持圣礼；
2. 神学家 (doctor) 或教师 (teacher)：负责诠释圣经，驳斥谬误。在各类学校和大学中教导神学的人士也包括在内；
3. 治理长老 (ruling elder)：负责帮助牧师实施教会纪律和管理教会；
4. 执事 (deacon)：特别负责照管教会财政和周济穷人。

除此以外，出于必要的考虑，当时还任命了一些人负责特殊和暂时性的事务。由于没有足够的牧师分派到全国各地，为了避免人民失去公共礼拜和接受教导的机会，一些虔诚庄重的人士被委任在教会中诵读经文和进行公祷。这些人被称作读经员 (readers)。如果他们在知识上有长进，将会得到鼓励，可以对诵读的经文附加一些简单的劝诫之言；因此被称作劝诫师^③ (exhorters)。但是，在担任这样的职分之前，他们必须经过考察和认可。

同样的原因导致了另一项权宜之计的出台。由于人手紧张，不太可能分派所有的牧师承担固定的事务，取而代之的合适作法是：在主要的城镇安置固定的牧职之后，委派其余的牧师每人监管一片较大的地区，并在该地区周期性地巡回旅行，从事讲道、开拓教会的工作，并视察各地教牧人员、劝诫师和读经师的举止行为。这些巡回牧师被称作地方监督 (superintendents)。最先建议的人数为

① 也译为《第一训海书》。

② 主仆或牧师也称为教导性长老 (teaching elder)。

③ 在某些现代长老教会中也称为“劝士”。

10人，但因为缺乏合适的人选，或者更主要是因为缺乏必要的资金，实际任命的监督从未超过六人。其余的缺口则由专员（commissioners）和访问牧师（visitors）补充，这些人是由总会（the General Assembly）不定期任命的。

以上所有这些职务的任命模式都由以下程序组成：民众的自由选举——对候选人的考查——公开认可，并伴随祷告和劝勉。对于每一群特定的会众而言，都有牧师、长老和执事管理他们的事务——他们构成了地方教会的“堂会”（the session），这是教会最基本的治理机构；一般每周一次聚集开会，或者更为频繁。还有一种会议叫常务周会或作先知讲道的聚会（weekly exercise or prophesying），^①地点在一个较大的城镇，参加者由附近地区的牧师、劝诫师和教会学者组成，其目的是为了阐释圣经。这种会议形式后来转化为“长老会”^②（the presbytery）或正规会议（classical assembly）。此外，地方监督每年两次和所在地区的牧师及委任长老开会，称作“地方大会”^③（the provincial synod），主要审理所辖区域内的教会事务。最后一级是“总会”（the General Assembly），由来自王国各地委任的牧师和长老组成，一年聚集两到三次，处理有关全国教会利益的事务。公共礼拜则按照《公共次序书》的程序进行，内容作了少许变动。

《第一教规书》的编写者们特别关注当时的教育状况。他们要

① 语出《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4章29到30节：至于作先知讲道的，最好两三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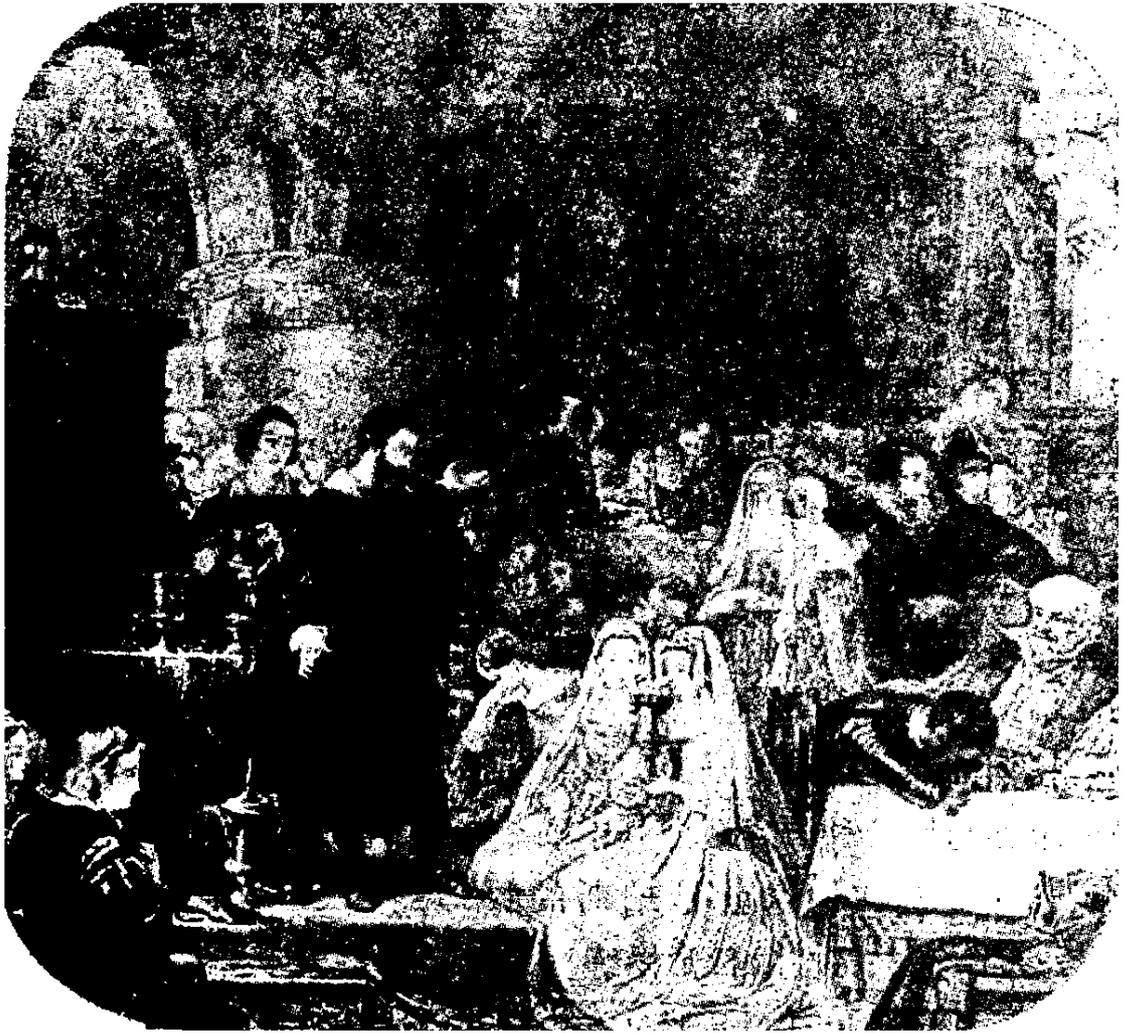
② 长老会（the presbytery）也就是“区会”，是由某一特定地区内所有牧师与各地方教会的一位治理长老所组成，审断本地区的共同事务。牧师也被称为“presbyter”，这个词直译就是“长老”；然而根据后来的威斯敏斯特会议的立场，治理长老虽然也是长老会的参与者，但他们并不是“presbyter”，只有牧师，也就是教导性长老才被称为“presbyter”，在当代华语基督教界，比较通行的译法是将该词译为“牧长”。

③ 地方大会从性质上讲也是长老会，只不过规模更大一些，通常要有三个以上的“区会”才能组成大会。

求在每一个教区都设立一所学校，教导青少年学习信仰原则、语法和拉丁语。他们倡议在每一个“重要的城镇”建立一所大学，除了传授高雅的语言之外，还教导逻辑和修辞学。他们的目的是复兴某些古老共和国所采用的教育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对青少年的抚养权属于公众，而不属于他们的父母；其政策是强迫贵族乡绅教育他们的子女，并且通过公共集资，为那些具备学习天赋但家境贫困的孩子提供教育。《教规书》还为三所国立大学起草了校规，从中可以看出编者对于培养文学素质的开明和重视，也可以发现一些值得当代人注意的线索。如果这些规定没有付诸实行，责任不在改教牧师身上，而应当归咎于那些出于贪婪和短视而废除了该项计划的人士。然而，尽管存在各种问题，政局也时有动荡，从那时起直到16世纪末，苏格兰的文化教育仍然取得了持续和显著的进步。

我们常常会形成错误和夸大的观念，以为我们的祖辈缺乏教养，粗俗不堪。也许当代的一些文人学士对16世纪的教育品味和知识水平不屑一顾。但是，倘若他们能够穿越时空，亲临某位苏格兰改教者的家庭，与他的孩子和学生围坐桌旁，听这些人从头到尾用法语交谈，并且在家庭礼拜中，听到男孩们用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诵读圣经的章节，必定会惊奇不已。倘若他们也被要求参与用某种语言朗诵其中的一段经文，恐怕各位先生就要面红耳赤了。其实，这就是珀斯的牧师约翰·罗先生（Mr. John Row）家中司空见惯的日常操练。当时许多贵族乡绅把自己的孩子寄宿在罗牧师家里学习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由此罗牧师将这两门语言的知识推广到了整个王国。另外，此间我们民族的母语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虽然《教规书》中的计划经过深思熟虑，而且特别适合促进本国的宗教和新兴学科的利益，但是当该书被呈交给枢密院时，却受到了冷遇，后者迟迟不给予正式的批准。这倒不是因为枢密院在教会管理的观点上和牧师们有任何分歧，而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议员们对书中制定的旨在反对罪恶习俗的清规戒律产生了反



1560 年，诺克斯在主持圣礼

感；第二，书中请求从天主教的财产收入中拨出款项，用于支持建立新的宗教和人文教育机构；对此议员们很不情愿。但是，大部分枢密院成员还是在《教规书》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由于对该书的偏爱，《教规书》仍然得到了全国上下的服从，并且其中制定的主要教会法规都得到了贯彻实行。

苏格兰改革宗教会的第一届总会（the first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Reformed Church of Scotland）于1560年12月20日在爱丁堡召开。一共有40名成员出席大会，内中只有六名是牧师，诺克斯是其中之一。他一直坚持参加总会的大部分会议，直到离世。起初，与会者的审议过程非常简洁，许多决定都是一致通过。他们连续开了七场不同的会议而没有设立一位主席或主持人，这真是独一无二的事件。然而，当后来成员人数增多，商讨的事务越来越复杂时，每次会议都选出一人担任主席来维持次序；许多的规条被制定出来，比如审议庭的成员资格，哪些议案必须呈交给他们评断以及审议的程序等等。

这年年底，诺克斯的爱妻去世，他承受了巨大的丧亲之痛。在诺克斯流放期间，妻子和他一同经历患难，当他终于为家人找到了一个舒适的定居之处，妻子却离他而去。如今他不仅要为许多的事务操心，还要独自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诺克斯的岳母仍然和他住在一起。尽管他非常高兴二人能够分享共同的信仰，但无论他如何想方设法，也无法令岳母沮丧低落的情绪有任何起色；这种状况无疑增加了他的负担。丧妻的打击让诺克斯敏锐的情感受到严重的伤害，但他努力缓和自己悲痛的心绪，将更多的精力用来安慰他人，并勤奋地投入到公共事务中。正在这时候，他收到了他极为尊敬的朋友加尔文的一封信，给了他很大的慰藉。加尔文在信中对诺克斯逝去的伴侣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对他的丧偶表示了哀悼之情。这里我要补充一点：诺克斯在弟兄们的一致赞同下，就苏格兰宗教改革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几个难题，向日内瓦改教者请教对策。两人之间有多封书信往来讨论此事。

除了家庭的忧伤以外，某些公共问题也让诺克斯感到十分焦虑。到目前为止，宗教改革的进展非常成功，正如他最乐观的预期一样；新建立的教会体制尚未遇到任何公开的反。但是，形势仍然极为严峻。当时国内有一个人数众多、势力强大的团体，依旧对教皇制度迷恋不舍；虽然他们表面上为大势所趋的改教运动让路，其实却急不可耐地等待机会，巴不得再次将国家卷入内战，复辟古老的天主教传统。玛丽女王和她的丈夫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二世之前拒绝批准法苏签署的和约；^①又解散了议会差派的代表团，并对后者擅自引介的革新措施表示了极大不满。一支新的军队正在法国组建，准备在次年春天入侵苏格兰；与此同时，法国特使在苏格兰四处活动，鼓励和联合罗马天主教徒的力量；最后，英格兰女王是否会再次同仇敌忾、解囊相助，并保护会众派免受法国的第二次袭击，还是一个问号。

^① 1560年7月6日，玛丽的代表签署了《爱丁堡条约》；在其母玛丽·德·吉斯逝世后，按照条约的规定，法国从苏格兰撤军，并承认伊丽莎白女王在英格兰的统治权。仍居法国的玛丽一直拒绝批准这个条约。

第20章

苏格兰的玛丽女王

我们的改教者已经预见到危险的临近，故而竭力说服同胞们为此做好准备。他使人们的头脑中时刻保持着一一种危机感，并鼓动他们在全国上下迅速完成新教体制的建立工作，他深信这是抵御敌人进攻的最佳保障。许多先前对他的话语不以为然的人，如今都专注地聆听他的警戒。尽管法兰西国王的驾崩化解了迫在眉睫的风暴，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项新决议的出台；该决议将苏格兰新教徒卷入了一场新的斗争，并将改革宗教会暴露在危险之下——虽然这种危险不是那么明显和惹人注目，但与公开的暴力和敌视一样令人担忧。这项决议就是新教贵族向他们年轻的女王发出了回国执政的邀请。1561年8月19日，玛丽女王抵达苏格兰，将政府权力揽入了自己手中。

玛丽在法国所受的教育，无论给她的美貌如何增色添彩，但却是再糟糕不过的资本，因为这一切与苏格兰的现实格格不入，使她不知道怎样在眼下的关键时刻统治自己的祖国。与生俱来的暴躁性情，加上一直以来习惯于接受人们对其个人魅力的仰慕，年轻的女王完全不能容忍任何的反对和抵触。成长在欧洲最奢侈放荡的宫廷，过惯了显赫荣华的生活，现在却要服从本国臣民制定的种种限制和清规戒律，她怎么可能屈尊俯就呢？当女王随心所欲的行为冒犯了臣民，使他们怨声载道的时候，她也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他们的

憎嫌和厌恶。带着满脑子有关王室特权的傲慢观念，她将苏格兰最近发生的变故视为对自己权柄的一系列叛逆行为。在她离开大陆之前，法国宫廷用尽了一切手段来巩固她对罗马天主教的盲目忠诚；她从幼年就深受这一宗教的养育和熏陶。多年的灌输使她对自己的臣民所信奉的新教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她被教导说，如果她能够使苏格兰重新归顺罗马教廷，并且和大陆信奉天主教的君主携手铲除异端，将会给她的统治带来莫大的荣耀。如果她放弃皈依多年的传统宗教，只会失去他们的友谊和势力；如果她一如既往死心塌地，就可以仰赖他们的援助去惩罚桀骜不驯的臣民，甚至可以击败邻国英格兰那位信奉异端的篡位者，最终夺取她的王位。

玛丽带着根深蒂固的先入之见回到了苏格兰，并极为执拗地恪守这些观念，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她下定决心，不去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争论主题作任何考查，因为她根本不关心真理到底站在哪一边；她不愿当面聆听新教传道者的发言，也不允许他们陈述自己信仰的缘由——就算有从法国随身带来的教士们在场护驾也是如此；任何会让她对养育自己长大的宗教产生疑惑的事情，她都一概不做。鉴于目前新教徒手中握有大权，玛丽不得不见风使舵，暂时收敛。但她坚持不肯认可最近实施的法令，准备一有机会就推翻改革措施，恢复天主教的旧制。

玛丽初抵苏格兰时，受到了颇为热烈的欢迎，充耳所闻的都是对她的溢美之词。但随即发生的一件事很快让民众的欢乐情绪烟消云散，并且预示着未来的猜忌和混乱。为了向她的臣民表明自己执意遵守罗马天主教礼拜的决心，玛丽下令进行筹备，要在到达后的第一个主日于圣鲁德宫（Holyrood House）的教堂举办一次隆重的弥撒仪式。获悉女王对这次活动大加支持之后，新教徒感到极为厌恶和恐慌，以至于当消息一传出，就激起了强烈的抱怨；如果不是新教领袖们及时干预，并使用权威压制了大众的狂热情绪，恐怕将会爆发一场公开的骚乱。在此危急关头，为了顾及社会安定的大局，也为了避免冒犯女王和她的亲属，诺克斯运用他的影响力和那



玛丽·斯图亚特，苏格兰的玛丽女王

些反应热烈的人士私下交谈，缓解了他们的过激情绪（这些人本打算采取强制手段制止弥撒的举行）。但和其余的弟兄们一样，他也警觉到这起事件所预示的危险。在接下来的主日讲道中他揭露了偶像崇拜的邪恶，说道：“在企图镇压神圣宗教的事情上，即便此刻有一万名全副武装的敌军在王国任何一处地方登陆，也不及一场弥撒仪式更令我感到担忧。”

今天，我们倾向于对我们祖辈的行为感到诧异，并且视他们的担忧为无中生有，或者至少是夸大其词；然后草率地得出结论，断言他们重蹈覆辙——虽然指责对手偏狭和不容异己，自己却犯下了和后者同样的罪行。诚然，如果仅仅为了维护自身信仰的权益而对他人横加逼迫，这是非常可憎的事情；就算轻微的举措也会产生严重的伤害。任何与此目的有关的手段都让我们深恶痛绝。不过，让我们站在公正和开明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对改教先辈们置身其中的社会环境作一点点反思，可以有助于缓和我们惊讶不已的态度，同时让我们的批评更加中肯。的确，改教者当时的反应主要是出于对天主教偶像崇拜的憎恨，以及不愿看到国家再次被其玷污的想法，但同时也是出于保障自身安全的正当考虑。而且，他们的担心不是幻想捏造，所采取的防范也非毫无必要。

在大部分宽容原则和信仰自由的热心倡议者当中，不少人的态度相当中立；若指责他们怀有对新教徒的偏见，实在是毫无道理。然而这些人都一致同意：最残暴的逼迫行为，和当时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教皇制度是分不开的（当时的天主教会骨子里似乎带有某种嗜血成性的偏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法否认的推论是：天主教信仰的宣告和传播理当服从于刑罚性的约束措施；这些措施的必要性在于阻止教皇派重新得势掌权并再次上演以前炮制过的血腥惨剧。苏格兰新教徒对于那些恐怖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如今厚颜无耻的对手又施展阴谋诡计，试图用宗教宽容的迷人高调来麻痹他们；倘若新教徒聆听这些催眠之音，沉溺于某种虚假的安全感，并且放松他们应有的警戒，忽略为将来不期而至的危险早作

筹备——这无异于是一种罪过。他们怎能无视每一个罗马天主教统治的王国内，新教徒所遭受的背信弃义、残暴野蛮和冷酷无情的待遇呢？在法国，由于王后的亲戚们所施加的压力，许多弟兄们被交付死地；在荷兰，不计其数的信徒被拷打、斩首、绞死、溺毙或者活埋；在英格兰，大逼迫的熊熊烈焰不久前才告熄灭；而在西班牙，逼迫的火势依然凶猛肆虐。他们怎能忘记自己的国家最近刚刚发生的事情？又怎能忘记自己好不容易才躲过的劫难？“愿上帝禁止这样的事！”枢密院的领主们曾在某个场合向玛丽女王这样大声喊道（他们并无意要冒犯她）：“忠信圣徒的生命绝对不可落入教皇派的权势之下。以往的经历足以让我们明白，教皇派分子心中所存的是何等残忍的性情。”

有人认为宗教逼迫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新教徒充满戒备的防范手段是毫无必要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大陆强国野心勃勃的征服欲，如今已转变成强迫改宗（proselytism）的狂热。^①天主教国家的君主之间正在紧锣密鼓地订立同盟，意欲将各地的新教徒彻底除之而后快。苏格兰女王接过那个曾让“地上无数的君王喝得酩酊大醉的酒杯”，狂饮不绝，无法自拔。国中不少人也和她一样沉迷其中，同怀此意。在女王得到作弥撒的特权之后，所有自称是天主教徒的人也会马上要求得到同样的权利。迄今为止，许多归到新教旗下的人士其实对新教信仰抱着不冷不热的态度；而其他一些人的热心也大不如以前。更让人担心的是，宫廷用来引诱人的各种好处，以及一位工于心计、富有魅力的女王堆砌的甜言蜜语，将会拉拢一些人重返天主教的阵营，并且哄骗其他人陷入危险的高枕无忧中；而与此同时，阴谋正在暗中酝酿，其目的就是要毁灭这个国家的新教信仰和自由权利。正是这些顾虑使得国中一群最明智的人士起来据理力争。假如不是因为当时改教者们难能可贵的卓越胆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的警世预言必定会得到一一

① 即强迫那些先前接受新教的地区和人民重新皈依天主教。

的证实。

对于那些有意把苏格兰新教徒的言行和罗马天主教徒的不容异己相比较的人士，我推荐他们读一下一位明智的法国作者的陈述；他对这些历史事件发表的意见比我国的许多作者都要更加公正合理。他说：

玛丽在法国被抚养长大，从小就对新教徒被烧死的景象司空见惯；她也长期受到舅父们——吉斯家族成员之观念原则的灌输。他们主张，对任何所谓的宗教改革分子，都应当毫不留情地赶尽杀绝、斩草除根。玛丽带着这样的思维倾向回到了苏格兰。当时这个国家除了少数领主以外，几乎全部接纳了新教。然而整个王国仍然欢迎她的到来，承认她是他们的女王，并且在一切事情上都依照国家的法律对她表示顺从。我敢断言，假设一位胡格诺派的女王带着大批随从人员，就像玛丽回到苏格兰的架势一样，去继承一个罗马天主教国家的王位，那么依照那个时代人们头脑中的观念，他们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她逮捕入狱。倘若她仍然坚守自己的信仰，那么他们就会请求教皇贬黜她的君王身份，把她投入宗教裁判所，最后把她作为异端分子送上火刑柱烧死。任何一位诚实面对历史的人，都不会否认这种假设的真实性。

毕竟，对于那些赞同现今英国宪法的人士而言，我们根本没有必要为先辈们意图加给玛丽女王的诸般限制进行辩解。众所周知，今天的英国宪法完全排除了天主教徒成为君主的可能性，并且规定，如果在位的国王胆敢私自在自己的礼拜堂中设立弥撒，将被立刻剥夺王位。请问：难道天主教在今天的危险程度，比250年前要

更加严重吗?^①

除了对国家大局的忧虑，诺克斯也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自己的个人安全。他在最近的革命行动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无疑激怒了玛丽女王。逃离苏格兰的天主教教士们声称他是那些挑起内讧之人的头目。玛丽离开法国之前曾表示，一定要让诺克斯受到严惩。他所撰写的反对女性政府的著作显然最有可能成为指控他的证据。事实上，诺克斯曾经托爱丁堡的英格兰侨民向伊丽莎白女王说情，希望得到她的支持；这显然是由于他害怕后者也会受人唆使，参与反对他的行动。但是，尽管诺克斯担心玛丽会给公众和自己的安全带来诸多的威胁，他却并没有出面阻挠邀请她回国的决定。相反，他不但在这件事上和弟兄们立场一致，而且还和他们一道挫败了切斯特哈罗特公爵（Duke of Chastelherault）的阴谋——当时后者在圣安德鲁斯大主教的授意下，准备剥夺玛丽执政的权利。然而，当圣安德鲁斯执政官^②即将被派到法国去邀请玛丽回国时，诺克斯强烈要求把“不可举行弥撒仪式”作为玛丽获准回国的条件之一。当他发现执政官和枢密院的其他议员倾向于准许玛丽拥有在自己的私人礼拜堂做弥撒的自由时，他预言说：“她的自由将成为他们的网罗。”

① 作者的意思是，今天（指19世纪初期，本书的写作年代）的英国在太平盛世之下禁止天主教徒染指王位的规定，其苛刻程度远远超过苏格兰改教时期的新教徒加给玛丽女王的限制措施。如果人们觉得今天针对天主教徒的严厉政策无可厚非，为何反而对改教者限制玛丽的行为大放厥词呢？作者要表达的抗议是：某些批评家对于改教者“缺乏宗教宽容”或“不容异己”的定罪是毫无道理的。

② 即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wart），詹姆斯五世的私生子，玛丽女王同父异母的兄弟，会众派的主要领袖之一。

第21章

第一、第二次会面

不管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还是因为别人的建议，总之，玛丽女王一到苏格兰就马上派人召诺克斯进宫，并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当时女王的兄长圣安德鲁斯执政官也在场。玛丽似乎希望，就算不能通过辩论来打乱对方的阵脚，起码也要借自己的权柄威慑诺克斯自己表示屈服。但诺克斯大胆无畏地回复了她所有的指控，并为自己的言行作了有力的辩护，使她的两样打算都落了空。女王本想给诺克斯一个下马威，不料后者反而让她碰了一鼻子灰。玛丽控告诺克斯的罪状有四条：一、煽动臣民反对女王和她的母亲（即摄政太后）；二、著书攻击女王所拥有的合法权柄（玛丽宣称，她可以让欧洲最博学的人士来进行回应）；^① 三、他在英格兰逗留期间，引发了那里的骚乱和流血事件；四、他使用邪门巫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针对这些严重的控诉，诺克斯的答复是：真诚地教导上帝的真理，斥责偶像崇拜以及劝诫人们按照上帝的话语去敬拜上帝——如果这样做是煽动臣民起来反叛他们的君主，那么他毫不避讳地承认自己犯有这一“罪行”；因为他是被上帝所选派，按照上帝所喜悦

^① 指诺克斯所著《吹响反对女性丑恶统治的第一声号角》一书。

的旨意，去向这个王国的人民揭露天主教的虚空无益，以及罗马教廷敌基督者的谎言、骄横和暴政。但是，如果对于上帝的认识并正确敬拜他的真知识，是促使臣民由衷顺服其君主的最强大动力（事实上的确如此），那么他是清白无辜的。他完全相信，现今苏格兰新教徒对于女王陛下的顺服之心，其真实程度绝不亚于那些教皇派主教们对她的父王或任何先王的效忠之心。对于传到女王耳中的有关他在英格兰布道之果效的报道，诺克斯感到十分满意，因为天下人都知道他的敌人所陈列的罪证是荒谬无稽的言辞。如果他们中间有人能够证明，诺克斯当年在英格兰居住过的任何一个地方发生过暴动或叛乱，那么他愿意承认自己是一名罪犯。但事实显然与谣言不符。他可以毫不羞愧地说，在伯威克，驻军士兵中间以前常常发生流血冲突，然而上帝大大祝福了他软弱不足的事奉，使当地充满了宁静祥和的气氛，正如今日的爱丁堡一样。至于诽谤他行法术的谣言（其实他在各处布道时都谴责邪门巫术之类的活动），诺克斯就更不以为意了，因为他回想起主耶稣也曾被人污蔑为跟鬼王别西卜是一伙的。谈到那本似乎大大得罪女王的著作，诺克斯承认是自己所写，并且很愿意交付诸位学者去作评断。他知道一位英格兰人曾经撰文发表过反对意见，但他并未看过此文。如果那位英格兰人有理有据地驳斥了他的论述，并成功构建了针锋相对的命题，那么他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在那一时刻到来之前，他会始终认为自己能够坚守书中的观点；就算有 10 位欧洲学者群起而攻，他也不为所惧。

“那么你认为我没有合法的权柄？”女王发问。

“尊敬的陛下，”诺克斯答道，“所有世代的有识之士都具有独立和明智的判断力。他们的洞察往往和世界的通行观念不同。他们也通过著书立言，发表演讲，将自己的思想公之于众；尽管他们自己仍然和众人一样生活在公共社会中，并且耐心地忍受着那些靠一己之力无法解决的种种谬误和缺陷。哲学家柏拉图（Plato）在其著作《理想国》（*the Commonwealth*）中，曾谴责了当时世界诸多

流行的弊端，并要求对许多事情进行改革；然而，他却依旧生活在被同时代人普遍接受的法度规条之下，并没有扰乱任何政府的统治和秩序。陛下，我甘心乐意所行所作的也与此类似，而且都是出于纯正的动机，这是我清洁的良心可作见证的。”诺克斯补充说，他在女性执政问题上的观点只限于个人意见的范围内，并不会大肆张扬；如果女王能够避免施加逼迫手段，那么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著作，都不会对她的权柄产生任何损害。毕竟，“那本书的写作目的，主要是针对英格兰那位邪恶的耶洗别。”

“但是，你在书中所谈论的是所有的女性。”女王说。

“的确如此，陛下。但依我之见，您若是明智通达之人，就绝不会在此问题上大做文章，纠缠不休，因为迄今为止，这本书并没有对陛下的人格或权柄造成任何损害。近年来，许多从前认为不可动摇的事情都受到了质疑，甚至受到了清楚明白的批驳；但是，陛下，我可以很确定的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无法证实，有关女性权柄的诘问曾在公开或私下场合被提议过。此外，陛下应当知道，假如我曾因为您的女性身份而企图阻止您回国秉政，我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更有利的时机来达到这个目的，而不必等到现在您亲临国内的时候。”

于是女王转换话题，指责诺克斯教导人民接受一套未经他们的君主许可的信仰，并质问他，这种行为岂不是与神圣的诫命相悖吗？上帝岂不是命令臣民必须服从他们的统治者吗？

诺克斯答道：“真实信仰的源头和权柄并不是来自于君主，而是来自于永恒的上帝；君主们通常是一群对真实信仰最懵懂无知的人；臣民在宗教信仰的问题上并没有义务要服从于统治者专制武断的意愿——假若有这项义务的话，那么古希伯来人就应该皈依埃及法老的宗教，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也必须信奉尼布甲尼撒和大流士的宗教，早期基督徒也应当接纳罗马皇帝的宗教了。”

“是的，”女王回答，口气略有缓和，“但这些人并没有用武力来对抗他们的君主。”

“但您不能否认他们进行了抵制，”诺克斯说，“他们没有服从颁布给他们的命令，这就是一种真实的抵制。”

“但是他们并没有用武力进行抵制。”女王反驳道，紧紧抓住这一关键不放。

“陛下，这是因为上帝没有赐给他们相应的权能和手段。”

“你的意思是，如果臣民得到这样的权能，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抵抗他们的君主吗？”女王追问。

“陛下，如果君主们越过了他们的界限，那么毫无疑问，臣民就可以进行抵抗，甚至通过权能的方式。臣民应给予帝王君主的尊崇和顺服，我想不会大过儿女应给予父母的尊荣和孝敬——后者是上帝所亲自命定的。但父亲也有可能陷入癫狂，要杀害他的儿女。假如儿女们奋起抗争，一同联手抓住父亲，夺过他的刀剑，捆绑他的双手，并将他关入监牢，直到他的癫狂平息下来；请问陛下，您的意见如何？那些儿女们所作的有什么不对吗？同样的道理，有的君主会对自己治下的神的儿女大开杀戒；他们盲目的热心不过是一种丧失理智的癫狂。因此，当臣民夺过他们的刀剑，捆绑他们的双手，并将他们投入监狱，一直等到他们的头脑恢复至一个比较清醒的状态，这样做并不是对君主的不顺服，而恰恰是对正义的顺服，因为这一举动符合上帝的旨意。”

女王虽然在先前的辩论中一直底气十足，但诺克斯以上大胆的答复使她完全落败。她脸色大变，呆若木鸡，沉默良久。一旁的兄长和她搭话，询问她为何惊愕不安，但她没有回答。最后，她回过神来，说道：“原来如此。据我看来，我的臣民应该顺服您，而不是顺服我；他们可以随心所欲，而不是按我的命令行事；就连我自己也必须听任他们摆布，而不是让他们接受我的统治。”

“绝非如此！”诺克斯回答，“我从来无意要命令任何人来顺从我，也不是要臣民随心所欲任意而行。我劳苦事奉的目标，乃是看到君主和臣民都来顺服上帝。陛下，当您被要求顺服上帝的主权时，请不要以为受到了冒犯；因为正是上帝使臣民隶属于君主的权

杖之下，并且履行向君主顺服的义务。上帝期望国王们像养父一样照看他的教会，并且命令女王们像乳母一样眷顾他的子民。陛下，这种对上帝和他的教会的顺服，是凡人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得到的最高贵的尊严——因为这将带他们进入永远的荣耀。”

“但你们并不是我要呵护保守的教会，”女王说，“我必须捍卫罗马教会，因为只有罗马教会才是上帝真正的教会。”

“陛下，您的意愿毫无理性的根据。不管您如何思想，也不可能将罗马的淫妇变成真实无伪、纯洁无瑕的基督的新妇。陛下，请不要对我称呼罗马教会是淫妇感到惊奇，因为无论在教义还是行为上，那所教会已经全然被各种属灵的淫乱所玷污。”诺克斯补充说，他随时可以证实：从前，在犹太人拒绝并钉死上帝之子的年代，他们已严重偏离了上帝借摩西和亚伦传给他们的律例典章；如今罗马天主教会也远离了使徒所教导的纯正信仰，其衰败程度，比犹太教会的堕落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的良心却不这样认为。”女王说。

“陛下，良心需要知识的指引。我担心您并没有正确的知识。”诺克斯说。

当女王说自己听过教诲，读过经典时，诺克斯答道：“陛下，把基督钉十字架的犹太人也是如此；他们都读过律法和先知书，并且听过有关这些经书的含糊解释。除了教皇和红衣主教们所准许的人士之外，陛下有否听过其他人的教导？我可以向您保证，您的教师们绝不会发表任何损害他们自身利益的言辞。”

“您用一种方式解释圣经，”女王含糊其辞地推托道，“而他们用另一种方式。我应当相信哪一方呢？谁又能充当裁判断定是非呢？”

“您应当相信上帝，因为他在他的道中清楚明白地说话，”诺克斯回答，“除了上帝的圣言对你的指教以外，您不应当相信任何一方。上帝的道本身是明显易懂的。如果某一处经文的意义模糊不清，圣灵会在另外的地方作出解释，因为他从不会自相矛盾。除非碰到那些冥顽不化之辈，否则圣经的真理是人人可以明白的。”



诺克斯和玛丽在对话

为了举例说明，诺克斯从双方争论的条款中选择一个主题，即有关主的晚餐的圣礼，并指出教皇派制定的弥撒献祭仪式是没有任何圣经根据的。但是，女王决意要避免陷入任何有关自己信仰条款的讨论，故打断了诺克斯的陈述，借口说自己的能力不足以和他争辩；但若那些昔日教导自己的老师们在场的话，那么他们可以回应诺克斯的挑战。

“陛下，”改教者情绪激昂地回答，“上帝作证，巴不得欧洲最有学问的天主教学者，并您最信任的导师能够当场和我辩论一番，巴不得您能够耐心地聆听这场论战直到最后结束！因为我毫不怀疑，陛下，到那时您就会了解罗马天主教的空洞虚假，以及他们的教义何等缺乏上帝话语的根据。”

“是吗？”女王说，“您所说的这一刻，也许比您的预计来得更快。”

“确实如此，如果我今生有幸得到这样的机会，那一定是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愚昧无知的教皇派人士不会有辩论的耐心，而拥有学识、狡诈老练的教皇派人士永远也不会来此应战，唯恐会在陛下面前破绽百出，暴露了天主教的真正根基。倘若您能够让我看到完全相反的结局，我愿意承认自己受到了蒙蔽。”诺克斯说道。

晚餐过后不久，这场单独谈话即告结束。临别时，改教者对女王说：“陛下，我祷告上帝，愿您在苏格兰人民中间得享祝福，正如底波拉在以色列人民中间得享祝福一样。”

这场会见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人们纷纷猜测可能产生的后果。对天主教徒而言，这是一个危险的警报；因为他们现在把所有的指望都押在女王身上，所以唯恐诺克斯的滔滔雄辩会动摇女王坚定的信念。新教徒们则满心期待女王会从此改变态度，愿意聆听新教徒的布道，并且逐渐消除她的宗教偏见。诺克斯并没有怀抱如此乐观的期望。在上次的会面中，他通过观察发现了女王真实的性格：骄傲、诡诈、对天主教会死心塌地并且反感所有形式的教导。诺克斯从那时起形成的这一看法在日后形势的发展中得到了证实。因此，

他非常警觉地注视着女王的一举一动，只要有任何危害新教利益的倾向，他都会发出及时的警告。当他察觉到新教贵族的热情在渐渐冷却，并且女王的诡计屡屡得手，使贵族们丧失了防备之心时，他就越发频繁地大声疾呼，吹响警报。尽管他的表达方式常常激烈严厉，他的讲道和祷告势大力猛、搅动人心、令人难以忍受，但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讲，他的言辞从来没有扰乱过公共秩序，相反对公共安全倒颇有助益，甚至可以让人避开那些使国家卷入其中的混乱——正是那些混乱导致了执迷不悟的女王最终走向毁灭。诺克斯粗犷率直、不加修饰的风格显然不是用来讨取女王的欢心的（其实就算换成相反的语气也不会奏效），他的劝诫也常常令女王感到恼火；但她迫于压力，不得不更加谨慎收敛，适度节制。在很大程度上，诺克斯的言行激发了全体国民的热忱，唤起了他们的危机意识；这两种态度无疑是那段时期新教信仰在苏格兰的重要保障。当时的英格兰大使一直是诺克斯忠实的听众，从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对诺克斯讲坛事奉的果效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他在写给塞西尔的信中说道：“既然您劝勉我们要在信仰上根基牢固，我可以确实地告诉您，一个人一小时的讲道所能给予我们的生命供应，远胜过600只号角在我们耳边持续不断的轰鸣。”

有一些朋友认为改教者的措辞过于严厉。其实他并非不知道这些意见，而且在很多场合，他的确没有为自己的表达方式作过辩解。不过，他仍然坚信，眼下的时局需要最直白坦率的语言；而且他担心朝中大臣的甜言蜜语下面，隐藏着重重陷阱。针对塞西尔给自己的建议，诺克斯在回信中答道：“那些喜欢两面讨好的骑墙派经常抱怨我过于严厉。我倒是担心，与这个王国内任何一位传道者的激烈言论所带来的后果相比，他们所标榜的宽厚仁慈、柔声细语将给他们自己和别人带来更可怕的毁灭。”

正如诺克斯所忧虑的，一些新教领袖的热忱因着“宫廷圣

水”^① 的功效开始冷却下来。女王视教会召开的总会为眼中钉、肉中刺，巴不得将其取缔。在她到达苏格兰之后召开的那届总会上，有一些大臣受她的影响而故意缺席；当受到质问时，他们就争辩说，既然令女王感到不快，那么召开这些集会是不妥当的。在这一点上，诺克斯和时任国务大臣的梅特兰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剥夺我们的集会权，就是剥夺了我们所拥有的福音，”改教者说，“如果教会的自由必须建立在女王的同意之上，那么我们不仅不能集会，而且连传福音的权利都没有了。”此外，诺克斯对支付教会牧师待遇所作的安排感到非常愤慨。迄今为止，新教牧师们主要依靠听道者的捐款度日，其中许多人几乎没有维持生计的手段。鉴于抱怨声不绝于耳，枢密院被迫开会进行商议，最后作出的决定是：教会的收入分成三部分；三分之二给遭到赶逐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剩下的三分之一则由宫廷和新教事工平分。那些负责调配津贴的人员倾向于满足女王的需要，故而最后付给新教牧师们的薪水少得可怜，根本不敷使用。当获悉这一可耻的安排时，诺克斯大声说道，“唉！如果这一假称为了供养牧师需要所作的安排能够有什么好的目的，那真是匪夷所思。我看到三分之二白白交给了魔鬼，三分之一必须在上帝和魔鬼之间分配。谁能想象，当约瑟统管埃及的时候，他的兄弟们居然还得辛苦劳力才能糊口，而且回家的时候仍然粮袋空空?! 哦！假如今生之后没有天堂和地狱的话，那么作魔鬼的仆人真是太幸福了，作耶稣基督的仆人真是太悲惨了！”

诺克斯之所以就此问题发表语气强烈的抨击，乃是因为他的抱怨不是出于个人利益的动机。他自己的津贴尽管不高，但是和绝大多数的弟兄们比起来，还是相当充足的。从他最后一次回苏格兰直到内战结束，他主要依靠来自多方的个人奉献来支持他的家庭。此后一段时期，他临时寄宿在一位爱丁堡的议员大卫·福里斯特（David Forrest）家里，后来又搬到曾属于邓弗姆林修道院长迪里

① 指玛丽从法国带来的天主教风气的影响。

(Durie, abbot of Dunfermline) 的私宅中。当他开始在爱丁堡定期讲道之后,市议会就发给他一笔数额为两百英镑的年金,每季度付一次;另外还替他支付房租,并向某些人补偿先前为供养他的家庭所付的费用。当枢密院的津贴方案出台以后,诺克斯似乎只能从拨给教会牧师的公共基金中领取微薄的薪水了;但爱丁堡的市民补足了政府津贴的缺口,再次证明了他们的慷慨之心。实际上,市议会对诺克斯的住宿和生活条件十分关心,这是一件值得赞誉和尊敬的美事;所以我特地在此记上一笔。

1562年年初,唐县的约翰·厄斯金被推选为安古斯和蒙斯地区的地方监督;诺克斯赶到安古斯去主持他的就职仪式。在第一届总会所宣布的“具有事奉能力和才干”的人士当中,就有这位受人尊敬的男爵。他曾经为推进改教事业多方出力,贡献不小;如今,当教会急需敬虔博学人士时,他又献身于这份艰辛的工作,全心来事奉教会。在此之前,诺克斯还主持了约翰·斯波蒂斯伍德(John Spottiswood)担任洛锡安地方监督的就职仪式。

有时,我们的改教者还被邀请去调解新教徒之间的民事纠纷,从这些事中可以看见他的个人声望和影响力。一些当地居民因目无法纪的行为而招致惩罚时,经常会请求诺克斯替他们向市议会说情。这一年的三月,博斯维尔伯爵(Earl of Bothwell)一再恳请他帮助化解自己和阿伦伯爵之间不共戴天的世仇。由于之前握有大权的枢密院对此事也无能为力,所以诺克斯很不情愿介入这桩是非。但在几位朋友的要求下,他最后同意出面调停。经过非常艰苦的努力,他终于成功地说服他们举行一次友好的会见,双方一致承诺将所有的恩怨一笔勾销。然而和约刚刚签订不久,阿伦伯爵就向诺克斯举报说,博斯维尔向他提起一桩反叛朝廷的阴谋;这一消息使诺克斯受到很大羞辱。最终两位贵族双双入狱。虽然阿伦伯爵有精神错乱之嫌,但朝中权臣仍然由于这场虚惊而大大提高了戒备之心。

第22章

第三、第四次会面

五月的时候，诺克斯和女王又进行了一次会谈。事情的起因是法国的吉斯家族正在极力夺回自弗朗索瓦二世驾崩后丧失的权势；考虑到对罗马天主教的热忱是掩盖其野心勃勃计划的最好借口，他们行动的第一步就是挑起对新教徒的逼迫。三月初发生的瓦西大屠杀（the massacre of Vassy）不过是整个阴谋的序曲。当时吉斯公爵（Duke of Guise）和洛林的红衣主教带领一支武装部队，袭击了正在做礼拜的一群新教会众，杀害了一些人，打伤了其余的人，甚至连妇女和孩子也未能幸免。当舅舅们血腥镇压新教徒的消息传到玛丽女王耳中时，她马上为她的法国侍从们举办了一次豪华的舞会，跳舞狂欢直到深夜。

诺克斯被告知了王宫里的欢庆活动以及事情的缘由。他一直非常关注法国新教徒的情况，对他们的遭遇感同身受，并且和其中不少人有很熟的交情。另一方面，他对洛林王侯的评价非常糟糕。在接下来的主日讲道中，他严厉地抨击了王侯们所热衷的各种罪恶，诸如压迫、无知、憎恨德行、结伙行恶、喜爱愚蠢的享受等等。有人很快将这篇讲章的信息添油加醋一番通报给女王；第二天，诺克斯就接到了入宫接受问话的命令。当他被带入王宫的内廷时，女王和她尊贵的仆人及主要顾问都已正襟危坐，准备兴师问罪。他们控告诺克斯对女王出言不敬，使她成为臣民蔑视和仇恨的对

象。

当女王对此主题发表了一通冗长的讲话之后，诺克斯被准许为自己辩护。他说，有许多人拒绝出席宣讲上帝之道的礼拜，陛下也是其中之一；他平常对那些人的态度如何，对陛下的态度也如何。由于陛下没有亲自去听道，所以只能相信那些阿谀奉承之人的虚假汇报。假若陛下当时在场，那么他相信，她在那篇讲道中不会找到任何冒犯不敬的言语。因此，为了澄清事实，现在他会当着女王的面，尽量不作改动地将昨天的讲道重复一遍。诺克斯复述讲章之后，问道：“如果在座的哪位先生或女士认为我昨天在讲坛上说过的某些话，是我刚才没有提到的，那么请当场指控我。”有几位出席者作证说他的复述完全属实。女王转向那些告密者，可他们都哑口无言；于是对诺克斯说，虽然他的措辞相当严厉，但无可厚非，显然和自己先前听到的报告大有出入。她很清楚自己的舅舅们和诺克斯各自信奉不同的宗教，所以不会怪罪他对法国贵族缺乏好感。但是，如果女王有任何行为传到他耳中，让他感到不快，那么他应该直接找女王面谈，她也愿意洗耳恭听。诺克斯一眼就看穿了这个貌似合理的建议背后隐藏的诡计。他答道，只要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他愿意做任何事来为女王效力，使她心满意足。如果女王决定出席公共讲道的聚会，就能亲耳听闻诺克斯对她和众人的言行所表达的赞许或不悦；或者，倘若女王愿意专门约定一个时间，为要聆听他在公开场合传讲之教义的实质内容，那么他也会十分乐意为女王效劳；时间、地点和方式都可以由女王决定。但是，如果要他跑到女王的内室门前、单单向她私下传达人民对她的看法和意见，那么他的良心和职责都不会允许自己去做这样的事情。最后他用严肃的口吻说道：“虽然我今天来到这里，是出于陛下的命令；但我在一天当中的这个时刻，抽身离开我的日常工作，来到宫中伺候，我真不知道其他人对我会有何评价。”

“你总会有歇工的时候。”女王愠怒地说道，然后背过身去。

当诺克斯神采奕奕地离开内廷时，一些天主教侍从嘀咕道：

“他居然一点都不惧怕！”

诺克斯带着一脸的讽刺答道：“我已经看过太多满脸怒色的男人，并没有感到任何惧怕。为什么现在反要害怕一位和颜悦色的尊贵妇人呢？”

第 23 章

再度论战

在这段时期，爱丁堡市内只有一处礼拜场所。和今天比起来，当时该城的居民人口不多，但教会会友的人数相当可观。圣贾尔斯教堂内用来敬拜的地方非常宽敞，最多的时候能够容纳 3,000 人聚集听道。从 1560 年起，诺克斯就开始履行所有的教牧职责，除了读经员约翰·凯恩斯（John Cairns）之外，身边再没有其他助手。每个周日他讲道两次，周中讲道三次。每周要固定参加一次本教区的堂会，进行培灵训练，并参加一次区会，操练对圣经的运用。此外，他还要参加地方大会和总会。在几乎所有的会议中，他都会被任命到某些偏远地带去探访和讲道。他本已受损的健康因为这些劳累的工作而难以承受；尤其是他不太愿意作即兴讲道，每天都要划出专门的时间进行灵修学习，所以负担更加繁重。他的教区对他的景况非常关注；1562 年 4 月，市议会一致决定，恳请卡农门 [minister of Canongate, 即圣鲁德宫 (Holyrood House)] 的约翰·克雷格牧师 (John Craigor) 来帮助诺克斯分担一半的职责。其后召开的总会批准了市议会的提议，指派克雷格转到爱丁堡就职。但是，由于在获取额外津贴的问题上遇到困难，直到 1563 年 6 月，克雷格才最终得以赴任。

1562 年的整个秋季，罗马天主教徒满心希望形势会出现有利于他们的逆转。由于几次剪除新教权臣的企图都未成功，亨特利伯

爵 (Earl of Huntly) 公开在北部举兵起事, 想把女王从新教徒的手中援救出来。与此同时, 圣安德鲁斯大主教也极力联合, 鼓动南部的教皇派遥相策应。在此关键时刻, 我们的改教者再次表现出一贯的热忱和远见。当他受到总会的任命, 以专员的身份去访问西部地区的教会时, 他说服了当地的贵族们订立了一个新的防御同盟; 之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加洛韦 (Galloway) 和尼思河谷 (Nithsdale) 地区, 借着讲道和谈话, 坚固了这一带的新教徒团体。他委托马克斯韦尔的法官给博斯维尔伯爵写信 (伯爵刚从狱中逃出来, 很有可能会加入亨特利的阵营), 使他不至于倒戈。他还亲自给切斯特哈罗特公爵去函, 警告他不可屈从其兄弟圣安德鲁斯大主教的诱惑, 更不可参与后者的阴谋, 否则必将自食其果, 给自己的家族带来灭顶之灾。通过这些手段, 王国南部保持了和平稳定的局面, 同时枢密院的有力措施也平息了北部地区的叛乱。新教徒的胜利让玛丽大为沮丧。可以完全肯定的是, 就算女王私底下对亨特利造反一事并不知情, 她至少期待兵变能够有助于推进自己的计划。虽然这次她嘴上没有明说, 但心里原本“盼望在一年的时间内, 看到弥撒仪式和天主教信仰在整个王国境内得以恢复”。

痴迷于这样的盼望, 教皇派的教士们觉得有必要比先前更加公开地捍卫他们的教义, 以便为自己东山再起的计划赢得支持。他们开始公开讲道, 并夸口说随时恭候和新教牧师们展开辩论; 其中为首的一人名叫昆廷·肯尼迪 (Quintin Kennedy), 是克罗斯拉戈尔的修道院院长 (abbot of Crossraguel), 也是卡西里斯伯爵 (Earl of Cassilis) 的叔叔。肯尼迪的大半生和其他教士们一样庸庸碌碌, 对自己的职责疏忽怠慢。但是, 1556 至 1557 年间, 新教传道者以破竹之势攻击天主教信仰, 并猛烈抨击圣品阶级的懒惰和腐败; 他们的节节胜利将这位修道院长从无所事事的状态中唤醒过来。虽然已到迟暮之年, 但他却没有卸职退休, 而是开始擦亮闲置多时的神学武器, 并披戴上了全副盔甲, 准备投入论战。

肯尼迪初次亮相是在 1558 年, 当时他出版了一本有关天主教

护教策略的简短方案，题目是《扼要小册》(Ane Compendious Tractive)。这本书在所有牵涉到信仰和宗教的争议问题上，指出了一条基督徒如何确立无愧于良心的“唯一和最近的途径”。这个途径无非就是要绝对信任教会或圣品阶级所作的决定。在每一次信仰争议中，圣经只不过扮演了见证人的角色，教会才是法官。教会在根据正统教规召集的大公会议上所作出的决定，所有的信徒都应当谦卑地接受和顺服。毋庸置疑，这条最简明直接的途径能够确保每一个基督徒的良心平安，而且无须经过考察和辩论就可以解决任何争议。

但是，由于固执的改教者们不愿顺从这一简单便利的决策模式，所以肯尼迪很不情愿地和他们展开了冗长的辩论。当威洛克于1559年年初在克罗斯拉戈尔附近讲道时，接到了肯尼迪的挑战，指明要就弥撒的献祭问题进行辩论。威洛克接受了战书，时间和地点也定下了，但肯尼迪却坚持要求：除非对手事先表态，愿意认同古代教会的神学家对圣经的诠释，否则他不会应战。从那时起，肯尼迪似乎把弥撒作为他神学研究的重要题目，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来装备自己，以便有足够的实力来捍卫这一天主教信仰的基石。

1562年的秋季，海乔治(George Hay)被总会派到卡里克(Carrick)和坎宁安(Cunningham)一带讲道；肯尼迪又提出了和他辩论的要求。8月30日，在柯克奥斯瓦(Kirk Oswald)的教堂里，肯尼迪宣读了几篇有关弥撒、炼狱、向已逝圣徒祷告和使用图像等方面的文章。他说，若任何人对上述内容提出异议，他会出面进行辩护；他还承诺在下一个主日就这些信条发表自己更全面的观点。诺克斯当时正好在邻近地区，于是在所定的主日赶到了柯克奥斯瓦，打算聆听肯尼迪院长的发言，同时满足后者的愿望，和他辩论一场。结果院长大人没有露面，所以诺克斯自己在教堂里讲了一场道。当他走下讲坛时，收到了一封来自院长的信，内中写道，院长很理解诺克斯拜访此地的目的是为了找人辩论，故而愿意下一个主日在梅博尔(Maybole)的任何一所房子里和他见面，条件是每一

方的赴会人数不可超过二十人。诺克斯答复说，自己此行并不是特意来辩论，而是为了传扬福音。不过，他仍然十分乐意和院长会面，但自己已经有约在先，下周日要去邓弗里斯办事。所以，如果院长能够先把文章送给他过目的话，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回复并确定见面日期。

此后二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和接续的辩论让人感到饶有趣味。诺克斯希望自己的答辩应该像院长的文章一样公开发布，并建议双方在艾尔的圣约翰教堂（St. John's Church）举行会面。但院长拒绝在公开场合进行辩论。卡西里斯伯爵写信给诺克斯，对所提议的论战表示了不满，认为这场活动不会带来什么益处，而且很有可能对公共秩序造成威胁。诺克斯在答复中指出：是伯爵的叔叔最先发出了挑战，所以自己不能随意拒绝；请伯爵务必支持他信守赴会的约定，而不用担心这场辩论会引发任何严重的后果。当肯尼迪获悉此事后，感到自己的声誉受到了伤害，于是给改教者去信一封，大意是：当诺克斯上次在此地停留的时候，若不是卡西里斯伯爵插手拦阻，他早就和诺克斯“交手过招”了。他还指责诺克斯招引他的侄子写了那封信，目的是要让他蒙受羞辱。“你可以确信的是，”院长说，“我必会按照我在书信里定下的日子和地点，到梅博尔和你会面；我已做好准备随时动身。”在另一封写给诺克斯和艾尔市政官的信中，他重申：“以卡西里斯伯爵的书信为证，望您遵守诺言，请勿借口推托。”鉴于院长的态度如此坚决，双方很快就商定了交战的各项前提条件：日期定于9月28日早上八时，地点在梅博尔的市长家中；每一方可携带40人赴会，作为论战的见证人；另外，“由于房屋宽敞，故还有许多其他的听众到场（正如卡西里斯伯爵后来亲眼所见）”。速记员或秘书将负责对双方可能递交的任何论文进行登记，并记录辩论过程中双方提出的论点论据，以防止不必要的重复和错误的指证。在论战的前一天，这些条件均得到了院长和改教者正式的签字同意。

会议一开始，首先由院长宣读了一篇论文。在进入正题之前，

他详述了自己到场的理由，并声明自己参与辩论的行动并非暗示所讨论的主题值得商榷或悬而未决；实际上，他要提到的论点都是历届合法的大公会议所作出的决议。他已作好充分准备来捍卫从前所陈明的教义条款。其中的第一条，就是弥撒中的献祭。

针对这篇论文，诺克斯在论战进行过程中递交了一份书面答复；与此同时，他陈述了自己对于大公会议的观点，之后就所辩论的信条发表了意见。他认为有必要对争议的主题作一个清楚明确的阐述。这个主题包括四个方面：名称、形式和运作、蕴含的观念，以及拥有权柄的执行者（靠此权柄他可以使自己的行动具有合法性）。他随时可以表明，这四个方面的全部缺乏任何圣经根据。

院长很清楚铺开话题和拉长战线将导致的麻烦，于是牢牢坚守自己的立场，和对手进行较量。他说：“关于诺克斯先生准备驳斥的弥撒，我的意见是——不管是谁的弥撒，实际上，就算是教皇自己举行的弥撒，也不是今天讨论的焦点。我所坚决拥护的，不是别的，乃是耶稣基督的弥撒；我的文章和著作对此提供了非常详细的定义和论据。诺克斯先生可以就这些手头上的文字提出异议。”

诺克斯回答，他很高兴地听到院长说自己只愿单单为基督的弥撒作辩护；倘若院长坚持这一点的话，那么他们离“达成基督徒之间的共识只有一步之遥”；因为无论何事，只要有人能证明是由基督亲自设立的，他随时都愿意给予认可。关于院长的书，诺克斯承认自己还未拜读，故请求对方为他宣读其中的关键定义（他并没有为自己的疏忽寻找借口）。

院长随即对自己的观点作了限定，指明他所维护的不是别的弥撒，而是那个在“实质、定规和果效”（*substance, institution and effect*）上都由基督制定的弥撒。就实质和果效而言，院长将弥撒定义为：主耶稣的身体和血所成的祭物和供品，由他自己在最后的晚餐上献上。对此圣礼的第一个印证，是麦基洗德献上的饼和酒的

供品。^①院长的论证是，既然圣经宣告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②麦基洗德给上帝献上了饼和酒，因此，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上把自己的身体和血作为供品献给上帝；这是唯一一处基督的祭司职分和麦基洗德的祭司职分可以吻合的地方。

诺克斯回应道，认为活人和死人的罪孽可以借礼仪得到赦免（procure remission of sins to the quick and the dead）的观念，被看做弥撒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对人们的良心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些问题必须一并讨论。但既然院长宣称稍后会对此进行辩护，所以他现在只探讨弥撒的实质问题。首先，他提议对辩论中使用的祭物（sacrifice）或供品（oblation）一词的意义作出明确的界定。祭物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为了赎罪（expiation）而献上的挽回祭（sacrifices propitiariae），^③另一种是为了感谢（thanksgiving）而献上的感恩祭（sacrifices eucharisticae）。当圣经将身体的禁欲苦修、祷告和钱财奉献称为“祭物”的时候，乃是指第二种意思。故此，他希望知道院长在这场辩论中是按照哪一种意思来理解这个词。

院长回答说，此刻他不愿去追究对手所说的“挽回祭”（a sacrifice propitiarium）到底是何含义；但他的观点是，十字架上的献祭是唯一的救赎之祭（sacrifice of redemption），而弥撒中的献

① 以下讨论所涉及的经文是《圣经·创世记》14章17-20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玛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所多玛王出来，在沙微谷迎接他；沙微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

② 参见《圣经·希伯来书》7章17节：因为有给他作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③ 赎罪（Expiation）指抵消罪过、偿还代价之意。挽回祭（sacrifices propitiariae）的目的在于满足上帝公义的本性，承受罪所当得的惩罚，并且平息上帝的愤怒。在旧约中通常称为赎罪祭和赎愆祭。参见《圣经·罗马书》3章25节：“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propitiation），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又如《圣经·约翰一书》2章2节：“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祭乃是对基督的受难和死亡的纪念之祭 (sacrifice of commemoration)。

诺克斯答道，他原本打算对这一主要信条进行批驳，但院长似乎已在此问题上作出了让步；就他个人而言，他当然很乐意赞同院长的观点，即在正确行使圣餐礼的过程中，包含对基督之死的纪念。

院长坚持要求诺克斯应该对自己文中引用的圣经依据提出异议。^① 诺克斯说道：“需要郑重声明的是，我方首战告捷。根据前面一轮的交换意见，我所否认的信条，即弥撒中的祭物是为活人和死人的罪所献上的挽回祭，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论据支持的。我很乐意继续进行讨论……院长阁下到现在为止还未对我提出任何有效的反击；至于我的著作……我已经在其中公开驳斥了对方的信条，即弥撒是为活人献上的挽回祭，等等；同时也驳斥了随后所作的辩护……因此，阁下也可以随意发表反驳，我暂时不会进行反对；但是，我的立场始终一致，那就是根据我的文章为圣餐辩护。”

经过一番争论后，诺克斯继续说道：“阁下的根据是，麦基洗德是基督的预表，体现在他确实给上帝奉献了饼和酒为祭；所以理所当然的，耶稣基督也应该在最后的晚餐中，把他的身体和血以饼和酒的形式献给上帝。我对您的回答依然是：麦基洗德并没有给上帝奉献饼和酒，所以，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可靠根据的。”

“请证明这一点。”院长说道。

诺克斯回答，根据公正论辩的原则，他没有义务去证明一个否定的命题；相反，他的对手倒有责任举出证据来支持自己断言的主张。然而，圣经经文对此是完全沉默的。除非院长能够拿出这样的证据，否则他完全可以简单地否决院长的主张。但院长“紧紧抓

^① 即上面提到的经文：《圣经·创世记》14章17-20节。肯尼迪要求诺克斯对此发表回应。

住那段经文不放”，并坚持要对手说明：如果麦基洗德带饼和酒出来不是为了奉献给上帝，那么究竟是为何目的？诺克斯再次强调，院长的立场一直缺乏任何正面的支持，同时本方在辩论中并没有义务去说明饼和酒的下落如何，或被派做什么用途。随后，他同意在这个问题上陈述自己的观点，即麦基洗德带饼和酒的意图是为了恢复亚伯拉罕及其同伴的体力。

听到诺克斯的答复，院长终于如愿以偿，认为抓住了对方的话柄。他已经事先准备的不少反驳这一观点的理由，现在总算有了用武之地；借此，他至少能够拖延辩论时间，使局面复杂化。第一天的论战遂到此结束。

第二天聚集的时候，院长继续攻击诺克斯就《圣经·创世记》的经文所发表的观点。首先，他强烈主张：由于在最近的战斗中取胜，亚伯拉罕和他的同伴从敌人那里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有非常充足的物资供应，因此，他们并不需要麦基洗德的饼和酒。其次，圣经经文说，“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很难设想他以王的身份，独自一人要携带足以犒劳 318 人的食物，这实在不太可能。针对这些反对意见，诺克斯给出了任何人都会想到的常识性答复。第二天的辩论在双方的拉锯战中告一段落。

第三天，院长陈述了一篇论文，提出了对诺克斯观点的另一条反对意见。又一番唇枪舌剑之后，诺克斯要求对手给出先前承诺公布的证据，即他的主张所赖以立足的根基。可是，院长带着不悦之色起身走过来，往诺克斯的手里塞了一本书，让他到书中去找证据。此刻，在座的贵族和绅士已是筋疲力尽，完全失去了耐性。除了这场辩论的方式和过程极为冗长乏味、令人生厌之外，更让他们心烦的是，自己和随行的侍从在梅博尔没有找到任何消遣和乐趣。因此，假如有人将饼和酒带到他们中间，可以预料，他们肯定不会多费工夫去辩论这些食物的用途。诺克斯遂提议大家转移到艾尔，在那里结束论战。但院长拒绝了这项提议，并说自己若能得到女王的批准，将会亲赴爱丁堡继续辩论。于是聚会解散。

肯尼迪院长和他的朋友开始四处散布消息，宣称自己在辩论中占了上风。诺克斯闻讯后，根据秘书的记录出版了整个辩论过程的报告，并加上了序言和简短的旁注。这篇序言和他对院长第一篇论文的回答（尤其是后者），堪称杰作。

我对这场论战的叙述可能过于详尽，耗费了太多的篇幅，主要是因为此事至今无人提及，且诺克斯出版的那本小册子极为珍贵，很长一段时期内只有极少数人亲眼看过。

当时另一位鼓吹罗马天主教教义的神甫名叫尼尼安·温盖特 (Ninian Wingate)，曾担任过林立斯戈的校长，后来因为拥戴教皇制被洛锡安的地方监督斯波蒂斯伍德撤职。1562年2月，他给诺克斯寄去一份著作，其中包含83个问题，都是有关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辩论的主要题目。虽然这是他自己起草的作品，但署的都是苏格兰天主教派中的下级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的名字。对文中的某些质疑，特别是有关新教牧师的呼召问题，诺克斯通过讲坛的讲道给予了答复。但温盖特给诺克斯去了几封信，抱怨说此答复不能让人满意；这些信件同时也发给了女王、贵族、主教和爱丁堡的市政官员。之后温盖特想把这些材料付诸印刷，但手稿在印刷厂被扣留，温盖特本人则逃亡到欧洲大陆。诺克斯原打算出版一份对温盖特所提问题的回应，并为新教圣工的有效性进行辩护，但这一想法最终没有实现。

1563年年初，诺克斯受总会指派赶到杰德堡去调查一件丑闻：当地的牧师保罗·梅斯文 (Paul Methven) 被人怀疑有通奸行为。事情得到了证实，梅斯文随即被逐出教会。他逃到了英格兰，但后来又返回国内，表示愿意顺服教会的惩戒措施。于是他必须按照规定，公开悔罪；整个过程极为严厉，令人颜面扫地。梅斯文履行了部分悔改的程序，极为痛心地当众忏悔，然而，由于被巨大的羞耻感所压倒，并对恢复声誉感到绝望，在惩戒期间中途放弃，再次退到了英格兰。当时不少人出于慎重的考虑，建议苏格兰改革宗教会应当压制此事；对于这样一位在近期的改教运动中影响卓著的人

物，最好予以遮盖，不宜让他蒙受公开的羞辱。但教会领袖们拒绝了此类建议。相反，他们对事实进行了严格详细的审查，对犯罪者施加了惩戒性的处罚，从而“表明了在这件事上光明正大的态度”，并有效地堵住了他们的敌人教皇派的嘴。

在梅斯文一案中所颁布的公开悔罪的模式后来成为定例，用于处理所有性质严重的不道德事件。在苏格兰改教者们的一切行动中，没有什么事情比严厉和公平地执行教会纪律更接近初期教会的风格了。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教皇制度下对教会纪律的松懈，正是导致普世性宗教腐败的一个主要原因。虽然他们弃绝了许多在使徒时代后最初的三个世纪内基督徒常用的敬拜礼仪，但是，出于对罪恶的憎恨以及抑制罪恶的愿望，他们毫不迟疑地遵循了早期教会的不少惩治规条。在某些个案中，他们对肇事者的处理方式可能比较极端，但这种极端是一种善意的正直，总比疏于管教甚至完全废弃教会纪律以致贻害无穷要好得多——后两种现象当时已经悄然蔓延到所有保留改革宗之名的教会中。同样，我们的先辈在避开道德犯罪群体的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谨小慎微和细致敏锐的态度，远远强过现代的处理方式——今天，无论是德行高尚的人还是邪恶堕落的人，都一视同仁地被接纳到圣徒团体中。

曾经听过，一名浪子，
凄凉落魄，四处飘流，
渴望归家，却不被接纳；
然而，这一切的苛刻和严厉，
本是于他有益；
那些无有瑕疵、未遭玷污的圣民，
也当以此为鉴，心存谨慎，
保守自己的纯洁——
这纯洁一旦失去，将失去一切。
——可是现今——是的，就是现今，

我们变得如此正直公平，毫无偏见，
如此自由开明，善于造就，
如此宽厚仁达，爱心满满，（真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时代！）
无论罪人们触犯什么律法，
均可高枕无忧，安享太平。^①

五月，女王派人邀请诺克斯到利文湖（Loch Leven）和她会面。由于女王一贯的偏袒和私下承诺的保护，教皇派的教士们近来越发有恃无恐，胆大妄为。在刚刚过去的复活节期间，他们在王国多处地方公开举行弥撒仪式。女王在枢密院的会议上数次颁布了反对此类行为的公告，但因实际执行权仍然在女王手中，所以这些公告发布之后就没了动静。西部地区的新教徒历来在信仰上最为热心，这次也不例外。他们意识到法律被搁置一旁，于是在没有向宫廷递交任何申请的情况下，决心自己起来执法，并逮捕了一批肇事者以示警告。这些果断的措施使女王大为恼怒，因为她所盘算的一系列阴谋将面临受挫的危险。但是，她发现自己表露怒气并不能阻止新教徒的行动，故转而希望利用改教者的影响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晚餐之前，女王非常诚恳地和诺克斯交谈了两个小时，劝他去说服西部的贵族们终止对天主教敬拜的所有干扰行动。诺克斯答道，如果陛下使用自己的权力去执行本地的法律，他可以向她保证，新教徒一定会举止温和、平安无事；但如果陛下一心想兜圈子避开法律，恐怕某些新教徒会出面给教皇派分子一个教训，使后者不敢再铤而走险，以为可以触犯法律而不受惩罚。

“您会容许他们手持我的宝剑吗？”女王严肃地问道。^②

① 柯珀，《任务》，第三卷。

② 女王的意思是，新教徒不经过宫廷（君主）的批准而擅自执法，属于违反君臣次序的越权行为，是对她的权柄的不尊重。

“公义之剑属于上帝，”改教者以同样坚决的口吻答道，“上帝将这把剑赐给诸侯和执政官自有其目的。倘若君王逾越界限，任意妄为、姑息恶人、迫害无辜，下级的执政官出于对上帝的敬畏，仍然按照上帝的命令恪尽本分、施行审判，那么他们的行为并非得罪上帝。”他补充道，西部的贵族领主一直严格按照法律行事，议会法案已经给予了贵族领地范围内的所有法官相应的权力，可以搜寻和惩罚那些违反议会法规的人。最后，诺克斯建议女王应当慎重考虑她和臣民之间的约；假如女王不向他们提供所应许的保护，也不授予他们秉公执法的权利，那么不要指望臣民会对她表示顺服。女王听后，神情极为不快，继而中断了谈话。

诺克斯将谈话的结果向莫里伯爵（这是圣安德鲁斯行政官詹姆斯·斯图亚特现在的头衔）作了通报，然后准备第二天就返回爱丁堡，对进一步和女王交流已不抱什么希望。可是，次日凌晨，他却接到通知说，女王希望再次和他会面，请他暂时不要离开。诺克斯随即赶到金罗斯（Kinross）西边拜见女王，当时她正在那里享受放鹰打猎的乐趣。这次会见的气氛和前一天迥然不同。女王将二人的分歧完全撇在一边，却和他聊起了其他的话题，态度极其随和自然，可谓推心置腹。她说鲁斯文勋爵（Lord Ruthven）送给她一枚戒指，^①但她并不爱他。她还知道鲁斯文善于蛊惑人心，可他却仍当选为女王枢密院的成员之一。她认为这一任命完全是出自朝中权臣莱辛顿（Lethington）的一手安排。话题一转，女王又说道：“我获悉您被委派去邓弗里斯，为要选举和设立当地的一位地方监督，对吗？”在得到诺克斯的肯定答复之后，她说：“但我得知阿森斯主教（Bishop of Athens）将会当选为地方监督。”“陛下，他只是候选人之一。”“如果您像我一样知道他的底细，您肯定不会推举他担任那份职务，也不会让他在您的苏格兰教会中有任何位置。”诺克斯的回答是，如果主教不敬畏上帝的话，那么被他欺骗

^① 指求婚。

的人就远远不止诺克斯一个了。“好吧，请您随意而行；但我提醒您，那个人是个危险人物。”

当诺克斯有意告辞时，女王强留他多待片刻，对他说道：“自从我回国以来，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令我放心不下，今日正好有机会向您表白；我实在需要您的帮助。”言语和神情充满了屈尊和信任，就好像给诺克斯的手指戴上一枚戒指一般，让人感到受宠若惊。接着她说了很长的一段话，都是关于阿盖尔伯爵和他妻子之间的家庭纠纷。她指责阿盖尔夫人对许多事的处理都不够慎重，辜负了自己的期望，而且至今仍然牢骚满腹，认为伯爵对她缺乏诚实，没有尽到合宜之分。

诺克斯说，他很了解这对受人尊敬的夫妇彼此曾有过的分歧；早在女王到达本国之前，他就已经促成了二人之间的和解。当时伯爵夫人承诺日后若有什么问题，会首先告知诺克斯，除他以外不会向别人倾诉。既然至今他并未收到来自她的任何消息，所以他推断这对夫妇必定关系和谐，相安无事。

“唉，”女王叹道，“事情比您想象的要糟。然而，劳驾为了我的缘故，请您再次帮助他们重归于好。假如伯爵夫人仍然不肯循规蹈矩，那么她将失去我的恩宠。但是，无论如何，请务必不要让伯爵大人知道是我让您抽手此事。”女王随后又回到前天晚上他们争论的话题，说：“我保证按您的要求去做。我会召集所有的肇事者；到那时您就知道，我必会秉公执法。”

“那么我可以确信，”诺克斯说，“您将得蒙上帝的喜悦，并且在您的王国四境之内必享受安息和宁静。如此太平盛世给您带来的益处，绝非教皇的一切权势所能相比。”说完这番话，诺克斯遂向女王告辞。

这次会见鲜明地展示了玛丽女王性格的另一面：为了实现处心积虑盘算的阴谋，她的掩饰和伪装是何等高明，她所用的诡计是何等狡诈，她的屈尊纡贵又是何等障人眼目。之前她曾在其他的场合出言攻击改教者，但没有得逞。现在，她又改弦更张，想通过取悦

他的虚荣心来软化他坚毅不屈的性情；同时极力流露出亲密的信任感，为要消除他的警惕和戒心。她的企图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收到了果效。尽管诺克斯并不是很容易就被甜言蜜语所打动，而且女王在言行上的突然转变肯定也让他颇感诧异，但他的判断仍然多少受到了影响。事实上，极少有人能够完全抵制位高权重者放下架子、亲切随和的姿态所产生的良好印象。在那样的场合下，我们的理智和判断力所作出的冷峻质疑，往往会被我们的情感责备为缺乏爱心的表现。诺克斯随后按照女王的要求，给阿盖尔伯爵去了一封信，使后者相当不悦；他也听信了女王对阿森斯主教所发表的看法，故要求对主教的言行进行更详细的调查，并推迟了邓弗里斯地方监督的选举。他还向外界报道了女王亲切优雅的回答，使公众对她产生了普遍的好感。

如果说诺克斯的热心经历了一段暂时的低落，那么不久以后，他内心的灵火再次被点燃，并且焚烧得更加炽烈。5月19日，在女王的命令下，圣安德鲁斯大主教和一群主要的教皇派分子因触犯法律而被传唤到首席大法官面前，并按照女王的旨意被投入了监狱。然而这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女王的真实目的，乃是借此迷惑众人以此占得先机，以图在次日召开的议会上能够更加顺利地施展她的策略。（事实上，当议会一解散，这些囚犯就马上得到了自由。）

这是女王抵达苏格兰之后召集的第一次会议。人们很自然地期待议员们会着手批准1560年7月签署的爱丁堡条约以及旨在确立新教制度的法案。假如上一届议会通过的法案是无效的话（正如女王反复宣告的那样），那么新教徒一方将没有法律作为自己的后盾和保障；他们的宗教信仰将完全受其君主的支配；倘若后者愿意，甚至可以要求他们重新改宗，服从于教皇制度——当时天主教信仰仍然占据着合法的正统地位。但是，由于女王精心预谋、步步为营的计划，巧舌如簧、曲意奉承的演说，再加上个人利益的强烈诱惑在新教领袖的心里占了上风，所以，他们一致同意把制定新教

法案的要求搁置一旁，从而丧失了玛丽女王统治时期唯一的一次为改革宗信仰争得法律保障的有利机会，也失去了一个维护自身安全的重要手段。会议通过了一部《大赦令》（*An Act of Oblivion*），规定对那些参与近期内战的人士提供赔偿；但落实这部法令的方式实际上暗示了起初签订的停战和约是无效的。可悲的是，新教徒如今卑躬屈膝地恳求女王赐下的恩惠，并一再请求得到的权利，本是他们自己昔日用刀剑赢来的胜利果实。会议还通过了其他的一些法令，用来安抚较为热心的改教领袖；但其内容明显出于故意的编排，表述得模棱两可，无异于是对他们理解力的一种侮辱。

我们的改教者在获悉大会所讨论的议案之后，深感震惊，几乎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他立刻约见了一些议会的主要成员，劝他们在会议解散之前务必要批准上届议会的法案，至少也应当批准那些推行宗教改革的法案；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将会产生危险的后果。议员们则宣称，倘若他们固执地坚持上述要求的话，那么女王一开始就压根儿不会同意召开这次会议。但他们对前景仍然抱乐观态度，因为女王成婚在即，到那时，他们就可以如愿以偿了。诺克斯提醒道，他们满心期待的女王的婚事将带来许多麻烦，会让他们费尽心机、疲于应付。但议员们的心意已定，他的劝说都归于徒劳。现在诺克斯完全看透了女王的精心伪装；同时，新教领袖们的自私和奴态也深深地伤害了他。

在这个问题上，诺克斯和莫里伯爵之间的争吵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导致二者的关系公然破裂。长久以来，诺克斯一直将这位贵族视为改教事业最坚定和真诚的支持者之一，因此对其最近的言行倍感失望。被激怒的改教者给伯爵写了一封信，痛心回顾当年两人在伦敦初次交往时，伯爵所处的光景，以及上帝如何抬举伯爵，使他享受现今尊荣的地位。然后，诺克斯严肃地宣布和他断绝友谊关系；因为在伯爵的心目中，确保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讨取妹妹的欢心，远比推进改教事业重要得多。既然伯爵挑选了一批新的顾问，那么他可以听从他们的指导，而不必再寻求诺克斯的意见。而且，

诺克斯在未来的任何事务计划中，也不会将伯爵考虑在内。女王和她的同党早已对诺克斯和伯爵先前的亲密关系嫉恨多时，如今二人之间爆发了长达两年之久的分歧，自然让他们满心欢喜。正如诺克斯告诉我们的，这场冲突对当时的形势而言无异于“火上浇油，直到上帝以苦难之水将它熄灭”。

在议会解散之前，诺克斯抓住了一次机会，得以在其教会的大部分会友面前吐露心怀。他谈到上帝如何向苏格兰大施怜悯，如何奇迹般地拯救他们脱离身体和灵魂的捆绑，而所有的达官显贵又是何等的忘恩负义；然后，他开始转向贵族团体发言。他赞美上帝赐下机会，使他能够在众人面前倾吐内心的悲痛；他们可以见证他以往言论的真实无伪。他呼吁众人的良心，追忆往昔岁月，促使他们醒悟。即便在他们处于最绝望的困境时，他仍然力劝他们要坚心依靠上帝，并始终确实地保证，如果他们看重上帝的荣耀重于自己的身家性命和世俗利益，那么上帝必会保全他们，赐下得胜。诺克斯充满激情、滔滔不绝地继续说道：

在你们面临最强烈的试探时，我和你们在一起；当你们身陷最极端的危险时，我也和你们在一起。珀斯、库珀穆尔（Cupar Moor）、爱丁堡的克拉格（Craggs of Edinburgh）——这些地方的经历在我的心中恍如昨日；是的，众位阁下，你们所有人带着恐惧和羞辱撤离这座城市的那个阴暗忧伤的夜晚，我仍然历历在目。愿上帝叫我永不忘记那一幕！不单是我对你们的警戒，还有上帝借我的口向你们发出的所有应许，有哪一句白白落空？你们自己可以当场作见证。你们当中虽有多人受到死亡和毁灭的威胁，却无一人丧命；再看看上帝在你们的眼前让多少敌人遭遇灭顶之灾？如今当你们拥有了任意而行的权力，却不进反退，背叛了上帝的旨意；难道你们就用这种方式向你们的上帝表达感谢吗？！

诺克斯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贵族们的懦夫行径，指斥他们已经完全抛弃了基督定下的准则。

在结论中，诺克斯提到了有关女王婚事的报道，以及那些谋求这一联姻的王侯。诺克斯刻意加重了语气，希望听众记下他的话。他预言说，如果贵族们同意女王嫁给一位天主教徒的话，将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这篇坦率直白的讲道不仅得罪了天主教徒，也冒犯了新教徒；甚至某些和诺克斯最亲近的朋友现在也远远地躲避他。阿谀奉承之辈纷纷跑到女王那里，说约翰·诺克斯在讲道中反对她的婚事。在玛丽克服了所有反对的阻力、非常成功地控制了王国中骄横跋扈、自以为是的贵族领主之后，居然还有一个出身微贱的人胆敢声讨她的所作所为，这不能不让她感到极其恼怒。女王曾尝试驯服改教者倔强固执的个性，但没有奏效，故决心要对他的鲁莽放肆施以惩罚。诺克斯接到命令，要他即刻去晋见女王。奥基尔特里勋爵 (Lord Ochiltree) 和另外几位绅士陪同他来到王宫，但只有安古斯的地方监督一人获准和他一起进到女王面前。

女王陛下接待诺克斯的态度和上次在利文湖的会见迥然不同。她怒气冲冲地大声抗议说，从来没有哪位君主受过像她这样的待遇；虽然诺克斯多次在讲道中严厉地攻击女王本人和她的舅舅们，但她对此一直耐心地忍受；她曾用尽一切办法来博取他的好感；无论他什么时候想对女王提出劝诫，她都予以正式接见，并洗耳恭听。“可是，我仍然和你脱不了干系。我向上帝发誓，他必为我申冤。”说到这里，猛烈爆发的情绪使她泪如雨下，泣不成声，被迫中断了讲话。等到女王镇定下来，诺克斯开始平静地为自己辩护。他说，女王和他在不同的场合曾发生过几次争论，但他之前从未察觉二人之间有什么结怨。女王过去所接受的训练一直缺乏真理的教导，如果能够将她从谬误的捆绑中释放出来，肯定是一件蒙上帝喜悦的事情；所以，他深信女王作为明理之人，必定不会觉得他直率的谈吐有任何冒犯之处。他认为在讲坛之外的其他场合，很少有人

会被他的言语得罪；至于讲坛上的事奉，他并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在那里，他不能自己做主，而是必须顺服上帝的命令，直言不讳地传讲真理，也不会去讨好世上任何血气之人。

“但我的婚姻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女王说。诺克斯继续陈述，自己作为一个传道的使命范围以及他插手这一敏感事务的原因。但女王打断了他的话，再次质问道：“我的婚姻和你有什么关系呢？换句话说，你在这个国家里到底是什么人？”语气中充满了鄙视。

“陛下，我是一个在本国土生土长的臣民，”诺克斯针对后一个问题答道，“尽管我既不是伯爵，也不是领主和男爵，但上帝使我成为国中一名有用的成员（无论在您眼中我是何等卑贱）。是的，陛下，与其说我预先警告的事情对您造成了伤害，倒不如说这些预言对贵族们的伤害更大；因为我的职业和良心要求我必须开诚布公。因此，陛下，我现在要对您讲的，也就是我在公开场合所说的话：‘无论何时，只要这个王国的贵族们同意您被一位缺乏纯正信仰的丈夫所辖制，那么他们所行的无异于弃绝基督，驱逐了他的真理，背叛了国家的自由，并且最终不会给陛下带来什么安慰。’”

听到这些话，女王再次开始流泪啜泣，神情颇为凄惨。地方监督是一个性情温和、心肠柔软的人，见此架势，连忙出言相劝，试图减轻女王的悲伤和愤恨；他赞赏陛下的美貌和成就，并且告诉她，全欧洲无论哪位君主若能得到和她喜结连理的机会，都必感到荣幸之至。在这幕情景中，诺克斯强硬严厉、毫不退让的个性尽显无遗。他一直保持缄默，不动声色，直到女王发泄完她的怒气和情绪。然后他声明，自己从来没有以任何人的悲痛为乐事；作为父亲，在惩戒自家孩子的错误时，他从来不忍心看到他们哭泣；既是如此，他更不会对女王的眼泪幸灾乐祸。但是，他没有看出在哪些事上获罪于她；他所做的不过是履行职责而已。因此，他只有被迫忍受女王的哀哭（尽管他并不情愿），而不能压制自己良心的呼声；倘若他闭口不言，就是背叛国家的利益。

诺克斯的申辩使女王更加怒火中烧；她命令诺克斯立刻从她面前离开，到隔壁的房间等候，直到自己的心情好转。诺克斯站在那所房子里，好像“一个人们从未见过的陌生人”；他的所有朋友（除了奥基尔特里勋爵以外）此刻都战战兢兢，不敢对他表示任何支持。在这样的境遇中，诺克斯处之泰然；他转向那些坐在宫室里、穿戴奢华的贵妇们道：“哦，可爱的女士们，你们今天的生活是何等惬意啊！假如今生能够维持不变的话，那么到最后，兴许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一切靓妆华服都带到天堂去呢！”

当他和这些贵妇人交谈之际，厄斯金走进来，告诉他可以回家了，并等候女王进一步的指示。女王坚持要大法官们召开审判，商讨是否可以对诺克斯在讲坛上的言论进行控告。但众人说服她放弃提起诉讼的念头。“至此，这场风暴表面上平息了，但在女王心中却无法消退。”

当女王的“青春、美貌和王室尊严”在诺克斯面前统统化为泪水时，他却丝毫不为所动；这种冰冷麻木、冷漠无情的态度引起了许多人的极端厌恶，没有什么语言能够充分地表达出他们对此的强烈反感。苏格兰女王必定具有某种令人心醉神迷的魅力，而改教者居然不受其魅力的蛊惑，那么他被人看作一位铁石心肠的人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直到今天，女王在人们心中的影响力仍然没有褪色，甚至于某些文笔庄重严肃、对附庸风雅和罗曼蒂克不感兴趣的作者也纷纷宣称，当他们读到这段女王涕泪交加的记载时，无不油然而生一股和她同哀共泣的心情。当然，另一些人持不同的看法：有人深知芸芸大众真实的苦难，故而不会去无谓地浪费自己的感情；还有人认为，在这起事件中，既没有必要过多同情女王的境遇，也没有必要过分非难改教者的言行。女王在实现自己的策略上一直运气不错，并且知道贵族们随时都可满足自己的愿望，所以她激烈的情绪宣泄显然是一种恣意的放纵；她的眼泪必定是出于愤怒，而非出于忧伤。从另一方面讲，如果考虑到诺克斯当时被朋友们遗弃，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抵挡一位女王的意志，我们可能会倾向

于对他的举止和动机萌生更加赞许的态度。实际上，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一位坚定不移的爱国者，一位刚直不阿的改教者；他忠心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捍卫公共事业的利益；无论是似水柔情，还是风暴雷霆，都不能使他动摇退缩。在历史的某些时刻，这些举止被视作一颗高尚心灵的明证；人们不再对他横加指责，而是钦佩有加，连异教徒也仰慕推崇他。

诺克斯此时得罪了宫廷，又失去了昔日挚友的信任，他的敌人断定这是一个落井下石的大好机会；他们随即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他的道德品行（尽管各方公认他在这方面有无可指摘的名声）。诺克斯在杰德堡调查梅斯文丑闻期间，按照教规对后者的行为进行了最严厉的谴责。但与此同时，有人却声称他也犯下了类似的罪行。一天，一位名叫尤菲米娅·邓达斯（Euphemia Dundas）的爱丁堡居民，在她的一群朋友面前，对新教教义和教牧人员进行了谩骂攻击；她说，约翰·诺克斯多年来一直是个声名狼藉的嫖客。就在几天前，他“还与一名粗俗的妓女在一个山洞里鬼混，被人逮个正着”。诺克斯和教会起先认为这些传言不过是长舌妇的恶意诽谤，或教皇派用来泄愤的途径，所以没有过多地在意。但最近发生在杰德堡的事件、改教者当时所处的不利环境、挑衅者言之凿凿的公开指控以及对个别情节像煞有介事的详细描述——这一切因素使他们觉得有必要提起法律诉讼，通过辩护来澄清事实。6月18日，教会总会的秘书向爱丁堡市议会提交了一份正式的说明和诉状，恳求议会传唤那名妇女当庭对证，以查清事情的真相。如果指控内容属实，被告将会受到严惩，绝不偏袒；如果指控纯系诬告，那么将根据控告者的罪行过失对她进行责罚。当邓达斯女士被招来站在议会面前时，她却矢口否认自己曾经讲过那些话。然而，诺克斯的诉讼代理人随后找到了几位有身份的证人，他们都指证邓达斯确实散布过那些言语。

这起诽谤案至此水落石出，所作出的判决在当时没有引起任何的异议。可是，当改教者去世以后，一些教皇派作家却把当年不值

一提的无稽之谈重新翻出来大做文章；他们以流言飞语为素材，从蓄意扭曲和存心误导的立场出发，添油加醋、精心包装，制造虚假不实的言论，并通过他们的出版物在欧陆大肆传播。尽管我没有能力去追溯这些谣言的来龙去脉，但是，考虑到这种嫁祸于人之罪行的恶劣性质，被告人在所有同时代人中间始终享有的正直无瑕的声誉，控告者证词中明显的自相矛盾以及教皇派文人在知识界由来已久的、专于造谣污蔑、恶语中伤的臭名，我们完全有充足的理由对这类指控予以驳斥并深恶痛绝。任何熟悉那段时期相关著作的人士都会知道我的语气并不过分。

第 24 章

审判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女王拍手称快，自认终于抓住了诺克斯犯罪的把柄，可以确定无疑地让他受到惩罚。1563 年 8 月，当女王在斯特灵居住的时候，她留在圣鲁德宫的家仆擅自举行了天主教的礼拜，其方式比女王在场的时候要更加公开。当爱丁堡地区的居民领受圣餐期间，女王的家仆们居然重新恢复了某些迷信仪式；这些仪式自改教制度确立以后，就一直被天主教徒搁置一旁，不再采用。此等大胆举动激怒了一些新教徒，他们来到王宫，想要确认有哪些市民参与天主教礼拜。目睹人们成群结队鱼贯而入，他们忍无可忍，于是突然冲进礼拜堂，站在准备用来举行弥撒的圣坛上，质问其中的神甫怎敢在女王缺席的情况下，如此放肆无礼、任意妄为？面对这群不速之客，宫室的女主人惊恐不已，急忙派遣一名使者去通报正在圣贾尔斯教堂听道的财务司长，请他火速赶来护卫王宫的安全。当财务司长带着几名市政官和一名侍卫匆匆赶到现场时，发现一切都平安无事，并没有任何骚乱的迹象——除了自己带来的随行人员的过激反应之外。当事件传到女王耳中时，她宣布说，除非这些“暴民”受到惩罚，否则她绝不会返回爱丁堡；她还指控闯入者中最为积极的两名新教徒犯有“预谋重罪、袭击王室家人以及擅闯王宫”的罪名，应当为此上庭受审。爱丁堡的新教徒担心女王会采取极端严厉的手段，对此二人的定罪只是一系列

敌视新教行动的前奏，因此决定委任诺克斯给新教派别的主要贵族们写一封通函，说明眼下的形势，恳请他们在公审之日出席旁听。诺克斯按照要求起草了信件；这封通函的一份副本落到了他的夙敌、罗斯主教兼最高民事法庭主席辛克莱（Sinclair, Bishop of Ross, president of the Court of Session）的手中。主教立刻将信转送到斯特灵的女王那里。女王遂向枢密院传达了此事；当枢密院宣布信件内容有叛国嫌疑时，女王大喜过望。但是，为了保证诉讼程序的正式和严肃，枢密院决定召集顾问团和其他贵族于12月底在爱丁堡举行一次特别会议，共同审理这起案件。改教者随即收到了出席大会的传唤。

在审判日来临之前，尽管有许多人私下向诺克斯施加影响力，希望说服或恐吓他俯首认罪，屈膝乞求女王的怜悯，但都遭到他的断然拒绝。和诺克斯长期保持亲密关系的赫雷斯男爵（Lord Herries）以断绝友谊相威胁，警告他若不顺服女王，必要后悔莫及，因为人们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对他包容和忍耐。诺克斯的答复是：他不明白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他从未蓄意和女王对抗，除了在宗教信条上的分歧之外——当然，在这个领域他是不会妥协的。只要他未曾失去对上帝的信任，只要他看重上帝的荣耀过于自己的性命，上帝就必会扶持他到底。上帝若帮助他，那么人怎么对待他的自然就不足介意了。再者，他并不知道在哪些事情上人们曾对他克制容忍——除了在听他传讲上帝之道的时候，有些人的态度非常勉强和抵触之外。倘若这些人拒绝接受上帝的话，他会为他们感到忧伤；但他们自己要承担由此产生的危险后果。

莫里伯爵和国务大臣梅特兰派人把诺克斯请到法务秘书的房间，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希望他作出让步。二人表明，他们已经尽了很大努力去平息女王的怒气；对诺克斯而言，如今唯一能救自己的方法，就是尽快向女王低头屈服。诺克斯给予了同样的答复，声称自己绝不会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对被大多数人冠以叛国之名的事情，他认为不都有叛国之实；他也不会畏惧众人所畏惧的。

老谋深算的国务大臣企图在这个话题上引发争论，从而取消诺克斯为自己辩护的权利，由他人替他出庭辩护。但诺克斯看穿了他的诡计，遂谢绝了进一步的交谈，并告诉国务大臣：他不会愚蠢地将辩护权交给一位已经对他的案件作出臆断的人。

在召开审判的当天，公众焦虑不安的情绪达到了顶点；王宫的庭院和所有的过道里都挤满了人，大家翘首以盼，急切地等待会议的结果。审讯安排在一间聚集了贵族领主的宫室内举行；会议尚未开始，贵族们就已经陷入了激烈的讨论之中。当女王正要就座时，察觉到诺克斯独自站在桌旁，并没有代理人替他辩护，于是她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说道：“那个人曾让我痛哭一场，而他自己一滴眼泪也没掉；我现在倒要看看能否让他也痛哭流涕。”

国务大臣开始了诉讼程序，首先对改教者发表了一通讲话，陈述了女王传唤他到贵族面前受审的理由。“让他先确认一下自己的笔迹，然后我们再来评断信件的内容。”女王说道。一份通函的副本递到了诺克斯手中；他看了看签名，承认是他署名的信件；并补充道，虽然他曾在不少空白信纸上签名，但他对于秘书的尽忠职守信任有加，所以随时愿意确认信件的签名和内容。

“你的做法比我所做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梅特兰说。

“爱是不加怀疑。”诺克斯回答。

“很好很好，”女王说，“朗读你自己的信，然后回答提问。”

“我会尽力而为。”诺克斯说道。在大声读完之后，他把信件还给了女王的律师。

“诸位阁下，你们听过比这更加充满恶意和叛逆的信件吗？”女王环顾桌子四周说道。

“诺克斯先生，你的心里难道不感到歉意吗？对于这样一封出自你手、四处流传的信件，难道你不应该为此忏悔吗？”梅特兰说。

“尊敬的阁下，在我忏悔之前，我必须被告知自己的罪名。”诺克斯回答。

“罪名！就算只有召聚女王的臣民集会这一件事，你的罪名也是无可推诿。”

“阁下，请不要忘记，合法的集会和非法的集会是有区别的。如果我在这件事上有罪的话，那么自本人最后一次返回苏格兰以来，必是常常犯罪；试想，到此刻为止，有哪一次召聚弟兄们集会的信件和我的笔墨没有关系呢？”

“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国务大臣说，“我们现今并不需要再有以往那样的集会。”

“在我的眼中，现在的光景和以往的岁月并无区别。”诺克斯反驳道，“因我看到可怜的羊群所面临的险境绝不亚于从前。唯一不同的是，魔鬼如今给自己戴上了一副面具。过去，他以其本来面目来到这里，施行公开的暴政，一心要彻底毁灭所有拒绝偶像崇拜的忠信之民；我想在当时，你们肯定会承认，弟兄们为了救亡图存而自发的集会是完全合法的。现在，魔鬼披着公平正义的外衣再次来到，妄图实现上帝禁止他用武力成就的事情……”

“这是怎么回事？”女王一声呵斥，打断了诺克斯的话语；她对于被告在受审过程中居然还可以如此自由的发表言论感到愤怒，并认为自己能够更准确地击中他的要害，“真是岂有此理！我看你们是在和他浪费时间。谁给予他权柄去召集我的臣民？这难道不是叛国行径吗？”

“不，陛下，”鲁斯文勋爵插了一句，他对女王在论辩中咄咄逼人的口气感到不悦，“因为诺克斯先生几乎每天都要召集人们去参加祷告和聆听讲道。不管陛下和其他人的观点如何，我们都不认为这些事和叛国罪有关。”

“阁下且慢，”女王说，“先让他自己回答这个问题。”

诺克斯接着说：“陛下，我想首先和国务大臣讨论一个问题（我认为和陛下相比，他是一位更好的辩论家）：并不是所有的集会都是非法的，刚才鲁斯文勋爵已经给出了例子。”

“有关你的宗教信仰，以及召集信徒去听你布道之类的事，我

不会表示任何的反对；但是，没有我的命令，你有什么权柄去随心所欲地召聚我的臣民？”

诺克斯答道：遵照他自己的意愿，他从未在苏格兰召集过四人以上的聚会；但遵照弟兄们的指示，他曾经发出过许多公告，召聚过大量的人群。倘若女王抱怨这些行动都没有经过她的命令许可，那么他的答复是：同样，这个王国内所有宗教改革的行动也没有经过女王的许可。因此，除非有一个公正的法律对他作出裁决，否则他无法就自己的所作所为表达任何的悔意。实际上，他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你休想逃脱罪责！”女王说，“众位阁下，随意指控君主举止残暴，这难道不是叛逆行为吗？我想议会法案（Acts of Parliament）中有专门的条款来惩罚这类搬弄是非的人。”几位贵族表示确实有这样的法律条款。

“但是，指控我犯有该罪的证据在哪里？”诺克斯问道。

“读读你自己书信的这一部分，”女王说道，神情之间俨然像一位精明的检举人。接着，她让人念出了诺克斯信中的一句话：“令人担忧的是，这次针对他们（两名受到指控的新教徒）的传唤无疑是向少数人发起的试探性攻击，旨在为打开逼迫之门做准备，要对更多的民众施以暴行。”

“看看！”女王得意洋洋地喊道，“对此你有什么话说？”所有听众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被告席，十分急切地想知道诺克斯将如何回答这一指控。

“请问陛下，我为自己答辩是否合法？或者说，在本人没有被给予申诉机会的情况下就对我定罪？”诺克斯问。

“你可以随意发言。我想你会有很多话要说。”

“首先，我希望向女王陛下和在座的尊贵听众确认一件事。顽固的教皇派分子向来是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福音之人不共戴天的仇敌；前者最热切的盼望，就是将后者赶尽杀绝，并且彻底消灭国内所有真实教义的教导。陛下对此可有所知？”女王沉默不语；但贵

族们异口同声地喊道：“愿上帝禁止这样的事！忠信圣徒的生命和教义真理的柱石绝对不可落入教皇派的权势之下。以往的经历足以让我们明白，教皇派分子所存的是何等残忍的性情。”

“那么请容我继续，”诺克斯说，“据我看来，所有人都赞同以下立场，即在这个国家之内，将信仰基督福音的庞大群体全部毁灭，是一种野蛮的暴行；可是教皇派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尝试通过武力来达到这一目的……由于他们的计划屡屡被上帝和他的旨意所挫败，所以他们想出了更加阴险狡诈的计谋，企图打着法律的幌子，拉拢君主成为自己的同党；这样，他们通过公开的武力手段无法做到的事情，如今却可以借着欺诈和谎言来成就。试问众位阁下，你们中间有谁会认为：对于这两位受到不公正传唤、并将面对更不公正指控的弟兄，假如他们最终遭到杀害，那么教皇派贪得无厌的残忍之心就会到此罢休、永不满足的嗜血之手就会收刀入鞘？！……因此，陛下，尽管堆砌和列举您的议会法令吧！我并没有触犯其中的任何条款，因为我在信中并没有控告陛下生性残忍、行事暴虐。但我要再次肯定的是，那些一直煽风点火、激怒陛下此刻与那些可怜人作对的教皇派，无异于发瘟之人；他们是魔鬼的子孙，所以必要服从他们父的意愿；他们的父从起初就是一个撒谎者和杀人者。”

“你忘乎所以了吧！你现在不是站在讲坛上。”一名贵族说道。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要求我必须凭良心讲实话，因此我所说的都是真相。如果谁有异议，可以出言反驳。”诺克斯回答，继而转向女王补充道：一些看上去拥有诚实、温柔、谦恭性情的人，经常会由于受到邪恶的指导和教唆而堕落变坏。女王所听从的那些教皇派分子是一群危险的顾问，当年女王母亲的经历就是印证。

女王眼看辩论没有任何结果，于是开始责备诺克斯在上次王宫会见中对自己严厉苛刻的举止。她说，虽然此刻在贵族领主面前，诺克斯说话“颇为合情合理”，可是在那天，他却让她流下了许多苦涩的泪水；更为恶劣的是，对于她的哀恸哭泣，“诺克斯居然完

全无动于衷”。于是诺克斯对自己的言行作了辩护，并叙述了当天和女王会面的过程。申辩结束时，国务大臣和女王商讨了片刻，然后告知诺克斯可以回家过夜。“我感谢上帝和女王陛下。”诺克斯说道。

诺克斯退出会场后，贵族们开始对他的言行进行审议和判决。除了那些王室的随员以外，其他人一致认为：诺克斯并没有犯下任何违反法律的罪行。国务大臣曾向女王保证一定要将诺克斯定罪，所以对这样的表决结果深感震怒。女王本来已在投票前退席，现在国务大臣将她再次请进会场，准备当着她的面举行第二次投票。这一试图威慑贵族团体的行动激怒了众人。“什么！”贵族们喊道，“莱星顿的领主有什么权力支配我们？再说，难道我们会因为一个女人的到场就不惜冒犯上帝，以致作出违背良心的决定，将一个无辜的人定罪吗？”接着，他们作出了同样的表决，宣布诺克斯的清白无辜，所有指控他的罪名都不成立；并且对他的谦虚表现和法庭辩护赞赏有加。

面对这一无罪开释的意外判决，玛丽无法掩饰自己的羞辱和怒气。当她看见先前的告密者罗斯主教在投票中也站在大多数贵族一边，忍不住当着众人的面公开奚落他：“不要搅扰那个孩子^①吧！我甚愿你不要搅扰他，因为他才刚刚从睡梦中醒过来。为什么年老的愚昧人^②不该跟从他面前走过之人的脚步呢？”主教冷淡地回答说：“陛下应当很容易明白，我的投票并没有因为对被告的偏见而受到影响。”

那天晚上，王宫里既没有轻歌曼舞，也没有琴箫鼓乐。女王沉浸在沮丧和失落之中。她原本希望通过贵族们的表决，使约翰·诺克斯成为她的阶下囚；如今这一计划破产了。

① 指诺克斯。

② 指罗斯主教。

第七阶段

力挽狂澜（1563 ~ 1570）

第 25 章

再度交锋

女王对于改教者免受惩罚的结果感到愤愤不平，所以，无论是投票表决诺克斯无罪的大臣，还是坚持认为诺克斯有罪的大臣，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她发泄余怒的对象。莫里伯爵属于前者，而梅特兰则属于后者。为了安抚女王，他们再次试图劝说改教者放下姿态，主动向女王表示屈服，并作出保证，所施加给他的所有惩罚不过是到城堡里走一趟，然后就可以平安回家。诺克斯拒绝从命，因为这样做就等于质疑贵族们宣告他无罪的判决，并且承认自己曾是暴乱的煽动者。失望之余，他们又尝试用流言和毁谤来伤害他，四处放话说：诺克斯以前的所作所为其实没有得到弟兄们的授权；他随意发布公开信，强迫大家向他表示服从；并且他擅取权力，独断专行，俨然是苏格兰教会的教皇。这些指控毫无根据、缺乏公平。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够像诺克斯那样行事谦和；他在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时，却非常小心谨慎，避免表现出任何凌驾于弟兄之上的优越感；也从未在团体和公共事务上凭借自己的权柄任意而行。

在 1563 年年底召开的总会上，诺克斯谢绝参与任何讨论。当大会的主要议题结束后，他请求当众发言，为要澄清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情。他讲述了自己起草最近那封通函的过程、由此带来的那场诉讼官司以及至今仍然流传坊间的对他存有偏见的猜测。他坚持声称，教会此刻应考察他在这桩事件中的言行，尤其应该宣布，他

们是否曾授予他以下的使命，即任何时候，只要他预见到有任何威胁新教的危险临近，或者出现一些难题需要众人的建议，那么他就有权向弟兄们发出通告。宫廷大臣们虽然极力反对将诺克斯的问题纳入审议，但没有得逞。绝大多数总会代表一致认为，诺克斯的确背负了这一使命，并且，他在最近的通告中发表的言论也没有越过使命的界限和职责的范围。

诺克斯在以往三年中一直过着鳏夫的生活，但在1564年3月，他和奥基尔特里勋爵（Lord Ochiltree）的女儿玛格丽特·斯图亚特（Margaret Stewart）结婚，开始了第二次婚姻生活。勋爵是一位性格和蔼可亲的贵族，和我们的改教者保持着长期的友谊，即便在后者被许多朋友离弃的时候，勋爵仍然对他忠诚不渝。玛格丽特以虔诚和爱心勤勉持家，专心致志地尽到了为人妻的本分，直到诺克斯去世。教皇派作者因为嫉妒苏格兰改教者的声誉，所以刻意将这段婚姻描绘成诺克斯满怀野心的证据；更加荒唐无稽的是，他们出于盈余的怒气，竟然宣称诺克斯蓄谋策划，一心要让自已的后裔坐上苏格兰的王位，理由是奥基尔特里家族拥有王室血统！他们还振振有词地说，他是通过巫术的手段和魔鬼的帮助才获取了这位年轻女士的芳心。但令人纳闷的是，如果诺克斯真的有如此强大的黑暗势力作其后盾，为何他上一次的求婚行动却以失败告终呢？根据同一批教皇派作者的记载，诺克斯之前曾向切斯特哈罗特公爵的长女弗莱明（Fleming）女士求婚，但遭到了拒绝。

1564年，苏格兰的国内局势一直处于平静的状态，但宫廷和教会之间仍然互相提防，彼此猜忌。女王对改革宗信仰所怀的偏见不仅没有减弱，而且和大陆上的新教死敌继续保持着书信联系；这些举动显然都不能逃过她的新教臣民警惕的眼目。传道者们的热忱并没有消减，他们针对教皇制度和所预见的种种危险一再发出急切的警告。他们悲叹大多数新教徒的属灵生命已经沦落到何等贫穷不堪的地步，并抱怨新教臣僚中间日益增长的不冷不热倾向。后者对于这些指责感到很不自在，于是和女王一拍即合，急于想限制讲坛

布道的资格。首先，大臣们在私底下说服了一些最温和顺从的牧师，拉拢他们站到自己一边，并同意对限制措施表示部分的认可。这一步成功后，他们就开始大胆地把建议公开化，并要求得到总会首要成员的批准。

这里我并不是要为那段时期个别传道者的言论尺度进行辩护，但总体而言，宫廷这次有计划、有步骤的行动远远超过了纠正某些过激言语的限度，其真实目的在于限制讲坛上的言论自由，所以不可避免会危及新教徒的利益。毋庸置疑，牧师们是当时公共安全最警觉、最廉洁的护卫者。我相信，就算被人以粗鲁无礼的方式唤醒或被人的不实警报虚惊一场，也比在危机四伏的境况中蒙头大睡要好得多。想想看，如果看门防贼的家犬时刻保持清醒，尽忠职守，请问有谁会因为它夜间的吵闹常常干扰居民休息，而起来封住它的嘴，或者替换一条“不能叫唤、但知做梦、躺卧、贪睡的哑巴狗”？^①

诺克斯直率锋利的批评言辞历来让大臣们印象深刻，自然首当其冲成为他们要限制的对象；但不管是通过威慑还是说服，要想让他闭口不语都绝非易事。六月间，大臣们施加压力，迫使总会的首要成员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就此问题进行讨论。会上梅特兰和诺克斯之间展开了一段冗长的交锋，争议的主题是改教者所说的那些冒犯王室的教义要点。这场论战“极好地展示了双方的才华和性格：梅特兰思路敏捷，学识出众，但过于精明圆滑；而诺克斯则长于理解和洞察，喜爱大胆地直抒胸臆，并且具备超凡的胆识和魄力。”辩论的过程在诺克斯所著《宗教改革史》（*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一书中有详尽的记载。鉴于我曾对他过去参与的一些辩论作过非常完整的介绍，故此处我只对这场辩论的要点作一个简短的叙述。

^① 语出《圣经·以赛亚书》56章10节：“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知做梦、躺卧、贪睡。”

梅特兰认为诺克斯在公开场合的服事中有两处地方犯下错误：一是为女王陛下祷告的方式，二是有关君主权柄和臣民责任的教义教导。诺克斯当场复述了平时为女王所作的代祷，并希望知道错在哪里。梅特兰说，诺克斯在祈求女王归信新教的祷告中附加了条件，因此让人民对女王改宗的可能性产生了疑惑，而且口口声声说女王正在撒旦的捆绑之下，这种不敬的措辞显然不适合用在君主身上。

改教者答道：女王陛下的举止使人有充分的理由表达各种怀疑；再者，无论他的措辞多么激烈，均有清楚明白的圣经经文作为根据。众所周知，很多时候，“祷告和眼泪”是基督徒唯一能够用来反抗暴行的武器。但是那些将基督徒的其他武器剥夺殆尽的人，时常连这两样武器也不能容忍；他们的祷告必须除去棱角，悦耳动听，迎合敌人的胃口，形式上虽然是对全能上帝的倾心吐意，但实质上不过是对君主的恭维和赞美；倘若不是这样的话，这些祷告通常会被视为煽动性的叛逆言论。

辩论的第二阶段涉及改教者另一方面的教义：诺克斯认为君主的权柄是有限的；如果他们滥用权力任意而行，那么人民就有正当的理由对他们进行控制。由此引出的实际问题是：禁止女王举行弥撒是否合法？在此番较量中，诺克斯颇具说服力的雄辩同样让对手只有招架之功。梅特兰发觉很难守住自己的立场，因为他本人曾亲自抵制过最高掌权者，而且和诺克斯持有相同的民权原则。可以肯定的是，双方都认为：崇拜偶像者就算受到死刑的惩罚也是罪有应得。之所以在这点上得出一致的结论，乃是因为二人都采纳了同一种不太站得住脚的观点，即基督教国家仍然须要遵守上帝借摩西传给犹太民族的律法条例，以惩戒所有触犯道德律的行为。

在辩论过程中，诺克斯的同工克雷格牧师给出了一段陈述，谈到他在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听到的一场主题相同的有趣辩论，其中有识之士的判断和最终的决议都对公众的自由权利表示强力支持，并认为君主的权力应当受到限制。

经过漫长的议程之后，梅特兰坚持要求会议成员进行投票表决，并建立相应的法令，禁止他所控告的罪恶现象重演。但诺克斯提出抗议，反对进行任何表决，认为只有总会才有权对此问题进行决断。与会者遂产生了意见分歧，会议在没有得出任何明确结果的情况下不欢而散。

八月间，诺克斯受总会差派，去拜访阿伯丁及北部地区的教会。他在那里呆了六七个星期。后一届总会给予了他类似的任命，派他到法夫和珀斯郡一带巡察。

我们的改教者在议会上次召开的大会上所发的预言，如今完全应验了。1564年年底，议会又举行了一次大会，但仍然没有制定任何措施来保护新教的利益。当女王的婚期临近时，领主们上奏说，若要他们同意陛下的婚事有一个条件，就是她必须给予新教名正言顺的合法地位。然而女王十分巧妙地避开了这一要求，并照样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当她正在筹划婚礼的时候，她派人将洛锡安、格拉斯哥和法夫的地方监督请来，用花言巧语哄骗他们。她说自己对新教信仰的真理还未完全信服，但是愿意了解有关这一主题的探讨和辩论；她甚至可以去出席某些牧师的公开讲道；“在所有人当中，她特别乐意聆听安古斯的地方监督——唐县的约翰·厄斯金爵士的讲道，因为他是一位性情温柔、和蔼可亲、正直诚实的人。”可是，当女王和达恩利爵士（Lord Darnley）的婚礼^①刚一结束，她就坚决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不会、也不可以离弃一直养育和栽培我的宗教信仰。”从此，她也不再提什么听道慕道之类的话了。

早在1565年年初，莫里伯爵和改教者之间就恢复了友谊关系。

^① 1565年7月29日，在圣鲁德宫，玛丽嫁给了达恩利爵士亨利·斯图亚特；达恩利是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的后裔，玛丽的表兄。不可否认，这次联姻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因为达恩利拥有英格兰和苏格兰皇室的双重血统，任何达恩利和玛丽的子女都有可能同时继承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王位（条件是伊丽莎白没有后嗣）。这一可能性最终成为现实：玛丽与达恩利所生的儿子、后来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在童贞女王伊丽莎白去世后，继位成为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

由于伯爵在这一年八月联合一些反对女王婚事的贵族发动的叛乱，使改教者陷入了非常棘手的困境。他的岳父也在那些闹事的贵族之列。这些人宣称他们举兵造反主要是为了保护新教的利益不受侵害。他们来到爱丁堡，四处召集人马归到自己的麾下。尽管诺克斯对他们抱有好感，但仍然采取了很明智的立场，没有卷入到他们的行动中。假如他真的参加了这次不成功的起义，^① 那么毫无疑问，女王肯定会抓住机会，在他的贵族朋友逃离王国之后，对他严惩不贷。

^① 由于反对女王和达恩利爵士的婚姻，莫里伯爵纠集其他贵族于1565年8月发动叛乱。玛丽不得不于8月26日逃往斯特灵去组织力量进行抵抗。9月，玛丽又前往爱丁堡招募更多的军队。决定胜负的战斗即是后来广为人知的蔡斯袭击。莫里伯爵和一同起兵的贵族被击败，之后被迫流亡国外。

第26章

遭逐

实际上，我们发现女王马上通过其他的借口来打击诺克斯，不过力度要微弱得多。刚刚被赐予国王头衔的女王丈夫，在宗教立场上脚踩两条船：既可以称他是天主教徒，也可以称他是新教徒；因为他有时和女王一起参加弥撒，有时又出席改革宗的讲道聚会。当时在反叛的贵族中间弥漫着对他的不信任情绪，认为他与新教信仰貌合神离。为了消除他们的猜疑，国王于8月19日正式出席了在圣贾尔斯教堂的礼拜，坐在专为接待他而预备的一张王座上。诺克斯当天布道的经文是以赛亚书26章13节，^①而且碰巧讲道的时间比平时拖长了许多。在讲到某处时，他引用了以下经文：“主说，我必使孩童作他们的首领，使婴孩辖管他们……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②在另一处，他提到上帝之所以惩罚亚哈王，是因为他没有纠正妻子耶洗别的拜偶像行径。虽然诺克斯并没有作个别的实际应用，但国王认为讲这些经文是他在含沙射影，刻意指着自己和女王说的。他怒气冲天地回到王宫，甚至拒绝去进晚餐。一些陪同他出席教堂礼拜的天主教徒所作的描述更是

① 《圣经·以赛亚书》26章13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倚靠你，提你的名。”

② 语出《圣经·以赛亚书》3章4节、12节。

火上浇油，使这对王室夫妇的愤恨之情有增无减。

那天下午，诺克斯正休息的时候被人唤醒，并被带到枢密院接受讯问。城里一些地位尊贵的市民感到他的处境不妙，于是陪他一起来到王宫。他被告知，因为冒犯了国王陛下，所以从今以后，只要国王夫妇待在爱丁堡，他就必须停止讲道。诺克斯回答：“我向来都是遵照圣经本文布道，从未偏离左右；如果是出于教会的命令，指示我继续讲道或放弃讲道（只要这是上帝的话语所允许的），那么我都会顺从。”斯波蒂斯伍德回忆说，诺克斯不仅坚持自己在讲坛上所发的言论，而且还加上了一句话：“国王陛下为了讨取女王的喜悦去参加弥撒，这是对至高上帝的羞辱；因此，上帝必会按他的公义，使女王成为他倒台的器皿。”大主教继续写道：“这段话在当时被认为过于莽撞无礼，然而后来却被人铭记，并被视为诺克斯说过的绝妙预言之一。女王再次被诺克斯的答复所激怒，禁不住放声大哭。”

禁止改教者讲道的消息在城中引起了极大的不安。在诺克斯停职期间，他的同工克雷格牧师受命顶替他的职位；但他以完全退出讲坛事奉相威胁，对此安排表示抗议。市议会聚集商讨后，决定委派一个代表团去求见国王夫妇，请他们撤销这项禁令。在当天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他们作出了一致决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也绝不容许剥夺诺克斯讲道的权利。”相反，他应当不负众望，“按照上帝放在他心里的感动，不受任何拘束地传讲纯正的教义，正如从前一样。我们对这些教义全心赞同，并且愿意持守遵行，直到生命的终点。”

实际上，诺克斯在这段时期内从未中止过讲道。原因很简单：国王和女王于下一个主日前就起驾离开了爱丁堡，而禁令只在他们待在城里的时候才有效。当他们回来以后，宫廷觉得再次执行禁令未免有些不太明智，因为这一禁令之前已经引起了很大的不满情绪，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拉大民众和当前政府之间的距离。因此，诺克斯得以照常讲坛上事奉，其直率大胆的风格一如既往。有人向

枢密院投诉，说诺克斯为那些流亡国外的贵族所作的代祷大有问题。但是那位先前对他的祷告百般挑刺的梅特兰，如今却站出来为他辩护。他说自己曾亲自听过这些祷文，认为其中的内容无可非议。

克里斯托弗·古德曼自1560年起担任圣安德鲁斯的牧师以来，一直得到各方普遍的认同；可是由于他在英格兰的朋友一再发信恳求，终于说服他作出了近期内返回祖国的决定。在1565年12月举行的教会总会上，来自圣安德鲁斯的特使向大会递交了请愿书，希望能够将诺克斯从爱丁堡调至圣安德鲁斯工作。他们觉得有权利对改教者提出这一要求，理由是：那座城市是他的事工发端之地。另外他们也觉得，此时诺克斯和宫廷之间的分歧也许会促使他倾向于一个更为退隐的环境。但是这一请愿被否决了。

此届总会加给诺克斯几项重要的事工。他受命去拜访苏格兰南部的教会，并且要写一封“措辞温和的信函”，激励王国各地的牧师、劝诫师和读经员务要恒切忍耐，尽忠职守。当时的情况是，由于拿不到应得的津贴，许多教牧人员扬言要放弃事奉，并且鼓动所在教会的信徒来帮补自己的生计。之前诺克斯就已经接到一项任务，要他草拟一份《有关开除教藉和公开悔罪的制度》（*Form of Ex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Repentance*）的文件，如今又被要求写一篇《论禁食》（*Treatise of Fasting*）的文章。考虑到国家所面临的各样艰难以及威胁整个新教利益的种种隐患，总会宣布在全国上下举行一次全教会的禁食；有关禁食行动的方式和步骤的起草工作，自然就落到了诺克斯和他的同工身上。鉴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出版文献清楚地谈论过这一主题，总会授权他们解释禁食的责任所在，并陈述眼下实施这一严肃行动的诸般理由。全文必须在禁食日到来之前准备就绪，以便可以作为各地牧师和民众的实践指南。这篇文章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来看，都为撰写者带来了很高的声誉。文章的表达清楚明白，风格刚劲有力，详细阐述了禁食的缘

由，包括所有改革宗教会的严峻处境、天特会议^①最近颁布的灭绝新教徒的法令、教皇派君主们为贯彻该项法令而联手制定的计划，以及新教徒在不同国家所遭遇的野蛮暴行。根据这些理由，作者向苏格兰新教徒发出了强烈警告，并呼吁他们悔改和祈祷。

尽管新教领袖们忧心忡忡，但实际上，即将来临的危险比他们所能想象到的更为迫近。鉴于最热心和最有权势的新教贵族均流亡国外，女王决心实施长久以来从未忘记的图谋。表面上，她始终宣称绝不会更改这个国家公认的宗教信仰，以此哄骗国民，同时在牧师们面前放置许多诱饵，答应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支持；而背地里却紧锣密鼓地准备尽快恢复罗马天主教的礼拜。为了拉拢贵族群体重新皈依旧制，她把所有能够想到的手段都用上了。国王公开承认自己是一名天主教徒，并且主持了教皇派的某些最露骨的迷信仪式；紧接着，伦诺克斯 (Lennox)、卡西里斯 (Cassilis) 和凯斯内斯 (Caithness) 的伯爵们以及蒙哥马利勋爵和西顿勋爵 (Lords Montgomery and Seton)，都纷纷跟进仿效。修道士们被请到圣鲁德宫去讲道；为了博取人们的好感，他们居然努力模仿新教传道人常用的方法和技巧。1566年2月初，一封来自法国洛林主教的信件送到了女王手里，内含一份教皇派君主们为了全面肃清新教徒而联盟立

① 天特会议 (Council of Trent)：近代天主教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针对16世纪中叶席卷欧洲各地的改教运动以及罗马教廷内部持续腐化、整个天主教体系岌岌可危的现状，教皇保罗三世 (Pope Paul III) 在意大利北部山区的小城天特召集了一次大会。这次大会从1545年一直断断续续开到1563年，史称天特会议。会议揭开了罗马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的序幕；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对抗新教的冲击，另一方面也是一场天主教内部的改革。由于德国、瑞士、法国、荷兰、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新教教会都拟定了信条，宣告他们的信仰，所以天特会议也为罗马教会拟定了一份信经，并采用了一本信仰问答书。这项运动的确纠正了当时教会内的一些腐败行为，例如贩卖赎罪券。其中，以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天主教会所受影响最深。天特会议重新确立了神职人员必须禁欲的原则以及七项圣礼，并开始重视宗教教育和传教工作。这些改革措施也促成了一些修会的成立，比如耶稣会 (Jesuits)。虽然罗马教会通过天特会议推行了力度很大的改革，但教会的本质和结构并未改变。事实上，为了对抗新教，天特会议更加高举和肯定了教皇的最高权柄以及天主教体系的正统地位。

约的副件以及主教要求女王签名入伙、授意她对苏格兰流亡贵族采取极端手段的指示。玛丽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一反新教同盟。她即刻向莫里伯爵为首的流亡贵族发出传唤，命令他们于3月12日在议会前露面，接受讯问。与此同时，女王随自己的意思选定了议会的立法委员，恢复了天主教教士在议会里的席位，并且备好了一些圣坛，只等时机一到就设立于圣贾尔斯教堂中，以便举行罗马天主教的礼拜。

女王精心筹算的计划眼看就要付诸实施，不料却功亏一篑、化为泡影。事故起因于国王和某些新教贵族私下结盟的一个秘密组织。这个组织制造的第一起麻烦就是众所周知的刺杀里奇奥事件（assassination of Rizzio）。里奇奥是女王身边的宠臣，为人卑劣无耻；无论是制定反新教信仰的政策，还是图谋陷害流放贵族的方案，他都是主要的煽动者和策划人。他的所作所为招致了国王的嫉妒、贵族的鄙视以及人民的憎恨。将这样一个奴颜婢膝的走狗从女王的身边和顾问团中除去，本来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举动；可是，贵族组织采用的手段却极不光彩，和那个时代的野蛮行径并无二异。

刺杀事件后，宫廷里的形势顿时发生了完全的逆转：教皇派的顾问们纷纷逃离王宫；流亡的贵族从英格兰返回国内；议会暂时休会，原定要达成的目标均未实现。但女王很快说服了懦弱和惧内的国王背弃了盟约的贵族，和她一同退到邓巴（Dunbar）。她还劝说国王发表宣告，否认他自己曾参与了最近的暗杀行动。国王的言行使他受到国民的蔑视，并从此失去了女王的钟情和恩宠。女王召集了一支军队回到爱丁堡，威胁要对所有参与杀害她的私人秘书的同谋进行最严厉的报复，并对先前侮辱其尊严的人还以颜色。然而，她发现自己对现状无能为力，试图更改公认信仰的计划已经没有重续的可能。莫里伯爵和其他反对女王婚姻的贵族很快就得到了赦免。

当女王返回爱丁堡后，诺克斯离开了这座城市，退到了凯尔（Kyle）。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曾经暗中参与了那场导致里奇奥死于

非命的阴谋；但可能的情形是，即便他没有对阴谋策划者的做法表示赞许，但至少在某场合表达了对里奇奥之死感到满意的态度——因为这一事件有助于保障新教信仰和全体国民的安全。总而言之，基于诸多原因，女王对诺克斯的厌恶之心本来就已经非常强烈，再加上目前的形势，更让她对改教者的憎恨情绪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所以，诺克斯在此刻抽身隐退显然是明智之举。

得知这位长期给自己制造麻烦的人终于卸职离任，女王感到庆幸不已，决心一定要阻止他返回首都。毋庸赘言，市议会和当地居民这次又积极行动起来，极力呼吁恢复诺克斯的牧职，正如他们先前对暂停诺克斯讲道资格的禁令拒不同意一样。然而无论诺克斯的众多友人如何迫切求情，女王都不为所动。她甚至不能容忍改教者在王国境内找到任何藏身之地。当诺克斯住在西部地区的一位贵族家中时，女王给这位贵族去信，要他把诺克斯从家里赶出去。历史记录表明，直到女王退位、不再执政以后，诺克斯才回到了爱丁堡——或者说，他才重新开始了在这座城市的事工。

由于遭到驱逐，离开了他的羊群，诺克斯认为眼下是一个拜访英格兰的大好机会。父亲对孩子的思念之情此刻也让他盼望已久的旅行愿望更加强烈。早些时候，也许是出于亲友们要求，诺克斯将两个儿子送到了邻国，希望他们能够在英格兰的几所神学院里接受教育。在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通行许可之后，他向1566年12月召开的总会提出了申请，希望他们批准自己的行程计划。总会欣然同意了他的请求，唯一的条件是他必须在明年六月召开的下届总会之前回国。与此同时，他们交给他一份充满褒奖之辞的感谢信，信中将他描述成“一位真正和忠心的牧师，他的教义纯全无伪，他的生活和言谈在我们的眼中无可指摘；他勤勉地善用全能上帝赐给他的才干，丰富地彰显了上帝圣名的荣耀，极大地拓展了耶稣基督的国度，有效地建立了听道之人的生命；我们满怀敬意，以最衷心的热忱赞美上帝的圣名，因他赐给诺克斯如此高贵的祝福，乃是为了我们的长进和益处。”

改教者受总会的委托，给英格兰的主教和牧师捎去一封信函，为该国一些不愿使用圣职服装的弟兄们求情，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宽容的对待；因为英格兰的法律规定神职人员必须穿戴僧侣服。当时，这一问题在英格兰的圣职阶层中间争论得如火如荼。苏格兰教会的总会介入这一事件，很有可能是出于诺克斯的意愿，并由他起草了信件的内容。诺克斯肯定不会忘记自己也曾遭遇过类似的麻烦，因此对许多不从教规者^①（scruplers）深表关注；可惜这次调解并没有为他们减轻任何压力。尽管高层的神职人员解决问题的愿望甚至比不从教规者更加迫切，但伊丽莎白的态度极为固执，无论是主教们的恳求，还是顾问团的建议，都无法说服她改弦易辙。诺克斯对英格兰女王存有的好感并没有因这次访问而有所增加。

在启程赴英格兰之前，诺克斯还处理了一件公共事务。12月23日，女王以枢密院的名义授权给圣安德鲁斯大主教，恢复他在当地的司法管辖权——该项古老的权力在1560年被议会法令废除。女王采取这一步骤的动机，部分是为复辟天主教制度做准备，部分是为实施另一套邪恶的阴谋铺平道路（那场阴谋很快就遭到揭露）。如此大胆的举动使新教徒吃惊不小，同时也深深激怒了他们。一方面受自己的热心驱使，一方面被弟兄们的劝告打动，改教者随即给王国境内的新教领袖发了一封通函，恳请他们立刻就当前事态提出建议，以制定最合适的应对策略，同时还附上了一份致女王的请愿书的副本。这封书信将作者心中炽烈不息的热忱表露得淋漓尽致。诺克斯先提到了最近颁布的供应事工需要的法令，指出这不过是女王试图蒙蔽新教徒的手段，然后说：

如果昔日被正义的法律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境的那位罗马敌

^① 指因为信仰和良心的缘故不愿服从国教教会某些教规的人士，他们中间不少人后来成为不从国教者（nonconformists）。

基督者^① (Roman antichrist)，如今又要再次凌驾到我们头上，试问法令中所说的分配给新教事工的供应款项以及与此有关的任何承诺，有哪一样能够得到稳定的保证呢？实际上，更可怕的是，如果容忍那只可憎之兽^②受伤的头在我们中间得以痊愈的话，那么这个王国境内所有认信主耶稣的人的生命和遗产将得不到任何保证。

在强调了他的要求之后，诺克斯又补充道：“既然我们从一开始就义无反顾，没有吝惜自己的财物和性命，那么就让我们善始善终，不要在最后一刻跌倒。只要还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弟兄，我们就当坚持到底；即或身边失去了并肩作战的弟兄（愿上帝禁止这样的事），我们也下定决心，绝不向罗马的敌基督者臣服，也不向他的专治暴政屈膝。最后，倘若我们竭尽全力，仍然不能制服那只可憎的野兽，那么我们会以自己的鲜血将它封住，不容它贻害子孙后代。我们将大声宣告：耶稣基督真理的荣光，已经将那个大罪人^③ (the man of sin) 和他毒害人的教义从我们的内心和良知中驱逐了出去！让这封书信和其中的请求，在上帝面前，在他的教会面前，

① 指教皇，下同。

② “兽”预表敌基督者，下同。诺克斯在这里引用的是《圣经·启示录》13章里使徒约翰所描述的异象：“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给了它。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它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它交战呢？’又赐给它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它，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它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它，制伏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它。”（启示录13：1-8）

③ “大罪人”：指敌基督者。参见《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4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

在世界面前，并在你们自己的良心面前，成为我们的见证！”总会呈交给枢密院贵族的另一份请愿书论及了同样的主题，也是出于改教者的手笔。

第 27 章

革 命

当诺克斯停留在英格兰期间，一出苏格兰历史上广为人知的悲剧开始上演，并导致了一场彻底扭转王国政局的革命；与剧中演员的意图恰恰相反，这出戏的结局使权力完全落到了新教徒的手中。婚后不久，玛丽对达恩利爵士的浓情蜜意很快就冷却下来，在里奇奥遇刺之后更变成了强烈的憎恨；她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自己对丈夫的厌恶之情。女王日渐疏远国王的同时，她对那位没有道德顾忌的博斯维尔伯爵的好感却与日俱增。伯爵不仅独揽了所有公共事务的管理权，而且深得女王的器重和眷爱。在这种情况下，备受冷落、郁郁寡欢的国王被诱骗到爱丁堡近郊的一幢别墅里索然独居，并于 1567 年 2 月 9 日被谋杀，他所住的房子被火药炸毁。

由于和本书的主旨无关，这里我不想花太多的笔墨探讨事件的详情。对于谁是谋杀国王的幕后主谋，从事发之日直到如今，仍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起先，莫里伯爵被指控为同谋之一；最初散布流言的人显然是为了转移公众的视线，使真正的凶手不被注意。这一充满暗示的论调后来在约克会议（conference of York）上被直接挑明，并遭到了伯爵本人的驳斥；但玛丽的某些死党仍然对此紧咬不放。事实证明，这一说法没有任何凭据，根本不可信。任何一位公正和理智的调查者都会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博斯维尔才是这起谋杀案的主要筹划人和执行人。玛丽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了同谋和

帮凶的角色，她不仅私下知情，而且对行刺计划表示许可和赞同。我认为所有道德和法律上的合理证据足以澄清此案的真相：从女王当初将国王从格拉斯哥带回王宫，直到她后来在那个致命的夜晚弃他而去，其间她对丈夫的举止行为发生的180度的转变；玛丽在询问谋杀事件时表现出的漫不经心的态度；她一手导演的审判博斯维尔的闹剧；^①更令人瞠目的是，对于这个被指控为谋杀她丈夫的凶手，她居然寡廉鲜耻、急不可耐地和他上床（此举震惊了整个欧洲，甚至她的朋友都惊愕万分）——这一切事实都为玛丽有罪的推测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再加上从信件和证词中收集的直接证据，足以将此案在很久以前盖棺定论。我相信，除了苏格兰女王玛丽的辩护者之外，没有人会表示任何异议。

女王和博斯维尔于1567年5月举行婚礼时，诺克斯并不在爱丁堡。当全体苏格兰贵族对这桩事件表现出一种消极和可耻的默许时，诺克斯的同工克雷格牧师不辱使命，以其杰出的表现履行了教牧的职责。当各方要求他发布结婚公告时，他起初极不情愿，后来在本教会堂会的建议下，他终于同意照办；但在其后几天的讲道中三次表达了抗议。克雷格宣称：天地可以作证，他对即将举行的这场非法的、不道德的婚姻感到无比憎恶；他严肃地告诫贵族们，应当使用他们的影响力阻止女王采取下一步行动，因为这样的丑行只会让她身败名裂。克雷格随即被召到枢密院，有人指控他的言行超出了牧师的职权范围。克雷格大胆地回答：他的职权范围就是神的道、健全的法律和正常的理性；而所提议的婚姻违反了所有这些原则。当时博斯维尔正好在场，克雷格指控他犯有通奸罪，质问他为何仓促办理离婚手续，怀疑他和妻子之间有不可告人的协议；不仅如此，他还涉嫌谋杀国王，劫持女王；假如博斯维尔和玛丽真的结婚，那么以上所有这些罪名都将确定无疑。

^① 达恩利爵士被人暗杀后，博斯维尔成为人们怀疑的焦点；为了应付舆论的压力，女王纠合一群支持自己的贵族组织了一次虚假的审判，结果是伯爵无罪释放。

在这桩臭名昭著的婚姻缔结后不久，一连串重大变故就接踵而至：贵族领主结成联盟，声言要对国王之死进行报复，并保护婴儿王子的人身安全；博斯维尔选择了逃亡；女王向贵族联盟投降并遭到监禁，随即被迫退位；她的儿子被加冕为苏格兰国王；莫里伯爵受命在国王未成年期间掌玺摄政。这都是研究苏格兰历史的读者耳熟能详的事件。

当女王和博斯维尔逃到邓巴的时候，诺克斯似乎已经恢复了先前暂停的教牧职责。他出席了6月25日举行的总会，并被委派到西部地区，去说服游离于领主联盟之外的汉密尔顿家族和其他势力加入联盟，共同解决国家目前的纷乱局面，并参加定于7月20日举行的一次由各地教会代表组成的全体会议。他的谈判工作并不成功，但会议如期召开，出席的贵族、男爵和其他代表签署了多项涉及宗教信仰和国家事务的条款。

7月29日，在斯特灵的教区教会，改教者在国王詹姆斯六世的加冕典礼上讲道。他拒绝主持涂油礼（ceremony of unction），认为这一犹太教的习俗在教皇制度下被滥用了。但在当时的场合下违反约定俗成的礼仪显然不太合适，所以奥克尼的主教（Bishop of Orkney）代为主持了涂油礼，并在洛锡安和安古斯地方监督的协助下将王冠戴到了国王头上。

当贵族领主把女王禁闭在利文湖城堡期间，他们对于将来应当如何处置她一直犹豫不决。有人提议可以让她离开王国；有人提议终身监禁；其他人则坚持要对她处以极刑。诺克斯和几乎所有的牧师和大批的民众都持最后一种意见。他们主张处决玛丽的主要根据并不是因为她的暴政，也不是仅仅为了保护全体国民的安全与和平——这两条观点正是下个世纪英格兰议会处决玛丽外孙的理由；^①

^① 玛丽的外孙即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I，生卒：1600 - 1649；在位期：1625 - 1649），为詹姆斯一世次子。由于对西班牙和法国的战争失利，向国民征税导致国会反对，于1629年解散国会。1640年5月为筹集经费召开国会，但因反对激烈，仅三周便告解散（短期国会）。同年11月召开长期国会。国会发表大抗议书抗议国王暴

政，国王率兵去国会逮捕反对派，最终酿成内战。1646年在苏格兰国王被逮（转下页）而是基于玛丽所犯下的个人罪行。他们辩称，按照上帝律法的规定，对谋杀和通奸罪应当判处死刑，这些诫命适用于所有国家；无论犯事者身居什么样的地位，都不能免除死刑的惩罚。眼下的实际问题是，通常的法律诉讼程序中没有制定任何条款来审理一位犯有此类重罪的最高行政官，因为制定法律时并没有想到执政掌权者竟然会犯下如此十恶不赦的罪行。但是，特别的案件需要特别的应对之策；并且，新的罪行会产生新的法律。他们列举了圣经里的一些对君王处以极刑的例子，并找出了本国历史上类似的先例。

基于以上的理由，诺克斯毫不犹豫地公开宣称，为了国家社稷的福祉，必须对玛丽进行审判；如果发现她确实犯有谋杀亲夫、与博斯维尔通奸的罪行，那么应该将她处决。英格兰大使斯罗克莫顿爵士和诺克斯举行了一次会谈，希望能够从轻审判。虽然诺克斯最终默许了贵族领主将玛丽拘押在监狱里的决定，但他仍然保留自己起初的意见。当女王后来从狱中逃脱并引发内战时，^①诺克斯一再感叹道，正是因着贵族们当初可耻的“仁慈之心”，使国家再次遭受了血光之灾。

莫里伯爵被立为摄政王之后，在执政的早期非常关注解决宗教问题，并致力于补偿教会长久以来抱怨的种种不公正待遇。由于12月中旬要召开一届议会，所以伯爵在此之前听取了枢密院的建议，任命了一批男爵和自治城镇的委员，共同商讨和整理出合适的提案，以便到时呈交给大会审议。伯爵又邀请了诺克斯和其他四位牧师协助他们处理与教会有关的事务。这个委员会从12月初开始

（接上页）捕，引渡给国会军。次年出逃，再次举兵反对国会，旋即又被捕。最终在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以暴君、叛国者、人民公敌的罪名被处死；英国进入共和政体。

① 1568年5月2日，玛丽从利文湖逃脱并再一次成功招募了一支规模不大的军队，准备和新教贵族对抗。但她的军队于5月13日在兰塞德战役（battle of Langside，兰塞德是今天格拉斯哥的一部分）中被彻底击败，三天之后玛丽逃往英格兰；从此成为伊丽莎白女王的阶下囚，被监禁达18年之久。西班牙和天主教势力企图谋杀伊丽莎白一世并扶植玛丽为英格兰女王。玛丽后被发现参与了天主教势力的阴谋，因此于1587年2

月8日被斩首。

一起工作，直到议会开幕那天。他们的日程记录，包括民事和教会事务两方面的内容，都完整地保存下来。虽然他们的许多主张都没有被议会采纳，但是这些文献表达了一群国内最富才干人士的观点，具有很高的价值。

12月15日，诺克斯在议会的开幕式上讲道，并力劝全体议员首先商讨宗教问题，如此他们就会在其他的事务上更加亨通。议会批准了1560年通过的所有支持新教信仰、反对教皇制度的法案，并且附加了一些新的类似条款。法案规定：以后君主若不宣誓拥护新教信仰，则不可在王国内执政掌权；只要不是世袭或终身性质的公共职位，都只能由新教徒担任，等等。

每一群教会会众所享有的教会管辖权 (ecclesiastical jurisdiction) 得到了正式批准，并且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更准确地界定哪些主题归属于教会审判的范围。所有的圣俸收入 (由三部分组成) 必须立刻交给教会委派的收款员；收款员在支付了牧师们的津贴之后，应将余额尽数缴纳国库。此外还规定从牧长监督基金 (funds of provostries)、受俸牧师基金 (prebendaries) 和社团牧师^①基金 (chaplainries) 当中拨出款项，用以支付大学生的奖学金。

在批准教会管辖权的法案议程中，诺克斯被任命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负责起草该项法案的具体要点，以便提交给议会的下一轮例会。同期举行的总会也委派他代表教会处理该项议题，并在总会解散之后继续和摄政王、枢密院就教会事务进行协商。另外，他受命在巡回探访的过程中协助洛锡安地方监督的工作，之后还要访问凯尔、卡里克 (Carrick) 和坎宁安 (Cunningham, 位于艾尔郡内) 一带的教会。

在莫里伯爵摄政期间，教会和宫廷之间的冲突烟消云散，以往

^① 社团牧师：指为私人礼拜堂、机构、监狱、宫廷、贵族或军队服务的牧师。

充斥于每次总会例会的令人不快的抱怨声也销声匿迹——尽管在这段时期之后又死灰复燃。实际上，他们投诉的所有冤情尚未得到解决；法律所规定的资源和款项仍然不能满足国家的教会建制和神学院教育的需要。但是摄政王听取总会陈情的态度“和后者惯常所受到的待遇迥然不同”；不仅如此，只要是在他的权力范围以内，他总是倾向于批准他们的恳求。新的圣俸收入管理方案的出台给教会带来的利益不小，摄政王在此事上也扮演了主要角色。他还努力劝说议会解散高级教士团（prelacies），并将他们的收入划归教会的公共基金——尽管这一尝试没有成功。

事到如今，我们的改教者终于长舒一口气，可以驻足回首，平静仔细地审视自己所走过的这段危险和忙碌的岁月；多年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如今终于带来了令人欣慰的结局。迷信的堡垒被颠覆，无知的黑云被驱散，真实的信仰被建立；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一位新教徒的手中，他的智慧和人品都深得改教者的信任。教会从许多令她呻吟叹息的苦难中得到了释放，并且对前途充满了乐观的憧憬：损失可以得到补偿，问题有望得到纠正。令改教者常常激动不已的是，长期以来他以烈火般的热情全心投入的工作最终取得了成功，其兴盛的势头甚至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他庆幸自己现在能够从所有公共事务的重担下解脱出来，并可以在余生致力于对信仰的沉思默想；同时他日渐衰弱的身体也提醒他当为离世早作准备。在内心深处，他一直希望辞去爱丁堡的牧职，然后退休隐居；自从苏格兰宗教改革发端以来，他的这一夙愿就再也没有实现的机会。

第28章

摄政王遇刺

然而，“人的道路不由自己”。^① 天意安排诺克斯还要在公共事业上经历更多的试炼：他将会看到新教信仰的安全再次受到威胁，国家又一次卷入内战；这场内战比以往的战争更加令人痛心，因为对立双方的主要领袖都自称是新教徒。自从政府权力从玛丽移交给她年幼的儿子，并莫里伯爵被任命为摄政王的时候开始，以汉密尔顿家族为首的一群贵族就持隔离观望的态度；出于对玛丽女王的忠诚以及其他类似的原因，他们拒绝承认摄政王的权柄。当女王从狱中脱逃后，他们聚集到她的旗下，公开宣称要恢复她所有的王室权力。在兰塞德一役战败之后，玛丽被赶出苏格兰，她的联盟也随之瓦解。摄政王通过强有力的举措，使整个王国都顺服在国王的权柄之下。玛丽的死党意识到，要想在摄政王有生之年达到他们的目的显然无望，于是决定秘密地除掉他。

在1568年期间，有两个人受雇去刺杀莫里伯爵，但他们的计划都被察觉。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反对者酝酿新的阴谋。圣安德鲁斯大主教的侄子博斯维尔平原的汉密尔顿（Hamilton of Bothwellhaugh）开始着手实施下一步的行动。他是兰塞德战役中的俘虏之一；经过审讯和宣判，本该予以处决，但摄政王最后救了他一命。

^① 语出《圣经·耶利米书》10章23节：耶和華啊，我曉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

其后不久，他和其他战俘被一同释放。据说他想刺杀伯爵的动机是出于复仇，理由是：他曾在一场阻止自己的地产被没收的冲突中受伤，或者是因为他的妻子被无情地剥夺了该份财产。究竟是出于这些理由，还是后来坊间流传的说法（为要减轻凶手罪行的恶劣性质，使他的同谋脱离干系），已经很难得出定论。但很明显的一点是，摄政王肯定在某件事上得罪过凶手，因此那件事就成为他恩将仇报的借口。汉密尔顿和其所在贵族团体的头面人物进行协商，后者怂恿他将计划付诸实施，于是他一路尾随摄政王到格拉斯哥、斯特灵和林立斯戈，并在最后一处地方找到了下手的机会，用一粒滑膛枪弹击穿了伯爵的身体。摄政王受了致命伤，当天晚上去世。弥留之际，几位朋友站在伯爵的床边，哀叹他对待敌人——尤其是刺杀他的凶手——过于宽厚仁慈；伯爵的回答则充满了真正高贵的基督精神，他说，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为自己慈悲宽大的行为感到懊悔。

一位卓越的领导人去世通常会引起极大的恐慌。然而当摄政王遇刺身亡的消息在全国上下传开时，这种恐慌却被深深的悲痛情绪所淹没。普通民众都经历到伯爵短暂的执政所带来的诸般益处，其后果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可以说史无前例。他们觉得犹如失去了一位挚爱的父亲，因此强烈要求惩罚炮制这桩弑父罪行的主谋。许多在伯爵生前对他心怀嫉妒和怨恨的人士，现在纷纷对他的德行作出了公正的评价。那些在刚听到伯爵死讯时禁不住喜形于色的人，开始对自己轻率无礼的兴高采烈感到羞愧。汉密尔顿家族看到刺杀事件招致万人声讨，连忙极力替自己开脱罪责。他们将凶手从自己的派系中扫地出门；这种终生流放的惩罚倒是正合后者的心意，因为他从此可以掩盖自己的耻辱而不被人知晓。日后，当圣安德鲁斯大主教将被处决之前，面对自己犯下的众多罪行，他只对其中一件表示出悔恨之意，那就是他曾参与了刺杀摄政王的阴谋。这些情感上的反应不仅仅只限于苏格兰，整个英格兰也感受到了同样的气氛；从那个国家传来的悲痛和哀悼之声表明了所有阶层的人士对伯爵怀

有的非同一般的尊敬之情。

颇为幸运的是，摄政王在早年就加入了一个敬虔的团体，在其中受到了良好的熏陶；这个团体启发了他旺盛的理解力，给他的行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并在他的头脑中灌输了信仰和美德的原则。他早期对于新教信仰的接纳和持守，在道德品行上始终一贯的端庄以及他的正直、睿智、富有魄力但沉着镇定的勇气，使他很快跻身于那些从事宗教改革斗争、维护国民自由权利的一流人物当中，并且深得众人的信任。玛丽女王给予他的荣誉和高位，相对于后者向她献上的服务而言并不过分。倘若女王继续将领导顾问团的重任交付给伯爵，那些促使她走向毁灭的政策也许就可以避免出台。伯爵屡次被置于复杂的处境中，假如换成其他资历不如他的人，很可能就会受到野心的诱惑，渴望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但是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夺权篡位的意向。当他接受摄政王的职位时，是顺从这个国家有表决权的多数派的呼声；后者通过明确和公正的审议程序，一致认为他是充任该要职的最合适人选。即便置身于一个执政者可能遇到的最微妙和最尴尬的处境，他的举止言行也适宜得体，不负国人之厚望。伯爵的生命中融合了许多优秀的品质，这些品质通常很难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但却是一位成就非凡的君主所必不可少的人格要素。伯爵深谙用兵之法，也精通和平之道；他通过骁勇善战的军事才能平定四方，使举国上下都臣服于国王的权柄；然后通过明智公正、不存偏见的施政策略，开创了秩序井然的平稳局面。尽管在所有的军事行动中都立下赫赫战功，他却从未以残暴或不必要的严苛手段对待被征服者，以至于玷污胜利的桂冠。伯爵知道如何维护法律的权威，并通过有益的严厉惩罚来约束行为放肆的人；同时也以宽恕仁慈来调和公正执法的严酷无情。他常常亲自出席法庭的审议，并尽力让所有的臣民在诉讼案件上能够得到方便快捷的判决。他对于朋友、学者和仆人的宽广磊落，以及对穷人毫无夸耀的慷慨仁慈，都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即便那些通过各种方式四处传播、为要败坏伯爵声誉的流言飞语，也从未暗示说，他

为了扩充自己和家族的财富而在摄政期间欺压百姓、给民众增加负担。归根到底，伯爵堪为典范的敬虔生活，是一切真实美德的唯一源头。他的家庭管理得有条不紊，像一间教会，而不是一户王室。从所有家仆的口中，你不会听到任何粗俗下流的言语。除了日常的灵修操练，午餐和晚餐时间还会朗读一章圣经，从无例外；在这种场合下，伯爵的习惯是要求他的家庭牧师或其他的学者（他身边总是不乏这样的人）就此段经文发表他们的意见，作为对自己和家人的教导。大主教斯波蒂斯伍德（Archbishop Spottiswood）评价道：“他是一位真正的仁者，完全有资格被列为这个国家最卓越的统治者之一；因此，就算今天授予他‘仁慈的摄政王’的尊贵头衔，也毫不为过。”

某些读者可能会认为以上的文字偏离了本书的主题。然而，即使二者的关联不大，即使摄政王和改教者之间不存在那种亲密的友谊与合作，我也由衷地想对这位时代的伟人献上一篇小小的悼词，以表怀念；因为他在现今的世代遭到了无理的诽谤和肆意的诋毁，甚至最温和的历史学家也用反对和不公正的笔调来描绘他的性情。我所努力要做的，不过是勾勒出他的人格肖像中最显著的特征。我完全无意暗示说，伯爵的行事为人无可指责；然而，我认为那些针对他的主要指控，要么风马牛不相及，要么未经证实，要么被过分夸大。的确，无人能够断言：当伯爵被提升至一介臣民所能享受到的国中最高尊位时，他的言行仍然一如既往，不偏左右；但我也并未看到有谁能证明相应的反方观点。伯爵对他的朋友们寄予了很大信任，故而他的判断会因后者的建议而产生偏差；但是，如果坚持宣称伯爵受到了一群卑鄙宠臣的愚弄，并认定他的倒台是因为听信这些人的谄媚之辞，拒绝聆听有益的劝谏，而非由于朋友们的背信弃义以及不共戴天之夙敌的恶意蓄谋，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揣测，根本经不起反驳和推敲——因为这些主张仅仅建立在一个见证人的权威之上。

摄政王在1570年1月23日周六的晚间去世；他遇刺身亡的消

息第二天清早就传到了爱丁堡。改教者此刻的悲痛心情很难用言语形容。长久以来他们一直保持着真挚和亲密的友谊。在所有的苏格兰贵族当中，诺克斯对莫里伯爵在信仰上的忠诚抱有最大的信心，伯爵在晋升为摄政王之后的言行也更加增强了诺克斯对他的好感。在改教者看来，伯爵之死是这个国家的一场巨大灾难，并预示着其他的灾祸将随之降临。忧伤震惊之余，改教者头脑中闪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当初正是由于自己的仁慈宽厚，扮演了求情者的角色，使汉密尔顿免于死刑，没想到此人日后竟成了刺杀摄政王的凶手。对照摄政王在临终前的表白，此事在诺克斯心中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感受。

在那一天的讲道中，诺克斯引入了主题。他首先提到，上帝以他极大的怜悯兴起了敬虔的统治者，然而由于整个民族的罪孽，上帝在怒气中将他们取去。接着，他向上帝发出呼求，倾吐心中的悲情：

哦，主啊！这个国家在他（指莫里伯爵）就任的时候是何等苦难深重、混乱不堪！再看如今，他的辛勤努力转眼间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又是何等的安宁和平静！所有阶层的人士，尤其是穷困的平民大众，都可以为此作见证。哦，主啊！你的形象无疑在他身上发出了荣耀之光，以至于魔鬼和他统管的那些邪恶之辈再也无法容忍。为了惩罚我们的罪孽和忘恩负义（我们对如此珍贵的恩赐竟不以为然），你允许他在残暴和叛逆的杀人犯手中遇害，这实在让我们哀恸难当。哦，主啊！现在他已享受安息，而我们却身处极度的痛苦之中。

当时外界流传着一份捏造的书面记录，谎称摄政王曾经和林赛爵士（Lord Lindsay）、碧塔罗的威沙特（Wishart of Pittarrow）、毕克（Pitcur）的家庭教师詹姆斯·麦吉尔（James Macgill）以及诺克斯举行过一次秘密会议。会中这些人以代表的身份建议莫里伯爵

废黜年幼的国王，然后将王位据为己有。记录中列举了每个人的发言，为了符合他们平时讲话的风格习惯，其表达方式都经过精心的模仿，以便让这些文字看上去更加可信。这份文件的目的是为了缓和谋杀事件引起的公愤，减少人们对莫里伯爵的缅怀和崇敬之情。它被各方普遍视为一部卑鄙无耻、用意昭彰的伪造之作。这些谎言的编写者是托马斯·梅特兰（Thomas Maitland），一个颇有天赋的年轻人，可惜被他那位任国务大臣的哥哥引入歧途。国务大臣之前就投身于女王的阵营，并被怀疑深入参与了除掉摄政王的阴谋。

当教会的常务周会在爱丁堡召开的那天，托马斯·梅特兰在讲坛上塞了一份程序表，里面包括了这样一段文字，大意是：“现在好好看一看当初你们奉若神明的那个人，想一想他因为自己的野心落到什么下场。”那天正好轮到诺克斯讲道，他拿起那张纸走上了讲坛，以为是请求会众为某位病人代祷的便条，所以将上面的内容读了出来。念完之后，他不动声色地把便条放到一边，然后开始讲道。他对教会和国家最近遭受的损失表示痛惜，然后宣布外界流传的所谓秘密会议的记录是无中生有、污蔑毁谤之言。他在临近结束时说，有些人对这起大逆不道的谋杀事件欣喜若狂，并且兴高采烈地将其作为讨论的话题；特别是在此刻聚会的现场中，有一个人刚才丢进来一个纸条，对这一令所有善良的人们感到悲伤的事件表示幸灾乐祸。“这个邪恶之人，无论他是谁，必要受到应有的惩罚；他死去的时候，将无人为他哀悼。”梅特兰回到家里对姐姐说，他认为诺克斯讲道时简直在胡言乱语，居然用这样激烈的语言谈论一个自己完全不认识的人。当姐姐获知弟弟写了那张纸条时，马上责备了他一顿，并流泪说道：那个人（诺克斯）所发出的指责，没有一句会随便落空。根据斯波蒂斯伍德（Spottiswood，他亲自从那位女士口中得到以上信息）的记载，梅特兰死于意大利时，“身边没有任何认识的人相伴。”

2月14日即周二那天，摄政王的遗体被运出圣鲁德宫，埋葬

在圣贾尔斯教堂的南侧。诺克斯在葬礼前讲道，题目是“在主里安息的人有福了”。当他描述摄政王的德行，并哀悼他的离去时，在场的3,000人无不深受感动，潸然泪下。布坎南为了表达对逝者的追思和敬意，满怀悲痛之情献上了题词；这段题词被刻在了墓碑上，内容言简意赅，令人印象深刻。贵族们在葬礼之后举行了会议，决意要惩治谋杀者。但众人对惩治的方式意见不一，平民大众对惩治措施的执行不力也极为不满。之后召开的总会一致表达了对谋杀罪行的强烈谴责，并下令将凶手开除教籍，在王国所有的主要城镇均不得参与教会团契；并且日后发现的所有参与谋杀阴谋的人，一经定罪，也将受到同样的惩罚。

在会议进行期间，诺克斯收到了许多英格兰友人的来信；他们在信中高度赞赏了摄政王的品格，对他的去世深表忧伤。劳伦斯·韩福瑞博士（Dr. Laurence Humphrey）建议诺克斯为逝者写一篇回忆录。假如诺克斯这样做了，鉴于他和伯爵之间的亲密友情，其作品必定会给后世留下许多珍贵的资料，我们也可以从中知道更多的历史细节。遗憾的是，尽管他有心提笔写作，无奈他的健康状况拦阻了该计划付诸实施。

由于此事引致的悲痛，再加上随之而来的混乱，改教者的心灵大受打击，健康状况也大不如前。10月间，他突发中风，几乎无法正常说话。他的敌人闻风兴奋不已，并四处散布夸大其词的谣言，从苏格兰一直传播到英格兰。他们宣称：约翰·诺克斯再也不能讲道，也不能说话了；他的脸一直歪到了脖子上；他已变成了一个丑陋无比的畸形怪物。甚至干脆说诺克斯实际上已经死了——这实在是他在人们心目中地位重要之最明确的表现；也是我们的改教者和他同时代的伟人常常受到的待遇。

第八阶段

最后的岁月（1570 ~ 1572）

第 29 章

最后的坚守

事态的进展使那些满心以为改教者身患重病、性命不保的人大失所望；诺克斯的身体渐渐痊愈，恢复了说话能力，并且在几天之后重新踏上了讲坛，至少主日礼拜是如此。只是他的身体再也没有从中风造成的虚弱中完全康复。正如他所预料的，摄政王的去世很快引发了混乱，并重新在全国各处燃起了冲突的火焰。汉密尔顿家族公开以女王的名义起兵。爱丁堡城堡的总督，威廉·科卡迪·格兰奇（Kircaldy of Grange）因受到梅特兰的负面影响，内心早已背叛了新教阵营，长期以来一直以中立面目掩盖他的变节；现在他公开宣布自己站在汉密尔顿派一边，并成为竭力推翻现任政府的主要人物，而这个政府正是他先前满腔热忱参与建立的。

格兰奇的变节给爱丁堡的居民带来了很大伤害，同时让诺克斯忧痛不已。诺克斯对总督抱有热诚的好感，因为后者曾在改教运动中作出过重要贡献；而且他始终认为总督在骨子里是一位新教信仰的真挚盟友。出于这样的确信，诺克斯才会在后者拒绝对国王效忠的时候，仍然不遗余力地试图劝阻他，并在他后来放弃新教信仰的时候，仍然希望感化和挽回他。但是他的努力都归于徒劳。

1570 年年底，诺克斯和格兰奇之间发生了直接的争吵。事情的经过如下：格兰奇的一位仆人因受到杀人的指控而被投入监狱；格兰奇知晓后，从城堡里差派了一队士兵，给监狱施加压力，强行

带走了罪犯。在下一个主日的讲道中，诺克斯谴责了这次妨碍司法公正的骚乱。倘若这起事件是一个残忍嗜血、对神毫无惧怕的人所为，那么他也许不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但是，令他无法平静的是，一个被所有善良的人们寄予厚望的人，一个昔日在牢狱中宁肯流血也不愿苟且偷生的人，今天居然堕落到这样的地步，扮演了如此不光彩的角色。有人将诺克斯的谴责言论作了夸大其词的报道，并传回了城堡。总督听后勃然大怒，首先向诺克斯的同工继而又正式向当地教会的堂会递交了诉状，抱怨说他被污蔑成一个杀人犯，并提出要求：既然他的人格受到公开的诋毁，那么就应当受到公开的辩护。诺克斯解释和澄清了自己在讲坛上说过的话。在接下来的主日，格兰奇来到了教会（他缺席教会礼拜几乎已有一年之久），随行的是一帮曾积极参与谋杀和骚乱的人。诺克斯看出他们并不以自己所犯下的丑行为耻，故而抓住机会，特别强调了一种罪，即忘记上帝所赐好处的罪，并警告听众：如果他们对律法明知故犯，或傲慢地为自己的罪行辩护，那么不要以为靠上帝的怜悯就可以万事大吉。

格兰奇被这些警告深深地激怒了，认为是有意针对自己的攻击；所以他在谈论诺克斯的时候，使用了非常有威胁性的言辞。消息很快传开，说城堡总督变成了诺克斯的死敌，并试图要杀害他。凯尔和坎宁安的几位贵族绅士听说后，联名给格兰奇写了一封信，信中先提到了总督从前对宗教信仰的姿态，以及现在传到他们耳中的报道；然后警告格兰奇不可做出任何伤害诺克斯的事情，因为“在他们中间，诺克斯是上帝为他的教会所设立的第一位栽种者和浇灌者”；并且宣称，“他的生死犹如他们自己的生死一样至关重要”。

威胁恐吓并不能阻止诺克斯照常履行自己的职责。他继续警告听众，避免和那些支持女王主张的人同流合污；因为他们不仅拦阻政府对臭名昭著的罪行施以惩罚，而且图谋颠覆国王的权威和新教的信仰。当总会于1571年3月聚集时，许多匿名的诽谤文章被投

人集会场所，教会的门上也张贴了不少布告，指控诺克斯的数项罪名，如对玛丽女王进行煽动性的辱骂，拒绝为她的福祉和归正代祷，把她描绘成上帝所弃绝的人，断言她不可能认罪悔改，对她发出咒诅。总会公开宣告，要求责难者站出来证实他们的指控。这时又出现了一份匿名布告，作者承诺说，如果被指控者继续发布冒犯性的言论，那么他会在下次总会上露面发言；还有一个前提是，被指控者到那时应循规蹈矩，不可用惯常的伎俩伺机逃避。

诺克斯的几位朋友劝他保持沉默，对这些匿名的中伤之言置之不理；但他拒绝遵从朋友们的建议，原因是考虑到自己事工的声誉会受到影响。他在讲坛上展示了这些文字材料后，对其中包含的控告作出了特别的答复。他承认自己曾经控诉过退位的女王^①先前所犯下的众所周知的罪行，但自己并没有辱骂过她，除非攻击者能够证明以赛亚、耶利米和其他受圣灵默示的作者也是辱骂者。他从未称呼玛丽是“被弃绝者”，也没有说过玛丽不可能悔改之类的话；但他曾断言，傲慢和悔改不可能在一个人的心中长久同居。他曾在祷告中祈求上帝为了安慰教会的缘故，以他的大能阻挡玛丽的骄傲，并让她和她的助手们在自己的不虔不敬中陷入混乱和迷惑。不管攻击者把这个祷告叫做诅咒也好，咒骂也罢，总之，凡是支持玛丽的人，这段祷文已经应验或者将要应验在他们身上。关于拒绝为玛丽代祷的指控，诺克斯的回答是：“我在这个位置上并不是非要为她祷告不可，因为她对我而言并没有至高无上的主权。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绝不会为了金钱或世界的宠爱而出卖自己的舌头。”对于玛丽在政府中拥有的或曾有过的头衔，他不会提出任何争议，因为主要的社会阶层已经剥夺了她的执政权力，并据为己有，这些事实已足够说明问题了；而他自己在这个王国中，始终对所有合法的政权表示了顺服的态度。至于说认为他可能会在下届总会到来时“不守规矩”，诺克斯回复说，他的生命在上帝的监护之下，一直

^① 玛丽女王 1558 年去世，是她的妹妹伊丽莎白继承了王位。

存活到今天，在这样的年纪他不太可能会东躲西藏；实际上，从来没有谁能指责他曾擅自撇下所牧养的会众逃走，除了应会众的主动要求离开以外。

在诺克斯发表以上辩护以后，他的敌人黔驴技穷，于是亮出了最后一招，开始攻击他的著作《号角》(*Blast of the Trumpet*)。他们谴责诺克斯的行为前后不一致：他写书反对女性执政，可是却又为伊丽莎白女王祷告，并寻求她的帮助以对抗自己的国家。诺克斯在讲坛上有力地驳斥了这一控告。在证实了自己的前后一致之后，他以下面的话作为结论：

最后，有件事我不能置之不理。对于那些胆敢或有意声称我曾寻求境外支持来反对祖国的人，我必须戳穿他的谎言。我在自己的国家行事为人如何，尽管这个忘恩负义的世代并不知道，但后来的世代将为真相作见证。在我结束之前，我请求所有反对我的人开诚布公地表明你的立场，正如我将自己和我一切的作为显明在世人面前一样。因为对我这样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而言，被迫要和那些见不得光的阴影和猫头鹰争战，实在是一件最荒唐的事情。

我们的改教者这一次的言行展示了他那颗熊熊不熄的火焰焚烧的心灵，令人印象深刻。他的身体非常衰弱，一般除了在主日上午讲道之外，从不出门。他已经放弃出席教会法庭的会议。在中风发作之前，他就已经定意不再卷入公共事务。可是，只要看到教会和国家的福祉受到威胁，他就忘记了自己的决断和虚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信仰事业中，其激情之澎湃，较之他体力充沛的岁月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受到声讨和谴责的是国家的公共事务，还是他的个人操行，无论这些攻击是在明处还是暗处，他都随时准备应战，予以抵制和驳斥；他让对手确信：只要诺克斯还能开口说话，他们就休想毫无拦阻地轻易实现他们的企图。

1571年4月间的时候，格兰奇将汉密尔顿派和他们的军队接到了城堡里，诺克斯在爱丁堡的处境变得相当严峻。这些人对诺克斯累积的夙怨如此之深，以至于他的朋友们在夜间不得不守护他的住所。他们希望在诺克斯出门的时候给他配上一支护卫队，以确保安全；但城堡总督不许，认为这样做是对他不信任的表现，于是委派了他手下的一名军官迈尔维尔（Melvill）护送诺克斯往返教会。巴拿提尼（Bannatyne）评论说：“总督这样做，无异于把羊交给狼去照管。”在市民们的迫切要求下，总督希望汉密尔顿公爵和他的随行人员能够保护诺克斯；但公爵一行拒绝对诺克斯的安全作出承诺，因为“在他们中间有许多不喜欢诺克斯的流氓恶棍，后者也许会在他们不知情的時候对诺克斯造成伤害”。

许多迹象表明，诺克斯的生命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一天晚间，当他在住所的时候，一粒滑膛枪弹丸从窗户射进来，打到了房间的天花板上。碰巧的是，当时他所坐的位置正好和平时不同，否则按照射击的角度，那粒子弹很有可能击中他。事故发生后，他的同工和一些市民赶到他那里，再次请他离开爱丁堡，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直到支持玛丽女王的团体从城中撤离。但诺克斯拒绝听从他们的建议；他认为敌人正想恐吓他逃走，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加不受搅扰地实施阴谋，并且控告他胆怯懦弱。朋友们用尽了一切手段也无法说服诺克斯，无奈之下，他们使出了最后一招，终于奏效：万一有什么不测，他们决心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诺克斯的安全；如果在冲突中发生流血（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他们会将这血归到他的头上。听到这番话后，诺克斯在“非常痛苦地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答应离开那座城市。

5月5日，诺克斯离开了爱丁堡，穿过利斯的海湾之后，经过短暂的行程到达了圣安德鲁斯——这是他为自己选的退隐的地方。加洛韦主教亚历山大·戈登（Alexander Gordon, Bishop of Galloway）随后占据了诺克斯的讲坛。和他的前任相比，戈登的讲道和祷告显然更合乎女王党的胃口，但却让民众大失所望；他的软弱招

致会众的鄙视，而且，由于他取代了大家所钟爱的牧师的位置，所以人们都不喜欢他。有一段时间，爱丁堡教会处于被解散的状态。许多最受尊敬的会友要么被赶出城市，要么带着不满情绪离开。圣餐仪式也暂时中止了。在整整一个星期当中，“整座城市里没有讲道，没有祷告，也听不到钟声——除了大炮的轰鸣以外”。

在这种极度的敌视状态下，双方剑拔弩张，都采取了几次不光彩的报复行动。许多证据都表明了女王的拥护者们对改教者的人身攻击和强烈反感。利斯的一位居民仅仅因为和改教者同名同姓就被人袭击，身体遭到了残害。约翰·克雷格的一位仆人某天遇到了一支侦察队，对方问他的主人是谁，他战战兢兢地回答说是“诺克斯”，于是马上被抓了起来。虽然他立即纠正了口误，对方还是倾向于视其为“第一位主人的忠实手下”，将他投入了监狱。为了威慑整个城镇，负责在圣贾尔斯教堂尖塔上驻防的士兵们给一尊名叫“诺克斯”的大炮施洗；他们很喜欢鸣放这门炮，不料却发生了意外爆炸，夺去了其中两个人的生命，并使多人受伤。好事者还四处散布有关诺克斯在圣安德鲁斯之言行的荒唐谣言。当圣安德鲁斯的信使约翰·罗（John Law）在爱丁堡城的时候，“一些长舌妇跑到他跟前信誓旦旦地声称，约翰·诺克斯是被这座城市驱赶出去的，因为他曾在坟场里使一些圣徒复活，但他们中间突然冒出了一个头上有角的魔鬼；当诺克斯的仆人理查德看到这一幕时，吓得神志失常，很快就一命呜呼”。

尽管个人安全不再受到威胁，但诺克斯发现圣安德鲁斯并不像自己所期望的那样，是一个平静的退隐之处。科卡迪派（the Kircaldys）和巴尔弗派（Balfours）在当地人多势众，颇有影响；汉密尔顿派在大学和教牧团体中也都有他们的支持者。只要改教者继续住在他们中间，这些人就是他肋旁的刺，使他处境不妙。诺克斯在爱丁堡时，本想指证那些反对王国合法政府、威胁新教信仰安全之人的阴谋，可是却被剥夺了自由表达立场的权利，故而离开了那里。可以预料，当他来到圣安德鲁斯之后，肯定不会在这个话题上

保持沉默。有一次，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预言为主题的讲道过程中，他多次提到自己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猛烈抨击针对已故国王（达恩利爵士）和摄政王的暗杀行径。在敌对派人士看来，这些声音显得极为刺耳。罗伯特·汉密尔顿和阿奇博尔德·汉密尔顿（Robert and Archibald Hamilton）对此尤其不快——前者是该城的一位牧师，后者是大学的一位教授。听到诺克斯指责他的亲戚，罗伯特感到非常不满，但因慑于诺克斯在讲坛上的声望，所以只敢在私下说，诺克斯对凶手们的强烈谴责纯属装腔作势，因为他曾经在一份刺杀达恩利的盟约上看到过改教者和莫里伯爵的署名。可是，当改教者后来质问他时，罗伯特却否认他曾经说过这些话。

阿奇博尔德·汉密尔顿的反应则更为公开：他退出诺克斯的讲道现场，并控告诺克斯的言语充满了毫无宽容的责骂。此举引起了很多人的抱怨。于是他试图将此事交给大学的院长们来评断，因为他在这个圈子里有很大的影响力。诺克斯很愿意应教授们的要求，在他们面前就自己的言行给出清楚的说明，但他同时觉得有必要发表抗议，宣告自己出面接受询问并不意味着任何人可以随意干涉讲坛布道的自由和教会常规法庭的权柄；实际上，对宗教信条的审断权属于教会法庭，而不属于任何大学。这次事件彰显了改教者在信仰立场上一如既往的热心。他在写给1571年8月斯特灵总会的一封信里对此问题也作出了详尽的表述；信中他劝诫与会者，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保护教会不受大学势力的约束，不可让大学的文人们免受教会管辖权的限制。

还有一件让改教者忧心如焚的事情是：当时的权臣正在策划一起阴谋，企图变更教会的政策，将教会圣俸的主要进项揽入自己手中。这个计划在莱依克斯（Lennox）摄政的时候酝酿出台，然后在马尔（Mar）摄政期间开始付诸执行，最后在莫顿（Morton）摄政时得以实现。前面我们已经提过许多贵族对《第一教规书》心怀反感，并分析了产生这种情绪的主要缘由。在莫里伯爵执政期

间，他阻止了任何新的侵犯教会权利的举动；但继任的摄政王要么对这些教会权利不以为然，要么无力约束那些权势显赫之贵族的贪欲。当时的情况是，鉴于多种原因——比如圣职人员去世或者天主教圣品人员的退隐，有几个收益最丰厚的圣职出现空缺；尽管教皇派暂时获准持有这些收入，但将来应该以何种方式处置这些巨额财富的问题已成当务之急。教会全体一致要求，这些收入应当被分成几块，用来支持宗教信仰和人文教育领域的建设。权臣们对此要求自然是一百个不愿意；但同时觉得，若试图把这些财源和教会完全分离，又显得太过大胆；况且法律宣布只有神职人员才能拥有，平信徒既没有正当的名分也没有足够的资质担任这些职位。最后定下的权宜之计是：主教职位 (bishoprics) 和其他的教会财产应当授给某些牧师；牧师们则必须将他们收益的大部分转交给有名望的贵族，因为后者替他们争取到了宫廷的庇护。

根据以上的设想，一群牧师和权臣于 1572 年 1 月在利斯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者最后同意：在国王成年之前，大主教、主教等天主教系统中的头衔和职位应当继续保留；同时应提拔牧师中间的合格人士晋升这些高位。但是，主教们所拥有的权力并不会大于地方监督的权力，他们和后者一样要受制于教会的总会。从这些信息中我们可以得知，在詹姆斯六世未成年期间，主教制度 (episcopacy) 被引入苏格兰新教教会的缘由和性质。对贵族权臣而言，这些做法背后的意图，根本不是出于对圣职等级制度 (hierarchical government) 的偏爱，而是出于将教会的圣俸收入据为己有的贪欲。当时就任这些圣职的人，通常都被叫做“稻草牛主教”^① (tulchan bishops)，此种称谓一针见血地说明了问题的实质。

但是，侵犯教会管辖权的行为仍然通过不同的方式屡屡发生，比如：某些不够资格的人士未经教会的许可，擅自承担圣职并继续

^① 稻草牛 (tulchan)：指用稻草塞在牛皮中制成的假牛犊，由此可以欺骗母牛，让其不停地产奶。此处指主教们成为贵族手中的工具，被后者利用以篡取圣俸收入。

享受教产和圣俸；一人兼任数份圣职的例子依然不少；甚至民事法庭也经常越权审理本该属于教会管辖范围内的事务。当时许多牧师对这些现象抱怨不已。

有人曾含沙射影地指出，诺克斯对利斯会议作出的恢复主教职位的决定也持赞成态度；这种说法援引的证据是诺克斯呈递给1571年8月斯特灵总会的文章。然而，从这些文章里所能得出的推论不过是：诺克斯希望在选举主教的过程中，决策者能够严格遵守大会制定的各项条件和限制，以抵制将主教职位授予平信徒之类的行为（因为刚刚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例），并反对牧师在晋升高位时和贵族订立买卖圣职的交易（*simoniacal pactions*）。假如总会采纳和执行了诺克斯的提议之一；假如主教们也受到有效的约束，必须对他们所有收入的分配和去向有一个清楚的交代（或者用来支持圣俸来源地区的牧师，或者将相应费用打入教会为同一目的所设立的基金里面——总之，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说明），那么很明显的结果是，不仅授予圣职者和接受圣职者（*patrons and presentees*）双方唯利是图的算盘不会得逞，而且教会也将实现原定的目标，能够自主使用主教的圣俸收入。正是对此美好前景的期望促使一些正直的牧师在利斯大会上对所提议的规定表示了同意。可惜，以公正无私的坚定立场持守原则，要比附和大多数人的意见困难得多；即便在这段时期，贵族们也能够找到一大群见风使舵、贫困匮乏或贪图好处的牧师，使他们成为自己贪婪之心的同伙和工具。

但是，人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的改教者在这时偏离了他一贯主张的反主教制度的原则。实际上，我们从他此间写给碧塔罗的威沙特的一封信里以及写给斯特灵总会的公开信中，都看到他对于新近出台的那些骗取教会财产和侵犯教会自治权的计划所表示的强烈不满。当时，他还收到了朋友贝扎（*Beza*）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贝扎对诺克斯从苏格兰教会中排除了主教阶级（*the order of bishops*）的举措甚为满意，并提醒他和他的同工保持警觉，不可容许有人打着“维护合一”的骗人招牌，将此类圣品制度重新引

入苏格兰教会。

诺克斯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更加公开地宣布自己的看法。莫顿伯爵 (Earl of Morton) 因为之前得到王室的赏赐，故手中握有一个圣安德鲁斯大主教的职位；他和已经退休的大学校长约翰·道格拉斯 (John Douglas)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将这份圣职授给了后者。道格拉斯是一个“心地正直、志气高大，但过于天真、不谙世故的人”。诺克斯对这份任命感到极为不快。1572年2月13日，即举行新任大主教就职典礼的那一天，当诺克斯完成例行的礼拜讲道后，莫顿希望他能够主持这场就职典礼；诺克斯不仅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而且发表了对捐职者和受职者的强烈谴责。圣萨尔瓦多学院的教务长 (the provost of St. Salvador) 宣称，诺克斯这样做其实是出于失望，因为他自己没有得到这个圣职。在下一个主日的讲坛上，诺克斯对此恶意的指控进行了驳斥。他说，自己曾经拒绝了一个比圣安德鲁斯主教更为显赫的主教职位；那些愿意施恩赐给他圣职的人士，其地位也远比道格拉斯的施惠者高贵得多。他先前所说的话是为了卸下良心的负担；鉴于《第一教规书》已经建立起了一套与旧制完全不同的教会次序，并得到了贵族们的签名同意和议会的正式批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希望苏格兰教会仍然受主教阶级的辖制。此外，针对任命主教事件本身，他也发出了痛心的质问：即便是20位最有恩赐的主仆也无法担当的重任，怎么能够放在一位垂垂老者的肩上呢？因此，在3月间举行的圣安德鲁斯总会上，诺克斯不仅对道格拉斯担任主教一事提出了正式抗议，而且对“选举主教”的程序表示了直接反对。

在卷入这些争论的同时，诺克斯的体力每天都在衰退；但他仍然坚持讲道——尽管必须有人搀扶才能走上讲坛。当他在台上因所论述的主题兴奋起来，他就会忘记自己的虚弱，变得慷慨激昂、滔滔不绝，使台下的听众震惊不已。安斯特拉瑟 (Anstruther) 的牧师詹姆斯·迈尔维尔 (James Melville) 当时还是神学院的学生，并

且一直是诺克斯的忠实听众；他描述的诺克斯讲道之情景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现将原文摘引如下：

整个 1571 年期间，让我最受益的事情，莫过于有幸见到本国最著名的先知和使徒——约翰·诺克斯先生光临圣安德鲁斯。由于女王派占据了爱丁堡的城堡和市镇，所以诺克斯先生被迫离开那里，并在一群最优秀的主仆陪同下来到了这座城市。这一年的夏季和冬季，我一直在听他教导《但以理书》中的预言。我一般带着纸笔，以便随时记下自己理解的内容。诺克斯在讲解经文的头半个小时通常口气温和；但是，当他进入应用部分时，我禁不住浑身战栗和发抖，甚至无法继续拿笔写字。他真的非常虚弱。每次讲道的日子，我都看到他小心翼翼地缓步而行，脖子上围着一圈貂皮衬里，手中拄着一根拐杖，由他忠心虔诚的仆人理查德·班纳坦（Richard Bannatyne）搀扶着，从修道院走到本地的教区教会；然后理查德和另一位仆人协力将他扶上讲坛。他刚上台时，身体要靠着讲坛；可是，一旦他开始讲道，马上就变得精力充沛，干劲十足，似乎要把讲坛击得粉碎，整个人从里面飞出来。

诺克斯于圣安德鲁斯停留期间，出版了一部为改革宗信仰辩护的著作，以回应苏格兰耶稣会教士泰里（Tyrie）写的一封信。这部著作中的论辩部分在 1568 年就已完成，但诺克斯这次对内容进行了增补，然后送往国外，作为对世界发表的告别演说以及为自己长久以来教导和捍卫的真理所作的临终见证。和这本书一同出版的，还有他先前写给岳母鲍斯夫人的论及信仰问题的一封信；在前面的序言中，他提到岳母最近离开人世，所以他想借此机会公开这封信，让民众能够了解，他们二人之间能够维持多年密切的基督徒团契的主要缘由是什么。

从诺克斯这段时期留下的文字里面，可以看到他热切盼望死亡

将他从今生的劳苦愁烦中解脱出来；字里行间常常出现“厌倦世界”、“渴望离开”之类的用语。比如他在上述著作的题献中写道：“耶稣基督的仆人约翰·诺克斯，不堪世界之劳苦，素常盼望属地的帐篷早日拆毁，^① 在此写给忠信的主仆，即被那位满有怜悯的上帝所任命、在我离世之后继续争战的人。”在末尾他又说：“亲爱的弟兄们，请为我向上帝呼求，愿上帝以他的慈悲和美意，结束我所经历的这场漫长和痛苦的战斗。因我现在已无力争战（虽然上帝仍不时给我力量），故渴望快快进入安息，以免自己成为众圣徒的拖累。然而，主啊，愿我的期盼在你温柔的圣灵引导之下。”在献辞末尾附加的祷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哦，主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给你，因我渴望能够脱离这副有罪的躯体，并且深信自己将在荣耀中复活。任凭那些邪恶之辈将我并你的众仆人暂时踩在脚下吧。哦，主啊，求你向苏格兰的教会大施怜悯吧！愿主福音的光芒继续与教会同在；求你增加忠心的传道人的数量。也求你以恩慈眷顾我所撇下的妻子，她怀中的骨肉，以及我亲爱的两个孩子——拿但业和以利亚撒。主啊，求你现在结束我的苦难。”在一篇题目为“致忠诚的读者们”（To the Faithful Reader）的公告（1572年7月12日发自圣安德鲁斯）中，诺克斯的结束语是这样的：“我谨向地上和天上的所有圣徒致以衷心的问候，并诚恳地请求他们以代祷帮助我，不叫福音遭受任何的诽谤，让我能够安心结束一生的争战。因为世界已经对我感到厌倦，我也厌倦了世界。”

总会于8月6日在珀斯召开例会时，诺克斯给他们发去了一封辞别信，随信附上了一些文章和问题，建议大会予以考虑。总会在回复中表示了对其建议的赞赏，并诚挚希望他健康安宁、满得安慰。诺克斯应总会的要求所做的最后一件公开事工，乃是对邓弗姆

^① 指肉体的朽坏死亡。参见《圣经·哥林多后书》5章1-2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

林的牧师大卫·弗格森（David Ferguson, minister of Dunfermline）最近传讲的一篇讲道稿所作的考查和认可。他为这篇讲道所作的批语，正如那段时期他所有口头和笔下的言论一样，极为引人注目：“我——约翰·诺克斯，用衰弱无力的手和欢喜快乐的心赞美上帝；因着他的怜悯，即便在这样一个荒凉的景况之中，仍然为他的苏格兰教会存留了如此宝贵的亮光。”

1572年春季，诺克斯的健康状况开始急剧恶化；所有的迹象表明，圣安德鲁斯很可能成为他人生的最后一站。然而，上帝的美意让他又一次回到自己的羊群中间，并能在自家的床榻上寿终正寝，平安离世。七月底的时候，摄政王和女王党达成了停战协议，女王党的军队随即从爱丁堡撤离；这座城市从此不再受到驻军的搅扰。当流放在外的市民们一回到家中，马上就差派了一支代表团去圣安德鲁斯，向他们的牧师呈递了一封信，表达了会众想“再一次听到他的声音”的真挚愿望；恳请他即刻返回爱丁堡——如果他的身体状况允许他动身的话。诺克斯读完信，和代表们交谈之后，同意回去；但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条件，即不可拦阻他对女王党占据城堡并与摄政王对抗的行为发出谴责；“只要我还能开口说话，就一定会大声抗议那些人的叛逆和暴行”。因此，诺克斯希望代表团向爱丁堡的会众务必陈明自己的意愿，以免日后人们因为他的严厉话语而心生悔意，担心由于他的缘故而招来麻烦，惹祸上身。当他回到爱丁堡准备上台讲道之前，他又重申了这一条件。代表团成员和爱丁堡的弟兄们都向他保证，他们并无意要限制他的言论自由，反而希望他一如既往地履行他的职责。

8月17日是女王党感到兴高采烈的一天，因为那位令他们震慑不已的改教者启程离开了圣安德鲁斯；与之随行的有他的家人以及许多弟兄和朋友。由于诺克斯身体虚弱，所以行程很慢，23号才到了利斯；在那里休息了一两天后，终于抵达了爱丁堡。在诺克斯回城后的第一个主日礼拜，市民们如愿以偿，终于看到他再次走上了讲坛。然而，由于他气力衰竭，音量不足，所以有一半的会众

听不到他的讲话。没有谁比诺克斯更清楚他自己的光景了；因此，他向本教会的堂会提出请求，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小一点的房子，容纳不超过一百人，这样就可以保证大家都能听见他的讲道了。实际上，即便在诺克斯体力最佳的岁月，他在大教堂布道时，尚且无法让人数众多的会众都能听见他的声音，更不用说如今身体衰弱的时候了。很快，教会按照他的要求重新作了安排。

在诺克斯离开爱丁堡的日子里，他的同工克雷格和教区会众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疏远。会众批评克雷格在女王党占据该城期间有见风使舵的行为。双方的矛盾导致分裂，克雷格遂去往他处。诺克斯深知自己能够讲道的日子不多，而且已经无力胜任其他的教牧职责，所以迫切渴望邀请到一位新的同工，这样会众在他离世后就不至成为“无人牧养的羊群”。鉴于上届总会已授权爱丁堡教会可以选择王国内的任何一位牧师（邓迪和珀斯的牧师除外）来担任牧者，因此会众一致决定阿伯丁学院的副校长詹姆斯·罗森（James Lawson, sub-principal of the college of Aberdeen）为最佳人选。诺克斯对此决定非常赞同；在地方监督和堂会给罗森发出邀请信的同时，他也给后者去信一封，催促他顺服呼召，不要迟疑。尽管这封信曾在公开出版物中出现过，但由于该信非常生动地刻画出改教者在这段特殊时期的心境，而且篇幅不长，所以我将其引述如下：

所有世间的力量都必衰败，甚至属灵的能力也不例外；然而，上帝的工作却永不衰败。如你所知，满有怜悯的上帝再次呼召我回到了爱丁堡，这实在远超我的预料；然而我的肉身日渐衰败，自感体力不支，无法继续战斗；亲爱的弟兄，我谨在此喜乐地将自己灵魂的重担卸在你和其他人身上，因我相信你们对上帝仍然存有敬畏之心。我请求你来这里和我会面，这样我们就能共同协商天上的事情；（倘若我的体力够用的话，我断不会让你来承受这份劳苦的责任）因为在地上没有任何的

稳定可言，唯有耶稣基督的苏格兰教会，靠着十字架的带领奋战不息；故此，我衷心地将你交托在他的大能保护之下。

约翰·诺克斯

1572年9月7日于爱丁堡

在附言中诺克斯还加上了一句话：“请弟兄速速动身，恐怕你来得太迟了。”

第30章

离世

九月初，有消息传到爱丁堡说，在查理九世（Charles IX）的命令下，那位勇敢、慷慨和敬虔的法国海军上将柯利尼（Coligny）在巴黎惨遭杀害。^①紧接着，噩耗接踵而至：法国的天主教势力以最无耻的方式背信弃义，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野蛮行径，对境内的新教徒发动了大规模的屠杀行动。接二连三的信件报道展示了最令人震惊的、前所未闻的残暴行为。受雇的杀手和狂热的食人者公开游走于各个城镇大街，并闯入那些被标记为毁灭的房屋中肆意行凶。没有对白发老者的尊重，没有对有地位才德者的敬意，也没有对女人孩子的怜悯。寿高年迈的主母，即将生产的孕妇，还有尚未成年

^① 法国宗教战争期间最震惊世界的一幕是1572年8月24日发生的“圣巴多罗买日大屠杀”（S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在巴黎，大约3,000名胡格诺派新信徒（Huguenots）被杀害。这一惊人事件发生之前，法国已经经历了三次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内战，双方一直剑拔弩张。当时，法国新教的领袖是来自查蒂庸家族的柯利尼海军上将（Admiral de Coligny），他和几乎所有的新教头面人物都应邀来到巴黎，参加国王查理九世的妹妹玛戈和波旁家族的亨利（新教徒）的婚礼。不料婚礼前夕，柯利尼在会见完国王后返回驻地时遇刺受伤。巴黎城里的新教徒群情激愤，走上街头，要求国王伸张正义。新教徒的示威使王室惊恐不已，他们错误地判断新教徒即将举行暴动。王太后凯瑟琳·麦迪西（Catherine de Medicis）随即在卢浮宫召集天主教的贵族，决定先发制人，乘新教领导群汇集巴黎的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国王最终被太后说服，同意采取屠杀行动。

（转下页）

的儿童都被冷血的杀人者踩在脚下，或者用钩子拖到河里。其他被囚在监狱里的人，则被带出来当众处死。仅仅一个星期就有七万人被杀害。巴黎的街道上好几天血流成河——这不是比喻，而是真实的景象。那位残忍的国王和他的臣僚们站在王宫的窗户旁边，心满意足地欣赏着城中惨无人道的一幕幕；当许多悲惨的逃亡者来到王宫门前寻求庇护时，国王竟然命令向他们开枪，以此取乐。

和其他新教国家的反应一样，这次大屠杀的消息（教皇已下令在罗马专门为此举行了盛大隆重的感恩礼拜）在苏格兰国内引起了广泛的恐慌和震惊。诺克斯近乎衰竭的心灵又遭到了一次严重的伤害。除了整个新教阵营受到打击之外，许多在敬虔、学识和地位上出类拔萃的人士也不幸殉难，诺克斯对此深表悲痛，因为这些人都是他所熟知的朋友。当诺克斯被人搀扶着走上讲坛时，他拼尽剩下的力气，向法国国王——那个残忍的刽子手、毫无信义的叛国者——发出了雷霆般的谴责，并宣告万军之上帝必要追讨他的滔天罪行。诺克斯要法国大使李·克罗克（Le Croc）转告他的主人：苏格兰已经公布了对查理九世的审判；如果他拒不悔改，那么上帝的报应不会离开他，也不会离开他的家室；他的名字将成为子孙后代咒诅的对象；他的后裔的国位将永无宁日，无一人能够安享太平。大使先生听后表示抗议，认为这些话是对其主人的侮辱，于是要求摄政王出面制止传道者的发言。在遭到拒绝后，大使愤然离开了苏格兰。

罗森一收到邀请函就马不停蹄地赶到爱丁堡，并且高兴地发现

（接上页）8月23日晚间和24日（即圣巴多罗买日）凌晨，一群国王的卫队士兵冲进柯利尼的住所，将柯利尼从床上拖起来一刀刺死，然后把尸体从窗户扔到大街上任人践踏。住在附近的其他新教贵族也都被杀。巴黎的天主教市民以为是国王下令铲除新教，也开始大肆杀戮左邻右舍的新教徒，整个巴黎城立刻成为人间地狱。新郎亨利被拖到国王面前，被迫发誓改信天主教，才得以保命。大屠杀像瘟疫一样从巴黎扩散到各省，直到三个月后才平息。估计全国总共有超过10万新教徒遇难，塞纳河里浮尸累累，堵塞了河道，好几年后河中的鱼都没人敢吃。教皇得到消息后，下令在罗马全城燃起篝火，通宵达旦地庆祝。这次大屠杀消灭了整整一代胡格诺派的领导核心，从此法国新教开始逐渐衰微。

诺克斯仍然有能力接待他。罗森到达后即发表了一篇讲道，得到了普遍的认可。9月21日的主日，诺克斯开始在图布斯教会（Tolbooth Church）讲道；这个场所是专门为他安排的。那天讲章的主题是《马太福音》第27章记载的、有关我们的救主被钉十字架的事件；诺克斯经常向人表露的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以这个主题来结束自己的事工。

11月9日，他主持了罗森的就职典礼，后者正式成为他的同工和继任者。那天，当诺克斯在图布斯教会讲完道之后，他和听众一同转移到大教堂；接着，他按照任职仪式的惯例，向牧师和会众提问，对他们发表了一番劝勉，并且祷告上帝祝福他们之间的交通和团契。在阐明了牧师和会众对彼此的责任之后，他宣称自己很快就要归回天家，故而在那位要召见他的主面前向众人作见证：自己一直以清洁正直的良心在他们中间生活，诚实无伪地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所行的一切既不是讨人的欢心也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喜好。赞美上帝，如今他非常高兴能够推荐一位牧师来顶替他的位置，因为自己已经无力担当教导的重任。诺克斯热切地祷告说，愿他所领受的全部恩赐在其继任者身上有一千倍的加增。他以极其严肃和感人的方式激励全体在场的听众，劝诫他们务要恒切坚守所告白的信仰。最后，诺克斯以非常愉快但筋疲力尽的声音为会众作了祝福。当礼拜仪式结束时，他从讲坛上走下来，倚靠着他的拐杖，缓缓地走到街上；道路两旁站满了听众，他们似乎急切地想看亲爱的牧师最后一眼，所以一直尾随其后，直到目送他迈入家门。从那天起，诺克斯再也没有走出自己的屋子，直到去世。

11月11日（周二），诺克斯咳嗽得很厉害，呼吸十分困难。他的朋友们迫切希望延长他的生命，因此建议请医生过来帮助。诺克斯以默许的态度说，尽管他相信主会很快结束他所有的苦难，但他也不会忽视普通的医疗手段。诺克斯通常每天都会读几章旧约和新约的经文；另外加上几首大卫的诗篇，这样每个月他就可以将诗篇细读一遍。

13日（周四），他的病情突然加重，被迫停止了惯常的读经计划；但是，他指示他的妻子和秘书理查德·班纳坦，要求他们每天轮流用清楚的声音给他朗读以下的圣经章节：《约翰福音》17章、《以赛亚书》53章，以及《以弗所书》中的一章。在他整个病重期间，这一安排得到了按时的遵行；几乎每一小时当中，都会有人为他朗读一段经文。除了以上的章节，诺克斯间或还会专注于某些诗篇以及加尔文论《以弗所书》的某些法语讲章。有时，他们在朗读讲章的过程中，以为诺克斯睡着了，就问他是否还在聆听；诺克斯答道：“赞美上帝，我的听力和理解力都非常好。”他最后一次说这句话，是在去世前四小时。

同样在13日那天，诺克斯委托妻子给仆人们派发薪水。次日，他亲自给一名男仆发薪，并且多付给他20先令，同时对他说：“你以后再也不会从我这里收到更多了。”然后，他给予所有的仆人合宜的劝勉，鼓励他们过敬畏神的生活；这些仆人都在他的家中受到教育并成为基督徒。

14日（周五），诺克斯比平常起得更早。他以为当天是主日，所以对人说他想去教会，并要在讲坛上传讲基督复活的信息——这是他整个晚上默想的内容，也是按照正常安排在下个主日讲道的题目。然而，他的身体已经如此虚弱，以至于需要两个人的搀扶才能从床上下来，就连坐在椅子上也非常费力。

第二天（周六）午间的时候，诺克斯的两位密友约翰·杜里（John Durie）和阿奇博尔德·斯图尔德（Archibald Steward）登门来探望他；二人并不知道他已经病入膏肓。诺克斯起来接待他们，并说服客人留下来共进晚餐——这是他最后一次坐在餐桌旁边。他要人到地窖里开了一大桶酒，为朋友们增添欢乐的气氛，并兴致勃勃地对阿奇博尔德说：趁着还有很多酒，他可以派人来取走一些，因为自己已经等不到酒喝完的那一天了。

16号主日，诺克斯一直躺在床上；他误以为这个主日是为纪念法国大屠杀而指定的禁食期的第一天，所以拒绝吃任何东西。费

尔利·布雷德 (Fairley of Braid) 当时正好在场，他告知诺克斯，禁食期从下个主日才开始；然后，他亲自坐在诺克斯的床边用餐，并一再劝说，诺克斯才吃下了一点点食物。

诺克斯非常急切地希望和教会的堂会成员再见一次面，向他们作最后的告别，并留下自己的临终嘱托。为了满足他的愿望，17日（周一）那天，他的同工罗森、教会的长老和执事们以及利斯的一位牧师大卫·林赛一同来到他的房间聚集；诺克斯的发言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

我素来热切渴望的日子终于临近，就在眼前了；很快我就要从极重的劳苦和无数的伤痛中解脱出来，进入基督的同在。此刻，我在灵里事奉的上帝可以为我作见证，在上帝儿子的福音上面，我所教导的都是真实和完整的教义。我唯一的目标就是：靠着恩典的应许，去指示无知的人，坚固忠信的人，并安慰那些软弱、惧怕和愁苦的人；同时凭着上帝的警戒，与狂傲和悖逆的人争战。我知道从以往到如今，有许多人常常高声抱怨，指责我为人过于严厉和强硬；然而上帝知道，当我向人发出最猛烈和严厉的审判时，我对他们并无任何憎恨之心。的确，对于他们所深陷其中的罪孽，我感到深恶痛绝，但我从未忘记：倘若有可能，或许我可以为主得着这些人。我之所以能够放胆无惧地传讲主交付我的话，而不看任何人的情面，乃是出于对我的上帝的虔诚敬畏——因我受他恩典的呼召和任命，成为上帝奥秘之事的管家；同时也是出于这样的信念，就是有一天我会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必须要为托付给自己的责任向他交账。因此，在上帝和他的圣天使面前，我宣告自己从来没有出卖过上帝神圣的话语，没有存心讨人的喜悦，也没有放纵自己和他人的邪情私欲。作为教会的守望者，我所行的一切不过是忠心地分派所赐予我的才干，去建立和造就教会。无论在这些事上被邪恶之人如何诋毁，我都因着清洁良心的见证，大

有喜乐。与此同时，我最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在福音的永恒真理中坚守忍耐，殷勤地服侍主所指派你们管理的羊群——这羊群是他用独生儿子的宝血重价赎回的。罗森，我的弟兄啊，愿你打那美好的仗，以喜乐和坚定的心志做主的圣工。愿至高者上帝祝福你，也祝福整个爱丁堡的教会；只要教会持守在我历来教导的真理之道里面，那么地狱之门永远不能胜过她。

接着，诺克斯警戒他们不可支持那些否认国王权柄的人，并对梅特兰在堂会上对自己的一项控告发表了若干意见。之后，他筋疲力尽，被迫停止了发言。所有在场的人都被这篇感人肺腑的讲话深深触动，心中悲喜交集。他们提醒诺克斯，他所经受的争战不是徒然的，等待他的将是胜利的冠冕。最后，他们一起流泪祷告，并向他辞别。

当他们出门时，诺克斯请求罗森和林赛留下，并对他们说：

有一件事让我非常痛心。格兰奇从前为上帝的事业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忠诚，都是你们有目共睹的。可是如今，唉！他却陷入了何等可怕的深渊之中！我恳请你们务必要去拜访他一趟，并替我捎话给他，就说我约翰·诺克斯快死了，但我的心态和情感依然如旧。我一直非常了解他，如今更希望他能够好好思考一下自己过去的身份以及眼下所处的光景——因为他正在极大的祸患之中。无论是他所坚心倚靠的岩寨石堡，还是他所尊为半神半人的梅特兰的世俗精明，或者局外人的帮助辅佐，一概都不能救他。除非他速速悔改归正，紧紧抓住上帝的怜悯，否则，他必会被人耻辱地从巢穴中拽出来接受惩罚，并且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挂在绞刑架上。此人的灵魂在我的眼中看为宝贵；只要还有任何拯救的机会，我断不愿看到他的灵魂灭亡。

两位牧师遵照诺克斯的嘱咐，随即赶到爱丁堡城堡约见总督，并向他当面转达了诺克斯的信息。听完他们的话，格兰奇表露出一些回心转意的迹象；可是，在征求梅特兰的意见之后，他给出的答复令两位牧师颇为不快。诺克斯得知会谈结果后，感到非常难过，并说自己一直恳切地为格兰奇祷告，而且至今仍然相信：尽管格兰奇的肉身会有一个悲惨的结局，但他的灵魂终必得救。

这次会见了堂会成员之后，诺克斯的状况更加恶化。他的呼吸困难加剧，每说一句话都要忍受极大的痛苦；但他仍然继续接待来自各个阶层的大量访客，并无一例外地给予他们相应的劝勉和告诫；这些劝诫之言因人而异，而且特别适合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这不禁让那些服侍诺克斯的人感到惊奇不已。某天，博伊德爵士 (Lord Boyd) 来到诺克斯的房间对他说：“先生，我知道自己在许多事上得罪过您，我现在是来恳求您的原谅的。”诺克斯的回答无人知晓，因为服侍的人都退了出去，只留下他们二人在房间里。不料，爵士第二天又来了，随他一同来访的还有莫顿伯爵和庄兰利的领主 (laird of Drumlanrig)。诺克斯和莫顿的私下交谈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因为莫顿日后在自己临终时曾说起过那段经历。在那天的会见中，诺克斯问莫顿先前是否获悉刺杀国王达恩利的阴谋；在得到对方否定的答复后，诺克斯说：

上帝赐予你的许多美善的恩惠，并不是人皆有之的；就如他曾赐给你财富、智慧和朋友，现在又提升你治理这个国家。因此，我以上帝的名义指示你，务要正确合宜地使用这些恩赐，并且在将来的日子里要比过去做得更好。你所行的一切，首先应当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促进福音的广传以及维护上帝的教会；其次是为了国王、他的王国和臣民的福祉。倘若你这样做，上帝必要将祝福和尊荣加给你；但是，倘若你不这样做，上帝将会夺去你所享有的这些恩惠，你的结局将是耻辱的

臭名。

20日（周四），林赛爵士、凯思内斯郡（Caithness）的主教和其他几位绅士前来探访。诺克斯劝诫他们继续持守所听到的真理，因为再无任何其他的拯救之道；同时切切恳求他们不可与城堡中的党派有任何交往。

诺克斯熟知的一位虔诚的女士希望诺克斯为自己行过的善事赞美上帝。当她开始说一些称赞他的言语时，诺克斯打断了她的话：“舌头啊舌头！女士，我们的肉体骄傲透顶，实在不需要用任何方式自吹自擂了。”他劝诫这位女士放下骄傲，并披戴谦卑。接着，诺克斯以他一贯论及自己的方式宣告说，他所完全倚靠的，是上帝白白的恩慈和怜悯；上帝借着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将这样的恩典彰显在人类面前；只因他单单信奉耶稣基督，才能得着智慧、公义、成圣和救赎。当探访的人群离去后，诺克斯对服侍他的布雷德领主说：“每个人都向我致以晚安，可你什么时候才会向我道别呢？我对你的亏欠太多，是我永远无法偿还的；但我将你交托给永恒上帝，他能够替我偿还这笔爱心的债。”

21日（周五），诺克斯请理查德·班纳坦为他定做棺材。整整一天他都沉浸在默想和祷告中。他的口中不时喃喃自语：“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请你快来，我将自己的灵魂交托在你的手里。愿主将平安赐给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兴起忠心的牧师来看管你的教会。主啊，求你显出震怒和怜悯的凭据，使我们全然恨恶罪恶。”在默想的过程中，他经常对站在身边的人说：“当以敬畏的心服侍主，这样，死亡对你们而言将不再可怕。不仅如此，凡是感受过与上帝的独生子同死之能力的人，生命的结束将成为祝福。”

23号主日是全国禁食的第一天。在例行的下午讲道期间，安静躺卧多时的诺克斯突然大声说道：“请所有在场的人都来看上帝的工作。”理查德·班纳坦以为诺克斯马上就要去世，于是立即派人到教会将约翰斯顿·埃尔芬斯顿（Johnston of Elphinston）请来。

当人们来到诺克斯的床边时，他欣喜万分地对他们喊道：“在过去的两个晚上，我一直在默想上帝的教会目前的困境。教会虽然被世界所轻看，但却是耶稣基督的新妇，在上帝的眼中看为宝贵。我已经为她向上帝呼求，将她交托给她的元首耶稣基督。我为了天上的事情和属灵的邪恶势力争战，并且得胜。虽然我身在此地，但我确实魂游象外，进入了天堂之境，并尝到了天上的喜乐。”接着，他开始复述主祷文和教会信经；当他每说完一句祈愿和告白时，都会发出一些虔诚的语气词。

讲道结束后，许多人赶来探望他。看到诺克斯的呼吸极为困难，有人就问他是否感觉非常痛苦。诺克斯答道，若上帝的美意本是如此，只要上帝继续借着耶稣基督光照他的灵魂，那么他情愿像这样躺卧在床多年。当人们以为他在睡觉时，其实他是在默想；中途他常会说一些劝勉和祷告的话来，比如：“住在基督里。只要住在基督里，肉体将不再惧怕死亡。主啊，求你将真正忠心的牧师赐给你的教会；求你保守教义的纯正。求你兴起敬虔的执政掌权者，让这个国家重新恢复和平。主啊，我再一次请求你结束我的苦难。”他常常向天举起双手，说道：“主啊，我把我的灵、魂、体和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哦，主啊，你最了解我一切的患难；我不愿向你发怨言。”类似这样简短、虔诚祈祷的例子数不胜数，故而那些在他身边服侍的人只能记得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在他们没有为诺克斯读经或祷告的时候，他很少能够保持沉默。

23 日晚间，诺克斯的病情急剧恶化。

11 月 24 日（周一），是诺克斯的生命在地上的最后一天。那天清早，诺克斯表示不愿躺在床上，执意要起来；尽管无法独自站立，他仍然在九点到十点之间起身穿上了袜子和上衣。被人扶到椅子上坐了半小时之后，他才重新回去躺下。日间的时候，各种迹象都显示出他的生命已快到尽头。除了他的妻子和理查德·班纳坦之外，诺克斯最亲密的三位朋友——坎贝尔·金尼克（Campbell Kinyeancleugh）、约翰斯顿·埃尔芬斯顿和普雷斯顿医生

(Dr. Preston) 一直守候在他的床边。坎贝尔先生问诺克斯是否感觉很痛苦。诺克斯回答：“我相信，这些痛苦并不是让我难受，而是为了结束我的战斗；只是我必须要把内人和孩子们留给你照看了。”

下午三点钟的时候，诺克斯的一只眼睛开始看不见东西，因此他的谈话受到很大影响。他请求妻子为他朗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当妻子读完时，他说：“这章经文真是抚慰人心，不是吗？哦，主在这段经文里给了我何等甜美和有益的安慰啊！”过了一会儿，他一边举起三个指头示意，一边说道：“现在，最后一次，哦，主啊，我将我的灵、魂、体交在你的手里。”五点钟的时候，他对妻子说：“请为我读那段经文，就是我最初放下信心之锚的地方。”妻子随即为他朗读了《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然后又念了一段加尔文论《以弗所书》的讲道稿。

此后诺克斯似乎陷入了昏睡，其间发出沉重的呻吟。周围服侍的亲友密切关注着他的情况。当他终于从睡梦中醒来后，人们问他为什么发出很沉重的叹息，他答道：

在我软弱的一生中，我曾经历了许多的争战，并受到撒旦多方的攻击。如今，那只吼叫的狮子^①恼羞成怒，对我发起了最猛烈地袭击；他积蓄所有的力量想吞吃我，巴不得立刻毁灭我。从前，他经常将我的罪孽放在我眼前，引诱我产生绝望的念头，并且企图用世界的种种诱惑陷我于网罗之中。然而，他却无法胜过我，因为他使用的这些武器都被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击碎。现在，他用另一种方式来攻击我。诡诈的古蛇不厌其烦地想说服我相信：我的功劳使我配得天堂的奖赏和永恒的祝福，因为我忠心地履行了事奉的责任。但是，感谢上

^① 吼叫的狮子：指魔鬼。语出《圣经·彼得前书》5章8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帝，他提醒我想起以下的圣经经节，使我有能力击落并熄灭了恶者射来的邪恶火箭：“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①“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②神的话击败了魔鬼，他就离开了我。我要借着耶稣基督感谢我的上帝，因为他按自己所喜悦的旨意赐给我得胜。我也深信，那诱惑者将不能再攻击我；很快，一切身体的痛苦和心灵的磨难都会消失；借着耶稣基督，我这个必朽坏的悲惨生命，将被一个蒙福的不朽生命所替代。

然后，诺克斯安静地躺卧了几小时，其间偶尔要服侍者用稀释的麦芽酒给他润润口。晚上十点，大家开始做晚祷。因为之前担心诺克斯正在睡觉，所以晚祷时间比平常要晚一些。结束后，普雷斯顿医生问诺克斯是否听见了大家的祷告。诺克斯回答：“正如你和所有人一样，我也听见了；为这些天上的声音，我要赞美上帝。”医生起身后，坎贝尔先生随即坐在床边守候。

十一点左右，诺克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时候到了。”理查德·班纳坦立刻就近前来，提醒他思想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满有安慰的应许，这些应许也是诺克斯常常与人分享的。由于诺克斯已经不能说话，理查德请他做个手势示意，然后可以平安离世。于是诺克斯举起了一只手，吐出了两口长气，没有任何挣扎地停止了呼吸。

诺克斯终年 67 岁。他离世的原因，与其说是高龄体弱，不如说是超乎寻常的劳苦工作和殚精竭虑将他的体力消耗殆尽。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一生曾遭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实际上，从他皈依新

① 语出《圣经·哥林多前书》4 章 7 节：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② 语出《圣经·哥林多前书》15 章 10 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教信仰之日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其间饱经忧患，鲜有间歇和喘息的机会。往往是才脱离一个难处，却又陷入了另一个更糟的困境。当初他为了躲避毕顿主教的震怒而逃离了圣安德鲁斯，来到东洛锡安郡隐居，可是大主教汉密尔顿又派人来捉拿他。有好几年的时间，他像逃犯一样生活，每天担惊受怕，唯恐落入那些寻索其命之人的手中。他在圣安德鲁斯城堡里仅仅受到了几个月的保护，随即就开始了漫长和严酷的被掳岁月。在英格兰他享受了一段难得的休整时期，然后再一次遭到驱逐，被迫离开不列颠岛；接下的五年时间里，他的身份是一名在欧洲大陆四处漂泊的流亡分子。及至回到自己的祖国，他所从事的事业又是一场最为冒险和艰巨的斗争。当改教体制得到确立，他也在首都定居之后，他又卷入了一场和宫廷之间的持续不断的争论。当他撤出战斗，只想平静地安度晚年时，不料却再一次蒙召进入了事奉的工场。尽管连正常行走都很困难，但为了避免引发敌人的仇恨情绪，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羊群，踏上了新的流放之旅。他的性命常常受到威胁，曾有人公开以重金悬赏他的人头；那些试图置他于死地的阴谋者从来都不乏其人。所以，诺克斯对世界感到厌倦，并且急切地盼望离世归主，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想此刻对诺克斯最合宜的话莫过于：他歇了自己的劳苦，进入了安息。

11月26日（周三），诺克斯被安葬在圣贾尔斯教堂的墓地里。参加葬礼的人包括新近当选的摄政王莫顿、爱丁堡城内的贵族们以及大批的民众。当他的遗体被放入坟墓时，摄政王念诵了那句著名的悼词：“躺卧此地的这个人，在其有生之年，从未惧怕过人的脸面。”

结 语

有关这位非凡人物的性格，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者笔下，有截然不同的刻画。公众舆论对诺克斯的不同评价以及导致这些不同的原因，自然成为一个令人好奇和值得关注的话题。诺克斯在苏格兰的教会和政治变革中所扮演的显著角色，使得他的名字传遍了整个欧洲，甚至比大多数改教者更加广为人知。在罗马天主教徒的眼中，诺克斯是颠覆梵蒂冈在苏格兰的宗教地盘的罪魁祸首。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天主教派系的作家为何会用否定的笔调来描写他的人格。除了扣上异端和叛教的常见罪名之外，他们还将诺克斯描绘成一个惹是生非、性情狂暴、满脑子悖逆思想的人。即便他们指控诺克斯犯有淫乱的罪行，也不会令我们太过吃惊。他们定这罪的理由是：诺克斯作为一名神甫，居然先后两次结婚；或者，他们将诺克斯的改宗归因于他想摆脱禁欲独身的束缚，因为这是天主教神职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的规条。然而，以上这些指控若和他们所勾勒的诺克斯形象比起来，仍然显得微不足道。他们还在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的情况下，恬不知耻地肆意诋毁诺克斯的声誉，将他丑化成一个荒淫放荡、在堕落中自鸣得意、公然热衷邪恶阴谋的怪物；并煞有介事地宣称：上帝在诺克斯死时显出了一个记号，表明他已经彻底弃绝了诺克斯；而且当时发生的情景令旁观者无不感到惊恐万分。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从确凿无疑的历史文

件中可以发现，当时的许多作者通过炮制和传播类似的恶毒诽谤，猛烈攻击那些在反罗马教会的阵营中名声清白、无可指摘的杰出人物。尽管这些控告荒诞不经、卑鄙恶劣，但却被那些心怀偏见者和轻信盲从者急不可耐地全盘接受。

平心而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的改教者那样，在死后遭到如此多的毁谤。但这些毁谤的文字很早以前就失去了可信度；如今它们得以保存下来，恰好证明了那班作者当初是被说谎和欺骗的灵所驱使，同时也是出于对攻击对象的刻骨仇恨——因为后者通过艰苦的努力，成功地颠覆了教皇派的迷信和专制体系。

诺克斯与法国、瑞士和德国的改教派领袖有广泛的交往，深得他们的尊重。我们前面已多次提到他和日内瓦改教者之间的友情。加尔文的继任者贝扎（Beza）也和诺克斯保持了很好的个人关系；在彼此间的通信往来中，贝扎向诺克斯表达了最诚挚的问候和最崇高的敬意。后来他在其《杰出人物肖像》（*Images of Illustrious Men*）一书里还专门为后者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一位已故的日内瓦文献历史学家（其宗教观念与加尔文和贝扎完全不同）虽然不喜欢诺克斯有时在讲台上发出的严厉抨击，但却这样评论说：“他以对抗教皇制度的非凡勇气和反对玛丽暴政的坚定态度，奠定了自己的不朽地位。尽管他的方式非常激烈，但对天主教徒来说，他始终是一位站在明处和值得尊敬的敌人。”

诺克斯去世以后在苏格兰仍然享有极高的声望和普遍的爱戴，这一事实表明他生前在本国同胞当中的影响力并不是通过强迫手段营造的，而是建立在国民对他的德行和才干的一致认同上。班纳坦曾用最热烈的笔调描述过诺克斯的品格。人们通常会认为，一个备受恩宠的仆人与其挚爱和尊敬的主人的关系自然非同一般，他在写回忆录的时候难免会受到私人感情的影响；这的确是读者需要考虑在内的因素，但我们也应当看到，班纳坦在诺克斯的家中居住多年，自身也是一位受人尊重、富有学识的人，所以他的见证绝不当被忽视。他在日记中写道：



日内瓦宗教改革纪念碑，该碑是通过国际捐献的资金建立的，奠基于1909年加尔文400周年诞辰之际，竣工于1917年。四个塑像从左到右依次是法雷尔、加尔文、贝扎和诺克斯。

一位属神的人就这样离开了世界。他是苏格兰的明光、教会的安慰、敬虔的典范；并且在清洁的生活、纯正的教义和谴责邪恶的勇气上，都是所有忠诚的牧者效法的榜样。他从来不在乎人的好感和面子，无论对方是什么样的大人物。他在教导上的灵活机敏、责备上的无所畏惧、性格上的疾恶如仇，都是我这个愚昧迟钝的人无法言述的。如果我尝试去那样做，就好像为了让人看到太阳而点燃一支蜡烛一样。他的所有美德早已传遍天下，尽人皆知，远非我的笔墨所能表达。

斯梅顿校长（Principal Smeton）描述改教者的文字则不太会有“存心偏袒”之类的嫌疑，但同样充满了尊敬和溢美之词：

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像诺克斯这样，在一付衰弱不堪的躯体中存有如此深沉的敬虔和杰出的天赋。我敢肯定这样的人物是不多见的；圣灵的恩赐在他身上如此光耀夺目，乃是为了给苏格兰教会带来莫大的安慰。没有人像他承担了如此繁重的身体和心灵的劳累，也没有人像他在履行所托付的职责上如此热心专注。

在和汉密尔顿的对话中，斯梅顿又说道：

对于约翰·诺克斯这位出类拔萃的上帝的仆人，您所提供的那些不实的指控和诽谤不能成立；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个人的主观态度，而是因为一群令人尊敬的会众所作的见证。他们满心欢喜地一致将虔诚的职责委派给这位基督耶稣里的优秀教师，并且对他鞠躬尽瘁的一生予以褒奖。他们作出这样的感恩见证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深信他完全配得这样的称赞；虽然他已寿终正寝，但他的见证会继续流芳后世。他脱离了那具被基

督徒的属灵争战消耗殆尽的血肉之躯，经过荣耀的转化，进入了蒙福的安息；他在那里得到了地上劳苦的甜美回报，此刻正与基督一同享受得胜。但是，那些在他死时乘机侮辱他的阿谀奉承之辈，你们要当心了，因为那些捍卫诺克斯声望的人不可胜数。可以这么说：曾经因为诺克斯忠心的讲道而脱离了无知的深渊、认识了福音的真谛的人有多少，那么为他辩护的人就有多少。

当时，英格兰教会中有不少和我们的改教者年龄相仿、尚且在世的神职人员，他们都对诺克斯怀有极高的敬意。约翰·艾尔默在一篇反驳诺克斯观点的著作中，曾主动为后者的学问和人品作见证。里德利主教（Bishop Ridley）在爱德华六世年间比他的弟兄们更坚持教会礼仪的重要性；当初在法兰克福的时候，他曾对诺克斯的举动表示不满，因为后者反对将英格兰的礼拜程序引入当地的流亡教会。可是如今，主教却表达了对诺克斯的高度评价，认为他是“一位满有智慧、学识精湛和无比热忱的人”。虽然诺克斯针对英格兰教会制度的某些方面提出的尖锐批评招致了教会领袖们的不快，但他们对诺克斯的成功改革均感到由衷的喜悦，并对其许多策略都毫无保留地表示赞许（可惜这些策略日后却遭到了他们的继任者的口诛笔伐）。至于英格兰清教徒对诺克斯的尊敬和仰慕，我就更不用多说了。当诺克斯旅居英格兰和大陆期间，某些清教领袖和他有很好的个人交情，还有一些人则和他保持着书信联系。清教徒对诺克斯的著作推崇备至，他们设法从苏格兰获取他的手稿，将其中的一部分予以出版。

但是，临近16世纪末的时候，出现了一批新的主教群体，其立场和英格兰改教者大相径庭。他们主张实行教区主教制（diocesan episcopacy），大谈敬拜礼仪的优越性，并开始对其他的新教教会采取不同的论调。在这帮人中间，后来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班克罗夫特博士（Dr. Bancroft）是撰文攻击诺克斯的第一人；在他之

后，这种作法开始在不同等级的圣职团体之间流行起来。苏格兰的牧师们对班克罗夫特的文章非常不满，并热切地为他们的改教者的声望辩护。国王詹姆斯六世出于继承英格兰王位的动机，当时正和班克罗夫特私下通信，打算将主教制引入苏格兰教会。所以，当国王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断言说：“只有叛国者和煽风点火的神学家才会为诺克斯、布坎南和摄政王莫里进行辩护。”安德鲁·梅尔维尔（Andrew Melville）告诉国王：当初将王冠戴到他头上的正是这些人，因此这样诋毁他们是没有道理的。詹姆斯又抱怨说，诺克斯曾对他的母亲出言不敬。爱丁堡的一位牧师帕特里克·加洛韦（Patrick Galloway）听到后回答：“如果一位国王或女王是个杀人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这样称呼他（她）呢？”该市的另一位牧师沃尔特·巴肯库尔（Walter Balcanquhal）在1590年10月29日的讲道中，严厉斥责了那些贬损改教者的人。国王闻讯后派人将牧师招来，情绪激动地抗议：“要么我失去王位，要么沃尔特先生收回他的话。”巴肯库尔一面祷告上帝保守国王的王位，一面说道，即便要为此掉脑袋，他也决不会收回自己的话。在苏格兰教会的管理制度与英格兰模式接轨多年以后，苏格兰的主教们承认，每当他们回顾改教者诺克斯所做的一切，心中仍然充满了感谢和尊崇。1639年，大主教斯波蒂斯伍德（Archbishop Spottiswood）评价诺克斯是“一位被赋予杰出恩赐的人，是上帝成就那个时代工作的一个主要器皿”。

我们的改教者从来不受君主专制政体的拥护者的欢迎。伴随着英国革命的结束，斯图亚特家族（the Stuart family）的支持者们对诺克斯的偏见强烈地爆发出来。由于他们的宗教观念和教皇派颇为相似，再加上一贯鼓吹的“不可对抗君主”（non-resistance of kings）的专横原则，导致他们对宗教改革时期的几乎每一项政策都持不赞成态度，并且将整个改教进程判定为一系列的骚乱、暴动以及对合法政权的反叛。然而对于诺克斯声誉的最大毁谤，乃是来自一群文人墨客的口诛笔伐，这些人极力要为那位“举世无双、

纯洁无瑕”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报仇雪恨，鸣冤平反。他们在头脑中塑造了一个完美的女神形象，为了向她顶礼膜拜，不惜将那个时代所有在学识素养、爱国情操、道德品行和信仰生活上备受尊重的杰出人物献上为祭。这帮文人俨然超越了自己挑起的争论，他们丝毫不受敌对双方交战法则的约束，赋予自己随心所欲诽谤中伤的特权——好像这些特权是绝对有效和不可废除似的。凡是在言论、著作和行为上反对过玛丽女王的人士，都无一例外地被他们扣上伪君子和恶棍的帽子。在这些作者语无伦次的笔调下，诺克斯被描述成“一个狂热的煽动者、一个圣洁的野蛮人、暴虐和愚昧之子、一群虔诚的未开化土著人的宗教领袖。”

现代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对宗教信仰与日俱增的离弃和漠然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此类偏见的泛滥。无论他们对脱离教皇制的宗教改革表示多么的赞赏，并认为这场变革是将世界从迷信和教士权术中解放出来的工具，都必然会蔑视或憎嫌那些被信仰的深情所激励的先驱人物；因为后者的首要目标是传播耶稣基督的教义和实践，其次才是对获取公民权利和推进文学教育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今日甚至在支持改革宗教义的人士中间，对于改教先驱们的人格和行动所怀的偏见也比以前广泛得多。他们受到现今世代启蒙思想高涨的影响，故而对前人的成就评价不高；同时，他们对改教时期本国宗教体系骇人听闻的罪恶和腐败缺乏足够的了解；他们也忽略了当时敌对阵营的险恶用心和行事原则迫使改教者们奋起抗争的历史背景，没有考虑到改教者所经历的重重危险和困难。因此，他们很容易就接受了那些迎合自己偏见的流言飞语，并轻率地谴责改教者的策略——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他们今日所享受的无比珍贵的祝福，正是由那些策略提供和保障的。

在叙述了各方对我们的改教者所持的若干观点之后，我尝试以尽可能真实的笔调，来对他人格的主要特点作一番勾勒。

毫无疑问，诺克斯拥有非同一般的天然恩赐，就如他的刨根问底、热情洋溢、观察敏锐；他有魄力、有胆识，敢于树立自己的观

点。他深入研究了当时流行的经院学科的所有细致微妙之处；由于对其空洞无聊的结果感到厌恶，他开辟了一条新的求学之路，以致观念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在他早年的时候，他没有机会像许多同辈人一样在国外的大学获得全备的教育，再加上后来漂泊不定、极为忙碌的生活方式，使他更加无暇继续学业；但是，他的能力和勤奋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克服了这些不利因素；对于神学界的同行们在那个时代开拓的新兴学科，他都相当熟悉和了解。他的生命中凝聚了热爱学习和积极行道的素质——很少有人能够将这两种素质集于一身。他对于所发现的真理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冲动，迫不及待地想传授给别人；他直率勇敢的气质和充满激情的雄辩使他足以胜任这份传道的工作，因为对当时性情暴烈、举止粗鲁的苏格兰民众而言，诺克斯身上拥有一种卓越不凡的气质，可以牢牢地抓住他们的注意力，影响他们的心思意念。

从诺克斯接受新教教义时起，传播这些教义，将他的同胞从教皇制的欺骗和腐败中拯救出来的愿望，就成为支配他一生的激情和目标。他随时准备为此牺牲自己的安逸、利益、名誉和性命。在他心目中占第一位的是对新教信仰的热爱，其次则是对公民权利的极力推崇。他为了促进这些变革的劳苦努力和热心显然是发自一种极为高贵的情操，每一个公正地考察过其生平的人对这一点都不会有任何疑问，不论他们对诺克斯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某些手段持何种意见。“实际上，他唯一考虑的，是彰显上帝的荣耀和提升本国的福祉。”勇猛无畏的性情、脱离污秽不洁思想的头脑、不知疲倦的工作以及不会被任何挫折撼动的坚忍不拔，使诺克斯出色地坚守着那份危险和艰难的岗位。他的正直纯全的品格超越了种种质疑；在他坚如磐石的信念面前，朋友的恳求和仇敌的威吓都无功而返。尽管他的急躁和大胆常常将他置于危险的境地，但我们发现，对于旁人为其安全着想而提出的谨慎防范措施，他从来没有忽略不顾。从本国同胞在诺克斯身上寄予的信任可以看出，人们对他的睿智和诚实评价极高。那些推进宗教改革的措施要么是直接采纳他的提

案，要么与他的建议一致。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措施不仅计划周详，而且也得到了果敢的执行。

他在履行教牧事工的责任上投入了极大的勤勉、忠诚和热情。不管是个人活动安排，还是身体软弱不适，都不能阻止他走上讲坛。他不仅钟爱讲道的事奉，而且也很适合干这份工作，因为他对圣经经文有广泛的了解，并擅长一门高超的艺术，即用最引人入胜的方式，将经文巧妙应用在教会和听众“此时此刻”的具体处境中。人们常常提到他警示良心和调动情感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他也深知如何打开福音的安慰之门，以及如何平息被罪恶感困扰之人的心怀意念。当他谈论真基督徒的悲哀和喜乐、挣扎和得胜时，讲的都是他自己知道和理解的，也是亲身经历和感受过的。他写给亲密友人的书信都散发出最炽烈的敬虔气息。他并不是在最后一次生病期间才去虔诚默想，从他被带领认识真理的那一天起已经这样操练多年了，这也是当他身处险恶环境之中、经历一切艰难困苦时的慰藉源头。

诺克斯和一同事奉的弟兄们之间始终保持着非常诚挚友善的关系。我们从未读到他和任何一位同工之间发生过哪怕是最小的冲突。一方面，他疾恶如仇的性格使那些生活放荡、亵渎上帝的人对他又怕又恨；另一方面，他毫无瑕疵的个人声誉和广受欢迎的讲道恩赐却赢得了那些虔诚理智的会众和国人的尊重。在私人生活中，他深受朋友们和家人的爱戴。有时候，他会受到偶发的忧郁情绪的影响——这种意志消沉的现象部分是由于他的天性使然，部分是由于长期困扰其健康的疾病所致——从而显得有些“粗俗无礼”（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太注意别人的感受，也不知道怎样取悦朋友；但这并非他平时待人接物的风格。关于这些缺陷，诺克斯自己也公开承认，并请求友人的谅解。但他的友谊是真挚、深情和稳固的。当他不受这种抑郁情感的辖制时，他很懂得享受社交活动的愉悦，也知道如何将注意力从繁重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和朋友们一起开心健康地娱乐，并且享受妙语连珠、风趣幽默的谈话——尽管

他的性格给人的总体感觉是比较严肃。

诺克斯大部分的过失都可归因于他与生俱来的性情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和国家的特征。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对每一个感兴趣的问题都怀有热切和敏锐的关注；他是那种有感而发、开门见山的人，从来不会假装掩饰和矫揉造作；他的热心程度常常会让他情不自禁地说出过于激烈的言辞；他毫不退让、坚守原则的态度近乎于一种固执；他的特立独行偶尔也会给人高傲的印象；他不擅长说恭维和圆滑的好话，也不介意别人能否接受他的谴责方式（是否说中要害才是关键）；他对于各种邪恶罪行的痛心和愤慨，使他根本无视犯罪者的地位和名望而仗义执言；因此很多时候，“他所发表的尖锐和激烈的劝诫，往往更容易惹怒、而不是感化对方”。诺克斯曾在某个信任度很高的场合郑重地声明（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不大可能对他的纯正动机抱有怀疑）：即便在自己作出最严厉的责备时，他的动机也完全是出于对罪恶的憎恨，而不是出于对邪恶之人的敌意；他的目的从来都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责任，并且尽一切可能挽救犯罪之人。

那些指责诺克斯冷漠麻木、没有同情心的人，和那些肤浅的思想家一样，犯了一个常见的错误：他们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性格时，往往忽略了后者和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迥然不同的事实，而仅仅从历史人物外在的言行举止来判断他们的道德品质。诺克斯的性格严肃而非粗鲁，质朴而非冷酷，情感强烈而非蓄意报复。他从来没有动用自己的影响力去为所受的个人伤害施行报复。虽然他恪守施行公义的原则，但文献记录表明，他为罪犯请求赦免的事例，可能比同时代的任何人所作的都要多；除非所犯的罪行极其残暴恶劣，或者国家安全危在旦夕，否则他从来不鼓励执政掌权者使用严厉手段进行镇压和惩罚。由于特殊的时代和环境铸成了诺克斯大胆热忱的思想风格，故而他在某些论题的看法上容易走极端；如果他对于某个观点一直深信不疑，那么就没有什么建议能够让他改弦易辙。但是，当诺克斯出版了那本抨击女性执政的著作之后，其言行却证明

他仅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并非要求这些观点得到采用，更无借此扰乱公共秩序之意。他在法兰克福牧会时的行为表明了他对在同一个信仰屋檐下的弟兄之间的宗教分歧所持的温和态度；至于那些在改教立场上没有他那么彻底的人，他倾向于给予他们合理的宽容和许可——条件是他们应当谨慎克制，不将自己的观念强加于别人的良心之上。他在教会讲坛上公开指责达官显贵和头面人物的作法，在我们看来似乎显得不同寻常和难以忍受，尤其是和当今时代的沉默无语相对比的时候。但我们应当记得，这些作法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且其效果和功用不容忽视；因为在那个年代，位高权重者习惯于放荡无忌、压迫虐待，常常肆意挑衅法律设置的一般界限。

在默想诺克斯的人格时，他作为改革家比他作为普通人的身份更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其中特别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上帝如何在他护理的旨意中，以他绝妙的智慧兴起他的仆人，分派他们去从事有利于人类福祉的工作，并赐给他们适合担当此任的品质和才干。我们应当回想那位在旷野大声疾呼、有着严厉和粗犷性情的改革家，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间束着皮带；他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他将斧子放在每棵树的树根上，并警告毒蛇逃避将来的愤怒；他甚至对王座上的暴君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① 我想说，这个人很适合“在他的世代中服侍上帝的旨意”；他的地位和职分，并他所事奉的那位天上的主，都证明他所遵循的“智慧是公义合理的”。^② 那位他所宣告的、在他以后来到的主，是一位怎样的主呢？“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有些人声称对我们国家的改教者非常失

^① 参见《圣经·马太福音》3章1-12节、11章18节、14章4节。

^② 英文“wisdom was justified”，此处乃译者结合文脉所作的意译；作者原引自《圣经·马太福音》11章19节：“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是”（注：有古卷作“但智慧在行为上就显为是”）。

望，因为在他身上看不到温和优雅的举止、彬彬有礼的风度和富有魅力的谈吐。对于这种抱怨，我们可以引用主耶稣在犹太人面前论到施洗约翰的话作为回答：“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①

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中使人有所作为、行事有益的才能，可能在另一个时代和环境中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在宗教改革之前，迷信仰仗愚昧和权力，占据着压倒性的统治地位；如果气质温和、温文尔雅的人要走上战场和这样的敌人较量，就如同侏儒或儿童遇到巨人一样，根本不是对手。“在路德的年代，伊拉斯谟^②（Desiderius Erasmus）能做什么？在威克里夫的年代，洛思^③（Robert Lowth）能做什么？抑或，在诺克斯的年代，布莱尔^④

① 语出《圣经·马太福音》7章24-26节。

②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又译埃拉斯默斯，1466-1536）史学界俗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是中世纪末期尼德兰（今荷兰和比利时）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他是一个用“纯正”拉丁语写作的古典学者，对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的思想有巨大影响，路德钦佩他并渴望与他结交。尽管伊拉斯谟终生都是一个天主教徒，但他尖锐地批评了当时他认为骄奢过度的罗马教会，甚至拒绝接受后者授予的红衣主教职位。在《论死亡之准备》（*Treatise on Preparation For Death*）一文中，他声明了自己的观点——永久生命的保证不在于教堂中的圣礼和仪式，仅在于对基督赎罪的信念。他整理翻译了《圣经·新约全书》新拉丁文版和希腊文版。其创作的作品有《愚人颂》（*The Praise of Folly*）、《基督教骑士手册》（*Handbook of a Christian Knight*）和《论儿童的教养》（*On Civility in Children*）等等。

③ 罗伯特·洛思（1710-1787），是英国国教教会的一位主教，同时也担任牛津大学诗歌文学的教授，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英语语法教科书的作者。

④ 詹姆斯·布莱尔（1656-1743），是一位主教、宣教士和教育家。他生于苏格兰，从阿伯丁大学和爱丁堡大学毕业后，于1679年被按立为苏格兰长老会的牧师。1681年，由于教会内部长老派和主教派的纷争而卸职并移居到伦敦。1685年被按立为英格兰教会的主教，之后以宣教士身份到北美弗吉尼亚地区复兴和改革当地的教会。他也是威廉和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in Williamsburg, Virginia, USA）的创立者和终身校长。

(James Blair) 能做什么?” 如果以公正的眼光来考察我们的改教者，读者将不难发现：“诺克斯身上有一些品质令他的性格缺少亲切和蔼的一面，但正是那些品质将他铸成上帝手中的器皿，从而能够在强悍暴烈的民族当中推进改教运动，并且给了他直面危险和克服拦阻的勇气。倘若是一个温和柔顺的人遭遇这一切，恐怕早就畏缩退后了。”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审视他的人格，我们不会把他看作一个温柔可亲的人，但正因如此，我们才会毫不犹豫地宣称：诺克斯是一个伟大的改教者。

也许很少有人曾经像诺克斯那样全力以赴、热心劳苦的工作；不过诺克斯并非像人所说的那样精力充沛、体格健壮，他自己更没有如此自以为是。那种说法完全是出于误解。实际上，他身材瘦小、体质羸弱，这更加证明了他具有很强的信念和心智。他一生中似乎不止一次被人画像，并且他的肖像也多次在雕刻作品中出现。有一幅画像至今仍然挂在玛丽女王的卧室里，画中的改教者蹙着眉头，表情肃穆。显然，对女王陛下来说，他是一位不受欢迎的访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可以从画中看出他独特的个性：勇猛无畏、严肃克己以及敏锐的洞察力。我们自然也不会忽视他的胡须——按照当时的风俗，他的胡须留得很长，直到腰际。我提这一点，是为了反驳某作家的无稽之谈；他们想让我们相信，诺克斯的胡须是帮助他赢得国人尊重的首要因素。

还有一项控告是我以前未曾注意的。有人指责他妄自尊大，自封为先知，竟敢揣测上帝隐秘的旨意，而且别有用心，热衷于将自己想象出来的意见和内在情感的流露与上帝启示的神圣命令并来自天堂的直接沟通混为一谈。让我们对这类指控的依据作一点点考查。诺克斯的许多警戒都是具体的预言，他也阐述过发出这些警戒的理由。在某篇文章里，他先对英格兰人背弃福音真道、复归偶像崇拜的作法进行了抨击，然后解释了他凭什么有权发出以上的警戒我们先听一下他自己的话比较合适。

你们会知道我如此确定无疑的根据何在。上帝若是许可，你们就能聆听、理解并坚定地相信这一切。我所依靠的不是梅林^①（Merlin）的魔术，更不是那些充满褻渎之预言所包含的隐晦言语，而是上帝之道的显明真理、永恒上帝不可战胜的公义权能以及他的刑罚和灾祸通常降临的方式——从起初这就是我所有言论的基础。对所有悖逆之人，上帝的话语都发出了毁灭的警告，这也是他永不改变的公义本性之必然要求；平常遇见的惩罚和灾难就是例证。既是如此，有谁能够不再预言呢？

在对那些谋杀国王达恩利和摄政王莫里的人发出警戒时，诺克斯也使用了类似的表达方式，为自己的言辞进行辩护。他否认自己说话的姿态“好像一个洞晓上帝隐秘旨意的人”，并坚持认为，自己仅仅是公布了上帝律法中所宣告的审判。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警戒和预言作出任何道歉。

然而，诺克斯还说过一些话，其真实性并不能靠以上的原则来证明；他自己也承认是基于不同的理由。这些话包括：在苏格兰内乱发端之际，诺克斯曾表示，他确信会众派的理想最终将会实现；当他被囚禁于法国战舰期间，曾信心十足地满怀期盼，声称自己有朝一日将回到祖国——特别是圣安德鲁斯，并重新走上讲坛证道。他在其后的流放生涯中又多次重复了这句话。此外还有他对于托马斯·梅特兰和科卡迪·格兰奇之死所宣布的预言。无可否认，诺克斯的同时代人均认为这些话来自于先知的灵，并且证实它们都准确地应验了。想摒除这一敏感话题的最容易方式是立刻不予考虑，并用简单的几句话盖棺定论：自从上帝所默示的圣经正典完成之后，任何假托神旨发布惊人预兆的言论都是毫无根据的；考查那些有关灾难的预警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们都是想象和幻觉的产物，应当

^① 梅林：英国传说中的一位威尔士巫师和预言家，曾担任亚瑟王（King Arthur）在卡米洛特宫廷中的高级顾问，享有很高的威望。

遭到废弃。其实这并不能使我们改教者的声誉和天赋受到任何特别的诋毁，因为在那个时代，即使最博学人士的头脑中也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对“天谴占星术”（judicial astrology）有某种强烈的迷恋。但是，我很怀疑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对以上主题是否保持了一贯的公正性。限于篇幅，我不能在这里深入讨论，只陈述几点总体的观察。一方面，人类渴望窥探未来奥秘之事的天然性情，总是和太多的轻信和迷信分不开的。不能否认的是，在我们的改教者生活的年代，人们倾向于相信不可思议的奇迹，特别是有关上帝在个人身上施加的审判。另一方面，我们也容易跑到另一个极端，陷入怀疑论的危险，并将某些总体的原则搁置一旁。这种危险会导致我们固执己见，从而对证据确凿的事实真相提出质疑，甚至会限制圣灵的作为和天意的安排^①——这是当今的世代所倾向的极端。我认为，倘若某些人曾对将要临到自己和他人身上的事件产生了预感或提前发出了警告，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此类经历的真实性。那些对民间宗教式的盲信行为（vulgar credulity）付之一笑，并绞尽脑汁、极力想通过常识性的原则来解释上述现象的人士，到头来却发现自己仍然困惑万分，百思不得其解（尽管他们嘴上并不承认）；在某些例子中，他们提供的答案之神秘程度，和各种高级灵体（superior spirits）及神圣谕令（divine intimations）的介入之事比起来，^② 可以说不相伯仲。的确，我们信仰的根基和标准都包括在旧约和新约圣经之内，我们不用再去找新的启示和经历来作为我们的信仰规条；但是，在某些特别场合下，上帝会预先向某些人发出警告，宣布即将临到他们的事情。这样做是为了证实对他们的认可，鼓励他们在特殊环境中信靠上帝或者其他有益的目的。我认为这和自然宗教及启示宗教的原则之间并无矛盾。如果将其说成一种

① 天意的安排：原文作“operation of providence”，指上帝出于护理的旨意而实施的行动。

② 高级灵体：指灵界的各种受造物，比如天使长、天使、魔鬼、邪灵，等等。神圣谕令：指上帝随己意通过各种方式向人暗示、宣布或晓谕他的话语。

狂热，那么古往今来有许多最为开明和理智的人士都曾落入这种狂热之中。那些极为敬虔的改教者，他们毕生“与神同行”，在“祷告中情辞迫切”；他们面对非同寻常的拦阻，身负重责大任的使命，被赋予卓越不凡的恩赐——并且我倾向于相信，他们偶尔会蒙上帝的恩宠、领受惊人的预兆；这些预兆或警戒所牵涉的事件，往往和他们自身、其他人或教会整体有关。然而，无论得到什么样的神谕，他们都没有将自己使命的权柄依托其上，也没有援引这些神谕的支持，将其作为他们向世人传讲之教义的某种内在根据。

我们的改教者身后留下了一位寡妇和五个孩子。前面已经提到过，他的第一任妻子玛乔丽·鲍斯女士为他生的两个儿子拿但业和以利亚撒于1566年去了英格兰，由鲍斯家族的亲戚负责照顾。他们在剑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接受教育。不幸的是，他们在完成学业后不久即英年早逝，而且没有留下后嗣，因此诺克斯的家庭断绝了男性继承人的血统。他的另外三个孩子都是女孩，由第二任妻子玛格丽特·斯图尔特夫人所生。她守寡后又嫁给法登赛的安德鲁·科尔爵士（Sir Andrew Ker of Fadounside），一位宗教改革的热忱支持者。诺克斯的长女嫁给了圣卡斯伯特（St. Cuthberts）的牧师罗伯特·庞特（Mr. Robert Pont）；二女儿嫁给了詹姆斯·弗莱明（James Fleming），同样是一位苏格兰教会的牧师；小女儿伊丽莎白则嫁给了艾尔郡的牧师约翰·韦尔奇（Mr. John Welch）。

韦尔奇夫人似乎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她父亲的性格和气质，而且也经历了和他类似的苦难。她的丈夫是抵制詹姆斯六世专制政策的人士之一，后者一直试图颠覆苏格兰长老宗教会。1605年7月，韦尔奇牧师不顾国王“会议延期”的命令（该命令的目的在于最终废除总会制度），赶赴阿伯丁参加总会的一次例行会议，遂被捕入狱；之后又因否认枢密院有裁决宗教事务之权利的举动，和其他五位牧师一起受到传讯。一个人数不足和充满腐败的陪审团最终认定他们犯有叛国罪，并处以死刑。早些时候，韦尔奇夫人将孩子留在了艾尔，只身来到监狱中照顾丈夫；在开庭公审的那天，她和其

他被告的妻子们一同出席了在林立斯戈的审判现场。当判决结果公布时，这几位具有英雄气概的女性不但没有悲叹自己命苦，反而赞美上帝赐给她们的丈夫勇气，能够为了主名的缘故坚守立场；此外，正如主耶稣所遭遇的一样，整个审判和定罪的过程都是在黑夜的掩护下匆匆进行的。

当死刑判决改为流放后，韦尔奇夫人又陪伴她的丈夫一同去了法国，在那里度过了16年的岁月。后来韦尔奇先生的身体状况开始恶化，医生告诉他，若想恢复健康，唯一的方法就是回到他自己的祖国。于是他冒险于1622年来到了伦敦。通过母亲的亲戚们在宫廷中的关系，韦尔奇夫人得到了面见国王的机会，可以为丈夫健康的缘故向国王求情，希望让丈夫得到重返苏格兰的许可。以下的对话内容据称是会见时发生的情景。国王问韦尔奇夫人，谁是她的父亲。她回答说是诺克斯先生。“诺克斯和韦尔奇！”国王惊呼道，“这样的绝配连魔鬼都想不出来……”“陛下，您说得对，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国王又问她，其父留下了几个孩子，他们是男是女。她答道，三个孩子，并且都是女儿。“感谢上帝！”国王举起双手大声喊着说，“假如他们都是儿子的话，我治下的三个王国将会永无宁日。”当韦尔奇夫人请求国王准许她的丈夫再次见到故土时，国王回答：“让他见鬼去吧！”——这句话是詹姆斯六世的口头禅。被国王亵渎的话语所激怒，韦尔奇夫人反唇相讥：“让您那些溜须拍马的臣僚见鬼去吧！”国王最后告诉夫人，如果她能说服她的丈夫顺服主教们的权柄，国王就会允许他重返苏格兰。韦尔奇夫人当即拎起她的围裙，^①就像她父亲的风范一样，面向国王说道：“尊敬的陛下，我宁可在苏格兰迎接他的人头（也不会从命）。”

在最后一章中，读者可能期望对我们的改教者出版的著作有一个概括性的回顾。尽管他的作品有很高的价值，但他并不是通过这

^① 指正式的行礼。

些作品，而是主要通过个人身体力行推进了宗教改革，并使诺克斯这个名字流芳后世的。他并没有将文字工作视为自己受呼召去事奉的领域。他说：

我想自己应当有最充分的理由宣布，我并不是通过著作来表达自己对圣经的观点。因为在这个败坏不堪的世代里，上帝对我的呼召是：用舌头和活泼的声音去教导无知的人，安慰伤心的人，坚固软弱的人，责备骄傲的人；而不是为将来的世代去写书（试看今天博学之士的文字多而又多，可真正被彻底遵行的教训却少之又少）。因此，我宣布将自己限制在那份神圣天职^①的界限之内，因为我觉得那才是上帝呼召我去委身的使命。

诺克斯作出这一决定显然是深思熟虑后的明智之举。他身处的环境和早期的新教改革者所面对的形势完全不同。在早期改教者生活的时代，整个世界对基督教的教义一无所知，书籍和印刷品非常匮乏，就算人们手上有一些书，其内容也完全是误导性的。一小群人口头教导的影响力和波及面都太小；所以，“文以载道”成为思想启蒙的主要手段，他们的著作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使各方各族的人民普遍受益。通过这种途径，这些思想先驱不再仅仅是他们所生活、布道的城市和国家的教导者，而是成为整个欧洲的改革家。到诺克斯登场亮相的年代，前辈们所撰写的有关圣经各书卷的高水准解经著作并他们对其中所宣扬的教义之有力辩护，统统都可以被英语读者看到。因此对诺克斯来说，眼下最需要他做的，是发挥他所擅长的独特恩赐，“用舌头和活泼的声音”将圣经的教义牢牢地印刻在国人的心里。当开口传道的机会在流放期间被完全剥夺的时候，取而代之的最佳选择莫过于提笔写作了。通过所出版的日

① 指传福音和宣讲上帝的话语。

常书信、劝勉和警戒，诺克斯以简洁的方式帮助读者回想起当初接受的真理，并激励他们恒心持守真道。和那些大部头的论文相比，这些朴实精炼、通俗易懂的作品传播面更广、可读性更强、影响力也要大得多。

关于诺克斯事奉生涯中的大量讲道稿，除了一篇在特殊情况下被外界强行获取的讲稿以外，其余都没有出版。该篇讲稿提供了一份展示其才华的良好范例。假如诺克斯真的全心致力于写作，他肯定会在那个领域卓有成就。他对语言有很好的驾驭力，表达清晰透彻、风格生动活泼并带有很强的震撼力。尽管他很轻视华而不实的修辞技巧，但他对这门学科的原则并不陌生；当他有足够的闲暇并且愿意润色文字风格的时候，其写出的作品同样规范得体、流畅优美。那些向摄政太后诵读诺克斯书信的人士、诺克斯回应耶稣会教士泰里的文章、他和肯尼迪辩论期间起草的论文甚至他的讲道稿，都足以证明这一点。在英格兰逗留期间，诺克斯养成了用该国的文体样式写作的习惯；实际上，纵观他毕生所有出版的著作，无一例外都是用英格兰的（而非苏格兰的）表音法^①（orthography）和表达模式写成的。从这方面来看，诺克斯的作品和布坎南的本地方言作品之间有明显的区别。

在读者常见的版本中，对诺克斯的文字过度随意的处理方式极大地损害了其作品的价值。这些作品通常被翻译成17世纪中期使用的语言，因此失去了原著本身具有的古雅韵味，同时又掺入了一些本不属于原著风格的庸俗气息。此外，在重印过程中发生的数不清的遗漏、插补和篡改现象也常常影响文意，削弱了语言的力量。影响诺克斯文学声誉的另一个因素是他流传最广的两部作品，但实际上这两部作品从文风来讲是他所有著作中表达最欠准确、措辞最显粗糙的。那份反对女性执政的小册子是诺克斯听闻英格兰的血腥玛丽变本加厉的暴行后，在义愤填膺的情绪下匆匆出版的。另一本

^① 表音法：用书写符号或印刷符号表现某一语言的读音的方法。

《宗教改革史》(*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则是在兵荒马乱的内战期间以及繁忙的事工时抽空完成的。收集历史材料是一项费力耗时的的工作，而且将这些材料消化和整理成脉络分明的记录更需要大量的空闲时光以及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不能分心和走神。由于作者不具备这些条件，故而可以解释那部作品中为何经常出现混乱不清的描述。但即便有诸如此类的错误存在，这本书仍然是了解那段时期教会行为的主要信息来源。尽管有人猛烈攻击其真实性和准确性，但书中记载的所有主要事件都陆续得到了其他文献资料的证实。

诺克斯出版的唯一的一部神学专著是关于对预定论的辩护。这是一部非常珍贵的作品，看过的人极少。对于预定论这个微妙棘手的主题，诺克斯以清楚明晰但又不失审慎的笔触，作了深刻犀利的阐述。

到此为止，我已经尽力为我们国家的改教者立传评述了他生平的重大事件、他的观点、著作以及他在追求信仰和自由的事业中所付出的努力。如果这本传记能够比通常勾勒的形象更加公正和丰满地再现诺克斯的人格，如果它能够对说明那段时期的教会历史有所帮助，并激发他人对该主题投以更多的关注；总之，如果它直接或间接地证实了一位满有智慧和怜悯的上帝在成就一场造福于这个国家的伟大变革时所施行的护理之工，那么我所投入的劳动就没有白费，并且得到了回报。

样的义务强加给君主。”新教领袖告诉太后，如果她违反和自己的臣民所立下的约定，他们将不再对她效忠，并警告她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见此架势，太后的口气缓和下来，答应设法阻止对传道人的审判。但没过多久，当她听说改革宗信仰已经传入珀斯镇的时候，她故伎重演，传唤所有传道人于5月10日到斯特灵（Stirling）报到，出席审判。

我们的改教者在得知这一消息时的心情，从以下这封书信里可见一斑；这封信是他在苏格兰登陆后的第二天匆匆写下的：

亲爱的姊妹，愿圣灵永恒不绝的安慰归给你。仅此寥寥数语，向你告知，因着上帝满有怜悯的旨意和安排，我于5月2日到达了爱丁堡。我不清楚上帝在这个国家下一步的作为，但我知道会有一场空前的争战。撒旦已猖狂到穷凶极恶的地步，但赞美我的上帝，他让我来到了决战的前沿。因为我的传道同仁接到指令，要在5月10日那一天在摄政太后面前答辩；我也打算出席那场审判（如果上帝没有拦阻的话），无论生死，总要荣耀上帝的尊名——他曾以恩慈垂听我漫长的呼求。姊妹，请你为我代祷，使我在战斗临近时不至于退缩。我本想和你分享其他的事情，但因忙于四处奔走旅行，所以抽不出时间写信。请参阅我从迪耶普给你发的信，并将我的近况转告给我的弟兄古德曼先生。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你同在。

5月3日，草书于爱丁堡

尽管诺克斯自己的官司先前已被审断，并且当局已经宣布了对他不利的判决，但他毫不迟疑，决意要出席在斯特灵的公审大会，为弟兄助一臂之力，分担他们面临的危险。在爱丁堡仅仅休息了一天之后，他赶到了邓迪，发现安古斯（Angus）和蒙斯（Mearns）地区的新教领袖已经聚集在那里；这些人决心与他们的牧师同赴公审会场，公开宣布对于那些遭到指控的教义的坚信。作为一位新教